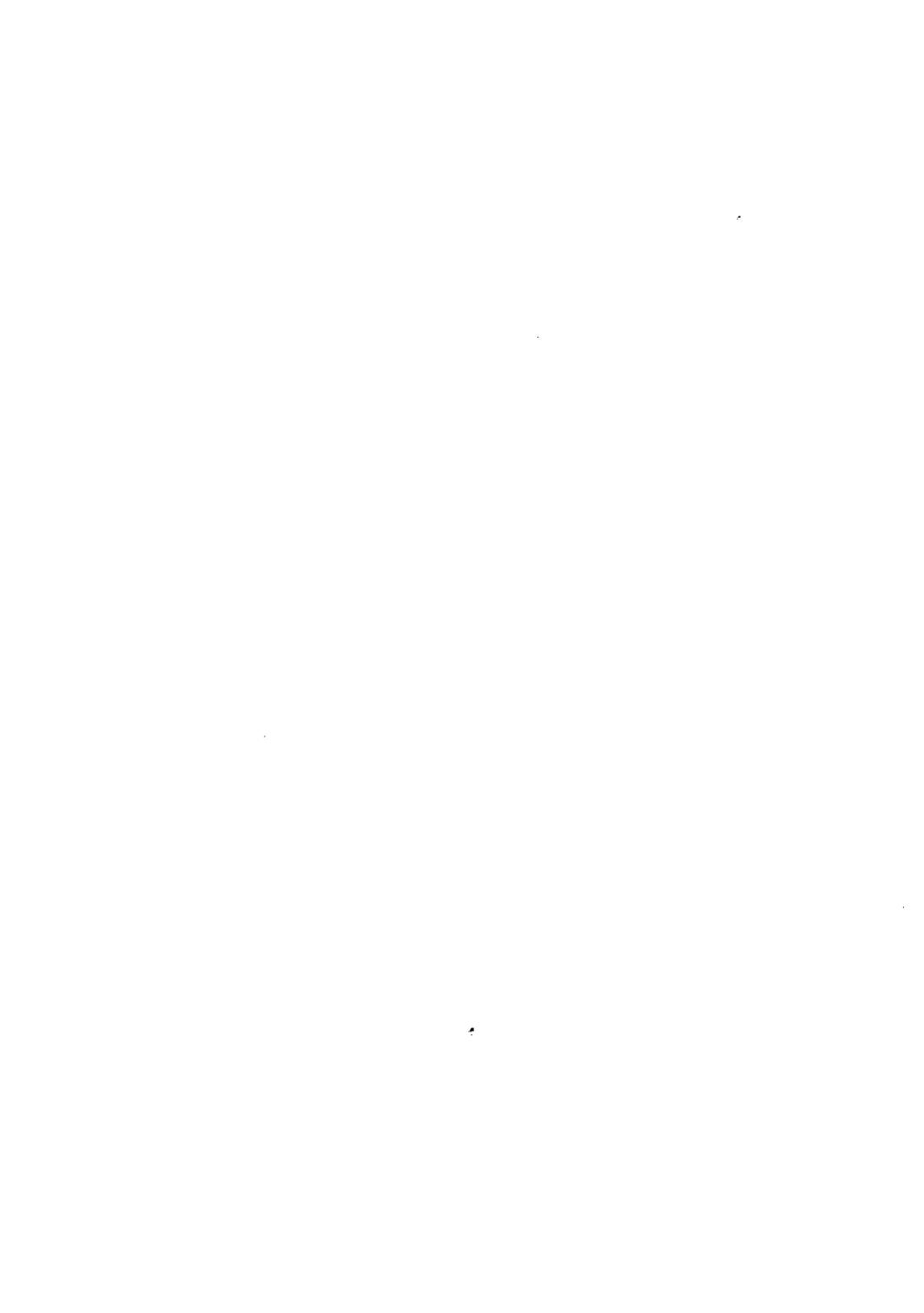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中文叢書系列 ⑥

中共史論

第一冊

郭華倫 著



中共史論

第一冊

郭華倫著



吳序

中共史論作者郭華倫教授對中共歷史曾有深入研究，撰成「史論」，預計五冊，每冊以十一章為度，可望明年完稿，約百餘萬言。現郭教授為應政大東亞研究所之需要，先刊印第一、二、三冊，共三十三章，都八十萬言。本書各章節均曾在本所匪情月報及英文月刊（ISSUES & STUDIES）登載，深受讀者所歡迎。英文本第一、二冊早已流行海外，第三冊亦在排印之中。國內外讀者經常查詢本書之出版時間，均以先讀為快，足見殷望之切。

作者之寫作，係由中共之成立，直至其竊據大陸，將近三十年期間，把中共歷史作一詳明的記述和加以客觀的論斷。這三十年，也是中國現代史急劇變化的時期，而其變化的主因，一為本黨領導國民革命與抗戰，其次便是中共陰謀之得逞有以致之。因此，如果不研究中共歷史，對於當代中國，實難作全貌的瞭解，這也是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一個缺點，「中共史論」或可為吾人彌補這一空虛和缺陷。

在這近三十年期間，中共曾以偽善的面目，兩度與本黨和平共存，第一次為本黨北伐時期，第二次為本黨團結禦侮領導八年抗日戰爭階段。在此期間，中共之所以能發展與坐大，實由於中共之統戰陰謀及其寄生本黨政策的結果；事實說明，當中共放棄其依附本黨政策，而獨力進行十年蘇維埃運動期間，其黨員與武裝力量，不僅直線下降，且幾乎是全軍覆沒，如果不是日寇的侵略，共軍的被消滅，那是毫無疑義的。不幸的是中共利用了抗戰，運用了蘇俄的援助，而竊取了大陸。對自由中國言，這雖是一段

痛苦的歷史教訓，但它對自由世界言，則是動人心魄的警鐘。對此，書中有過深刻的分析，值得世人深加體會。作者在二十二章結論中認為「中共之竊據大陸，完全得力於日寇的侵略和俄共的援助，絕非中共之農村包圍城市陰謀所能倖致。相反的，反五次圍剿的失敗以及七個根據地的完全崩潰，恰好證明鄉村包圍城市陰謀的澈底破產。」作者進一步指出：「只有在內有戰爭，外有侵略以及農民貧困，易被欺騙威脅的條件下，共黨始能實施鄉村包圍城市的陰謀，否則必歸失敗。不幸我國已往情況正屬如此，中共陰謀乃能得逞，這是我國的悲劇，也是痛苦的歷史教訓；這一教訓，在中共高唱世界農村包圍世界城市的今天，是值得加以研究的。」

關於國共兩黨的鬥爭，書中有過詳細的敘述，揭開了當時鬥爭的內幕。作者指出：「國共兩黨進行武裝鬥爭之同時，又展開了秘密的地下鬥爭，這種鬥爭是一種無聲的智慧之戰，較之公開的武裝衝突尤為尖銳。……所以地下鬥爭，雖被中共視為『永遠不能公開』的秘密，但是三十多年後的今天，已有足夠的資料來揭開這一幕『秘密戰爭』的實況了。」作者在這方面蒐集的資料，極為豐富，且係許多反共鬥士以血淚換來的結晶，尤值吾人珍視，且可供民主國家進行反共鬥爭的參考。

中共黨史，實際就是一部中共內部鬥爭的歷史，因而本書特別着重在這方面資料的提供和分析，這些可靠的資料，逐項的駁斥了毛共對於中共黨史的歪曲和竄改，為中共恢復了本來的面目。且以「文革」期間若干突出事件為例，劉少奇被指為叛徒工賊和國民黨的走狗，真相究竟如何？作者在二十七章第七節「關於劉少奇的問題」及三十一章第八節「毛匪的代罪羔羊」中，有過史實的辨正。其次，朱德、

毛澤東的結怨，彭德懷過去的反毛，高崗被迫自殺的禍根，王明被整的遠因，都可在書中找到真實的答。他如陳獨秀、向忠發、瞿秋白、李立三的浮沉，張國燾與毛澤東的分裂及其出走，均有明確的論述。所有這些，在中共欽定的黨史書刊中，是無法發現的。

對於毛澤東，在書中，尤其在第二第三冊中，作者根據文件的記載及若干身歷其境的記憶，曾着重予以敘述，幾乎每一章之最後一節，都以毛澤東為對象加以分析評論，讀者自可得到清楚的瞭解。二十六章第八節，分析張國燾的失敗時，作者曾經引用「紅軍大學」學員的一段話來形容毛澤東，學員們說：「毛澤東是心狠手辣而又狡猾奸詐的陰謀家」，證諸毛澤東的所作所為，這種論斷，真是一針見血，入木三分。

今天毛澤東之反俄，亦有其歷史根源，作者在十六章第九節中，認為毛澤東接受了陳獨秀等人反共產國際，反對蘇俄的衣鉢，書中這樣寫道：「中共建黨以後，一九二一年九月，陳獨秀與國際代表馬林開始發生爭執。一九二二年八月，西湖中委會，因加入國民黨問題，陳獨秀等又反對共產國際的決定。以後在武漢，發展成為對共產國際的反抗和指責，從此在中共黨內便形成了反對國際的傳統，把國際代表稱之為不懂中國情形的『毛子』。李立三在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國際主席團會議中說：『中國黨向來不尊重並且看輕國際，這已經有好幾年了，尤其是在陳獨秀領導的時代，對於國際是很不尊重的。』於是李立三便承襲了這種傳統說：忠實於中國革命和忠實於共產國際是兩回事，打到了武漢再和國際說話就不同了。瞿秋白的調和主義時代亦復如此，甚至不准國際代表說話，到了一九四三年，共產國際解散，於

是，毛澤東便趕緊接受了陳獨秀反國際的衣鉢，先行對國際派開刀了。」不過，毛澤東對於史大林則不同，當一九五六年赫魯雪夫清算史大林時，毛澤東持反對的態度，認為史大林功大過小，此中原因，除為保持毛澤東之個人崇拜外，本書二十九章第一節作了如下的答案：「經過史大林的認可和指示，毛澤東從此便逐漸成為中共黨的領袖，也正因為如此，所以毛澤東對於史達林沒齒難忘，畢生感戴。」另一方面，毛澤東今天所強調的「不斷革命論」，則是來自共產國際代表羅民那直的傳授，遠在一九二七年，中共中央「八七會議」，毛澤東便接受羅民那直（托派份子）的「無間斷革命論」，返湖南策劃秋收暴動，以後更執行半托洛斯基主義的立三路線，所以今天毛澤東的「不斷革命論」是來源有自不足為奇了。

本書採用的史料豐富而廣博，為中外類此書刊所不及，自由中國最可貴的中共黨史資料，如青潭的蒼廬，北投的石叟室以及中國國民黨的黨史會所藏第一手資料，大都經作者精選採用，尤其難能可貴的，就是收集了許多第一手的活的資料，即今天居留在台灣和海外的許多反共人士，其中有的曾是中共的高級幹部，他們以親身經歷的事實，對本書提供了豐富的資料。作者使用這些活的資料時，顯然曾經精細的選擇和安排，與中共文件加以對比研究和判斷，使事實與文件銜接和相互印證，以揭發事實真相，此與若干隨便引用他人回憶錄的著作，是不能同日而語的。至於每章之附錄，亦係從許多原始文件中精選出來的，極富研究價值，從這些文件中，也可以證明作者的敘述和論斷是以原始文件和活的資料為根據的，而不是一般的估計和猜想。

本書的另一特點，就是每一章的最後一節大都是綜合的分析或評論，也就是本書定名為「史論」的

來源。一般說治史難，論史更難，作者以其透澈的眼光，豐富的經驗，刻劃出每一時期中共內鬥的真相及其陰謀手段，實非普通史家所能下筆者，而其立場正確而客觀，評論平實而公正，更增本書之特色。譬如，本書在許多地方曾批評共產國際和史大林，但在第十章第七節「失敗責任的檢討」中，關於「武漢政權」所處環境的估計，作者寫道：「持平而論，斯大林的分析，固然是為自己辯護，但在若干方面尚符合當時的形勢，一般說是比較冷靜的。」這種就事論事不避忌諱的評論，使本書既有別於中共欽定的黨史書籍，亦與若干作家的「反共成見」不同，這種避免主觀武斷，處處從當時當地，就事論事，乃至設身處地來觀察和分析問題的客觀態度，值得特別向讀者介紹。

本書各章在連載期間，及英文本第一、二冊出版後，國外若干大學，指定為學生必讀的書籍，若干研究類此問題的研究生，則作為寫作論文的重要根據，且常致函作者，就若干問題作深入的討論。國內讀者，大都希望印行中文本，以利大陸問題之研究。本所為應各方要求，特先印行中文本三冊，但為適應今天的國內環境，只能作有限度之供應，一俟五冊載完及擴大匪情研究時，再作計議。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主任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主任

吳 俊 才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八月

中共史論 第一冊

中共史論 第一冊

目次

第一章 中共建黨前後概況·····	一
一、革命的輸出和輸入·····	一
二、「不要忘記東方」·····	三
三、臨時中央的工作·····	五
四、中共一全大會·····	九
五、初期史實的竄改·····	一一
附錄：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後的見聞·····	一八
第二章 中共一全大會文件之研究·····	二五
一、文件的發現·····	二五
二、黨綱決議的主要內容·····	二六
三、黨綱決議的真實性·····	二八
四、大會宣言·····	三〇

五、領導機關問題·····	三一
六、中共的歪曲·····	三二
附 錄·(一)一九二一年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黨綱·····	三四
(二)一九二一年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決議·····	三六
第三章 中共二全大會之若干問題·····	三九
一、問題爭執焦點·····	三九
二、內容說明時間·····	四〇
三、宣言與主張孰先孰後·····	四一
四、兩個杭州會議問題·····	四四
五、「二大」決議和中委·····	四六
附 錄·(一)中共「二大」宣言·····	四九
(二)中共黨章·····	五五
第四章 中共戰略策略的轉變·····	五九
一、「一大」前後中共之戰略方針·····	五九
二、「二大」戰略轉變的根源·····	六二
三、俄化的戰略策略·····	六八

四、聯合戰線的陰謀·····	七一
五、策略轉變的論爭·····	七三
附錄：一九二二年中共「二大」決議·····	七九
第五章 中共三大大會的論爭·····	九三
一、初期的黨內鬥爭·····	九三
二、「三大」爭論的來源·····	九五
三、「三大」決議和宣言·····	九九
四、「三大」爭論的重點·····	一〇一
五、可疑的中共記述·····	一〇四
附錄：(一)「三大」決議·····	一一〇
(二)「三大」宣言·····	一一一
第六章 國共兩黨初期的鬥爭·····	一一三
一、中共第四次要求建立聯合戰線·····	一一三
二、鮑羅廷來華出任國民黨顧問·····	一一五
三、李大釗發表加入國民黨之聲明·····	一一七
四、國民黨提出檢舉彈劾共產黨案·····	一二一

五、中共對國民黨一全大會之歪曲·····	一一五
附 錄：(一)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關於中共「三大」報告決議案·····	一二九
(二)李大釗對共產分子加入國民黨之聲明·····	一二九
(三)中共中央關於共產黨在國民黨工作及態度決議案·····	一三二
(四)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決議案·····	一三二
(五)謝、張兩監察委員與鮑羅廷問答紀要·····	一三三
第七章 中共的四全大會·····	一三九
一、商團事件之爭辯·····	一三九
二、放棄政權與北伐之謬論·····	一四一
三、全國的國民會議運動·····	一四五
四、四全大會宣言和決議·····	一四七
五、中共羣衆運動的陰謀·····	一五一
六、四全大會與黨內鬥爭·····	一五六
附 錄：中共第四次大會宣言·····	一六〇
第八章 國共兩黨再次的鬥爭·····	一六三
一、理論的鬥爭·····	一六三

二、內部的分裂·····	一六七
三、中山艦事變·····	一七一
四、暫時的退守·····	一七五
五、策略的爭論·····	一七九
附 錄：(一)我們最近在北方國民黨工作中應取的態度·····	一八六
(二)中共與國民黨關係問題議決案·····	一八八
第九章 北伐期間的中共·····	一九三
一、兩種不同的北伐觀·····	一九三
二、中共中央擴大會議·····	一九七
三、共產國際決議·····	二〇〇
四、南京事件與上海暴動·····	二〇三
五、國民黨的清黨運動·····	二〇八
六、中共的檢討和爭論·····	二一三
附 錄：(一)中共中央第二次執委擴大會議決案·····	二二四
(二)莫斯科致駐華武官訓令·····	二三〇
(三)汪精衛、陳獨秀聯合宣言·····	二三一

第十章 五全大會與機會主義	二一三三
一、鮑羅廷的退却	二一三三
二、中共的五全大會	二一三七
三、過火的農民運動	二一四一
四、兩湖的反共事件	二一四四
五、共產國際的訓令	二一四八
六、政治局領導的破產	二一五五
七、失敗責任的檢討	二一六〇
八、兩種機會主義類型	二一六八
附 錄：中共五全大會爲「五一」節紀念告中國民衆書	二一七六
第十一章 中共的盲動主義	二一七九
一、八一南昌暴動	二一七九
二、八七緊急會議	二一八二
三、四省秋收暴動	二一八七
四、十一月擴大會議	二一九三
五、十二月廣州暴動	二一九六

六、機會主義餘毒·····	二九九
七、左傾盲動主義·····	三〇七
八、不同之估價·····	三一二
附錄：(一)中央通告第十三號——爲葉賀失敗事件——·····	三二三
(二)中共的政治任務與策略的議決案·····	三三〇
(三)黨的組織問題議決案·····	三三九
(四)兩湖暴動計劃議決案·····	三四一
(五)最近組織問題的重要任務議決案·····	三四四
(六)政治紀律議決案·····	三四九
(七)陳獨秀的來信(一)·····	三五三
(八)中共中央致朱德信(一)·····	三五四
(九)中共中央致朱德信(二)·····	三五九
增補一：評毛匪在「九大」的講話·····	三六一
附錄：毛匪澤東在匪黨「九大」的講話·····	三六五
增補二：中共「一大」若干問題之研究·····	三六七

增補三：再論中共之建黨日期·····	二七五
附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	三九〇

中共史論 第一冊

第一章 中共建黨前後概況

一、革命的輸出和輸入

毛匪澤東說：「革命運動是不能輸出，也不能輸入的。」（註一）這是二十多年前的說法，當然有他自己的理由。但是也有人說，馬列主義和中共是舶來品，不適合於中國國情，這又是幾十年前中國的老話，同樣還是有他的道理。

毛匪當時所以說革命不能輸出或輸入，係由共產國際解散（一九四三年五月）而加以解釋稱：「假使從來沒有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亦必將應運而生，這是歷史的必然定律。」（註二）不過，如果沒有共產國際，照「歷史的必然定律」，也許中國要在工業革命之後才有共產黨，這是幾十年以後的事了。同樣，如果沒有「共產國際對於這三個革命運動都做了很大的幫助，這就是北伐戰爭，土地革命與抗日戰爭」（註三），那麼，中共也許還在「革命」歧途中摸索，沒有這樣容易的就奪取了政權，竊據了大陸。

說馬列主義和中共是舶來品，係指其來自俄國的輸入和移植，係指馬列主義和共黨不是土產於中國，這實在是不爭的事實。同樣，所謂不適合於中國國情，係指中國經濟落後而言；中共所強調的「馬列

主義中國化」，到底還是改裝商標或是加工製造的洋貨，這種改裝的來路貨，在農業中國的古老市場，確實難有銷路。然而，事實却是不僅中共竟能產生發展和壯大，而且佔據了整個大陸，這就不能不「歸功」於第三國際和俄共了。

如果細心觀察中共建黨前後情形，就不難瞭解事實真象。

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家，經濟非常落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之後，民族工業才有若干發展，可是在列強和軍閥的束縛下，其發展是有限的，而且是以輕工業為主。當然，隨着工業的發展，中國工人階級也逐漸增加，有了中共產生的社會基礎（或稱階級基礎），不過，工人的數目還是有限，毛匪澤東於一九二六年估計：「現代工業無產階級約二百萬人。」（註四）這是一個估計，而且是誇大了的說法。一九一八年據北京農商部的統計，全國工人人數共計一七四九三三六人（註五），這是包括若干手工業工人在內的統計，如果除去手工業工人，當時中國產業無產階級最多不過一百五十萬人，佔全中國人口百分之零點三七，中共建黨的階級基礎是如何的脆弱便可想而知了。

另一方面，由於中國工業的發展偏重於輕工業，產業工人在成份上，婦女兒童佔相當的數量，「老工人」的比重極其微弱，大部份是剛由農村流進城市的農民、手工業者和小資產階級的破落戶，所謂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是不能設想的。因此，中共建黨的所謂思想準備，也是沒有階級意識作為根據的。

照共黨的說法，共產黨的產生，是建築在工人階級由「自在階級」變為「自為階級」的基礎上，建築在所謂工人階級的階級覺悟的基礎上；但是，中國產業工人大都是「新工人」，這些人充滿農民意識

、行會觀念、流氓思想，他們還沒有建黨的覺悟和需要，於是中共的產生便落在少數知識分子身上，成爲一種畸形的小資產階級集團。

誠然，一九一九年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引導中國知識份子追求「民主」與「科學」，研究國外思潮，一部份知識分子受俄國十月革命影響，接受社會主義思想，企圖以馬克斯主義來解決中國問題，其代表便是中共創始人陳獨秀。儘管如此，當時如果沒有第三國際代表來華，「輸入」馬列主義和移殖共產黨，并在經費上全力加以支援，那麼，這些知識份子還是限於馬克斯主義的思想研究，限於口頭上文字上的空談和清談，中共的出生還是遙遙無期的。

由此可見，中國的社會形態和階級分化情況，決定了共黨在中國建黨的當時，既缺乏社會基礎，又沒有階級覺悟，而是一種道地的革命輸入和強制的移殖，無怪匪黨以後就成爲農民、小資產階級變種的產物，成爲第三國際和俄共的「兒子黨」了。

二、「不要忘記東方」

第三國際的創立及其向東方發展，向中國輸入革命，當然是基於當時俄共的利益和需要。因爲一九一七年俄共的十月革命，固然建立了第一個赤色政權，但是它還是在風雨飄搖中，國內有白俄軍激烈的抵抗和反撲，國外有列強的武裝干涉和封鎖；在當時，列寧認爲只有掀起世界革命，才能保障俄國革命的勝利，他說：「由此就有俄國革命面前的最大困難，就有他所應解決的最大歷史問題：必須解決國際

任務，必須引起國際革命，實現由狹隘的一國範圍的我國革命進到世界革命的這個過渡。」「若從全世界歷史範圍內看來，那就可以肯定地說，如果我國革命始終是孤立的革命，如果其他各國不發生革命運動，則我國革命的最終勝利是沒有希望的……我再說一遍，能把我們從這一切困難中拯救出來的，就是全歐革命。」（註六）爲着掀起全歐革命和世界革命，一九一九年三月，在莫斯科成立了第三國際。列寧在致閉幕詞時抱着很大的希望說：「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是有保證的。國際蘇維埃共和國的建立已經爲期不遠了。」（註七）

果然，經過俄共和第三國際的策動，在這一時期，歐洲爆發過革命，不過這些革命很快的都失敗了。德國慕尼黑共產黨人於一九一九年四月奪取該市政權，五月一日便被德國政府軍所擊敗。匈牙利共產黨柏拉·康（Bela Kun）在社會民主黨支持下，於一九一九年三月廿日宣佈成立蘇維埃共和國，也祇生存了五個月，八月十九日便告崩潰。同時歐洲各國政府也開始壓制各國共黨的活動，出現了「資本主義局部的穩定」，於是列寧所希望的「全歐革命」便成泡影了。

西歐無產階級革命的失敗，使俄共和第三國際不能不轉變戰略，把進攻的方向，由西方轉向東方，企圖在東方打開一條出路，并以東方包圍西方。史大林早在一九一八年就認爲：「一分鐘也不能忘記東方，至少因爲它是世界帝國主義『取之不盡的』後備力量和『最可靠的』後方」，「共產主義的任務就是要打破東方被壓迫民族數百年來的沉睡，用革命的解放精神來感染這些國家的工人和農民，喚起他們去反對帝國主義……」，「誰想要社會主義勝利，誰就不能忘記東方。」（註八）於是，如何來組織中國

共產黨，如何來策動中國革命，便成爲第三國際和俄共的重要課題了。

在第三國際派遣代表來華以前，俄共早就在中國做了許多擴大俄國革命影響的鋪路工作。一九一八年七月四日，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長齊采林（G. V. Chicherin）在第五次蘇維埃大會的報告中宣稱：蘇俄政府將對中國撤廢沙皇政府對東北的各種壓迫及其在中國和蒙古的治外法權，放棄沙皇政府以多種口實對中國人民所加的負擔，撤回沙皇政府對於駐在國的領事館所設的武裝部隊，並將中國各種賠款中的俄國賠款交還中國。一九一九年七月廿五日，蘇俄代理外交人民委員長加拉罕（L. M. Karakhan）根據齊采林的報告，以蘇俄政府名義，發表一篇致中國人民和南北政府的宣言，提出把所有沙皇政府單獨或與日本和其他協約國共同自中國攫取的一切權益歸還，不要求任何補償。

蘇俄政府這種偽裝親善的外交諾言，雖無確實兌現之意，但在中國却引起了良好的反響。一九一九年在巴黎和會遭受拒絕因而掀起五四運動的各項要求，居然得到蘇俄政府的支持，并自動聲明放棄在華一切權益，當然博得了中國人民的好感，同時對十月革命和社會主義也發生憧憬，從而鋪平了移植共黨的道路，俄共由東方包圍西方的迂迴戰略便開始了。

三、臨時中央的工作

第三國際經過上述擴大影響的鋪路工作以後，於一九二〇年春派遣東方部書記維丁斯基（Voitsinsky 中國名爲吳廷康或胡定康）來華策動組織共黨。維丁斯基帶同楊明齋（華僑，山東人）和馬邁也夫等來

華後，在北京與李大劍等有所接觸，後經李大劍的介紹，又到上海「首先找到了陳獨秀，遂於一九二〇年五月在上海發起組織中國共產黨」（註九），「當時陳獨秀、李漢俊、沈玄廬等一致主張成立中國共產黨。後來又有李達、俞秀松、施存統加入，於是他們完成了中國共產黨的黨綱草案，成立了中共臨時中央於上海，推陳獨秀任書記，并向國內外發展組織。」（註一〇）

自一九二〇年五月中共臨時中央在上海成立後，陳獨秀等即積極展開工作，主要活動有下列各項：

（一）在各地建立黨的組織：在一年間，即中共一次大會以前，先在上海、北京、廣州、湖北建立支部，後在湖南、山東、日本、巴黎建立地方組織。各地最初加入組織的主要名單有：

北京：張國燾、李大劍、張申府、黃凌霜、袁明熊、張太雷、劉仁靜、鄧中夏等。

廣州：陳公博、譚平山、譚植棠等。

湖北：董必武、陳潭秋、惲代英等。

湖南：毛澤東、何叔衡等。

山東：王燼美。

日本：周佛海。

巴黎：蔡和森、周恩來、李立三、羅邁、李富春、王若飛、向警予、陳延年、趙世炎、蔡暢、聶榮臻等。

（二）創辦刊物進行宣傳活動：中共臨時中央成立後，首先把陳獨秀所主編的「新青年」轉變為中共

的宣傳雜誌，於一九二〇年五月一日出版勞動紀念專號，介紹各國工人運動以及中國各地工人狀況，陳獨秀以「勞動者的覺悟」爲題，號召工人「第一步覺悟是要求待遇。第二步覺悟是要求管理權」，「管理政治、軍事、產業，居於治人的地位」，把中國古話倒轉過來說：「勞力者治人，勞心者治於人」（註一一）。其次，於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七日創辦「共產黨」月刊，作爲「黨報」，「介紹了俄國共產黨的歷史，登載了列寧的『國家與革命』等若干著作，以及有關共產國際的情況，歐美各國共產黨的動態報導，此外還有批判無政府主義和極粗淺的如何在中國實行馬克斯學說的文章。」。（註一二）

除此之外，各地支部相繼創辦刊物，藉以廣泛宣傳共產主義。其中較有代表性的刊物爲：上海的「勞動界」（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五日出版）和「夥友」（一九二〇年十月十日創刊）；北京的「勞動者」（一九二〇年十月革命節出版，後改名爲「仁聲」）；廣州的「勞動聲」和「勞動與婦女」（一九二一年二月十三日創刊）等等。

（三）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該團成立於一九二〇年八月，由俞秀松任書記。當時團員祇有八人，後以上海工讀互助團爲發展對象，吸收了廿多人。「這些團員都是準備去莫斯科留學的。青年團每星期舉行一次會議，每次都有政治報告，報告的內容多半是由黨規定下來的，俞秀松擔任報告的時候多」（註一三）。當時該團團員成份非常複雜，有馬克斯主義者，有無政府主義者，有基爾特社會主義者，有工團主義者等等，致使思想和行動無法統一。因此，該團於一九二一年五月加以解散，到同年十月重新組織。

（四）創辦「外國語言社」（或稱外國語言學校）：「創辦外國語言學校的主要目的是爲到莫斯科學

習的青年團員補習俄文的。雖然外國語言學校的章程中有英文班、法文班，但是並沒有開班授課。俄文班的學生來去無定，最多的時候，有廿餘人，最少時候約十餘人。一九二一年春天學生最多。劉少奇同志、羅覺（亦農）同志、傅大慶同志、李啓漢（森）同志，都曾經在這個學校裏學習俄文。」（註一四）該校由楊明齋任校長。

（五）開展工人運動：在上海建立了最早的赤色工會「上海機器工會」（一九二〇年十月）和「印刷工會」（同年十二月），並分別發行「機器工人」和「友世畫報」作為工會刊物；一九二一年一月，北京支部「開始在長辛店開辦勞動補助學校，由鄧中夏等領導。接着，粵漢路的徐家棚和上海、安源、廣州、浙江等地也都開設工人學校、工人子弟學校」，「三月六日，中華海員工業聯合會，在蘇兆徵、林偉民等領導下成立」（註一五）。湖北的地方組織「也在京漢鐵路及其他各工廠中間進行工人運動；一九二一年三月，領導了漢口租界人力車夫反對車行增加車租的大罷工」（註一六）等等。

（六）清除無政府主義者：各地支部成立之初，把無政府主義者亦網羅在內，但經過內部的鬥爭，這些人不久相繼退出組織或被開除。這是共黨初期的內部鬥爭和分化，「這一分化，首先在北平的小組織（按：即支部）中開始。北平小組通過中共綱領時（北平小組自己擬定的臨時綱領），因綱領中有贊成無產階級專政的一條，在討論時，黃凌霜等表示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爭論的結果，無政府主義者均退出了黨。在中國各地黨的小組中也發生了同樣的分化（廣東黨的小組最初完全操縱在無政府主義派手中）。這時黨內一面清洗了一批無政府主義份子，一面在組織上又吸收了一些新的份子進來。張太雷、鄧中

夏、劉仁靜（在北平加入）、譚平山、陳公博（在廣州）、沈雁冰（在上海）、惲代英（在湖北）等就是在這一時期中加入了黨的」（註一七）。

四、中共一全大會

中共臨時中央經過一年多的工作，已經建立了初步的組織基礎，乃於一九二一年七月廿日（註一八）在上海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大會代表共有十三人（註一九），代表七個地方黨的組織和五十七個黨員，出席代表名單如下：

上海代表	李漢俊	李	達
北京代表	張國燾	劉仁靜	
廣東代表	陳公博	包惠僧	
武漢代表	董必武	陳潭秋	
長沙代表	毛澤東	何叔衡	
濟南代表	王燼美	鄧恩銘	
留日代表	周佛海		

中共一全大會，原在上海貝勒路李漢俊家舉行，但在第四天晚上，遭受法國巡捕的搜查，乃於次日改在嘉興南湖的一艘船上開了最後一次會議，前後會期共五天。大會主席張國燾，紀錄周佛海、毛澤東

。會議是在第三國際代表馬林 (Maring) 和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尼康斯基 (Nikonsky) 兩人領導之下進行的，以討論黨的組織、勞動運動以及大會宣言爲中心。大會通過了「黨綱」、「工人組織」、「工人補習學校」、「研究勞工組織之學術團體」、「宣傳工作」、「對現有各政黨之態度」、「與第三國際之關係」等各項決議及大會宣言（註二〇），最後還產生了新的中央領導機關。

大會以全國黨員僅有五十七人，暫不成立中央執行委員會（對外則可用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而僅選出由三人組成的「中央局」（註二一），其分工情形和名單如下（註二二）：

書記 陳獨秀

組織委員 張國燾

宣傳委員 李達

候補委員 周佛海 李漢俊 劉仁靜

會中在討論組織路線和黨的綱領時，發生了很大的爭論。以劉仁靜爲代表的「左派」，反對任何合法運動，並認爲智識份子都是資產階級思想的代表，一般應拒絕其入黨；以李漢俊爲首的「右派」，則主張限於進行合法運動，認爲黨祇需要從理論上進行宣傳工作，祇需要辦馬克斯主義大學，辦圖書館，出版各種報紙，而不應該發展組織和進行工人運動（註二三）。大會對這種「左」「右」傾向進行了批判，認爲：「黨的當前中心工作任務是發展職工運動，決定成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作爲黨領導職工運動的公開機關。」（註二四）關於黨的組織原則，決定完全採取俄共布爾塞維克的原則，「明確

規定了黨必須成爲有戰鬥力的有紀律的黨。」（註二五）

關於一全大會宣言，在討論時亦曾發生激烈辯論，因而「第一次宣言未能順利發表。此第一次宣言的原稿分爲兩部份。第一部份敘述中國之政治及經濟情況，係根據馬克斯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極力主張中國進行社會革命的必要性。第二部份列舉北方及南方政府的劣蹟，并陳述孫中山政府并不比北方軍閥集團好。這兩種不同見解的部份，在共黨大會中引起最激烈的辯論。其中一些黨員辯護說，雖然在國民黨的綱領中有著許多錯誤的觀點，但它多少還代表著當時的新傾向，孫中山所提倡的一般公共福利原則，亦與共產主義所提倡者相似。而在另一方面，大多數黨員主張因有許多國民黨員反對共產主義，所以南方政府應予推翻。最後，該宣言終於被通過了，可是第二天又決議了一項議案，將宣言的發表問題交中央執行委員會來決定。在第一次代表大會後，該宣言始終未被公佈，而該宣言的原稿至今猶未爲世人所知」（註二六）。

五、初期史實的竄改

由於匪黨建黨前後的史料貧乏，於是現在的匪黨史家就利用這一空隙任意竄改當時的史實，目的不過是提高李大釗，貶抑陳獨秀，從而神化毛匪而已。

首先是陳獨秀與建黨關係問題。大家都知道，陳獨秀是五四新文化運動領導人物之一，當時與胡適齊名飲譽全國；他主編「新青年」（一九一五年九月創刊）和「每週評論」（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創刊）

，同時又是傳播馬克斯主義的第一人，還因散發「告北京市民」傳單而在北京被捕，後來在上海成爲中共的創始人和領導者。現在的匪黨史家，對於這些史實視而無睹、或輕描淡寫的提到一筆，還加以苛刻的批評，而把五四文化運動，馬克斯主義的傳播工作，甚至匪黨建黨初期的活動，歸功於李大劍或毛澤東，例如他們說：「在傳播馬克斯主義工作上，思想性最高的刊物之一，是毛澤東同志主編的『湘江評論』」（註二一七），但是這些史家們又不能不承認：「從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一九年，『新青年』上刊載的有關馬克斯列寧主義與蘇聯問題及中國工人運動的論文及通訊等，共有一百三十篇。」（註二一八）這樣，只出版了五期的所謂「思想性最高」的「湘江評論」怎能與「新青年」相提并論？何況據李銳的「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說，毛澤東於接到臨時中央的「共產黨月刊」（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七日創刊）并予介紹之後，才開始對馬列主義有所認識，這又怎能與陳獨秀相比？

關於匪黨的工人運動，匪黨史家也把毛澤東與陳獨秀相提并論，甚至說「毛澤東同志是把馬克斯列寧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結合得最好的代表者。」（註二一九）其實毛匪進行的所謂工人運動，不過是與湖南的無政府主義者黃愛、龐人銓打交道，想利用他們的工會而已。只有陳獨秀最早組織上海機器工會和印刷工會；還在一九二〇年五月臨時中央成立以前，他就上海船務棧房工人中發表通俗的演講（見「新青年」七卷六號）。現在的匪黨史家却把陳獨秀的工人工作歪曲成爲劉少奇或毛澤東的「功績」了。（註三〇）

至於建黨之初，上海臨時中央成立時，不僅沒有毛澤東，而且也沒有李大劍。北京支部的發起人和負責人爲張國燾，而不是李大劍（註三一）。當共產國際代表維丁斯基到北京後，雖然會見了李大劍，

但一說到組黨問題時，李大劍便沒有主張，而要介紹他到上海與陳獨秀商談。馬林到北京，同樣也見了李大劍，結果還是由張國燾陪同赴滬召開一全大會的（註三二）。可見匪黨的建黨歷史，無論如何是離不開陳獨秀的，想以李大劍或毛澤東來代替陳獨秀的作用和地位，那不僅徒勞，而且貽笑方家！

其次是匪黨臨時中央問題。鄧中夏於一九三〇年六月在莫斯科編寫「中國職工運動簡史」時，開頭就說：「中國『現代式』的工會運動，是一九二〇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後才開始的。」（註三三）在該書第二章又說：「一九二〇年中國共產黨成立。」（註三四）鄧中夏所說的中國共產黨成立，當然是指臨時中央的建立而言。棲梧老人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後的見聞」（見附錄），更詳述了臨時中央成立經過和具體工作。這一臨時中央是在第三國際代表維丁斯基認可和幫助下建立的，各地黨的支部也是在臨時中央幫助和指導下建立起來的，這不是任何人所能編造的史實。可是現在的匪黨史家却把臨時中央取消了，把它改成「小組」或「發起小組」；同時把先期成立的北京（一九二〇年九月成立）、廣東（一九二〇年十二月成立）、武漢（一九二〇年九月成立）支部，和後期成立的長沙（一九二一年春）、山東等地支部一律改稱為「小組」，他們說：「這時各小組以上海小組為中心發生聯繫，尚無統一的中央組織。」（註三五）這一竄改的用心是很顯然的，把較遲成立的長沙「小組」毛澤東與上海「小組」陳獨秀並列為匪黨的始創者，既提高了毛匪在當時的地位，又貶低了陳獨秀的臨時中央，豈不是神化毛匪又一「傑作」？

最後是有關一全大會的若干問題。關於「一大」通過大會宣言一節，雖然中共的前期史書承認：「

一次大會原擬討論：（一）中國共產黨宣言……後因各種關係，中共宣言沒有討論（原來起草之宣言，會後以小冊子形式印發）。」（註三六）中共中央宣傳部早期編印的「共產主義與共產黨」也說：「而大會宣言草案只在大會之後才公佈。」（註三七）雖然周佛海、陳公博等對「一大」宣言的爭論及其內容言之鑿鑿，但是現在的匪黨書刊都一律隻字不提而加以否認了。爲的什麼呢？道理是很明白的，因爲宣言內容說要反對孫中山先生，要推翻南方政府，這對於匪黨是多麼難堪呀！

從「一大」通過的「黨綱」看來，當時中共主張在中國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對於這一點，現在的匪黨史家當然也一律加以否認了。有的說：「一大」認爲「在目前必須進行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對孫中山的進步運動應採取黨外合作形式予以援助。」（註三八）有的說：「最先明確的提出了中國革命之反帝反封建的一般任務。」（註三九）有的甚至說：「毛澤東等提出了正確的主張」，認爲「現階段中國革命則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而不是社會主義革命。」（註四〇）董必武也在人民日報發表如下回憶：「董老回憶『一大』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大會提出過『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的政治綱領，這個綱領是在宣言一類的文件中表達出來的。」「董老記得曾經參加過起草這類文件的工作，所以還隱約想得起這個綱領的內容。『一大』文件以後就遺失了。」（註四一）好在陳公博在哥倫比亞圖書館中還留下了匪黨「一大」文件，這一文件就把所有匪黨史家的虛構歪曲，把董必武的違心偽證都澈底粉碎了；否則，衆口一詞，集體偽造，竄改史實的「傑作」又成功了。

最可笑的，還是關於毛匪澤東在「一大」的地位作用之瞎捧。匪黨的後期書刊說：「毛主席被選爲大

會的祕書長。」「從中國共產黨建立的第一天起，毛澤東主席就是黨最正確的領導者。」（註四二）到了一九六一年，董必武也大捧毛匪，他說：「首先，我們中國共產黨很幸運，毛主席不僅是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成員，并當選為當時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在黨中央以他為首後，他領導黨把馬克斯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的革命實踐相結合，制定了我們在各個革命階段的總路線。黨的政治路線，組織路線，都是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制定的。」（註四三）

這顯然是神化毛匪的信口雌黃。棲梧老人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後的見聞」和「二七回憶錄」中，沒有說過毛匪在「一大」當選為中央委員。曾經參加過「一大」的陳潭秋、李達、陳公博、周佛海、張國燾等，在他們的回憶錄中，從未提到毛匪在「一大」當選中委。匪黨前後期的黨史書刊也從無此說。連毛匪自己也不敢冒充的「一大」中委，現在居然由董必武加封了。至於「黨中央以他為首」，「黨建立的第一天起……」云云，也是虛構歪曲，自不待言。關於毛匪在「一大」的地位，陳潭秋在他的回憶中說得很清楚，他說：「大會選舉張國燾同志為大會主席，毛澤東和周佛海為書記。」（註四四）陳潭秋所說的「書記」，實際就是「記錄」，現在却被歪曲為「大會的祕書長」了。

註一—三：一九四三年五月共產國際解救後，毛澤東於五月廿六日晚在延安幹部大會的報告要點。一九四三年五月廿八日延安「解放日報」。

註四：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七頁。

註五：湖北大學政治經濟學教研室編：「中國近代國民經濟史講義」三四四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出版。

註六：列寧「關於戰爭與和平問題的報告」（一九一八年三月七日在俄國共產黨（布）第七次代表大會上）——「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二卷三四九、三五二頁，一九四九年莫斯科版。

註七：列寧「大會閉幕詞」，「列寧全集」廿八卷四五二頁，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北京人民出版社。

註八：斯大林「不要忘記東方」，「斯大林全集」第四卷一五二—一五四頁，一九五六年八月，北京人民出版社。

註九：中國現代史研究委員會編「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上冊一二七頁，一九四七年七月新民主出版社香港初版。

註十：棲梧老人「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後的見聞」，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北京「新觀察」第十三期。

註一一：「新青年」第七卷第六號九一五—九一六頁，一九二〇年五月一日。

註一二：李銳「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一四三頁，一九五七年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

註一三—一四：「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後的見聞」。

註一五：吳民、蕭楓合編「從五四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年表），一九五一年匪新潮書店出版。

註一六：洪煥椿「五四時期的中國革命運動」一六六頁，一九五六年八月，北京三聯書店。

註一七：「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上冊一二八頁。

註一八：陳公博「共黨運動在中國」中文本一三頁，一九二四年一月。

註一九：關於出席一大大會的代表人數，在匪偽政權成立後的有關匪黨黨史書刊，大部份都說十二人，但是其早期刊物如匪黨中央宣傳部所編之「共產主義與共產黨」，米夫所著「中國共產黨英勇奮鬥的十五年」等以及陳潭秋的一大大會的回顧，周佛海的「逃出了赤都武漢」，棲梧老人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後的見聞」等都說是十三人，後者較可信。

註二〇：陳公博「共黨運動在中國」附錄一、二。

註二：關於「一大」所選出的中央領導機關之稱呼，匪方資料中出現許多不同的說法，有些稱爲「中央局」或「臨時中央」，有些是「中央工作部」，有的索性稱爲「中央委員會」。

註三：關於當時「中央局」成員職務分工之稱呼，有的稱爲委員長，副委員長，組織部長，宣傳部長，有些又把委員長稱爲總書記。至於該領導機關之組成人員，周佛海的回憶錄（即「逃出了赤都武漢」）、中國國民黨組織部調查科編「中國共產黨之透視」以及日本波多野乾所編「中國共產黨史」第一卷所載內容爲：委員長陳獨秀，副委員長周佛海、組織部長張國燾、宣傳部長李達。匪黨現有資料大部份說：書記陳獨秀、組織委員張國燾、宣傳委員李達。陳潭秋「一大大會的回顧」一文內則稱：「因黨員過少，決定不組織中央委員會，先行成立『中央局』，張國燾、陳獨秀和李達被選爲臨時中央委員，周佛海、李漢俊、劉仁靜被選爲候補委員。」

註三三：「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上冊一二九頁。

註三四：胡華主編「中國革命史講義」五三一—三四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一九六二年北京出版。

註三五：王實等編「中國共產黨歷史簡編」三二頁，一九五八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註二六：「共產運動在中國」一四、一五頁。

註二七—卅：「中國共產黨歷史簡編」一七、二二頁。

註三一：「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上冊一二七頁。

註三二：「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後的見聞」。

註三三：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一頁，一九五三年北京人民出版社。

註三四：「中國職工運動簡史」十三頁。

註三五：「中國共產黨歷史簡編」二二頁。

註三六：「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上冊一二九頁。

註三七：中共中央宣傳部編「共產主義與共產黨」九八頁。

註三八：「中國共產黨歷史簡編」三二頁。

註三九：「共產主義與共產黨」九八頁。

註四〇：胡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初稿」修訂本二八頁。一九五二年北京人民出版社。

註四一：「中國共產黨『一大』的主要問題——訪問第一次代表大會代表董必武同志」，一九六一年六月三十日，「人民日報」。

註四二：洪煥樞「五四時期的中國革命運動」一七一、一七三頁，一九五六年八月北京三聯書店出版。

註四三：同「註四一」。

註四四：陳潭秋「一大大會的回顧」，一九三六年莫斯科「共產國際」雜誌第十四期，並載於「共產國際」英文版一九三六年十月號。

附錄：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後的見聞

棲梧老人

魏金斯基 (Voitsinsky)

五四運動的怒潮，震動了全世界，第三國際重視這一事件，約在一九一九年的冬天至一九二〇年春天之間，派魏金斯基來中國了解中國的政治情況，訪問領導五四運動的人物。和他同來的，有他的秘書馬邁也夫，馬邁也夫的夫人馬邁也娃，翻譯楊明齋，楊明齋是山東人，窮苦學生出身，在帝俄時代，即由東北經過西伯利亞到莫斯科，在那裏半工半讀了十幾年。十月革命以後，他加入了蘇俄共產黨。他雖然是個中國人，但因為旅俄日久，對中國的情況不熟悉。他們初到北京，人地生疏，無法開展工作。後來通過蘇俄大使館的關係，才找到北京大學俄文教授鮑立維。

鮑立維原是白俄而同情十月革命的，十月革命以後，中國與蘇俄建立了外交關係，優林（M.I. Yurin）大使來中國，鮑立維爲了他的職業，才與蘇俄大使館建立聯繫。

魏金斯基最初化名吳廷康，中等身材，態度沉默，說一口很流利的英語。他由鮑立維的介紹會見了李大劍同志，還會見了一些其他與五四運動有關的人士。經過李大劍同志的介紹，他又到上海會見了陳獨秀（陳獨秀那時住上海法租界環龍路老漁陽里二號，主編「新青年」雜誌。）魏金斯基與陳獨秀一見如故，又由陳獨秀介紹會見了上海「星期評論」的主編人戴季陶、李漢俊、沈玄廬和「時事新報」的負責人張東蓀。當時的新青年雜誌是五四運動以後在羣衆中最有威信的一個刊物。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都是研究系的報紙，同情五四運動，自命爲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成員。「星期評論」是繼「民報」而起的一個刊物，算是國民黨的刊物。戴季陶、沈玄廬都是老國民黨員，李漢俊是剛從日本帝大畢業回國，被戴季陶吸收到「星期評論」寫文章的。魏金斯基與他們會談過好幾次，他們曾經有過這樣的打算：把「新青年」、「星期評論」、「時事新報」結合起來，建立一個新中國革命同盟，並由這幾個刊物的主持人聯合發起組織中國共產黨或是中國社會黨。可是經過相當時間的醞釀，把這個意見正式提出來，首先就嚇倒了張東蓀，退出了這個運動；戴季陶最初還表示同意，但看到黨綱草案中有一條規定：「共產黨員不做資產階級政府的官吏，不加入資產階級的政黨」時，戴季陶也借口他不能同國民黨斷絕關係，申請退出了這一運動。

當時陳獨秀、李漢俊、沈玄廬等一致主張成立中國共產黨。後來又有李達、俞秀松、施存統加入，於是他們完成了中國共產黨的黨綱草案，成立了中共臨時中央於上海，推陳獨秀任書記，並向國內外發展組織。相繼成立了北京、上海、武漢、長沙、廣州、山東六個支部。

一九二〇年冬天，馬邁也夫婦同鮑立維會到上海、武漢等地，到武漢時是陳潭秋同志和我接待的。我們作過兩次長談，地點是在武昌多公祠五號。他談了很多關於十月革命以後的蘇俄情況。他能說一點不熟練的中國話和英國話，談話時，我們手上拿一本華英字典。他拿一本英俄字典，一面說話，一面翻字典，一面打手式。他鼓勵我們學習理論，也鼓勵我們努力工作，還談到共產黨的鐵的紀律。一九二四年秋天，他們夫婦來到廣州，馬邁也夫在黃埔軍校任顧問，北

伐戰役中任第七軍李宗仁部顧問，在北伐戰爭中有過很大的貢獻。

中共臨時中央

在臨時中央時代，只做了一些宣傳和計劃組織的工作。「新青年」雖然是由黨領導，還不能算是黨報，於是發行了「一種」共產黨月刊」算是黨報。但只出了幾期，因黨的經費來源中斷，到一九二〇年年底即行停刊。「共產黨月刊」是祕密發行的，發行面很小。臨時中央所在地是上海環龍路老漁陽里二號，此外，還在法租界霞飛路新漁陽里（現改名銘德里）六號租定一棟兩樓兩底的房屋，作為黨的工作部，在這裏設了以下的工作部門：

(一)華俄通信社：華俄通信社是魏金斯基到中國來首先建立起的工作部門，由楊明齋負責，因為受了人力物力的限制，並不經常發稿。

(二)社會主義青年團：社會主義青年團簡稱S. Y.，黨臨時中央成立後不久就成立了。時間大概是在一九二〇年八月前後。至一九二一年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會議以後才改為共產主義青年團，簡稱C. Y.。最初由俞秀松任書記，有十多個團員。這些團員都是準備去莫斯科留學的。青年團每星期舉行一次會議，每次都有政治報告，報告的內容多半是由黨規定下來的，俞秀松擔任報告的時候多。

(三)外國語學校：辦外國語學校的主要目的是為到莫斯科學習的青年團員補習俄文的。雖然外國語學校的章程中有英文班、法文班，但是並沒有開班授課。俄文班的學生，來去無定，最多的時候有廿餘人，最少的时候約十餘人。一九二二年春天學生最多。劉少奇同志、羅覺（亦農）同志、傅大慶同志、李啓漢（森）同志，都曾經在這個學校裏學習過俄文。

當時黨的公開的或半公開的集會如「李卜克內西（Karl Liebknecht）、盧森堡（Rosa Luxemburg）的紀念會」、「五一勞動節的慶祝會」、「馬克斯誕辰紀念會」、「三八婦女節」等集會，都是在這裏舉行。黨的會議不是在老漁陽里二號就是在貝勒路樹德里卅號李漢俊家裏舉行。

第一次紀念五一節

一九二〇年秋冬之交，陳獨秀到廣東，臨時中央書記職務由李漢俊代理（李漢俊在一九二二年六月因為犯了錯誤，被開除黨籍），這時魏金斯基也回國了，臨時中央工作陷於停頓狀態。除了青年團與外國語學校維持現狀以外，就沒有什麼活動。黨的發展也很慢，原在上海的黨員本來就不多，到了一九二二年一月間，沈文盧赴粵，施存統去日本，在上海的黨員只有李漢俊、李達、俞秀松、楊明齋等幾人了。在這個時間，雖然先後吸收了一些黨員，但他們都是有職業的，沒有方法把工作推動。這時我從武漢帶着幾個青年團員到上海，準備去莫斯科，他們就留我在中央工作，組織了一個教育委員會，由我同楊明齋負責。教育委員會的工作，主要是就青年團員中選擇比較優秀的分子提前派赴莫斯科學習。這是當時唯一儲備幹部的辦法。職工運動委員會以印刷工人、煙草工人、紡織工人為對象，在小沙渡義袋角辦了一個工人補習學校，但為人力與經濟所限，工作沒有展開。

一九二二年五一勞動節，我們在上海舉行了集會。這一次集會，雖然所發動的羣衆不多，規模不大，在中國却是第一次慶祝五一勞動節。那時候，中國的工人階級絕大部份還不知道有自己的節日。

在五一勞動節以前，我們召集了一些比較進步的學校、社團、報館的成員，在新漁陽里六號開過三次慶祝五一勞動節的籌備會，我們把這個集會作為新文化運動提出來。五一那一天，我們的同志一大早就全體出動，在各公司、工廠、電車、公共汽車上散發傳單，貼標語，我們有兩個同志跑到先施永安兩公司七層樓上把大批傳單向南京路散發。在天后宮舉行的羣衆大會雖然到的人不多，會開得不算好，我們的傳單標語却散發得很普遍。民國日報、時事新報，凡是同情新文化運動的，都作了新聞報導。這樣，在上海也算起了一個不大不小的震動。第二天正午，法國巡捕房派了四個中國包探和兩個法國人到新漁陽里六號我們的工作部進行檢查，在樓上樓下共檢查了兩個鐘頭，因為我們事前有準備，沒有檢查出什麼東西。最後，他們問我們辦的外國語學校為什麼不到工部局註冊，我們說還在籌備時期，籌備好了再辦註冊手續。他們除了提出口頭警告外，也沒有什麼特別舉動。不過住在這裏的一些學俄文的青年團員怕出亂子，差不多都悄悄

兒地搬走了。事後李漢俊召集了一次黨員會議，他主張把工作部暫時結束一下，把臨時中央遷到廣州，或是要陳獨秀回上海再行部署工作。李漢俊要我到廣州向陳獨秀彙報情況，擬定工作辦法，上海的工作停頓了一兩個月沒有活動。

第一次全國代表會議

一九二二年六月間，第三國際派馬林(Maring)來中國，與他同來的還有赤色職工國際代表李克諾斯基(Olikonsky)。(他們先到北京同李大釗、張國燾等會談了幾次，馬林建議召集一個全國性的建黨會議，北京方面的同志同意這個建議。李大釗同志因為工作關係，不能離開北京，即由張國燾同馬林、李克諾斯基一路到上海與李漢俊等會商。上海方面的同志也同意召開這樣的會議，即寫信給陳獨秀請他回上海主持，可是陳因為工作的關係不能離開廣州，只派了兩名代表出席代表會議。

代表會議開會的時間，是在各學校放了暑假以後。我們在法租界打鐵濱博文女學校樓上租了一個統廂房和一個統樓共三間，作為各地代表住宿之所。這個學校的校長是一個卅歲左右的老姑娘，據說是湖北黃季剛的老家侄女；那時學校是在暑假期中，她好像也不住在這裏，只有一個看房子的娘姨住在樓下，沒有什麼人來往。我們是用北京大學暑假旅行團的名義租用房子的。為什麼用這個名義呢？因為五四運動以後的北京大學有很大的榮譽，到處受人尊敬；加以黃季剛當時是北大的教授，我們同她扯上一點關係，有很大方便。

這一次代表會議的代表是以地區為標準，而不是以黨員的人數為標準。七個地區原規定每個地區兩個代表，如東京只有兩個黨員，也是邀請兩個代表，因為施存統那一年暑假沒有回國，所以只有一個代表出席。這七個地區是：湖南、湖北、上海、廣州、北京、濟南、東京，出席的代表有毛澤東、何叔衡、陳潭秋、董必武、李達、張國燾等十三人。加上馬林和李克諾斯基，到會的共十五個人。

會場在貝勒路與望志路之間的樹德里卅號樓上，這裏是李漢俊的家，我們的會場就是李漢俊兄弟兩人的客堂。這裏是弄堂房子，房間不大，中間擺一張餐桌，四面擺十幾張椅子，當街的窗戶下面放着一張舊寫字檯。十五個人坐下來，

那一個小客堂就擠滿了。會期原定四天至五天，每天開會是在下午八點鐘。第一天的會各地代表及馬林和李克諾斯基都出席了，主席是張國燾。第一項議程就是馬林的報告。馬林大概四十歲上下的年紀，高大身材，看起來像個德國人（據說他是猶太人），頗有政治家的風度。他用英語報告，由劉仁靜翻譯，報告的時間很長。接着李克諾斯基報告赤色職工國際的工作及其任務。他好像是一個工人出身，說話很慢，聲音很低。第二、三兩天的會，馬林和李克諾斯基沒有出席，各地代表的工作報告都很簡短。因為黨在誕生初期，工作還不多。這兩天的時間，集中討論兩個問題：第一是「黨綱」，第二是「勞動運動計劃」。

第四天的會，還是晚飯後開始。馬林、李克諾斯基及十三個代表都是準時到會。開會後不到半個鐘點，突然有一個陌生面貌的中年男子闖進了會場，我們問他幹什麼？他用可疑的目光對著我們掃射了一下說：「對不起，我找錯了地方」就匆忙下樓去了。馬林坐在當街的窗戶下，目光正對著那個可疑的人，他很機警地說：「一定是包打聽，我們馬上解散，改地點開會。」於是我們立刻解散了。兩個小時以後，我回到李漢俊那裏看動靜，走上樓梯時，李漢俊迎出來說：「你們剛剛出門，就來了十幾個包打聽和武裝巡捕，搜查了一番，沒有發現什麼。他們問我們開什麼會？我說是北京大學的幾個教授在這裏談天，商量編現代叢書的問題。好在我還會說法國話，他們也知道這裏是阿哥（李書城）的住宅，把緊張的場面緩和了一點。很倖倖的是我的寫字台抽屜內有一分共產黨的黨綱沒有來得及收檢，他們竟沒有發現。他們臨走時還說了幾句客氣話。不過明天的會不能在這裏開。」大家根據這情況商量了一下，決定第二天到嘉興南湖盡一日之長來結束這個會。次日黎明我們都到了火車站，馬林、李克諾斯基因為不便去，便留在上海。約在十時左右，我們都到了南湖，雇了一隻大船，買了酒菜，把船開到湖心，順利地通過了「黨綱」和「勞動運動計劃」。

最後的一個議程就是選舉，張國燾同各代表是事先分別協商過的，所以票很集中，選舉結果是陳獨秀、張國燾、李達當選為中央委員。李大釗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並決定陳獨秀為書記，張國燾為組織委員，李達為宣傳委員。約在下午六時前後，太陽還沒有下山，我們的會結束了。當即乘車回滬，到達上海時，已是萬家燈火了。

漁陽里二號被搜查、馬林赴粵訪孫中山

在第一次代表會議結束以後，各地代表回到了各個工作崗位，有計劃、有步驟地把革命工作向前推進。根據代表會議的決定，黨中央設在上海，在南成都路輔德里租了兩棟樓房開始工作。宣傳方面，首先恢復「共產黨月刊」；組織方面除了計劃發展黨的組織以外，並把勞動運動的計劃提到了首要地位，在馬林的指導之下，於八月間成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吸收了一些新的同志在勞動組合書記部工作，設工作部於北成都路底蘇州河畔一個里弄內（好像是光明里），發行「勞動周刊」，主編的人是張特立、包晦生等；發行人鮑一德。這些名單都是化名。這樣的部署比臨時中央時代是有很大的發展，但是馬林同志對於我們的工作很不滿意，他認為局限在一部份學生、工人的圈子裏，政治作用不大，他建議陳獨秀回上海重新部署工作。陳獨秀接受了馬林的意見，於是摒擋一切，從廣州回到上海。但不久老漁陽里二號被法國巡捕房查抄，陳獨秀被捕，同時被捕的還有他的夫人高君曼及楊明齋、柯慶施、包惠僧等。後來還是馬林出錢出力，在很短的期間（一天半）請巴和律師（法國人）以五萬元現金的保證，把陳獨秀取保出獄。其餘的同志坐了五天洋牢。接著經巴和律師出庭辯護，最後以「新青年雜誌有過激言論，罰款五千元」結案。在這次事件以後，馬林提出發動民主革命的聯合戰線問題，建議我們黨與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國民黨建立聯合戰線，在陳獨秀的同意之下，馬林就於一九二一年十月間同張太雷到廣州，和孫中山商談國共兩黨建立聯合戰線的問題去了。

（錄自北京「新觀察」一九五七年第十三期，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出版）

第二章 中共一全大會文件之研究

一、文件的發現

匪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於一九二一年七月，距今四十餘年，大會對外沒有公佈任何文件，正如董匪必武所說：「……『一大』本身，沒有留下甚麼文字材料，但找人回憶，也是一個好的辦法」（註一）。不過，曾經參加過會議的十三個匪黨代表，現在還活著的已經不多，這些人回憶，由於立場不同，往往相互矛盾，而董必武一九六一年的回憶，則類乎偽造。張國燾、李達、陳潭秋、周佛海、陳公博等的說法也有差異；因此，研究匪黨黨史的中外學者，對共匪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情形，甚難得出客觀的結論。

這些回憶，綜合起來，僅僅在幾個問題上有共同之處：第一、大會著重討論了建黨問題，而且產生了中央領導機關；第二、討論了以工運爲主的羣衆運動，因而會後成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第三、建黨目的、革命目標以及與第三國際關係也曾加討論；第四、曾有大會宣言，不過會後沒有對外公佈。這四點，固然大體相同，但具體內容仍有出人，如無具體事證或大會文件加以證實，將是永無結論的差異。

這是一個意外，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中，居然發現了共匪一全大會的文件。那是陳公博於民國十三年元月在該校所寫的碩士論文，題爲「共黨運動在中國」，附錄「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第一次

代表大會黨綱」，「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決議」。發現該文並加以研究刊印的是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主任韋慕庭教授（Professor C. Martin Wilbur），他在研究與刊行本文時說：「一九二四年元月，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後二年半，陳公博氏，那位曾參加一九二一年七月間中國共產黨成立大會的參與者，寫成了一篇題為『共黨運動在中國』的論文。這論文也就是現存有關文獻中關於最早期中共史實的紀錄。三十多年來，這一手抄本，一直放在哥倫比亞圖書館中，迄未爲人所注意。」直到一九六〇年九月經韋慕庭教授發現研究後，始予以刊印參考。

陳公博此一論文的發現，足以幫助我們瞭解匪黨一全大會的實況，有關會議內容的若干基本差異，也許可以得到一個初步結論。

二、「黨綱」「決議」的主要內容

陳公博論文「共黨運動在中國」本身，雖可供研究匪黨黨史參考，但主要的還是論文的附件，即一全大會的「黨綱」和「決議」，這是共匪一全大會僅存的文件。這兩項文件的主要內容，可歸納爲下列各點：

- （一）中共主張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推翻資產階級，沒收一切生產手段，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 （二）以階級鬥爭精神宣傳、教育、組織工人，與黃色組織斷絕關係，獨立發動階級鬥爭。

(三)對現有各政黨，應採取獨立、攻擊、排他的態度，堅守無產階級立場，不許與其他黨派建立任何關係。

(四)從支部到中央，建立有系統的、純潔的、祕密的黨的組織，以領導工農兵羣衆運動。

(五)接受第三國際領導，每月向第三國際報告，必要時得派代表前往遠東書記處。

顯然的，這是一種徹底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綱領，陳公博稱之爲「不妥協」政策，並說明所以形成這一政策的原因：第一、由於長期的內戰，使中國人民陷入悲慘境遇；第二、巴黎會議結束後，說明弱小國家無法逃脫帝國主義的剝削和控制；第三、雖然中國代表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但山東問題仍然未獲解決；第四、在此種遭受壓迫的痛苦情形下，不僅是急進份子，就是溫和的知識份子都認爲中國如欲在內憂外患的雙重壓迫下解放出來，必須立即從事社會革命方可成功。結果在上述各因素的影響下，參與該項會議（按：指匪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全體代表一致主張採取「不妥協」政策」（註一）。

至於強調不許與任何其他黨派發生關係的原因：「第一，……共產黨相信，任何使人民遭受痛苦的黨派，都是他們的敵人。」「第二，當時許多共產黨員在其他的政黨及團體中，……將敗壞黨員的人格和風氣。第三，……共產黨人與非共產黨人共同工作，將無任何益處」（註三）。

這些，也許是形成此「黨綱」「決議」的客觀因素，然而重要的還在於主觀的原因，這批創建匪黨的人員，全都是年青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他們初出茅廬，還不瞭解中國國情，還沒有學到共

產黨人的所謂戰略策略，把馬列主義的若干條文生硬的輸入中國，如法炮製，乃制定了如此這般的「黨綱」。

三、「黨綱」「決議」的真實性

由於數十年來從未發現匪黨一全大會文件，好些人的回憶，雖說到一全大會的「建黨」、「黨章」、「黨綱」一類問題，但都無法列舉條文，而陳公博是一個早已離開共黨的人物，今天匪黨又在偽造黨史，對於這一「黨綱」「決議」的真偽如何，不能不首先加以研究分析和鑑定。

先從「共黨運動在中國」本文說起，這是一本為匪宣傳的小冊子，全文以闡揚共匪宣言主張為中心，猛烈攻擊帝國主義，最後並以匪黨第二次全國大會宣言為結論，他說，我願意引用共產黨的宣言來結束此篇論文：「……如果貧苦農民要除去窮困和痛苦的環境，那就非起來革命不可。而且那大量的貧苦農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時可以保證中國革命的成功。」（註四）此種對共匪毫無惡意而又不對外發佈的碩士論文，其附件當不至於偽造。

其次陳公博於出席匪黨一全大會後，仍返粵從事共黨工作，遲至民國十一年十一月才離粵赴日，在日停留三個月，延至十二年二月十二日始乘船赴美。他之出國赴美，共黨指為不服從調滬命令，決議留黨察看。但陳公博辯稱「至於我要到美國，也早在仲甫在粵時決定，何以贊成於前，而阻撓於動身的俄頃」（註五）。陳公博在橫濱期間，曾應廖仲愷先生之邀與越飛共談「國共合作」問題，當時廖先生要陳

公博做現在的革命黨，實行三民主義，不要做一百年後的革命黨（按：指共產黨而言），陳公博表示祇能做一個黨的黨員，不能做兩個黨的黨員（註六）。可見，陳公博在留美期間仍爲留黨察看的共產黨員，直到民國十四年春，陳公博回到廣州「遇見了植棠，才知道共產黨已將我的共產黨籍開除」（註七）。以一個共產黨員身份所作的論文，其附件實無偽造必要，由此也可見文件的真實性了。

如果再從時間上來說，陳公博於共匪一次大會後兩年半就寫成論文，在此短促時間內保有「一大」文件，是不足爲奇的。現在一些「一大」出席者的回憶錄，其所以無法列舉「一大」具體內容，實由於時間過得太久，不易記取；同時「一大」黨綱決議，尤其「一大」宣言，對於匪黨偽造黨史非常不利，因此好些回憶都是含糊其詞，加以掩飾。

再次，從現有各種有關匪黨黨史資料來看，說明了如下的幾種事實：第一、「一大」會議之前，北京、廣東各地的共產組織（卽支部），內部曾發生劇烈分化，將所有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無政府主義者開除出黨。第二、「一大」討論組織路線與鬥爭綱領時，發生了很大的爭論（註八），爭論中心亦與黨的戰鬥性及「無產階級專政」有關。第三、「一大」會議主席張國燾，一貫堅持無產階級獨立奮鬥立場；「一大」黨綱起草人陳獨秀（黨綱係陳獨秀起草後由廣東寄上海「一大」討論的（註九）亦主張無產階級單獨戰鬥，以後還反對加入國民黨（註一〇）。因此，「一大」所通過的「黨綱」標明社會革命，無產階級專政，排斥他黨的主張是這些共產黨領導人一貫的觀點，從而也說明了這一篇「黨綱」和「決議」的真實性。

四、大會的宣言

匪黨一全大會對外沒有公佈宣言，這是事實。不過，大會期間有無討論宣言及何以未對外公佈，這是值得研究的。對此，匪黨有兩種說法：一說宣言草案沒有討論，會後以小冊子的形式印發（註一一）；一說祇在大會之後才公佈（註一二）。陳公博則列舉宣言要點，指明大會宣言經過討論並予通過，惟會後沒有公佈，周佛海的「逃出了赤都武漢」亦有類似的說法。

從上列幾種不同記述研究，有一共同之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一全大會確有過宣言草稿，照匪黨歷次大會的慣例，如二次三次大會等都有宣言發表，一次大會當然也提出了大會宣言。至於曾否討論，也不用置疑，因為既然會後敢「以小冊子的形式印發」及「祇在大會之後才公布」，那非經大會討論不可。不過，這種「印發」和「公佈」，可能是在黨內「通告」「傳閱」，沒有對外發表，沒有遺留下來。

一個政黨的大會宣言，必須總結大會的精神與決議，闡明該黨的政策和主張，匪黨歷次大會的宣言或決議亦復如此。因此，「一大」宣言雖未公佈，亦無流傳，但從「一大」的黨綱與決議中便可測知其大概。陳公博所說該宣言第一部份「極力主張中國進行社會革命的必要性。第二部份列舉北方及南方政府的劣蹟，并陳述孫中山政府並不比北方軍閥集團好」（註一三）。此與「一大」黨綱決議中的社會革命及攻擊排他的精神相符，同樣是可以採信的。

「一大」開會前後，匪黨北方的李大釗與南方的陳獨秀正與軍閥吳佩孚、陳炯明勾結，陳獨秀之出任廣東教育委員長也是陳炯明邀請的；他們認爲孫中山先生沒有力量，想在吳佩孚、陳炯明實力派方面求發展（註一四）。這樣，匪黨「一大」宣言之攻擊孫中山先生也是可以理解的。

「一大」宣言之未敢對外公佈，可能是國際代表或第三國際的反對。從次年（民國十一年）匪黨二次大會政策的轉變，以及西湖會議，第三國際代表以紀律強制中共加入國民黨的事實看來，匪黨「一大」宣言之「反孫」主張，未能取得第三國際的同意，因而予以擱置，不對外公佈。其次則因「一大」會議中討論宣言時，曾有激烈爭論，「第三件是通過宣言，內中對孫先生和徐世昌（那時孫先生是廣東非常國會選出的臨時大總統，徐是北洋軍閥左右下的國會所選的大總統）相提并論，批評得一文不值。這一篇宣言，辯論很久，宣言終於通過了。……後來到最後會議，才提出一個折衝方案，將來這篇宣言應否發出，授權新任的書記決定」（註一五）。這樣，新任書記陳獨秀在未經「國際」批准前，祇好先在黨內「公佈」或「印發」了。

五、領導機關問題

共匪所編「黨史」資料，對於一大大會所選出的共黨領導機關名稱及其分工，有各種不同的說法，有的稱爲臨時中央局，有的稱爲中央局，有的稱爲中央委員會，有的說是中央工作部；職稱的說法也有不同，但對陳獨秀任書記、張國燾任組織、李達任宣傳是一致的。如果說，民國九年五月上海已成立了

臨時中央（註一六），那麼，一次代表大會正式選出的領導機關便不能稱之為「臨時中央」了，更不會是一個「中央工作部」，而將是中央局或中央執行委員會。由於全國共黨黨員祇有五十七人，「一大」代表也祇是十三人，成立中央局（對外仍稱中央執行委員會）、選舉三人為中央局委員（即陳獨秀、張國燾、李達），并以少數人為候補委員是較為可信的。周佛海是否任副書記或副委員長值得研究。照陳潭秋的說法，周佛海、李漢俊、劉仁靜三人被選為候補委員。棲梧老人則謂李大釗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就「一大」會議分工觀察，會議主席張國燾，會議紀錄（當時稱為會議書記）周佛海、毛澤東；當紀錄的被選為中央副書記，可能不大。且當時周佛海正在日本讀書，趁暑假到上海開會，暑假期滿後又返回日本，選舉一個留學海外的黨員任中央副書記，恐無此可能。

六、中共的歪曲

「一大」時期的中共還非常幼稚，對所謂馬列主義僅是皮毛的瞭解，以「共產黨宣言」為根據集中全力發展工人運動，「一大」曾著重討論勞工運動，會後又以中央組織委員張國燾出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書記（註一七）。因此，當時以工運為中心的匪黨，按照「共產黨宣言」的說法，在「一大」會議中堅持社會主義革命、主張無產階級專政是可以理解的。「一大」所通過的「黨綱」「決議」也是很自然的。不過今天共匪不敢承認，而篡改為「在目前時期，……而且必須積極號召無產階級從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註一八）。因為在中國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主張，後來被中共指斥為托洛斯基主義。既

然「一大」「黨的政治路線、組織路線，都是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制定的」（註一九），如果承認「一大」的黨綱和決議，那麼，所謂「毛主席」不就成爲中國托派的始祖了麼？

今天，大陸匪黨對於「一大」宣言內容，同樣不敢認賬，好在沒有「本本」可憑，大可抵賴。而且說「大會對於孫中山的進步運動，決定用黨外合作的形式援助他」（註二〇），這是中共二次大會宣言及第一次對時局的主張（民國十一年七月及民國十一年六月十五日），怎可移花接木說是「一大」的決定呢？

註一：「中國共產黨『一大』的主要內容——訪問第一次代表大會代表董必武同志」一九六一年六月卅日「人民日報」。

註二：陳公博「共黨運動在中國」中文本一三頁。

註三：陳公博「共黨運動在中國」中文本一四頁。

註四：陳公博「共黨運動在中國」中文本二七頁。

註五：陳公博「寒風集」甲二二六頁一九四四年十月初版，上海地方行政社發行。

註六：陳公博「寒風集」甲二二〇頁。

註七：陳公博「寒風集」甲二二七頁。

註八：中國現代史研究委員會：「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上冊」一二九頁新民主出版社一九四七年七月香港初版。

註九：中國國民黨調查科：「中國共產黨之透視」四五頁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編。

註一〇：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上海印發。

註一一：「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上冊」一二九頁。

註一二：中共中央宣傳部：「共產主義與共產黨」九八頁。

註一三：陳公博「共黨運動在中國」中文本一五頁。

註一四：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二五、二六頁，一九四九年九月一版。

沈雲龍「中國共產黨之來源」一〇頁，一九五九年一月台北民主潮社出版。

註一五：陳公博「寒風集」甲二〇七頁。

註一六：棲梧老人「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後的見聞」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北京「新觀察」第十三期。

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一頁。

註一七：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一七頁。

註一八：「中國革命史講義」五三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一九六二年北京出版。關於無產階級參加資產階級革命問題，連棲梧老人也不否認「一大」沒有討論。他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後的見聞」中說：「在這事件以後，馬林提出發動民主革命的聯合戰線問題」。所謂「事件」是指「一大」之後，陳獨秀返滬主持匪黨工作期間，爲法國巡捕房逮捕事件。可見「中國革命史講義」純屬偽造。

註一九：「訪問第一次代表大會代表董必武同志」一九六一年六月卅日「人民日報」。

註二〇：「中國革命史講義」五四頁，胡華主編。

附錄一：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黨綱

一、本黨定名爲「中國共產黨」

二、本黨黨綱如下：

(1) 用無產階級的革命羣衆推翻資產階級，以勞工階級重建國家，直至階級的區別消除爲止。

(2) 爲了完全停止階級鬥爭——廢除各階級，採用無產階級專政。

(3) 推翻私有資本，沒收一切生產手段諸如機器、土地、建築物、半製造物品等。並將其歸於社會所有。

(4) 聯合第三國際

三、本黨採用支部形式組織工業與農業工人及士兵，以宣揚共產主義，並承認社會革命爲本黨之主要政策；與黃色智識階級及其他類似黨派斷絕一切關係。

四、本黨黨員無性別及國籍之區別限制；任何人，凡接受本黨黨綱及其政策，並承諾效忠本黨，經一位本黨黨員之介紹，即可成爲本黨同志，但參加本黨之前必須斷絕與任何反對本黨黨綱之政黨及團體之關係。

五、介紹黨員入黨之程序如下：申請人須經人向當地支部提出申請，并接受調查；調查期間至多二個月。調查完畢，經過半數以上黨員同意後，該申請人之黨籍即予承認。如在該區域內已有地方執行委員會之設立，申請人之黨籍應由執行委員會批准。

六、在時機未成熟前，本黨之主義，甚至黨員之身份皆應保持秘密。

七、任何地區如有黨員五人時，即可組織支部。

八、支部之黨員經由當地黨書記之正式介紹，可轉入其他地區之支部。

九、在任何支部中，如其黨員不超過十人時，僅派書記一人處理事務，如超過十人時，即應指派財務委員一人，組織委員一人，及宣傳委員一人；如支部人數超過三十人，即應組織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會規章另定。

十、在各地區內，當黨員逐漸增加時，即應利用各工人、農民、士兵及學生等各種組織，各就其職業，從事羣衆活動，但這些組織，應由當地執行委員會統一指揮。

十二、（註）：任何支部之經費、出版物及政策，應由中央執行委員會統一監督指揮之。

十三、當全國黨員超過五百人或全國各地建立起五個以上地方執行委員會時，即應選擇一適當之地點設立全國執行委員會，該委員會應由全國黨員代表大會選出委員十人組成之。如上述情形未能實現時，應組織一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

以應需要。中央執行委員會之詳細法規另定之。

十四、黨員，除非受現行法律之壓迫，或經本黨同意者，不得任政府之官吏或國會議員，但士兵、警察及文職雇員則不受此限。（此條曾引起激烈辯論，決定交一九二二年第二次大會討論）

十五、本黨綱如經三分之二出席全國代表大會代表通過一項修改議案時，可予修改之。

（註：陳公博原著中無十一）

附錄二：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決議

（一）工人組織：

本黨主要的目的，在組織各種產業工會。任何地區之內，如該處有一種工業以上，即應組織一個產業工會；如某個地區沒有鉅大的工業，而僅僅有一兩家工廠時，即應組織一個適合該地區情形之工廠工會。

黨應以階級鬥爭的精神灌輸予各工會。如果各工會所發動的政治鬥爭與本黨黨綱不相符合時，本黨應避免淪為其他政黨之傀儡。

至於現存的同業公會及技術工會，本黨得派遣黨員參予該等組織，以作改組該等工會之第一步工作。

除非能獲得二百人以上的會員，不可以組織工會。在每一新工會中，本黨至少應有黨員二人以上參予其間，以協助組織工作。

（二）宣傳：

一切雜誌、報章、百科全書及小冊子均必須在中央執行委員會，或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之管理之下。

每一地區，均可視其需要而發行一份工會雜誌，一份日報或週報，及小冊子，臨時傳單等。

出版物，不論屬於中央或地方，皆應由本黨同志直接管理與編輯。

不論中央或地方任何出版物，不得登載任何違反本黨主義、政策及決議之文字。

(三)工人補習學校：

因工人補習學校係組織工會的一個準備步驟，故此類學校應在各種工業中組成，諸如「運輸工人補習學校」「紡織工人補習學校」等等。任何教授數種不同工作的補習學校除非不得已時不准成立。

補習學校中，僅有工人才可擔任學校管理委員會管理委員，以負責校務，教師統由黨方雇用，但他們可以參加管理會議。

工人補習學校應逐漸地變為工人組織之中心；否則，黨即可予以停辦或改組。

教育最重要的原則是能喚醒工人們之良知，並教授他們組織工會之必要性。

(四)研究勞工組織之學術團體：

此種學術團體應由各種工會領袖，有階級意識的工人，及本黨同志組成之，教授工會組織之適當方法，此團體之目的在訓練從事本黨實際工作之工人，因此應特別注意工會組織，協助無產階級各項運動，並調查工會及無產階級情況等問題。

爲了增進會員之能力，此種學術團體可分爲幾個研究小組，其項目如下：勞工運動之歷史、組織工廠工人之方法、卡爾·馬克斯之經濟理論。各國工人運動之現勢。研究之結果可陸續發表。(在討論這些問題時，應特別注意到中國各地之情況)

(五)對現有各政黨之態度：

對現有各政黨，應採取獨立、攻擊、排他的態度。在政治鬥爭中，在反對軍閥主義及官僚主義中，在要求言論、出版、及集會之自由中，當吾人必須表明我們的態度時，本黨應堅守無產階級的立場，並不准與其他黨派建立任何關係。

(六)本黨與第三國際之關係：

中央組織應每月向第三國際呈報告一份。如有必要，得派一正式代表前往第三國際設在伊爾庫茨克 (Irkučika) 之遠東書記處，並派代表赴遠東各國商討聯合階級鬥爭之計劃。

第三章 中共二全大會之若干問題

一、問題爭執焦點

日本研究中共黨史的學者和匪情專家，三年前（一九六一年）先後到台北蒐集匪情資料，同時和我們研究匪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若干問題，其中提出了二全大會開會的時間地點。當時我們有好些分析，不過還沒有得到肯定的結論，因為連匪黨自己對此一問題，也是前後矛盾、不知所措，直到今天還沒有有一個定論。

匪黨二全大會舉行於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毛匪澤東、董匪必武等都不是代表，沒有出席這次會議。曾經出席會議的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向警予、鄧中夏等都已去世，剩下一個張國燾早已脫離共黨；因此，匪黨無從去蒐集活的資料，文字資料也僅僅留下一篇大會宣言。這樣，二全大會的時間地點以及大會的若干問題，就把匪黨「史家」弄得前言不對後語。

匪黨二全大會究竟舉行於一九二二年的五月抑七月，開會地點是在上海抑在杭州（西湖），這就是問題爭執的焦點。查閱共匪有關於此一問題的記載，在十七種書刊中前後說法不同（註一），有的說五月，有的說七月，有的說在上海，有的說在杭州，使人眼花繚亂，莫之所適。

爭執的根源產生於不同記載的兩本書。匪黨最初收集和研究黨史係於一九三七年，那時在延安出版了一本油印的「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上冊（下冊亦係油印本，因有礙「統戰」未敢公開出版），這本

書記載了匪黨各次大會的情形，對於二次大會舉行的時間地點，列明爲一九二二年七月於杭州西湖；於是以後匪方的好些書刊，都照樣抄列。同年（一九三七年）匪黨中央宣傳部又出版了兩本「中國問題指南」（第一冊和第二冊），其中刊出了「中共第二次全國大會宣言」，發佈時間署明爲「一九二二年五月」，而「中共第一次對於時局的主張」則註明爲「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發表，編列於「二大」宣言之後。於是匪黨好些作者又把「二大」開會時間改爲五月，有的把開會地點也從杭州改在上海。這樣就使「二大」的時間地點爭個不休，自由世界研究中共黨史的學者，對此也就無所適從了。

二、內容說明時間

匪黨的一些作者，往往慣於抄襲篡改，不去研究內容，不去考證時間，結果弄得錯誤百出，或者一錯再錯。以「二大」宣言爲例，如果細心去考查「宣言」的內容，不難瞭解其發佈時間，因爲宣言本身就說明了它的時間。比如宣言第二節「中國政治經濟現狀與受壓迫的勞苦羣衆」之第（一）項中有如下的敘述：「英國更又贊助暴露了反動行爲的陳炯明，剷除孫文派在廣東的民主勢力。」同節第（二）項中則說：「國民黨所組織的廣東政府，更是中國開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的運動。廣東政府現在雖然倒了，但是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運動在中國是不會消滅的。」

從上列兩節敘述中說明，宣言的發佈時間必然是在當時的廣東政府被推翻之後，亦即陳炯明叛變之後。大家都知道，陳炯明是在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六月十六日叛變，即六月十六日晨三時砲轟觀

晉山粵秀樓總統府，國父因而避難永豐艦。「二大」宣言既然說「廣東政府現在雖然倒了」，其發佈時間當然是在六月十六日陳炯明叛變、推翻廣東政府之後，絕不會發表於廣東政府「倒了」之前的五月；因而「二大」開會的時間顯然是六月十六日以後。「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記載「二大」於七月舉行無疑是可信的。

另外從陳公博於一九二四年一月所著「共黨運動在中國」附件看來，也說明「二大」是在七月舉行的。附件三：「第二次全國大會宣言」其發表時間署明為「一九二二年七月」（註二）。附件五：「中國共產黨的組織」第六章第廿九條稱：「上述規章係中國共產黨第二屆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日至廿三日），同日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宣佈實施者」。這裏，連開會的日期也說清楚了。

由此可以確定，匪黨「二大」是於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日至廿三日舉行，「二大」宣言係於七月發佈。「中國問題指南」所稱為五月發表顯然是錯了。

三、「宣言」與「主張」孰先孰後

「中國問題指南」原名「國際路線」，第一冊收集共產國際對中國問題的決議與指示，第二冊刊列中共各次大會的宣言主張和決議，係一九三三年於瑞金「蘇區」編印的，當時由何凱豐（註三）主編。匪黨到了延安，於一九三七年仍由匪黨中央宣傳部長何凱豐編印出版。何凱豐在匪區瑞金編印當時，所蒐集的「二大」宣言抄件，無發佈年月，但同時取得的中共第一次對時局主張則註明為一九二二年六月

十五日，估計對時局主張應在「二大」之後，於是對「二大」宣言的發出時間，自行判斷，大膽列爲「一九二二年五月」，編入「國際路線」第二冊第一篇，對時局主張則編爲第二篇。到了延安，改名出版。次年（一九三八年）二月，共匪「解放社」出版的「紅色文獻」亦照樣翻印，一誤再誤，以迄於今。

由於這一錯誤，於是「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以及華崗的「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都說「在第二次大會宣言發表後之一月餘，中共發表了第一次對於時局的主張」，其他類此書刊均有同樣記述。

然則「二大」宣言與對時局主張的發表，究竟孰先孰後，對時局主張所列日期（六月十五日）是否可靠？會不會發表於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大」宣言之後呢？解答這一問題最好的辦法，仍然是考證它的內容。

中共第一次對於時局主張有下列敘述：

「中國現存的各政黨，祇有國民黨比較是革命的民主派，……以及廣州政府不禁阻勞動運動……等事，都算是擁護民主政治的表示。」

「就是最近的廣東政府也不建設在護法上面了。」

「我們固然承認吳佩孚倒張去徐是差強人意的。」

「奉直還正在戰爭，直皖戰爭恐怕也就在目前。」

「好政府主義者諸君啊！你們剛才發出『努力』『奮鬥』『向惡勢力作戰』的呼聲，北京城裏僅僅

去了一個徐世昌，你們馬上就電阻北伐軍。」

「國民黨諸君啊！你們……寧可戰而失敗，不可與北洋軍閥妥協而失敗。」

從「主張」內容看，其發表時間：第一、爲奉直戰爭時間，即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四月以後（奉直戰爭爆發於十一年四月）。第二、廣東政府仍然存在，即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陳炯明叛變之前，亦即 國父於十一年五月在韶關誓師北伐後，右翼軍於六月攻克贛州之時。第三、北京政府總統徐世昌去職之後，即十一年六月徐世昌去職之後。由此可見，「主張」不會發佈於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廣東政府「倒了」及「二大」宣言公佈之後。「主張」原記載爲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發表是可信的；由此也可以確定，「主張」先於「二大」宣言發出。

如果再把宣言與主張的若干內容作一比較，也可以看出發表時間的先後。「主張」的重點是反對軍閥戰爭，肅清軍閥、建立民主政治，它並沒有提出「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主張」說：「我們目前奮鬥的目標，……乃以左列各項爲準則：

一、改正協定關稅制，取消列強在華各種治外特權。清償鐵路價款完全收回管理權。

二、肅清軍閥，沒收軍閥官僚的財產，將他們的田分給貧苦農民。

三、採用無限制的「普通選舉權。」（餘略）

「宣言」的重點，不僅反軍閥，而且反帝，宣言的結束口號爲「打倒軍閥！打倒國際帝國主義！」，宣言的奮鬥目標是：

一、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

二、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

三、統一中國本部（東三省在內）爲真正民主共和國。」（下略）

兩相比較，很清楚的，匪黨當時的主張是由取消列強特權發展到打倒帝國主義，由建立民主政治發展到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國」；這不僅說明了「主張」發表在前，「宣言」發佈於後，而且也肯定了董匪必武的回憶，他說「一大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大會提出過『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的政治綱領」。其實，不僅「一大」沒有提過「反帝」，就連一年後的第一次對時局主張也沒有提過；直到「二大」才提出反帝反軍閥的兩大口號。

四、兩個杭州會議問題

「二大」召開地點，最初說是舉行於杭州西湖，自從「中國問題指南」出版後，隨會議時間之更改（七月改爲五月），好些匪黨書刊，也由杭州改爲上海，但是都沒有註明確實的根據與來源。

「二大」舉行於杭州西湖的最先記載，發現於「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上冊，初版（油印本）爲一九三七年。當時匪黨中央設於延安，該書爲匪黨「抗日大學」與「中央黨校」教材。這時，張國燾還在延安，任匪黨中央書記（當時匪黨中央有七個書記）及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且兼授「抗大」政治經

濟學課程。「二大」出席代表與「二大」所選中委，除張國燾外大都去世，「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的編者，對於「二大」情形的記述，除宣言外既無文書資料可憑，必然取材於張國燾之口述，這是唯一活的資料來源，這一親身參與會議代表的回憶，對開會地點實無編造必要，應該是確實的。如果有錯，那也是張國燾記憶的錯誤。

據「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的編者陳然先生告稱（參閱本冊增補二「中共『一大』若干問題之研究」註一五）：關於中共「一大」「二大」會議問題，他在延安曾親訪張國燾於清涼山石洞內，張謂「二大」舉行於西湖。同時把「一大」最後一次會議開會地點，也錯記為嘉興「東湖」（見「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一二八頁，香港版）。後來根據李達等遺作，證明「二大」是在上海舉行的。張國燾也在他的回憶錄中據此而更正其當年錯誤的記憶。

匪黨於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日至廿三日在上海舉行第二次代表大會之後，不到一個月，即八月廿二日又於西湖舉行中央委員會會議，這樣就使一些中外作者往往把兩個會議混淆起來了。其實這兩個會議是有重大區別的，這種區別不僅在於一個是「二大」，一個是「中委」會，而且是決定匪黨聯合戰線策略方式原則性的重大問題。前者決定用「黨外合作」方式參加聯合戰線，後者決定以「黨內合作」（共黨黨員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方式滲透國民黨，利用聯合戰線。對此，陳獨秀的告全黨同志書有如此的記述：

「於是中國黨的第二次大會（一九二二年）遂決議了民主革命的聯合戰線政策。」

「大會散會後不久，共產國際即派代表馬林來中國，要求中共中央全體委員在西湖開會，提議加入國民黨的組織，……當時中共中央五個委員：李守常（按：即李大釗）、張特立（按：即張國燾）、蔡和森、高君宇及我，都一致反對此提議，……最後國際代表提出中國黨是否服從國際決議案爲言，於是中共中央爲尊重國際紀律，遂不得已接受國際提議，承認加入國民黨。」

匪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所通過的「對於民族革命運動之決議案」也有如下的說明：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大會時（一九二二年），已經決定中國無產階級應該參加民族革命運動并贊助中國國民黨，提出的口號是：『民主的聯合戰線』，『推翻帝國主義推翻軍閥』。在此大會後，共產國際派代表向中國黨提議：中國同志們應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當時黨中雖尊重國際的提議，而大多數同志祇贊成民主革命的聯合戰線，對於加入國民黨的組織十分懷疑，……」。

顯然的，兩次會議雖然相隔僅僅一個月，但是會議的性質與內容是有重大區別的，這是匪黨在策略運用方面的一個重大轉變。

五、「二大」決議和中委

匪黨「二大」情形，除宣言外，在國內未見有其他文件的留存。祇有陳公博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下了「二大」的決議和黨章（即第五號附件：中國共產黨之組織），這是研究匪黨黨史的重要資料，其中有關「二大」所產生的匪黨中央，也可以從「二大」黨章中得到印證。

匪黨往往把一些已死的所謂「烈士」，「追贈」爲某一屆的中央委員，如鄧中夏、向警予、共匪說「一九二二年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中夏同志被選爲中央委員會委員」（註四），「一九二二年警予同志回國，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卽在這次大會上被選爲中央委員」（註五），可是陳獨秀的告全黨同志書却指明二屆中委祇有五個委員，卽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蔡和森、高君宇，五個委員中並沒有鄧中夏、向警予其人。而「二大」所通過的黨章，也明白規定「（七）全國代表大會得推選五位委員，組織中央執行委員會，……」，相互印證，足見陳獨秀的說法是真實的，而共匪的「烈士」中委祇能是死後加封了。（註六）

註一：1.「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上冊載：「二大」於一九二二年七月在杭州西湖舉行。

2.「中國問題指南」第二冊註明：二大大會宣言發表於一九二二年五月。

3.「紅色文獻」註明：二大大會宣言發表於一九二二年五月。

4.匪黨中央宣傳部編「共產主義與共產黨」載：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大」舉行於西湖。

5.米夫著「中國共產黨英勇奮鬥的十五年」載：二大大會舉行於一九二二年七月。

6.陳紹禹：「新中國論」謂「一九二二年七月在西湖舉行的第二次代表大會」（見「陳紹禹救國言論選集」一一四頁，一九三八年七月漢口中國出版社出版）。

7.「中國問題講授提綱」（新四軍五支隊政治部編，一九四〇年十月）載：二大召開於一九二二年七月。

8.「中國共產黨成立十九週年紀念——新四軍臨時政治教材之五」（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五日）載：二大於一九二二年召開於杭州西湖。

9.胡喬木「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一九五一年六月）載：一九二二年五月在杭州西湖召開第二次代表大

會。

- 10 匪華南人民出版社「中國共產黨史學習資料(一)」載：一九二二年五月在杭州舉行。
 - 11 匪華南分局宣傳部編「幹部學習資料——中國共產黨成立三十週年紀念專輯(二)」內載「中國共產黨年表」採用五月召開「二大」說。
 - 12 華崗「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第二卷載：一九二二年七月召開於杭州西湖。
 - 13 胡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初稿」載：一九二二年召開於杭州西湖。
 - 14 何幹之「中國現代革命史」上冊載：一九二二年七月召開於上海。
 - 15 榮孟源「中國共產黨歷史簡編」載：一九二二年七月召開於上海。
 - 16 四十五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報」載「歷次代表大會簡況」稱：一九二二年七月召開於上海。
 - 17 五十年十二月匪「中國青年」雜誌載「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到第八次代表大會的簡況」(羣文)載：召開於一九二二年五月，在上海。但後一期「中國青年」雜誌(第十三—十四期)又更正為一九二二年七月。
- 註二：陳公博「共黨運動在中國」附件三：「二大」宣言，英文本註明其發表時間為一九二二年七月。
- 註三：何凱豐又名何克全，為第三國際派返中國的工作人員，在上海任少共中央宣傳部長。匪黨中央遷入匪區瑞金時任少共中央書記。匪黨中央逃竄至延安後任匪黨中央宣傳部長。
- 註四：「中國職工運動簡史」附錄「鄧中夏同志傳略」。二五六頁。
- 註五：新民主出版社華應申編「中國共產黨烈士傳」一八頁，一九四九年十二月香港版。
- 註六：據事後的考證：鄧中夏、向警予兩人可能當選為二屆候補中委。

附錄一：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大會宣言（摘錄）

（錄自中國問題指南第二冊一九三七年延安中共中央出版）

一、國際帝國主義宰割下之中國（略）

二、中國政治經濟現狀與受壓迫的勞苦羣衆

（一）

帝國主義的列強既然在中國政治上經濟上具有支配的實力，因此中國一切重要的政治經濟，沒有不受他們操縱的；又因現尚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農業和手工業的經濟基礎上面，工業資本主義化的時期還是很遠，所以在政治方面還是處於軍閥官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之下，軍閥們一方受外國資本帝國主義者的利用唆使，一方爲自己的利益把中國割據得破碎不全，張作霖之佔據東三省，便是一個最顯明的例。這樣的情形，即是中國政治上一切糾紛內鬨的複雜基礎。

中國目前政治狀況又另開了一個新局面，這個新局面一方面便利於帝國主義的列強實行華盛頓會議所決定的共同侵略政策，一方延長中國的糾紛情勢。最近的奉直戰爭，在吳佩孚方面，英美帝國主義者站在他的後面，爲的要協助吳佩孚打倒日本在北京的優勢，達到他們自己把持中國政治中心的慾望，在張作霖方面，自然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爲其後盾，希圖維護著名親日派張作霖所栽培的交通系內閣，以保持他對北京政府的優越地位。這次戰爭的結果，吳佩孚掃除了張作霖在北京的勢力，但是張作霖在滿洲的勢力並未失墜，仍足爲日本帝國主義利用做專心掠奪滿蒙的劊子手。吳佩孚戰勝以後，北京政府漸漸落在親美派的官僚手裏，這是美國實現對華政策一個絕好的機會。但是美國並不願意吳佩孚是一個較進步的軍閥！製造一個統一的政府，因爲吳佩孚所主張廢督裁兵如果實現的統一，是與中國資產階級以極大的利益而易於發展，與外國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進行是極不利的。美國帝國主義者便轉過頭來，與日本強顏攜手，企圖共同利

用張作霖曹錕和其他頑固的軍閥官僚（如安福系交通系等），以免日美互相掣肘而造成一個可以共同利用的中國傀儡政府。英國更又贊助暴露了反動行爲的陳炯明，剷除孫文派在廣東的民主勢力。這樣他們利用軍閥，阻撓中國資產階級的發展，造成軍閥勢力下之有名無實的統一政府做英日美的共同工具的計劃，已是顯明極了，即使中國現在能出現一個所謂統一政府，但列強的壓迫不去，軍閥的勢力不除，中國是萬難實際統一的，而且內亂還會不止呢？民國成立十一年，幾乎年年都有戰爭，不是軍閥壓迫民主主義革命戰爭，便是軍閥內鬩，如直皖戰爭和奉直戰爭等。現在那些督軍間的衝突，無處不現出嚴重的形勢，加以帝國主義者無窮的操縱，因此內亂是有加無已的。真正的統一民主主義國家和國內的和平，非打倒軍閥和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是永遠建設不成功。因為中國還是軍閥把持和割據的時代，故在現今「統一」呼聲之下，發生兩種矛盾的現象：一派軍閥假聯省自治的名義實行割據，同時他派軍閥假統一的名義壓迫南方的民主革命和蒙古的自治，以增長自己威權。兩派所假借的名義雖然不同，而其各想延長武人政治的命運，則是一樣的。但是本部各省（東三省在內）經濟上絕無根本不同，而民國的歷史，若以十年來武人政治所演出的割據現象便主張劃省爲邦，以遂其各霸一方的野心而美其名曰地方分權或聯省自治，這是完全沒有理由的，因為十年來，一切政權已完全分於各省武人之手，若再主張分權，只有省稱國，督軍稱王了，所以聯邦的原則在中國本部各省是不能採用的。

至於蒙古、西藏、新疆等處則不然：這些地方不獨在歷史上爲異種民族久遠聚居的區域，而且在經濟上與中國本部各省根本不同，因爲中國本部的經濟生活，已由小農業手工業漸進於資本主義生產制的幼稚時代，而蒙古、西藏、新疆等處還處在遊牧的原始狀態之中，以這些不同的經濟生活的異種民族，而強其統一於中國本部還不能統一的武人政治之下，結果只有擴大軍閥的地盤，阻礙蒙古等民族自決自治的進步，並且於本部人民沒有絲毫利益。所以中國人民應當反對割據式的聯省自治和大一統的武力統一，首先推翻一切軍閥，由人民統一中國本部，建立一個真正民主共和國，同時依經濟不同的原則，一方面免除軍閥勢力的膨脹，一方面又因尊重邊疆人民的自主，促成蒙古、西藏、新疆三自治邦，再聯合成爲中華聯邦共和國，才是真正民主主義的統一。

那些帝國主義者，本來想完全毀滅中國舊有的經濟構造，代以完全由他們掌管的新式資本主義的經濟建築，但是他們畢竟沒有完全毀滅的本領。他們曾經百般阻撓中國經濟自動的改進，如他們不讓中國人民自己建築粵漢鐵路滬杭甬鐵路及川漢鐵路，強迫清政府借他們的款子來興工，以及他們奪取漢冶萍公司之類。但是這樣阻撓的結果，曾激成劇烈的反抗，對他們經濟的壟斷政策加以打擊。而且外國資本家初到中國的時候，究不能獨立經營，只好借助中國商人和雇用中國賬房、買辦、經紀人之類，做掠奪勾當的中間物。這麼一來，中國資產階級就漸漸完成他們的初步積累階段。大戰期間，歐美商品不能顧及中國，日本商品又遭抵制，遂造成中國資本家發展的最好機會，如是中國資本主義也漸漸在揚子江流域一帶興旺起來了。但是壓迫在世界侵略的資本主義極大組織之下的新興的中國資產階級，那能自由發展和自由競爭而達到獨立的地位，只不過做世界資本主義侵入中國的中間物罷了。而且外國資本主義為自己的發展和利益，反扶助中國軍閥，故意阻礙幼稚資本主義的興旺。中國幼稚資產階級為要免除經濟上的壓迫起見，一定要起來與世界資本帝國主義奮鬥。

中國幼稚的資產階級，已能結合全國的力量，反對外國帝國主義和北京賣國政府，如一九一九年的排日運動。國民黨所組織的廣東政府，更是中國開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的運動。廣東政府現在雖然倒了，但是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運動在中國是不會消滅的。還有一層，中國的知識階級，商業和工業的資產階級，要自己能夠避免美國的愚弄，他們的民主運動才能依正軌進行。

中國三萬萬的農民，乃是革命運動中的最大要素。農民因為土地缺乏，人口稠密，天災流行，戰爭和土匪的擾亂，軍閥的額外徵稅和剝削，外國商品的壓迫，生活程度的增高等等原因，以致日趨窮困和痛苦。近來農民更可分為三種界限：（一）富足的農地地主；（二）獨立耕種的小農；（三）佃戶和農業雇工；第一種佔最少數，第二第三兩種的貧苦農民至少也佔百分之九十五。如果貧苦農民要除去窮困和痛苦的環境，那就非起來革命不可。而且那大量的貧苦農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就可以保證中國革命的成功。

自從外國商品充斥中國市場以來，手工業者小店主小雇主也是日趨困苦，甚至破產失業，加以本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又增加了手工業者無產階級化的速度。這個大量的羣衆也勢必痛恨那拿痛苦給他們受的世界資本主義，加入到革命的隊伍裏面來。

中國勞動運動已是在第一個階段中發展起來，香港海員和其他工人爲經濟要求的罷工運動，足夠證明工人們的偉大勢力，工人們的組織近來亦見迅速的擴大。而且工人們處在中外資本家的極端壓迫之下，革命運動是會發展無已的。發展無已的結果，將會變成推倒在中國的世界資本帝國主義的革命領袖軍。

(三)

各種事實證明，加給中國人民（無論是資產階級工人或農人）最大的痛苦的是資本帝國主義和軍閥官僚的封建勢力，因此反對那兩種勢力的民主主義的革命運動是極有意義的，即因民主主義革命成功，便可得到獨立和比較的自由。因此我們無產階級審察今日中國的政治經濟狀況，我們無產階級和貧苦的農民都應該援助民主主義的革命運動。而我們無產階級相信在今日的奮鬥進行中間，只有無產階級的革命勢力和民主主義的革命勢力合同動作，才能使真正民主主義革命格外迅速成功。

三、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及其目前的奮鬥

(一)

無產階級去幫助民主主義革命，不是無產階級降服資產階級的意義，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長生命和養成無產階級真實力量的必要步驟。

我們無產階級有我們自己階級的利益，民主主義革命成功了，無產階級不過得着一些自由與權利，還是不能完全解放。而且民主主義成功，幼稚的資產階級便會迅速發展，與無產階級處於對抗地位。因此無產階級便須對付資產階級，實行「與貧苦農民聯合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二步奮鬥。如果無產階級的組織力和戰鬥力強固，這第二步奮鬥是能跟着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後即刻成功的。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政黨。他的目的是要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鬥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剷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

中國共產黨為工人和貧農的目前利益計，引導工人們幫助民主主義的革命運動，使工人和貧農與小資產階級建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中國共產黨工人和貧農的利益在這個聯合戰線裏奮鬥的目標是：

- 一、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
 - 二、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
 - 三、統一中國本部（東三省在內）為真正民主共和國；
 - 四、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實行自治，成為民主自治邦；
 - 五、用自由聯邦制，統一中國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
 - 六、工人和農民，無論男女，在各級議會市議會有無限制的選舉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罷工絕對自由；
 - 七、製定關於工人和農人以及婦女的法律：
 1. 改良工人待遇：(甲)廢除包工制；(乙)八小時工作制；(丙)工廠設立工人醫院及其他衛生設備；(丁)工廠保險；(戊)保護女工和童工；(己)保護失業工人等……
 2. 廢除丁糧等重稅，規定全國——城市及鄉村——土地稅則；
 3. 廢除釐金及一切額外稅則，規定累進率所得稅；
 4. 規定限制田租率的法律；
 5. 廢除一切束縛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權利；
 6. 改良教育制度，實行教育普及。
- 上面的七條，是對於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都有利益的，是解放他們脫出現下壓迫的必要條件，我們一定要為解放我們自己，共同來奮鬥！工人和貧農必定要環繞中國共產黨旗幟之下再和小資產階級聯合着來奮鬥呀！

但是工人們要在這個民主主義聯合戰線裏，不至爲小資產階級的附屬物，同時又能爲自己階級的利益奮鬥，那麼工人要組織在共產黨和工會裏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工人們時常要記得他們是一個獨立的階級，訓練自己的組織力和戰鬥力，備與貧農聯合組織蘇維埃，達到完全解放的目的。

中國共產黨是國際共產黨的一個支部——現在他們向工人和貧農高聲喊叫道：快聚集在共產黨旗幟之下奮鬥呀；同時，向中國全體被壓迫的民衆高聲喊叫道：一齊來和集在中國共產黨旗幟之下的工人和貧農共同奮鬥呀！並又高聲喊叫道：一齊來和全世界的革命伙伴們並肩前進呀！只有「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聯合」是解放全世界的途徑呀！前進呀！共同前進！

打倒軍閥！

打倒國際帝國主義！

爲和平而戰！

爲自由而戰！

爲獨立而戰！

和平、自由、獨立萬歲！

受壓迫羣衆之解放萬歲！

中國共產黨萬歲！

國際共產黨萬歲！

附錄二：中國共產黨章程

（此一章程是經匪黨二全大會通過，是匪黨最早的章程，譯自陳公博哥倫比亞大學碩士論文「共產運動在中國」）

第一章 黨 員

1. 黨員不受國籍或性別之限制。凡信仰本黨主義，服從本黨紀律，並願獻身為本黨服務者，即可成為本黨黨員。
2. 凡願加入本黨者，應經本黨同志一人向基層委員會介紹，由基層委員會向區委員會報告，而區委會再向中央委員會報告。經區委員會及中央委員會之調查和批准後，即可成為本黨正式黨員。工人欲參加本黨時，祇須得到區委員會之批准，並由區委員會呈報中央委員會即可。
3. 凡經中央委員會承認為經第三國際批准之任何共產黨黨員時，得為本黨黨員。

第二章 組 織

4. 在每一鄉村、工廠、鐵路、鐵場、連隊、或街道中，有共產黨員三至五人時，即應組織小組，選舉組長一人，在當地支部之管轄下執行黨務。如當地沒有地方支部之設置，區委會可以將這些小組編入最鄰近的支部內，或直接由區委員會領導；如當地沒有區委員會之設置，各小組則由中央委員會直接監督指揮。如當地有兩個以上的小組存在，地方委員會即應指定一定數目之黨員為各小組的地區代表。小組的組織，是本黨正常的組織方法，係進行訓練和活動的最基層單位，每一個黨員皆須參加此小組。

5. 任何地區，如有兩個以上共產黨小組存在時，區委員會即應在中央委員會之同意下，派遣代表至該一地區召集黨員會議，或推選黨員會議之代表，在這些代表中另選出三名委員，負責組織地方委員會。同時，另選出三名候補委員，以

便負責地方委員會的委員離開時代理其職務。區委員會尚未設置的地區，則由中央委員會派代表一人在中央委員會直接領導下，召集黨員組織地方委員會。此地方委員會即代理區委員會之職權。

6. 在任何區域裏，如有二個以上之地方委員會存在時，中央委員會即可派遣代表至該地區，召集各代表推選五位委員，以組織區委員會，同時並選出三個候補委員以代理委員出缺時之職務。如有必要，中央委員會可指派地方委員會之一暫時代理區委員會之職務。區委員之職權範圍是有限的，並可由中央委員會酌情調整改變之。

7. 全國代表大會得推選五位委員，組織中央委員會，並推候補委員三人，以代理正式委員出缺時之職務。

8. 中央委員會委員任期為一年，區及地方委員會委員則為半年，而各小組組長之任期則不予限制，如經再度當選得連任之。各地方小組之幹事得由地方委員會任意任免之。

9. 中央委員會負責執行全國代表大會之決議，監督並決定黨之政策及行動；區及地方委員會則執行中央委員會之決議，並在其權限內監督及決定處理事務之方法。每一委員會，應推選書記一人，負責一般事務及帳目之事宜，委員會之其他委員協助書記，處理政治問題。每一委員應分別領導工人、青年和婦女運動。

10. 全國代表大會或中央委員會所通過之法規之執行，及各地特殊問題發生之處理。統由一區及地方委員會指派的代表所組成的一特別代表委員會處理之。當召開特別代表委員會時，得在代表中推選一人為主席。

第三章 會 議

11. 各小組，每週應由小組長召開會議一次；在小單位內，所有黨員及小組組長應每月集會一次；在各地區，地方委員會應每月召集會議一次；各地方全體黨員或各小組長，應每半年開會一次，區代表會議，應由區委會每半年召開一次會議；中央委員會得於一定期間，每年召開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12. 如有必要，中央委員會得召開臨時全國代表會議。臨時全國代表會議，經全國超過半數地區之請求，由中央委員會召集之。

13 參加全國大會或臨時全國會之代表人數，由中央委員會臨時規定之。

14 如某一地區有特殊問題發生，上一級委員會得命令下級委員會，召集該地區黨員大會商討之。

15 中央執行委員會得隨時指派代表至各地召開特別會議，中央委員會所派遣之代表，在該會議中爲當然主席。

16 中央、地區、或地方委員會之會議，由主席召集之。

第四章 紀 律

17 全國代表大會係本黨最高機關，但在大會閉會期間，中央委員會則爲最高機關。

18 全國代表大會及中央委員會之決議，全體黨員應絕對服從。

19 本黨上級委員會之命令，應由下級委員會執行之。如命令未能徹底執行，則得解散該委員會，並由本黨中央機關重新組織之。

20 如大多數黨員抗議地方委員會之命令時，則將抗議案呈報區委員會裁決。如地方委員會抗議區委員會之命令時，抗議之裁決由中央委員會決定之。如有反對中央委員會之領導時，此反對案由全國大會或全國代表會議決議之。但一切命令皆應徹底執行，直到適當之委員會撤銷該項命令爲止。

21 地方或區委員會和各種小組，得執行並宣傳中央委員會之各項決議；地方委員會不得私自決定任何政策。當與全國有關之問題發生時，在中央委員會發表意見之前，地方或區委員會不得私自單獨發表意見。如地方或區委員會所持之意見與黨之決議案及制訂的政策相反時，中央委員會得命令解散該委員會並重新組織之。

22 本黨任何黨員，非經中央委員會之特准，不得參加其他政黨或團體；其已參加者，當加入本黨時，應即正式退出其已加入的政黨或團體，除非得到中央委員會之特准，不得保持其他黨籍或會籍。

23 本黨黨員，非經中央委員會之特准，不得任資本主義國家之任何官職。

24 本黨一切政策皆經大多數投票贊同決定者，必須絕對服從，即令曾投票反對的少數亦須服從。

25 任何黨員如犯下列諸罪時，得由地方執行委員會開除黨籍：

- (1) 在言行上反對本黨宣言、黨章、及全國代表大會或各級委員會之決議者。
- (2) 連續無故不出席會議者。
- (3) 三個月不繳黨費者。
- (4) 無故不執行黨所交付之任務滿一個月者。
- (5) 恢復黨籍後知過不改，經調查屬實者。
- (6) 洩露黨內機密者。

第五章 經費

26 黨的收入由下述諸項獲得：

(1) 按月捐獻，黨員（不分性別）之薪俸每月不超過五十元者，每月捐獻一元；如薪俸超過五十元者，每月捐獻其收入之十分之一；任何沒有按月的收入，或月入二十元以下之工人，捐獻二角；失業或服刑中黨員之捐獻豁免之。

(2) 黨內額外捐獻。

(3) 黨外之津貼。

27 本黨之捐獻與開支統由中央委員會管理之。

第六章 附則

28 上述規章之修改權屬全國代表大會，規章之解釋權屬中央執行委員會。

29 上述規章係中國共產黨第二屆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日至廿三日）同日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宣佈實施者。

第四章 中共戰略策略的轉變

一、「一大」前後中共的戰略方針

匪黨建黨後，於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發表第一次對於時局的主張，緊接著於七月十六日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公佈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表達了當時匪黨的政治主張與「奮鬥」目標。不過「二大」決議在匪黨黨內似乎早已遺失，檢閱匪黨出版的有關匪黨黨史書刊的記載，對於「二大」情形，除引用宣言內容，記述個別議案名稱、代表人數及黨員數量外，從未敘述會議具體情形及引用大會決議，足見在匪黨黨內并未存留有「二大」決議或有關文件。

在國內，對於匪黨「二大」決議僅僅有兩處曾加引用。一為鄒魯先生，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在北京參加國民黨西山會議時所寫的「再告孚木」一文，文內引用「二大」「有關工會運動與共產黨決議案」之第十八條（按：引用原文誤列為第八十條）。一為國民黨於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廿三日，在西山召開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所通過的「為取消共產派在本黨的黨籍告同志書」中，除引用「二大」工會運動議案第十八條（按：引用原文亦誤列為八十條）外，并曾引用「二大」「有關國民黨聯合戰線決議」之若干語句（註一）。可是在國民黨容共時期的史料中，亦未發現匪黨「二大」文件。直到一九六〇年九月，美國韋慕庭教授在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中找出了陳公博寫的「共黨運動在中國」後，匪黨「二大」決議和黨章才全部大白於天下。

當然，匪黨「二大」有過決議和黨章，那是必然的；但是，是否對外公佈，那是另一回事。因為有些決議是祕密的陰謀策略，無顏與世人見面；有些決議是內部的事務，無必要對外公佈。「二大」決議也因此而沒有發表，而僅僅代以「二大」宣言的公佈，那是可以理解的。已往我們研究匪黨黨史，祇能從「二大」宣言來瞭解當時匪黨主張及其動向，這一方向當然是正確的；不過，如果想進一步作深入的探討，瞭解當時匪黨的陰謀策略，除活的資料外，祇能借助於「二大」決議了。

匪黨於一九二〇年五月在上海成立臨時中央，次年（一九二一年）七月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建黨。直到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大」召開之前（精確的說法應是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第一次對於時局主張發表以前），在此兩年期間，匪黨對於中國「革命」的主張是實行社會主義革命，亦即推翻資產階級，沒收一切生產手段，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因而集中全力去組織工人，發動階級鬥爭。對於國內的其他政黨，則採取排他攻擊的態度（註二）。這種主張，顯然有悖於中國國情。因為當時中國政治經濟的特點是這樣的：第一、掌握中國政治經濟命脈的是各國帝國主義，掌握政權的是地方封建軍閥，造成連年內戰的也是帝國主義和軍閥，而不是所謂資產階級。第二、中國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中國工業當時雖有若干脆弱的基礎，但在帝國主義和軍閥統治下受到許多束縛，無法自由發展，所謂無產階級的人數也非常之少。第三、中國人民處於水深火熱的痛苦來自帝國主義和軍閥，而不是來自所謂資產階級。第四、當時 國父所領導的中國國民黨，以兩廣為基地正致力於反抗列強侵略，準備揮軍北上剷除軍閥。顯然的，當時如此的中國局勢，匪黨居然主張發動無產階級去推翻資產階級，實行社會主義革命

和無產階級專政；像這樣的主張，不僅是盲人瞎馬或無的放矢，而且在客觀上是幫助國際資本主義和國內封建勢力來扼殺幼稚的中國民族工業，徒然促使中國內部進一步的紊亂與人民深一層的痛苦。同時匪黨排他攻擊其他政黨的主張（包括攻擊中國國民黨），也不僅自陷孤立、自取敗亡，而且也削弱了當時反抗列強、剷除軍閥的革命勢力。這種幼稚的反動主張，在各處屢次碰壁失敗之後，才逐漸改變過來。

按照馬列主義的說法：「戰略就是規定無產階級在革命某一階段上的主要打擊方向，製定革命力量（主要的和次要的後備力量）底相當佈置計劃，在革命這一階段整個過程中為實現這個計劃而奮鬥。」（註三）那麼，在這兩年中（一九二〇年五月至一九二二年五月），匪黨主要的打擊方向是甚麼呢？那就是「延續的內戰至為可怕，北京政府和南方政府對內戰都要負責」（註四）。「對於南北政府應一律攻擊」（註五），「所以南方政府應予推翻」（註六）。這就是匪黨當時的戰略方針。

至於「製定革命力量……的佈置計劃」及在策略運用方面，那就是宣傳教育組織工人、發動工人鬥爭，同時在學生知識份子中致力於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工作。自從「中共中央成立後，黨內工作開始有系統的加強，勞動運動也進一步的推動與發展，建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組織，出版了『勞動週刊』，一九二一年底及以後，各地工人的鬥爭大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註七）

可是第三國際代表馬林，對匪黨「一大」以後的工作表示不滿，「因為馬林說：一年以來，第三國際在中國用了廿餘萬，而成績如此，中國同志未免太不努力。」（註八），認為匪黨工作「局限在一部份學生工人的圈子裏，政治作用不大」（註九），因而飭令陳獨秀由粵返滬，重新部署工作。這樣，匪

黨「一大」所決定的戰略方針便逐漸改變，而有第一次對時局主張的發表和二全大會的召開。

二、「二大」戰略轉變的根源

匪黨「一大」決議和「二大」決議，照共黨馬列主義觀點看來，那是代表着兩種不同的戰略方針。前者認為在中國應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後者則以為在當時的中國要參加民主主義革命。這是重大的原則的戰略方針的區別。「二大」前後，匪黨何以要放棄前者採用後者，根源何在？要解答這一問題，最好根據事實從四方面加以客觀的論斷。

自辛亥革命以來，國父不斷為中國革命而奮鬥。匪黨「一大」「二大」前後，正是國父以廣東為基地積極籌謀北伐，剷除軍閥時期。這種堅忍的革命精神以及國父的三民主義思想，影響了匪黨戰略方針的改變。

早在辛亥革命以後，即一九一二年七月，列寧就曾高度評價國父的理想，他說：

「戰鬥的真實的民主主義滲透着孫逸仙政綱的每一行。完全懂得種族革命之不夠。……這是帶有共和國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義。直接提出羣衆生活狀況、羣衆鬥爭的問題，熱烈地同情勞動者和被剝削者，相信他們的正直與他們的力量。」

「這裏的亞洲的共和國臨時總統是革命的民主主義者，是充滿着這樣一個階級所固有的高尚精神與英雄氣概……」

「沒有高度的真實的民主主義的高漲，中國人民就不可能有擺脫成百年奴隸地位的真正解放，因為祇有這種高漲可以激起勞動羣衆，使之能够完成奇蹟，而且這種高漲從孫逸仙政綱每句話中都可以看出來。」（註一〇）

列寧的這一評價和觀點，以後就成爲第三國際和匪黨戰略轉變的根源。成爲「援助孫中山先生進步運動」的理論基礎，後來匪黨也不能不這樣寫道：

「辛亥革命時候，列寧對於孫中山主義曾這樣稱道過：『他這理想是深受了世界資本主義文明潮流的數萬萬人民的革命運動而產生的』。所謂孫中山的理想，主要的是關於三民主義的理想。這理想是從百年來近代中國歷史矛盾所發展的三大問題（民族問題、民權問題、土地問題）中抽引出來的。……然而明白提出了這三大問題和三大原則的，乃是孫中山先生。……」（註一一）

因此，在匪黨「二大」召開前一個月，中共就拋棄了「對於南北政府應一律攻擊」的主張，而把革命希望寄托在中國國民黨的北伐，呼籲「國民黨諸君啊！你們本是革命的民主主義者，應始終爲民主主義而戰，寧可戰而失敗，不可與北洋軍閥妥協而失敗。」（註一二）這是匪黨改變戰略方針第一次的公開表示，顯然的，當時國父的北伐進軍，對中共的時局主張予以最大的影響。

匪黨戰略轉變的另一因素，就是當時匪黨勾結軍閥失敗所促成。鄧中夏於一九三〇年在莫斯科編寫「中國職工運動簡史」時就曾坦白承認，他說當時中國共產黨「對於吳佩孚有很大的幻想。」「經過李守常同志向吳佩孚御用內閣交通總長高恩洪建議每路派一密查員，得其允許，於是京漢、京奉、京綏、隴

海、正大、津浦六條鐵路都有一個密查員（守常同志薦去的共產黨員）」（註一三）。鄧中夏的承認，證明了周佛海的說法是可信的。他說：

「共產黨因爲要和吳佩孚勾結，所以首先送他一個『開明的軍閥』的尊稱，當時孫洪伊和吳佩孚接近，而李大釗却和孫洪伊關係密切（按：李大釗與吳佩孚、白堅武二人是極好的老朋友）。他們利用這種關係，就和吳佩孚私通起來，李大釗赴洛陽數次，似乎當時報紙也有記載。他的手段真巧妙，京漢、京奉、津浦、隴海四線總稽查，都由吳佩孚電令高恩洪委共產黨人充任，京漢線稽查爲包惠僧、津浦線似乎就是李民治……。共產黨見棄於吳佩孚之前，曾一度和陳炯明妍識。陳炯明……：特招陳獨秀赴粵爲其教育委員會委員長。當時陳炯明逆跡已著，廣東顯分孫陳兩派，……：共產黨當然以實力爲轉移。……：所以共產黨遂和他勾結。陳炯明每月出五百元，給陳公博辦『羣報』，就是互相勾結的一個結果；以後陳炯明匿居惠州的時候，馬林和譚平山等（時陳獨秀已赴滬）二次赴惠，商量合作條件，誰知陳炯明竟敢砲擊觀音山，危害孫總理。陳逆經此叛逆行爲以後，爲國人所唾棄，共產黨畏輿論的攻擊，遂也不敢明目張膽的聯陳。北爲吳佩孚所棄，南和陳炯明絕緣的共產黨，遂於民國十二年奉第三國際的命令，設法混入國民黨，而肆其破壞國民黨的陰謀了。

「（註一四）」

陳公博對於中共勾結軍閥一節，也有記述。他說，他曾陪陳獨秀到惠州去見陳炯明，之後，「仲甫先生在回滬之前一日，約我在宣講所談話。他說廣東不久必有變故，我們應知有所適從，論道理應當聯

孫，論力量是應當聯陳，問我有甚麼意見。」（註一五）

「據海隅孤客的解放別錄說：那一次惠州談話，陳獨秀力勸陳炯明加入中共，領導華南發展，謂要幹不能全靠軍隊，必須以廣大的工人羣衆爲基礎。陳炯明則表示反對，認爲不能拿勞工做政治本錢，這惡風一開，往後將不可收拾，他們同意的，祇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那一套，因此雙方談得無結果，陳獨秀才快快而退，這是後來中共不堅持聯陳而聯孫的最大原因。」（註一六）

從上列史料研究，并證之於中共對時局主張和「二大」宣言：主張雖說要打倒軍閥，但「承認吳佩孚倒張去徐是差強人意的事」，宣言則稱吳佩孚「是一個較進步的軍閥」，這就說明當時匪黨確實與南北軍閥勾結，但是後來碰到了困難和失敗，尤其在陳炯明叛亂前後，匪黨的策略策略不能不由勾結軍閥轉變爲打倒軍閥及「援助民主主義革命」了。

匪黨戰略轉變的又一原因，爲前一戰略失敗的結果。匪黨建黨兩年期間，爲了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積極組織工人，發動罷工鬥爭，想依靠工人的力量來完成社會革命，這方針的失敗是必然的。當時中國真正的產業工人；一般估計爲一百五十萬人，僅佔全中國人口百分之零點三七，這些工人中，沒有「老工人」，大部份爲農村流進城市的農民和手工業者。由於中國工業偏於輕工業的發展，工人成份有許多婦女兒童。這些工人，充滿行會觀念，幫會組織，流氓思想和農民意識，缺乏所謂「無產階級意識」以及「階級鬥爭」精神；正如當時陳獨秀所說，中國工人「不是獨立的革命勢力……大多數還沉睡在宗法社會裏……，不感政治的需要，并不脫離神權帝王之迷信」（註一七）。因此，當時匪黨雖然建立

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組織了一些工會，也發動過若干經濟鬥爭和罷工，鄧中夏說在好些罷工中取得了若干勝利，但一般說都是失敗的，正如當時的「嚮導週報」所說：「因為國內產業發展的程度，尚未到階級反抗顯然分裂的時期」。（註一八）「中國大多數的工人，還沒有自己階級的政治鬥爭之需要與可能。」（註一九）

這一時期工會的派別也很複雜，「當時職工運動中却有另一種特殊的現象，不是甚麼社會主義，而是市儈的和流氓的工會主義。這種現象在上海特別明顯。」（註廿）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在廣州舉行的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大會代表成份非常複雜，就其大者而言，有共產黨派，有國民黨派，有無政府黨派，有毫無主義和信仰的市儈的或流氓的招牌工會派，甚至還有工商組合的團體。在這樣一個複雜成份的大會中，不消說會要發生衝突。就在舉行開幕那一次會上，爲了主席團名單的問題，便發生了劇烈的鬥爭，幾乎把大會搗亂。」（註二一）這樣，就使匪黨的工運受到許多阻撓和挫折。「後來『二七』失敗，工會被封，我們黨在工人羣衆中除政治影響外，甚麼也沒有了，當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註二二）

在另一方面，國父和中國國民黨在工人羣衆中却有很大的影響和威望，在第一次全國勞工大會上「就中有一個問題，就是五月五日爲孫中山就任大總統週年紀念，國民黨工會代表提出全體到總統府慶賀。」（註二三）「海員工會在五一節那天，在海旁街口紮了一座雄偉奇麗的花牌樓，左右一付對聯，就是『擁護三民主義』，『實行五權憲法』。這次歡迎會是用西式大餐，滿屋懸掛青天白日旗。這些事實

，都可看出那時海員工會對國民黨信仰到了如何程度，這是很自然的，因為海員罷工當時，的確得到國民黨政治上和物質上切實的幫助……，國民黨員在歡迎席上宣傳說：「勞工大會能在廣州自由開會，這就證明祇有國民黨才給工人以自由」，當時我們的答復是「自由是天賦的，不是甚麼人給我們的」。

一（註二四）

在如此薄弱的社會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匪黨和工會，雖經兩年的努力，其結果工會工作既然如此，黨的工作又何嘗不是一樣，而且犯了「最大錯誤是黨的關門主義……，把許多鬥爭中表現很好的積極分子，都推到黨的門外。」（註二五）無怪馬林批評中共太不努力，而要「另作打算」，設法滲透國民黨來開展工作了。

當然，匪黨戰略轉變的最重要原因，還是第三國際的指導和幫助。列寧在第三國際第二次大會上（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九至八月七日）提出了「民族與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主張在比較落後的封建關係佔優勢的國家中，共產黨要幫助「資產階級民主解放運動」，與民主派結成臨時聯盟。他說：

「第一，各國共產黨必須幫助這些國家內的資產階級民主解放運動……。」

第四，必須特別援助落後國家中反地主、反大土地佔有制、反各種封建表現或封建殘餘的農民運動，極力使農民運動帶有最大的革命性……。

第五，必須堅決進行鬥爭，反對在落後國家內把資產階級民主解放思潮塗上共產主義色彩……；……共產國際應該與殖民地及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派結成臨時聯盟，但決不要同他們融成一片

，甚至當無產階級還處在萌芽狀態時，也無條件地要保持這一運動的獨立性。」（註二六）

「一九二二年一月，共產國際又召開了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中國共產黨曾指派王燼美、瞿秋白等同志參加（按：此次會議匪黨方面尚有張國燾等人出席，而以張國燾爲主要代表，匪黨黨史編者有意刪去張等名字。）會議期間，列寧親自接見了中國產業工人的代表，明確地指出中國現階段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它的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并勉勵中國工人團結其他革命的階級推動革命前進。共產國際這次大會更具體的幫助了中國共產黨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制定自己的綱領。」（註二七）

由此可見，匪黨戰略策略的轉變，係基於前期戰略所進行的工作受挫，係由於勾結軍閥失敗的教訓，加以 國父三民主義思想與中國國民黨的影響，以及第三國際的指導而改變的。這種改變，從匪黨的「二大」決議中表現得最爲明顯。

三、俄化的戰略策略

匪黨「二大」於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日至廿三日召開於上海，開會八天，共通過了九項決議，一個黨章、一篇宣言，改造了匪黨中央，選舉陳獨秀等五人爲中委，組織中央執行委員會。「二大」所通過的決議係遵照第三國際指示制定的，因此，全部決議之最大特點，便是匪黨的全般俄化，看不見中國的氣息，確是貨真價實的蘇俄「革命輸入」的產品。

列寧曾在「民族與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中指出「世界政治中的一切事變都必然環繞在一個中心點：即環繞在全世界資產階級反對蘇維埃俄羅斯共和國這鬥爭的周圍」，於是「二大」第一個「有關世界局勢和中國共產黨之決議」便說：蘇俄「她是無產階級和勞動羣衆的祖國」，「本黨并決定呼籲中國被奴役的廣大羣衆保衛蘇俄。」

列寧說過：「聯邦是走向各民族勞動者完全統一的過渡形式」（注二八），因此「二大」「有關國際帝國主義和中國共產黨之決議」便主張：「承認蒙古、西藏、回疆之自治權」。「根據聯邦之原則，將蒙古、西藏及回疆重新歸入中華聯合共和國」。這裏必須指出，匪黨「二大」時期，正是蘇俄紅軍佔領庫倫，在蘇俄羽翼下建立「蒙古革命政府」，宣佈成立所謂「蒙古獨立國」之後，匪黨此一決議，同時又配合了蘇俄對於外蒙的侵略。

由於列寧曾說：「不僅在共產黨的全部宣傳鼓動中——以及在國會講台上和國會講台以外——應當不屈不撓地揭穿一切資本主義國家裏違反其『民主』憲法而對民族平等及少數民族權利保障之經常破壞。」於是「二大」「有關議會鬥爭之決議」，便一反「一大」黨綱「不得任政府之官吏或國會議員」之規定，而決定「吾人應踏入受到封建軍閥集團威脅的國會中，在那裏……進行鬥爭。在國會中應勿忽視宣揚革命理想之機會」。

第三國際成立後，又有赤色職工國際的組織，匪黨「二大」「有關工會運動與中國共產黨之決議」中遂決議：「世界的革命工會之統一組織，是赤色國際勞工同盟。中國共產黨應根據上述原則組織工會，

并在國際勞工同盟之旗幟下予以領導」。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廿日，少共國際成立於柏林。匪黨於一九二二年五月五日至十日在廣州召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決議，加入少共國際。因此「二大」有關青年運動問題之決議特別強調青年工作的重要性，并「承認社會主義青年團在第一次全國會議中所決定的綱領及決議」。

第三國際第三屆大會中，決定在每一個國家的共產黨，必須組織一個特別委員會來領導婦女。各國共產黨應該成立「婦女部」，於是「二大」特別通過一項「有關婦女運動之決議」，并說明：「中國共產黨已決定儘速實施計劃。」

「二大」有關中國共產黨體制之決議，更是俄共布爾什維克的翻版。決議特別強調要組織一個「羣衆的黨」，要具備「鐵般的法律」，「俾使其行動趨於軍事紀律化」。「每一同志須犧牲他自己的意見、感想及陞職，以保護黨的統一」。

匪黨「二大」正式通過了參加第三國際的決議，在決議中說「因為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之無產階級，因而第二次代表大會正式決議加入第三國際，完全承認第三國際決議之廿一條款，并作爲第三國際之一個支部」。

最後「有關國民黨聯合戰線之決議」，更是第三國際的傑作，那是不用說了。

從全部「二大」決議來研究，如果說，匪黨「一大」是以「共產黨宣言」爲版本，製定出「一大」

的決議和綱領，那麼，「二大」便是以第三國際為模型，塑造出中共的形象。匪黨現在所叫罵的「父子黨」、「跟著指揮棒旋轉」等等，從「二大」決議和當時匪俄關係來看，那確係事實，然而這是自願的賣身，安能完全責怪「老子黨」呢？

四、聯合戰線的陰謀

匪黨「二大」決議雖然是俄國的舶來品，然而若干部份，尤其在第二項決議中黨的任務以及第三項決議建立聯合戰線方面，係受 國父及國民黨的影響而制定的。事實上，當時匪黨要求結成聯合戰線，請求加入國民黨本身就是這一影響的結果。否則恐怕還要勾結軍閥為禍於中國。

匪黨「二大」時期，中國國民黨從與中會起已有廿八年的革命歷史，孫中山先生推翻了滿清政府，創建了中華民國，繼而討袁、護法、北伐諸役，無一不在求中國之獨立自由平等。匪黨「二大」決議打倒封建軍閥，打倒國際帝國主義以及保護工人農民婦女等主張，早在同盟會的誓詞、中華革命黨的黨章誓約和 孫中山先生歷次主張以及實際行動中說得非常清楚。匪黨「二大」決議對中國革命主張的轉變，正是受國民黨影響的結果，否則當時匪黨恐怕還在夢想無產階級專政。

「二大」通過了「有關國民黨聯合戰線之決議」，當時所以作此決定，當然，第一是遵照列寧和第三國際的指示，改變了對於中國革命，對於中國國民黨的評價和看法，由「攻擊」國民黨，一變而為「聯合」國民黨了。第二是共產黨四處碰壁，無路可走，正如該決議所說：「無產階級同時受到國內國外

的雙重壓迫，他們除鬥爭之外，無他途可以獲得自由，因而參加了國民革命運動」。第三，匪黨黨員僅有一百廿三人，毫無力量可言，且黨齡亦僅兩歲，更無影響可及，如不依附國民黨，則永無革命可談，所以在決議中說「倘使無產階級無力獨自發動革命，他們即應協助民主主義來打敗封建主義」。後來張國燾也說「我們覺得自己的力量不夠，所以纔加入國民黨」（註二九）。第四，中國國民黨歷史悠久，革命功績卓著，威望極高，三民主義思想和對中國革命主張與北伐的進軍，正是全國人民的要求，為全國人民愛戴和擁護，李大釗也說「我們環顧國中，有歷史有主義有領袖的革命黨祇有國民黨」（註三十）。匪黨則係舶來品，在中國沒有銷路，祇好改頭換面，以參加國民革命作號召，企圖在聯合戰線中渾水摸魚。這些就是當時匪黨建議組織聯合戰線的原因和動機。

由於動機不純，因此在所謂聯合戰線中便隱伏著可怕的陰謀，這些陰謀策略在決議中也暴露出來了。決議中說：

「當國民黨一旦革命成功，他們當然亦必企圖獲得某種特權，……來壓迫無產階級。……」

「吾人必須明瞭『參加』并非向代表資產階級的國民黨（註三一）投降，做他們的奴隸，也不是在國民革命成功後無產階級即能完全解放；而事實是，我們爲了打倒敵人的壓迫——內在的封建軍閥，外在的國際帝國主義——不得不暫時與國民黨聯合。」

「此項聯合戰線并非爲國民黨的利益而奮鬥，吾人亦不爲國民黨而犧牲自己，而是爲了獲得暫時的

自由。

無產階級當戰鬥進行中，必須不要忘记他們自己的獨立組織。」

另外在「有關工會運動與中國共產黨之決議」中，第十八條寫道：「當共產黨員在由國民黨，無政府主義，或基督教團體所組織的工會中活動時，不得命令其他工人離開此種工會。共產黨的策略是，在這些工會中增長自己的勢力，直到能推翻國民黨，無政府主義者，及基督教團體之領導權，并能確實控制爲止」。

這些決議，便成爲以後匪黨陰謀破壞國民革命、顛覆國民黨的指南。

五、策略轉變的論爭

匪黨決議聯合戰線政策，係第三國際所發動，因此對於此一政策之推進，初期係由第三國際代表直接進行的。還在「二大」及第一次時局主張發表之前。第三國際代表馬林(G. Marins)於參加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註三二)「一大」及陳獨秀在滬遭捕出獄後，約於十月間離滬至粵，與陳炯明等各方人士接觸，進行試探游說工作。十二月廿三日始到桂林晉謁 國父，「宣佈第三國際意旨，力促國民黨與之聯盟」(註三三)，但爲 國父所拒。次年(一九二二)五月五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在穗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少共國際派大林(A. S. Dalin)出席指導。會後大林謁見 國父，提議建立聯合戰線，又爲 國父所拒。這點陳獨秀也說「同時青年團國際代表大林來中國，向國民黨提出民主革命派聯合戰線

政策。國民黨的總理孫中山嚴詞拒絕了。」（註三四）雖然如此，匪黨中央還是依照原來建立聯合戰線的決定，於六月十五日發表對時局主張，并建議於七月十六日舉行的「二大」，通過「有關國民黨聯合戰線之決議」，該決議說「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爲接受中央執行委員會之建議……通過了參加國民黨聯合戰線的政策。」

俄共與第三國際鑒於孫中山先生拒絕了大林的建議，乃又於一九二二年八月組成蘇俄第二次外交代表團，由越飛（A. A. Joffe）率領，至北京與北方政府談判，另派馬林至滬與國民黨接洽（按馬林係二度來華。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及中共「四大」決議均謂「二大」散會不久，共產國際即派代表馬林來中國。可見馬林并未出席匪黨「二大」會議）。越飛於八月十二日到北京（註三五）後，曾與八月十四日離粵到滬之孫中山先生通信，「信內曾言及當時中蘇兩國的國內國際各種問題」（註三六）。馬林則於八月廿二日匪黨中委會舉行以前到滬，旋即在西湖召開中委會，以國際紀律強制匪黨中央接受共黨黨員以個人資格參加國民黨的決定，會後晉謁 國父，要求准許中共黨員個人參加國民黨。九月六日 國父乃指派丁維汾等九人爲國民黨改進方略起草委員。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六日越飛自北京到滬，與 國父直接談判，一月廿六日發表聯合宣言，於是匪黨的聯合戰線政策乃奠定了初步基礎。

匪黨對於聯合戰線方式，「二大」決議爲：召開會議，訂定綱領，組織民主同盟，即以黨外聯合的方式建立聯合戰線，西湖中委會接受國際指示，改用共產黨員以個人資格參加國民黨，即以黨內聯合的方式組成聯合戰線，這是匪黨運用聯合戰線方式上的轉變。這種黨內聯合的方式，當時匪黨中央陳獨秀等五

人都一致反對，「其主要理由是：黨內聯合乃混合了階級組織和牽制了我們的獨立政策，」（註三七），但第三國際則認為：「國民黨是現時中國唯一強大的民族革命組織……，因為中國獨立的工人運動尚居薄弱……，年輕的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實行合作是必要的……。但中國共產黨無論如何不應與國民黨合併，無論如何不應在這些運動中隱藏自己特殊的旗幟。」（註三八）這樣，就使當時年輕的匪黨既要加入國民黨，服從國民黨，在國民黨內「實行合作」，又要在國民黨外保持自己獨立的組織，「不應與國民黨合併」。在聯合戰線政策上，既要「在民族革命戰線上一切運動中幫助國民黨，」（註三九）又要保持自己的「獨立政策」，不「隱藏自己特殊的旗幟」。這是一種互不相容的鉅大矛盾，這是陳獨秀與第三國際歷次爭執的根源，也是國民黨容共時期，一再檢舉制裁彈劾共產黨的原因所在。

不過，在共產黨人看來，這一鉅大矛盾，是一種辯正的矛盾，正是第三國際的滲透戰術。平實而論，這一戰術，如用之於一個鬆懈的友黨，其成功的公算是很大的，但用之於一個強大而嚴密的友黨，則很有失敗的可能，將使自己獨立的組織為友黨所溶化、對消或排斥。一九二七年四月國民黨的清黨，以及七月武漢的分共，第三國際承認這是中共的失敗。不過，把失敗責任完全歸罪於陳獨秀，而不檢討自己的領導責任，以及聯合戰線方式，特別是加入國民黨問題是否正確，這是共產黨人把錯誤推給下層的一貫作風，實在是不足為奇的。

現在匪黨史家對「二大」給予很高的評價，認為「黨的二次大會的功績是巨大的。但大會還有它的缺點。即沒有指出民主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沒有提出工人農民的政權要求和農民的土地要求。祇號

召工人農民參加民主革命和爭取自己的權利。而這個缺點後來就在黨對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的領導工作中，被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集團發展成爲嚴重的路線錯誤，使革命遭致了失敗。」（註四〇）這些史家爲甚麼不想想當時匪黨要求參加國民黨領導的國民革命尙不可得，而爲孫中山先生一再拒絕，還敢說領導國民革命和要求政權麼？如果共產黨人一開始便要政權，便要高高在上領導別人，誰人又敢和你聯合？何況當時共黨黨員祇有百餘人，國民黨已是卅萬黨員的大黨了，匪黨又憑甚麼力量去領導國民革命和要求政權呢？至於農民的土要求，在時局主張和「二大」宣言中都提出來了，爲甚麼不去讀文件？爲甚麼不去翻翻第三國際，當時又是如何指示匪黨中央的。現在匪黨史家的這種批評，看來祇有一個作用：那就是把後來「革命遭致了失敗」的責任，從「二大」起，便要有系統的完全推給「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集團」了。

註 一：據沈雲龍「中國共產黨之來源」稱：「當時鄒魯先生是任青年部長……并不斷的派人加入共產黨，去偵查他們的情形」，鄒先生之「二大」決議，可能就是由此獲得。

又謂「青年黨始創人曾琦先生在法國發現共產黨之陰謀，載於一九二二年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議案，經間接轉告謝持。」

註 二：匪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黨綱」「決議」見陳公博「共黨運動在中國」附錄。

註 三：史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史大林全集第六卷一三三頁、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北京人民出版社。

註 四：陳公博「共黨運動在中國」中文本一四頁。

註 五：周佛海「逃出了赤都武漢」——見中國國民黨廣西省黨部清黨叢書。

- 註六：陳公博「共黨運動在中國」中文本一五頁。
- 註七：中國現代史研究委員會「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上冊一二九頁。
- 註八：周佛海「逃出了赤都武漢」。
- 註九：棲梧老人「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後的見聞」。
- 註一〇：列寧「中國的民主主義與民粹主義」列寧選集第七卷四二〇、四二二頁，一九三四年莫斯科版。
- 註一一：「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上冊一五六頁。
- 註一二：「中共第一次對於時局的主張」中國問題指南」第二冊，一九三七年，中共中央延安出版。
- 註一三：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二五頁。
- 註一四：周佛海「逃出了赤都武漢」。
- 註一五：陳公博「寒風集」甲二二二頁。
- 註一六：沈雲龍「中國共產黨之來源」一八頁。
- 註一七：陳獨秀「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載於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前鋒月刊第二號」。
- 註一八：隻眼「國民黨是甚麼」——載於一九二三年九月廿二日「嚮導週報第二期」。
- 註一九：陳獨秀「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
- 註二〇：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二〇頁。
- 註二一：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六九頁。
- 註二二：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四二頁。
- 註二三：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七〇頁。
- 註二四：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七一、七二頁。
- 註二五：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四二頁。

註二六：列寧「民族與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二卷七九三、七九四頁，一九四九年莫斯科版。

註二七：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國共產黨歷史簡編」三五頁，王實等編，一九五八年九月出版。

註二八：列寧「民族與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同「註二六」七九一頁。

註二九：張國燾「一封公開的信致國民黨全體黨員」——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嚮導週報」第一三九期。

註三〇：李大釗「對共產分子加入國民黨之聲明」——革命文獻第九輯。

註三一：匪黨當時指中國國民黨爲代表開明資產階級的政黨，或稱之爲代表國民革命運動的革命黨，又稱之爲領導民族革命的組織，以後又說是代表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工人、農民及各階級聯盟的政黨。

註三二：匪黨籌備建黨紀念時，因毛匪澤東、董匪必武等記不起「一大」究於一九二一年七月那日舉行，爲便於記憶起見，便商定七月一日爲「一大」召開之日，亦卽以後之建黨紀念日。

註三三：鄧家彥「馬丁謁總理實記」。

註三四：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

註三五：中國國民黨史料編纂委員會「國父年表」。

註三六：蒂赫溫斯基(S. L. Jekhvinsky)「論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五年間孫逸仙對蘇俄之關係」——載於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份蘇俄「歷史問題」雜誌。

註三七：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

註三八：「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決議」——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上冊。

註三九：「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決議」。

註四〇：「中國共產黨歷史簡編」——一九五八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附錄：一九二二年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大會決議

(一) 有關世界局勢和中國共產黨之決議：

自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資本主義之力量日漸衰落，可是相反的，社會革命之力量卻正在走向高潮。革命浪潮之所以有一暫時的衰退現象，其原因是在無產階級的陣營中出現許多叛徒，他們無恥的向資產階級投降，而變成革命無產階級最兇惡的敵人之故。當時產生了新的形勢，即世界帝國主義企圖恢復其經濟霸權，並在世界各地打擊無產階級——此項計劃最重要的徵候是各國資本家減少了工人的工資，並增加了工人工作的時間。爲了對抗此項運動，第三國際乃集合全世界無產階級，組織聯合陣線以對抗資本家之攻擊。

蘇俄係全世界第一個工人及農民的國家；她是無產階級和勞動羣衆的祖國；她也是世界工人及農民對抗世界帝國主義國家的大本營。目前世界資本主義之力量仍然十分強大，並繼續不斷地攻擊俄國，故工人階級及廣大羣衆應以其全力保衛她。

中國共產黨在其第二次大會中決議，集合全體中國工人參加爲保衛無產階級祖國——蘇俄的世界工人的戰場，抵禦資本主義的攻擊；本黨並決定呼籲中國被奴役的廣大羣衆保衛蘇俄，因爲俄國是解放全世界受壓迫國家之先驅。

(二) 有關國際帝國主義和中國共產黨之決議：

1. 當前世界經濟的主要形勢：

(1) 世界經濟秩序已經爲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之帝國主義戰爭所破壞。

(2) 資本主義者正在打擊著無產階級，他們正在加倍增強他們的力量，以期剝削勞動階級，並恢復曾被他們自己的戰爭所破壞的經濟秩序。無產階級必須聯合起來組成聯合陣線以抵禦此項攻擊。

第四章 中共戰略策略的轉變

(3)資本主義者企圖切奪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之原料，並剝削其勞動階級，以補償其大戰中之損失。在各被剝削的市場上發生了新的衝突，諸如日本與美國間之衝突，大英帝國與法國之衝突，比比皆在醞釀另一次帝國主義之戰爭。

2. 中國有龐大的天然產物及四億廉價的貧苦工人，因此使她變為世界資本家爭奪的戰場。此一市場現正更嚴重的吸引着列強的垂涎。

3. 中國之資本主義已發展到能拉攏封建軍閥到資產階級一邊，為它保護特權的地步。而外國帝國主義者則希望在此獲得更大的特權，而協助中國之封建軍閥，以壓制中國資產階級之興起。

4. 在此種情形下，一九一一年之國民革命力量變為非常脆弱；在過去十一年中，中國一直在軍閥的內戰及暴亂下受着壓迫，使資產階級的工商業遭受阻礙；農民遭受到無法忍受的折磨，而工人的痛苦亦一再增長。

5. 中國領土遭受到軍閥的割據。吳佩孚將軍陰謀以軍事力量統一南北，而今他又重新召開舊國會以圖藉以證明他的善意，但是都失敗了。

6. 中國不能夠統一其領土，因為各地區的經濟情況與中國本部完全相異；而且在這些區域間還有其他許多不同之處存在。

7. 統一中國之美夢唯有在中國擺脫世界帝國主義，打倒封建軍閥，建立真正的統一國家之時，才可實現。

8.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大會決定，黨的主要任務如下：

(I) 平息內戰，打倒軍閥，並建立全國和平。

(2) 統一中國本部（包括東三省）為真正民主共和國。

(3) 打倒國際帝國主義之壓迫，並達到中華民族之完全獨立。

(4) 承認蒙古、西藏、及回疆之自治權。

(5) 根據聯邦之原則，將蒙古、西藏及回疆重新歸入中華聯合共和國（United Republic of China）之內。

(6) 爭取各種自由。

(7) 制訂保護工人、農民、婦女及孩童之法律。

9. 倘使上述各項目標均能達成，它將有利於一切工人、農民及小資產階級的生活，故這些階級人士均能為上述諸種權利而奮鬥。

10 爲了達到這些目的，中國工人們應在中國共產黨之旗幟下團結起來，一方面參加國民革命戰線，另一方面爲改進渠等本身的情況而奮鬥。

11 中國工人必須團結在各種組織之中，以作中國共產黨之組成部份。

12 協助勞動階級是中國共產黨之主要方針。吾人參加國民黨戰線，能使勞動階級一開始就可獲得政治權力。因此，同國民黨建立聯合戰線，是我們的主要政策之一。

(三) 有關國民黨聯合戰線之法議：

人類經濟及政治之進化構成階級鬥爭，當封建主義轉變到民主主義的過程中，因爲經濟及政治之演變，資產階級反抗封建主義是不可避免的。同樣地，當民主主義演變爲共產主義的過程中，因爲經濟及政治之轉變，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挑戰亦是不可避免的。

人類之歷史是一篇鬥爭的紀錄。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發動的鉅大戰爭仍未結束。同時民主主義反對封建制度的鬥爭仍在激烈的進行着。特別是在東方的國家，工業剛萌芽，封建主義的勢力仍然存在於社會傳統及國家主權之中。在這些國度裏，人民的生命及財產緊緊的被軍閥的利爪控制着，而法律及民意的力量皆維護此種形勢。爲了大眾利益，民主主義起而推翻封建主義是必然的。倘使無產階級無力獨自發動革命，他們即應協助民主主義來打敗封建主義。封建軍閥集團是無產階級及國民黨之共同敵人。除非此兩階級聯合起來一致行動，即得不到出版、結社或集會的自由，而任何階級如不能獲得上述自由，其本身是不可能有機會發展的。當國民黨一旦革命成功，他們當然亦必企望獲得某種特權，而以

第四章 中共戰略策略的轉變

自封建統治者手中掠奪得來的政治力量來壓迫無產階級。當時機來到時，無產階級力量能否超過資產階級，完全決定於他們在革命期間所表現的組織能力及戰鬥能力。

中國虛有共和國之名，實際受封建軍閥所統制。從外表觀之，她是個在國際帝國主義勢力控制下的一個半獨立國。在這樣一個經濟及政治的環境下，無產階級同時受到國內國外的雙重壓迫，他們除鬥爭之外無他途可以獲得自由，因而參加了國民革命運動。吾人必須明瞭「參加」並非向代表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投降，做他的奴隸，也不是說在國民黨革命成功後無產階級即能完全解放；而事實是，我們爲了打倒敵人的壓迫——內在的封建軍閥，外在的國際帝國主義——不得不暫時與國民黨聯合，因此，無產階級應該參予國民黨，並協助它的革命，但是，這並不是要放棄共黨的組織的意思，因爲國民黨並不是代表無產階級的政黨，它也不爲無產階級而戰。相反的無產階級應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旗幟下——爲他們自己的階級獨立而奮鬥。

共產主義者並非空想主義者，也不是革命志願軍，而是一個任何時候都要不屈不撓的工作的黨。在中國目前經濟政治以及無產階級的情況下，吾人承認國民革命對無產階級及資產階級二者皆有裨益。事實上，吾人應聯合所有革命政黨，與國民黨組成聯合戰線，共同去爲推翻封建軍閥集團，及帝國主義之壓迫而奮鬥，並將中國建立成爲真正民主獨立的國家。吾人應號召所有工人及農民在中國共產黨的旗幟下參予此項奮鬥。吾人應明告他們，雖然此項奮鬥不能將他們自苦痛中完全解放出來，但這是協助工人及農民，並引導他們走向建立其本身權利的第一個步驟。同時還須告訴他們，此項聯合戰線並非爲國民黨的利益而奮鬥，吾人亦不爲國民黨而犧牲自己，而是爲了獲得暫時的自由。無產階級當戰鬥進行中，必須不要忘記他們自己的獨立組織。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爲接受中央執行委員會之建議，適應當前情勢之緊急需要，通過了參加國民黨聯合戰線的政策。茲將其列舉如後：

1. 中國國民黨及社會主義青年團應該在一適當之地點召開代表會議，以討論號召其他革命團體之最佳方法，並訂定一綱領。

2. 建議同情共產主義之國會議員聯合起來，並組成一個民主同盟的左翼。
3. 號召各城市之工會、農民團體、商會、教師會、學生會、婦女政治聯盟、律師公會、及編輯人俱樂部聯合組織「民主同盟」。

(四) 有關中國共產黨參加第三國際之決議：

無產階級是世界主義者，而無產階級革命亦是世界主義者。除非聯合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勢力將無法增長，尤其是在年青的東方諸工業國家中。今日代表世界無產階級的唯一無產階級革命大本營是第三國際，它是自蘇俄革命成功後新成立的。第三國際反對一方面利用無產階級，另一方面又作資本帝國主義者的傀儡的第二國際。因為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之無產階級，因而第二次代表大會正式決議加入「第三國際」，完全承認第三國際決議之二十一條款，並作為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

(五) 有關議會鬥爭之決議：

1. 在那些經濟情況可謂進步的國度裏，多年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生產已成長，而議會政治與資本主義相輔並行，共同造成了一個牢不可破的堡壘上。在此種勢力的影響下，那些經已變成統治階級的一部分的共產主義者，拋棄了革命理想，並開始計劃經由議會鬥爭進行改革。在德國、奧國、法國、及比利時諸國中的社會民主主義者皆有此情形。
2. 第二國際經戰爭情勢的壓力而向資本主義投降之後，產生了第三國際。它既利用既有合法團體進行鬥爭的決定是有價值的（與第二國際所持有的理論相反），並決定同志們應在各政府機構尋求職位，以改正第二國際所提倡的錯誤的教條。

3. 中國因為經濟鬥爭之落後，部份領土作了國際資本帝國主義者之剝削地及半殖民地，另一部份則成了由國際資本帝國主義者所組織的軍閥勢力的劫奪品。過去的革命運動雖遍及全國，但不成功，而議會政治亦未建立穩固。雖然召開了各種集會，但經常遭受到軍閥勢力的壓迫和折磨。

4.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窮苦農民羣衆之希望。吾人應踏入受到封建軍閥集團威脅的國會中，在那裏共產主義者應與軍閥勢力所造成的，並受到帝國主義支援的政治罪惡進行鬥爭。

在國會中應勿忽視宣揚革命理想之機會，在其他各種集會中亦要爲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階級謀取一切利益。

5. 中國共產黨爲了激發革命的議會鬥爭，因而承認第三國際第二次大會所通過的各項原則。

(六)有關工會運動與中國共產黨之決議：

中國勞工運動很難擺脫古老行會及手工業公會之束縛。勞工階級鬥爭僅是在某種手工業或某一工廠的特殊環境下的間發運動。這些運動並不普及全國。勞工組織並不鞏固，而工會之會員數目亦不鉅大。因爲以上各項缺陷，致力於擴大和正確的領導勞工運動，便成爲中國共產黨的責任。

鑑於目前中國勞工運動之情形，和我們過去的活動及經驗，以及近代歐洲領導勞工運動之結果，採取下述各項基本政策：

1. 當工人階級和勞工羣衆爲從資產階級的剝削中求取解放而從事鬥爭之時，他們必須參加最前進的鬥爭成份之中——勞工羣衆中之無產階級。中國共產黨應傾力影響此類工會之份子，如鐵路工人、海員、冶金工人、紡織工人等參予此項運動。

2. 爲何要組織工會？是爲了保護勞工之權益，並爲爭取此類權益而奮鬥。工人製造貨物，所以他應該享受他所製造的物品，這就是工會工作的出發點。

3. 一個工會應明瞭，並承認在資本家與工人之間沒有共同的利益。此兩者之間利益的衝突是無法調和的。工會不僅

不應該調和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衝突，而且還必須使兩者的敵對心更加尖銳。如果在一次鬥爭中工人獲得了勝利，工會應協助工人再鬥爭。工人組織將隨着每一次勝利而堅強起來。工人們須將其大部份資金投入罷工上，同時要小心謹慎地選擇良好時機實行罷工。

4. 工會應致力於改善工人情況。工會應計劃迅速的達到勞工運動之目的，譬如：推翻奴隸工資，及根據共產主義之原則重建社會。

5. 當工會發起改善勞工情況時，應參予更進一步的勞工立法運動。我們應該警告工會，在它們要求勞工立法及改善工人情況之前，必須具備強大的力量。在資本主義的制度下，如欲達成勞工立法及改善工人情況，工會必須具有足夠的力量去威脅政府及雇主，強迫實現工會的意志。

6. 有些同志總是認為工會活動不應變為政治運動。這是無政府工團主義的傾向，這是極大的錯誤，它會使工會變為脆弱無力，並立於非法的地位。工會應在政治上為國家獨立，公民權利及自由而奮鬥（包括普遍的參政權和刑法中的罷工合法性），並應在國民黨的聯合戰線中佔據獨立而重要的地位，如此以後，工人即能迅速地獲得最後的勝利。有人說，參加國民革命軍僅是一良好的手段，但並不符合共產主義之理論。這是不正確的。無產階級必須領導自己，而不要受非無產階級工人的領導。

7. 當一工會決定與某一個人（如工頭），或者是與整個階級（如廠主）敵對時，工會方面必須根據共產主義理想與之敵對，而不可以私人的爭論處理之。

8. 有兩件最重要的東西工會必須予以爭取。其一是「團體契約」，其二是「同工同酬」。個人契約對雇主是有利的，並有助於他剝削工人。雇主亦可利用個人契約任意雇用或開革工人，並能隨意限制工資。工會必須堅持，任何有關工作之合同，雇用或協約，個人不得訂定之。一切契約必須由勞資雙方之代表訂定之。根據種族、性別、年齡及能力來區分工資之多少，是資本家用以欺騙勞工階級最狡猾慘酷的方法。資本家運用這些方法不僅可以更自私的剝削老弱及年幼的工人，而且還可以将勞工階級分解成數個工資不同的階級，以期使工人彼此忌妒，並使他們相互競爭。在這種情形之

下，工會應強烈地提倡「同工同酬」。不論工人是外國人或中國人，男或女，成年人、孩童或老年人，祇要他們做的是同樣的工作，就應該付予同等的工資；也不能基於人們智慧及社會地位之不同而給予不同之工資。平等待遇者，不是將高薪者向低薪者拉平的意思，而是將低薪者向高薪者拉平的意思。堅持兩項原則，是工會之基本職責。

9. 工會之性質與以往之行會顯然不同。工會中雇主不得入會，而相反的，它希望所有工資階級能參加工會。入會條件不受性別、年齡、宗教、種族、國籍、政治見解、技術水準之限制。工會不得收受額外會費，亦不得以手續過於繁雜的調查來限制會員入會。使工會成為羣衆的工會是吾人應要銘記的第一件大事。

10 工會之主要活動，是對資本家與政府鬥爭，相互的援助及諒解是次要的目標，因為公會是個戰鬥團體，不僅僅是個爲爭取利益的機構。

11 工會裏應自設一完善之學校，並應將大部份時間花費在教育會員上，將工會之意義視爲重要科目，以便提高工人之階級意識。

12 每一工會之組織應迅速成爲一個堅強統一、集中的和紀律良好的產業單位，工會中不得形成任何根據職務不同的自治團體。這些單獨的自治團體足以削弱工會在鬥爭上的力量。

13 各工會中的基層是工廠委員會。應將某特殊工業工廠的工人組成一工廠委員會，作爲產業工會的基層單位。但工廠委員會應僅僅是工資階級——工人的組織；雇主及勞工代表則不得成爲會員。而此委員會亦不得脫離產業工會而獨立存在。

14 僅僅以產業工會爲基礎的工會，仍然不是一種最完善的工會型式。型式最完善的工會除以產業爲基礎之外，還有待革命來改變其狀況。這樣的工會必須施予全面性的共產主義思想的訓練，並聯合所有的勞動階級，同時在各特殊工會中的工人與工人之間必須不得有任何磨擦，而全國各工會之間亦不得有衝突。

15 世界各國的革命工會之間，對於對世界資本主義之鬥爭是互相協調一致的。世界的革命工會之統一組織，是赤色國際勞工同盟。中國共產黨應根據上述原則組織工會，並在國際勞工同盟之旗幟下予以領導。中國共產黨應不使外國勞

工湧入中國，而使中國勞工階級遭受苦難，并且應提高中國勞工之工資，以避免受到外國資本家之剝削。

16 共產黨與工會之區別是這樣的：共產黨是所有階級意識份子的部隊，是無產階級的先驅，它有明確的黨綱，且是以推翻資產階級及資本主義為目的的無產階級的政黨；工會是所有工人（不論其政治觀念如何）的聯合；它以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的精神教育工人，以推進共產主義的目標，祇是進行的速度較慢而已。以戰爭為例，每一軍事單位必須有一個以龐大的武裝羣衆為後盾的領袖。共產黨即可被視為領袖，工人就是軍隊。在任何勞工運動中，共產黨即是首領，他必須密切注意工會之活動，並忠實而勇敢地領導工會運動。

17 共產黨是工會的實際首領，是無產階級的發言人。它應在工會、工廠委員會，及其他任何勞工團體中組織堅強的小組。

18 當共產黨員在由國民黨、無政府主義者，或基督教團體所組織的工會中活動時，不得命令其他工人離開此種工會。共產黨的策略是，在這些工會中增長自己的勢力，直到能推翻國民黨、無政府主義者，及基督教團體之領導權，並能確實控制為止。

19 在為增進工人福利之鬥爭中，我們共產黨，應隨時隨地準備與國民黨員、無政府主義者，甚至基督徒合作。同時，我們要使他們知道，祇有共產黨才真正是工人及勞動者的政黨。

附加決議：

上述各項決議，係有關各種重要工業工人的工會運動的最重要的決議。尙有三項次要的決議如下：

1. 由勞工團體所組織的合作社應自食其力，幫助對象僅限於勞工階級，應由共產黨管理之。

2. 共產黨應在進步的行會中活動。其理由是不久以後雇主們可能被排除，屆時同樣性質或處理同樣產品的新行會可能聯合起來，組織工會。

3. 共產黨亦應在守舊的行會和由資產階級用以欺騙工人所組織的團體裏進行活動，在那些行會或團體中應組織小型的共產黨小組。

(七)有關青年運動問題之決議：

第一部份

隨着機器生產力之突起，青年及身體虛弱的人作為剝削制度的補充工人而被犧牲了。青年勞工羣衆走入了各式的企業中，他們也和成人工人一樣，變成了機器的重要附屬品。資本案對青年工人之工作待遇及工資之付予，較諸成人工人普遍的更慘酷而刻薄。青年工人變成了受剝削更猛烈的階級了。

無產階級青年，不僅僅受到資產階級的虐待，而且一旦衝突發生的時候，他們還得被迫服兵役來保衛他們的壓迫者。在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發展的每一個國家，要擁有強大的軍備是不可避免的。數百萬的強壯工人被用於維持防禦和反擊的力量。帝國主義國家不僅使用他們的軍隊來剝削小國家，而且用其來鎮壓他們自己的勞工階級的反抗及革命。在每一次戰爭及叛亂中，工人們皆被編入軍隊，由資產階級驅使着去摧毀他們自己的家庭，及慘殺外國的勞工兄弟。在商業競爭中，資產階級者爲了保持他們的霸權，不知道有多少千萬的青年，在資本主義的歷史中流血犧牲於少壯華年。

在資產階級如此慘酷的剝削及無恥的利用之下，歐洲青年勞工豎起了他們反抗的旗幟。他們勇敢地爲他們的經濟利益而奮鬥，並與軍國主義相對抗。很不幸地，當時有許多青年工人受到了黃色的社會主義者之玩弄和影響，因而未能徹底實現他們革命的目的。一九一九年十一月的柏林會議，是憎恨帝國主義戰爭屠殺的國際無產階級青年的大集會。這次會議，成功地組成了無產階級青年的赤色國際聯盟……青年共產主義國際（少共國際）。第二屆青年共產主義國際會議採用了「到勞工羣衆中去」的口號，議定了奮鬥中的青年勞工之新責任，並決定在國際共產黨的政治領導下，進行獨立的無產階級青年勞工運動。

任何有青年被剝削的地方，就是青年共產黨員應該去活動的地方。他們應該組織並指揮青年同志作各種經濟鬥爭。此舉將是誘導青年們到共產黨革命軍隊的旗幟下的有效方法。

根據勞工階級知識之增長程度，已有將資本主義世界推向湮自己的墳墓的能力。青年無產階級運動中最重要的事項是革命教育，教育之資料將在他們日常的鬥爭中很容易的獲得。組織本身應該是經嚴格訓練的導師；每一運動皆應是教育青年工人變成有階級意識的革命份子的一項教育課程。

應協助世界工人祖國——蘇俄埃共和國——的紅軍，來對抗資產階級的軍備。

世界經濟秩序經已被帝國主義所破壞，資產階級目前正在剝削他們自己的工人以及脆弱的國家，以期恢復一九一四年以前的經濟狀況。在反抗他們慘酷的策略中，青年工人將首當其衝，蒙受其害。當前之急務，是青年工人與成人工人聯合起來，參加國際共同戰線，以抵抗帝國主義之襲擊。

第二部份

中國之龐大物質及四萬萬廉價的勞工人民，在過去八十年中，已經成爲英國、法國、日本及美國等帝國主義之剝削及競爭對象。中國的經濟命脈已被外國資本家緊緊的掌握着，政治則受在外國帝國主義者控制的反動封建軍閥所控制，這些軍閥皆爲了自私的目的，分別佔據各省，以便他們彼此間發動戰爭。

資本主義在中國經已發展到新興的資產階級能夠站立起來與外國之勢力相對抗，並能推翻封建主義和建立獨立自主國家的程度，可是自一九一二年以來他們並未成功，因爲他們遭受到帝國主義及封建主義之壓迫。

此種形勢造成了少年共產黨在中國鬥爭的責任。青年運動不應該僅僅爲青年工人的經濟及文化上的進步而奮鬥，亦不應該僅僅將他們組織在共產黨及青年國際領導下的無產階級革命隊伍，而是要集合所有青年革命的武力，以參加國民黨的聯合陣線，領導他們去爲推翻帝國主義及封建的勢力而奮鬥。

共產黨應該銘記，爭取青年工人之福利是第一目標。它應該認識，爲國民革命而奮鬥是組織無產階級革命的唯一機會，它亦應吸收力量及與革命青年勞工羣衆團結一致。

第三部份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承認社會主義青年團在其第一次全國會議中所決定的綱領及決議，是一切實際的革命

第四章 中共戰略策略的轉變

計劃根據的基礎。同時，亦承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之重要性。

關於社會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共產黨間之關係是這樣的，社會主義青年團，是協助青年工人去改善其經濟環境的獨立團體，但是，爲了整個政治運動之目的，社會主義青年團應經常在中國共產黨控制之下。

爲了使黨與團間之關係更趨密切，在各種運動中能充份合作無間，大會認爲從各級組織中派遣代表互相商談是必要的。至於如何辦理，應由黨與團的中央委員會決定實施。

(八) 有關婦女運動之決議：

第一部份

許多世紀以來，資本主義文明的旗幟上一直頌揚着平等的原則，一如他們頌揚自由一樣。在這種經濟情況根本不平等的制度之下，婦女得不到任何平等與自由。她們不僅在勞工市場上變爲資本家的廉價生產奴隸，而且還必須在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下負擔沉重的家務及母親的義務。在如此制度下，婦女的解放將永遠無法達成。

世界上婦女開始實行平等與自由的唯一地方，就是蘇維埃聯邦。俄國的婦女已在政治、經濟及社會上獲得平等權。她們在沒有男性的協助下，已負擔起社會重建的實際工作。公共婦產科醫院、公共商店，及兒童公共洗澡室及養育院等，在俄國正在進行建立。這所有的一切，在在皆證明了，五年中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婦女所獲得的自由與平等，遠較其他國家在資產階級獨裁下的婦女所獲得的爲多。這也證實了祇要社會主義一旦成功，婦女的完全解放即可實現。

第二部份

自從國際開發入侵中國後，無產階級婦女的地位一落千丈，變成工資的奴隸。她們在幾乎不能負擔的情形下，每日工作十二小時以上，而所得之工資僅及男工之半數。在勞工羣衆中，婦女及孩童受到非人的待遇。

在目前的情形之下，無產階級婦女已經受到慘酷手段之折磨，還有許多婦女以往並非勞動階級，現在亦受着驅使走

入了工廠勞工羣衆之中，在中國尚有更多的婦女，被監禁在封建習俗的束縛裏，過着妓女似的生活。全國各階層婦女的政治、經濟及教育上的權利，毫無疑問地，都普遍地被剝奪了。中國共產黨，不僅要爲爭取平等工資、爭取保護女工和童工的立法奮鬥外，同時還要爲中國受壓迫的全體婦女之解放而奮鬥，而不考慮其階級爲何。

中國共產黨相信，如能將勞工階級普遍地解救出來，則對婦女之解放當有裨益。當無產階級獲得政權之時，她們即可自己解救自己了。目前中國共產黨在婦女方面之要求是：

(1) 協助婦女獲得普選權，政治權利及自由。

(2) 在工業中保護婦女及孩童。

(3) 革除一切老社會習俗及傳統之束縛。

中國共產黨向婦女界大聲疾呼：我們的運動，是達到解放目的的唯一必要步驟。在私有財產制度之下，婦女自己解放自己是不可能的。前進吧！邁向自由之道路就在吾人的前面。

第三部份

第三國際，是一切無產階級，所有受壓迫國家，所有受壓迫的婦女及所有受迫害的青年的革命的革命的總部，而共產主義婦女國際則是其中的一個部門。第三國際第三屆大會中，決定在每一個國家的共產黨，必須組織一特別委員會來領導婦女。各國共產黨應該成立婦女部，并在共產黨報紙上開闢爲婦女而設的專欄。中國共產黨已決定儘速實施此計劃。

(九) 有關中國共產黨體制之決議：

我們共產黨，既非由知識份子所組織的馬克斯主義學會，亦非與廣大羣衆無關的少數共產主義者的狂熱革命團體。我們應該是由無產階級羣衆所組成的真正的政黨，我們充滿了革命的精神，旨在爲無產階級而奮鬥，而且是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領導者。因爲我們既不是空談的知識份子，也不是狂熱的革命者，所以我們不必進大學和不必進研究所及圖書

館。因為我們是無產階級的戰鬥政黨，我們祇須到羣衆中去，去組織一個「羣衆的黨」。我們要組織一個革命的和一個廣大羣衆的黨，就必須記住如下兩項原則：

(1) 共產黨的一切行動應與廣大的勞工羣衆相聯繫。共產主義者要走向各階層工人羣衆中，灌注共產主義思想。

(2) 黨的領導中心的目標之一，是準備和訓練他們的同志，使他們在革命時機成熟時，能够發動革命。

任何一個革命黨，如缺乏中央集權以及受過良好訓練的組織和訓練時，它僅能夢想着革命，而無力為實現革命運動而奮鬥。

嚴密的，集中的，受過訓練的組織，是依據下列諸原則而形成的：

(1) 要避免專橫的情形；從中央以至各小組皆應具備一嚴正的目標；要避免無政府主義傾向，而具備中央集權的及鐵般的法律。

(2) 黨須訓練每一同志，俾使其行動趨於軍事紀律化。

(3) 每一同志不僅在其言談中要表達他們共產主義觀念，同時在行動中也要表示出他是個共產主義者。

(4) 每一同志須犧牲他自己的意見，感想及陞職，以保護黨的統一。

(5) 每一同志須銘記，任何一日如果他未為共產黨而努力，那一天就是他破壞共產主義的一日。

(6) 不論何時何地，同志的言談須與黨的決策一致，他的行動亦須符合黨的命令。除了黨以外他不能具有任何個人的興趣。離開黨的控制的任何活動，完全是其個人的活動，而非黨的活動，這些活動將變成無政府狀態的共產主義了。

(7) 每一同志須了解，當黨執行其領導和訓練時，並不是依照資產階級的法律及體系而進行的，而是執行黨的意願以準備革命。

第二屆全國代表大會決議，中國共產黨既不繼承學會，亦不繼承烏托邦的革命團體，而是要成爲一個有足夠力量去實行無產階級革命的黨。我們的組織須實施嚴厲的中央集權及訓練。我們的行動將不與羣衆脫節。

(錄自陳公博「共產運動在中國」)

第五章 中共三全大會的論爭

一、初期的黨內鬥爭

如果仔細去考查各國共產黨以及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非常明顯的暴露出他們的一個特點，這個特點也許是其他任何政黨所沒有的，那就是共產黨人天天在內部作鬥爭；這種鬥爭偶而是「和風細雨」的，一般的都是大張撻伐，甚至坐牢殺頭。一個鬥爭過去了，第二個鬥爭又接踵而來，好像要永無休止的鬥爭下去。在執行路線或進行工作時，不是被指為左傾便是右傾，不是盲動便是落後，總要鬥你一頓，然後給你戴上一頂機會主義的帽子；共產黨人好像永遠在鬥爭和錯誤中生活。當然匪黨對此另有一套奇妙的說法：認為黨內鬥爭是辯證的發展，黨是在鬥爭中長大和鞏固起來的。分析錯誤的來源時，則認為是由於社會環境的影響以及黨內社會基礎複雜、無產階級成份薄弱所使然。因此把鬥爭當作家常便飯，當作每天洗臉，甚至當作「治病救人」的良藥，否則共產黨便要死亡，革命便要失敗。這樣，錯誤和鬥爭便成為共產黨人註定的無可脫逃的命運。

照此邏輯來分析，中共社會基礎最為複雜，工人成份最為薄弱；於是錯誤最多，而鬥爭也就最為慘烈，事實上匪黨內部的鬥爭也確實如此。不過匪黨的這種說法，實質上是為了掩護領導者主觀的錯誤，把錯誤責任推給客觀環境和社會基礎，同時把鬥爭的真實目的偽裝起來，把本來是爭奪黨內領導權的鬥爭，說成是黨內偏差或策略路線不同的鬥爭，以換取黨徒們的信任和擁護。因此匪黨的歷史便成爲一部

錯誤和鬥爭的紀錄。

遠在一九二〇年五月匪黨建黨的初期，黨內即開始鬥爭和分裂，而以無政府主義者爲鬥爭對象。在北平，由張國燾發起建立的地方組織，在討論黨的臨時綱領時，無政府主義者黃凌霜、袁明熊等因對無產階級專政發生爭論，結果退出了匪黨組織。在廣東，由陳獨秀建立的地方組織，實際操縱在無政府主義者手中，直到陳公博、譚平山、譚植棠入黨後，始與無政府主義者分家（註一）。在湖南，則利用了無政府主義者黃愛、龐人銓所組織的工會，待黃、龐二人因領導罷工被殺後，便接收了這筆遺產（註二），同時也無政府人員分了家。這是匪黨初期的內部紛爭。

到了一全大會開會期間，匪黨就開始了反左而又反右的所謂兩條戰線的鬥爭。劉仁靜等的左派，反對參加任何合法運動，反對參加政治活動，主張共產黨人不得做政府官吏議員和校長，認爲知識份子都是資產階級思想代表，一般應拒絕其入黨。右派的代表爲李漢俊，「他認爲今天中國共產黨祇需要從理論上進行宣傳工作，祇需要辦馬克斯主義大學，辦圖書館，出版各種報紙；認爲黨今天不應該發展組織，不應該進行工人運動，以爲勞動運動在今天無目的的」（註三）。所以當時張國燾指一李漢俊是有問題的，他的主張，不是列寧理論，而是考茨基理論，他是黃色的，不是紅色的。」（註四）會中討論大會宣言時，又因對於孫中山先生和徐世昌南北兩總統相提并論而發生很大的爭執。這是共匪建黨後又一次的內部鬥爭。

一全大會後，匪黨內部的鬥爭發展到與第三國際代表馬林間的爭執。馬林認爲中共一年花了二十餘

萬，工作成績如此，中國同志太不努力，要另作打算，但陳獨秀則力加否認。當一九二一年九月，陳獨秀剛由粵返滬時，即與馬林發生齟齬。周佛海說：「不知爲一件甚麼事，仲甫和馬林雖然沒有見面，意見卻不一致。仲甫是一條硬漢，一定要馬林認錯，纔肯見面，而馬林卻不肯認錯」。「馬林託我帶一封信給仲甫，竟把第三國際代表的頭銜拿出來，信中對仲甫說：如果你是真的共產黨員，一定要聽第三國際命令」。爭執期間，陳獨秀被捕，出獄後與馬林見面時，陳獨秀懾於第三國際的權威，祇好屈服。匪黨第二次大會後一個月，在西湖舉行中委會時，對於共產黨員以個人資格參加國民黨一節，又發生爭論；匪黨中委均不贊成第三國際指示，但又因馬林以國際紀律相威脅，才接受了這一命令。由此可見，共產黨人的鬥爭，不僅在國內如此，在國際間亦復如此。匪黨第三次全國大會，據說又是一場論爭，爭執的重點是關於聯合戰線問題。

二、「三大」爭論的來源

匪黨第三次大會召開於一九二三年六月，與「二大」相距不到一年。自從西湖中委會接受國際指示、以「黨內合作」的形式建立聯合戰線後，第三國際執委於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在特別決議中對匪黨作如下的指示：

「國民黨是現時中國唯一強大的民族革命組織，它以自由民主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以及一部分學生和工人爲依據。

因爲中國獨立的工人運動尙居薄弱；因爲中國目前的中心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及其在華代理人……中國軍閥；尤其因爲解決民族革命問題直接有利於工人階級，而現時工人階級又尙未充分分化成爲完全獨立的社會力量——所以共產國際執委認爲：年輕的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實行合作是必要的。

祇要國民黨客觀上進行着正確的政策，中國共產黨就應在民族革命戰線上一切運動中幫助國民黨，但中國共產黨無論如何不應與國民黨合併，無論如何不應在這些運動中，隱藏自己特殊的旗幟（註五）。

第三國際這一決議，顯然是一種不明確的含混的指示，可以作多種多樣的解釋，因此便成爲「三大」及以後匪黨內部爭論的根源。這一含混的決議指出：「國民黨是現時中國唯一強大的民族革命組織」，要在「一切運動中幫助國民黨」，「獨立的工人運動尙居薄弱」；根據這一決議，於是陳獨秀就在一九二三年四月出版的嚮導週報二十二期及十二月出版的前鋒月刊第二號寫道：「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資產階級的援助，在革命事業中便沒有階級的意義和社會的基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會階級固然一體幼稚，然而資產階級的力量究竟比農民集中比工人雄厚」，「中國工人階級不是獨立革命勢力，……大多數還沉睡在宗法社會裏」，「中國最大多數的工人，還沒有自己階級的政治鬥爭之需要與可能」。陳獨秀這種觀點，雖然是當時第三國際決議的申論和解釋，但是在以後，卻被指爲右傾機會主義的思想。

據鄧中夏說：「陳獨秀此種觀點是得到一部分中央委員的擁護，於是另一中央委員就說：『勞動運動麼？這一名詞根本不能成立，現時祇有一個國民運動，即是要勞動運動也祇能與青年運動、婦女運動等量齊觀，而共同的隸屬於國民運動之下，做國民運動的一部分』（註六）。另一中央委員的這種觀點和第三國際決議「一切運動中幫助國民黨」的說法實質上不僅沒有矛盾，而且是這一決議的又一說明。

第三國際這一決議另一方面的解釋便是所謂左派的張國燾，決議說「無論如何不應在這些運動中，隱藏自己特殊的旗幟」，於是張國燾便「主張工人應該在自己的政黨旗幟之下參加民族革命」（註七），這種主張雖然本質上與第三國際決議完全一致，但是在「三大」爭論中卻被斥為左傾機會主義傾向。由此可見，如果說「三大」有甚麼爭論，那麼這種爭論的對象正是當時第三國際的決議，爭論重點似乎祇是對第三國際指示的看法和解釋之不同而已。

三大之前，即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國父與越飛發表共同宣言，宣言第一條稱：

「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并無使此項共產制度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況也。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感，且以為中國最急要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及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關於此項大事業，越飛君并確告孫博士，中國當得

俄國國民最摯烈之同情，且可以俄國援助為依賴也。」

這一共同宣言，是國父聯俄容共政策的根據，也是匪黨個人加入國民黨、建立聯合戰線的基礎。在越飛看來，中國根本沒有實行共產制度或蘇維埃制度之客觀條件，而以中華民國之統一獨立為最急要之問題，所以「越飛告訴我，蘇聯命令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實為完成中國的國民革命，而且越飛更鄭重的說，中國祇有實行孫先生的三民主義，絕不能行共產主義。我問越飛：蘇俄希望共產主義何時在俄實行？越飛祇是搖頭不答。我問越飛：六十年共產主義在俄會實現麼？越飛倒很老實，說還是一個疑問」（註八）。顯然的，越飛這一看法以及共同宣言的觀點直接影響了當時匪黨的中央。同時也成為匪黨「三大」決議和宣言的基礎。如果說「三大」有甚麼爭論，那麼這種爭論的第二個根源便是這一組成聯合戰線的共同宣言。

「三大」召開當時，匪黨黨員雖有若干發展，由「二大」之百餘人增加到三百餘人，但力量尚極微弱。一九二三年之「二七」事件，對於匪黨是一個沉重打擊，鄧中夏認為「二七」事件以後，是職工運動的消沉時期，所剩的祇是一個殘破局面。而在所謂聯合戰線方面，陳獨秀、李大釗雖於一九二二年九月在上海便參加了國民黨，陳獨秀而且參加了國民黨改進黨方略起草委員，並於一九二三年初被孫中山先生委任為國民黨參議，但「黨內合作」的進展困難重重，「孫中山屢次向國際代表說：『共產黨既加入國民黨，便應該服從紀律，不應該公開的批評國民黨，共產黨若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蘇俄若袒護中國共產黨，我便要反對蘇俄』，國際代表馬林因此垂頭喪氣而回莫斯科」（註九）。另一方面

，「當時黨中雖尊重國際的提議，而大多數同志祇贊成民主革命的聯合戰線，對於加入國民黨的組織十分懷疑，因此，在實際上，國際的提議未曾實行」（註一〇）。於是「到第三次大會（一九二三年六月）重新討論共產國際加入國民黨的指示……」（註一一）。這一主客觀的困難情形和現實情勢，迫使「三大」不能不對聯合戰線重加討論，這也是「三大」爭論的又一原因。

如果「三大」對聯合戰線還有甚麼爭論，那麼，這些便是爭論的來源。

三、「三大」決議和宣言

匪黨「三大」於一九二三年六月在廣州舉行，到會代表二十餘人，代表中有陳獨秀、張國燾、瞿秋白、譚平山、毛澤東、張太雷、蔡和森等人。會議根據第三國際執委的特別決議，重新討論「國共合作」問題和黨綱草案，通過了「中國共產黨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并改選中央機關，選舉中央委員九人和候補委員五人，陳獨秀仍當選為中央總書記。

從「三大」所通過的決議（見附錄一）和宣言（見附錄二）看來，正如陳獨秀所說，當時的匪黨確係忠實的執行了第三國際的決議和指示。第三國際決議對於國民黨的分析和政策，對於民族革命運動的指示和中國無產階級力量的估計，以及「國共合作」的原則方針，都在決議和宣言中充分反映出來了。而且在「不應與國民黨合併」、「不隱藏自己特殊的旗幟」這一點上表現得特別突出，決議說：匪黨加入國民黨，不僅仍舊保存組織，而且要擴大組織。加入國民黨後須注意保存不妥協之真面目，要阻止國民

黨妥協改良、忽視民運、偏重軍事的傾向。還要努力使國民黨與蘇俄接近。根據此一決議，於是在「三大」宣言中公開批評國民黨的兩個錯誤觀念，即依賴外援和忽視民衆宣傳的偏向。同時表明了匪黨對於工人農民和世界革命的責任與願望。這一宣言，當時曾引起國民黨的不滿。一年以後，即一九二四年六月，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根據「三大」決議及社會主義青年團「二大」議決案和宣言，公開彈劾共產黨。可見「三大」決議和宣言，確係馬列主義的產物、第三國際決議的翻版。

當然，決議宣言僅僅是當時匪黨聯合戰線的原則和方針，具體的運用那又是另一套了。所以「三大」以後，陳獨秀在答覆周佛海（時周在日本，仍爲中共黨員）的信說：「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有兩種作用：第一步，利用國民黨的招牌，發展共產黨的勢力，因爲如果拿着共產黨的招牌去活動，一定到處碰釘子，因爲人家一見『共產黨』三個字，就要望而卻步，拿國民黨的招牌，就可和各方面接近……」。第二，就是使國民黨共產化，因爲共產黨黨員，既取得國民黨黨員的資格，就可在國民黨內掌握黨權，操縱黨務，製造黨論，煽動黨員……」（註一二）。這些話，如果和「三大」決議特別重視發展共黨組織，阻止國民黨偏向，以及使國民黨與蘇俄接近等項相互參證，足見陳獨秀的覆信是當時匪黨的具體做法，當然是可信的。

其實，還在「三大」開會之前，亦即「二大」之後，一九二二年十一月至十二月，第三國際舉行第四次大會，陳獨秀曾率代表團參加會議，會中劉仁靜對聯合戰線問題，就曾作過詳細的說明，他說：「依據消滅在中國的帝國侵略主義的大前提，勢須形成一個反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因此本黨（中共）決

定與國民革命黨（國民黨）組織一個統一陣線。我們是以共產黨的名義并以個人為單位參加該黨；其理由有二：第一我們要對國民黨內所組織的勞工作份子加以宣傳而爭取他們。第二祇有我們聯合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共同力量，才能對帝國主義作戰。對於組織、宣傳、羣衆工作，我們要與國民黨作競爭。假使我們不參加該黨，則我們將要陷於孤立，我們所倡說的共產主義最多不過將成爲一個偉大高貴的理想——一個羣衆不願追尋的理想。羣衆無可諱言的願跟從資產階級的黨，而該黨也正要利用羣衆以達其目的。假如我們參加了該黨，就要對羣衆有所表現，讓他們知道我們的目標也是爲了一個民主的革命。但是我們對內部自己人來說，這個革命的民主祇不過是一項達到目的的手段而已。再者，我們更願指出，雖然我們是爲了這個長遠的目標，但是我們絕不會忽視羣衆的生活要求。如此，則我們就可結合羣衆親向我們而遠離國民黨了」（註一三）。劉仁靜的說明，當然是經第三國際認可的，這種意見和以後的「三大」決議以及匪黨的做法，基本上是相符的。

第三國際第四次大會（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五日至十二月五日）之後，國際執委於次年（一九二三年一月始有「國共合作」的特別決議。陳獨秀於一九二三年一月由俄返國，其所帶回的國際指示當不會超出特別決議的範圍。匪黨「三大」也就遵照此一指示而製定其「國際路線」了。

四、「三大」爭論的重點

匪黨三次大會的論爭，最早的資料，發現於一九三一年五月十日匪黨中央機關刊物「布爾塞維克」

第四卷第三期，在這期刊物上，華崗以「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的中國共產黨」為題詳為論列。他說：

「到第三次大會（一九二三年六月）重新討論共產國際加入國民黨的指示的時候，又曾發生過爭論：陳獨秀領導的右傾思想，贊成加入國民黨，同時主張『一切工作歸國民黨』，共產黨不應該有甚麼獨立的工作，甚至說『中國共產黨早生了五年』，這無疑的是取消主義的思想。同時有一派左傾的思想，則『反對在勞動羣衆中發展國民黨的組織，主張工人應該在自己的政黨旗幟之下參加民族革命，若加入資產階級性的國民黨，便不免有混亂無產階級的危險』（見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大會）對於民族革命之議決案」中之第四節「中國共產黨對於民族革命運動政策之經過」。他們起初是反對加入國民黨，後來贊成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但要保留產業工人不要加入，這是一樣的不能與資產階級爭奪革命領導權的策略……。

三次大會的結果，沒有把這樣的機會主義的思想駁斥下去，因此，一方面固然實行了共產國際加入國民黨的指示，另一方面機會主義的思想卻充滿了當時的指導機關。於是『一切工作歸國民黨，共產黨不要獨立的工作』，『一切運動都是國民運動，工人運動祇是國民運動的一種』，便成為當時指導機關的路線。甚至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還說：『中國國民黨應該是國民革命之中心勢力，更應該立在國民革命之領袖地位』。這是很明顯的與列寧所指示的『不要與資產階級混合，而要保存無產階級運動的獨立性』完全相違反，這就是極可恥的以階級利益去服從民族

利益，以無產階級去服從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這樣自然不會去在這聯合戰線中去力爭革命的領導權，更不會有『對待同盟者猶如對待敵人一樣』的認識。……」

其次，一九三七年匪黨在延安出版的「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對於「三大」的爭論，有相似的記述，雖然措詞較為溫和委婉，但明確指出，在爭論中「主張工人應該在自己的政黨旗幟之下參加民族革命」的左派代表就是張國燾。

共匪竊據大陸後，匪黨的所有黨史書刊都有同樣的記載，同時作了若干的歪曲，以「中國共產黨歷史簡編」爲例，它說：

「大會在通過國共合作的政策時，曾出現了兩種傾向：

一種以陳獨秀爲代表的投降主義傾向。認爲中國目前既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那麼，革命就應該由資產階級來領導。「一切工作歸國民黨」，「民主革命成功了，無產階級不過得著一些自由與權利」。他們根本就沒有企圖由無產階級和共產黨來領導這個革命……。

另一種傾向是以張國燾爲代表的關門主義傾向，認爲共產黨不應當與國民黨合作，祇有工人階級才能夠革命，國民黨是不能進行民主革命的，所以反對共產黨員和工人農民加入國民黨。

這兩種傾向都是否認無產階級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都是有利於敵人而不利於人民的，這兩種傾向受到了大會的批判。

黨的第三次大會由於正確的解決了民族統一戰線這一重大策略問題，因而加速了中國革命的步

伐，……但是第三次大會對於農民問題和革命軍隊問題，卻沒有加以應有的注意。

毛澤東同志在大會上堅持了正確的意見，反對了錯誤的意見，在這次大會上毛澤東同志被選為黨的中央委員。」

這些就是匪黨書刊所記述的「三大」爭論的重點。

五、可疑的中共記述

關於「三大」論爭情形，匪黨書刊前後的記述有若干不同：

第一、張國燾左派的主張，有「四大」決議可憑的僅僅是反對工人加入國民黨一點，但「中國共產黨歷史簡編」把它擴大為「國民黨是不能進行民主革命的」，擴大為反對「國共合作」，反對「共產黨員和工人農民加入國民黨」。

第二、「布爾塞維克」刊物說：「三次大會的結果，沒有把這樣的機會主義的思想駁斥下去」，「歷史簡編」一書則說：「這兩種傾向受到了大會的批評」，「由於正確的解決了民族統一戰線這一重大策略問題，因而加速了中國革命的步伐」。

第三、對於「三大」宣言，「布爾塞維克」刊物說，承認國民黨的中心勢力和領袖地位「是以無產階級去服從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但「歷史簡編」則於引用「三大」宣言第一節時說：「大會對當時國內外的政治情況和各階級的要求作了正確的分析」，「大會進而又正確地估計了孫中山反對帝國主義

和封建軍閥的民主主義立場」。顯然是承認宣言的正確性。

第四、匪黨黨史前期書刊的記述，并未說到毛匪澤東在「三大」的情形，僅僅說到他出席了這次大會。「歷史簡編」硬說「毛澤東同志在大會上堅持了正確的意見，反對了錯誤的意見」。

因此，有關「三大」爭論的真相，除左派代表張國燾的主張，有「四大」之「對於民族革命之議決案」可予證實外，其他的說法，似乎值得重加研究。

國民黨清黨及武漢分共以後，匪黨自認失敗，承認犯了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錯誤的主要代表為歷任中央總書記的陳獨秀。但是在「八七」會議決議及告全黨同志書中，從未說到陳獨秀機會主義的來源係自「三大」開始，其他有關資料如史達林論中國革命，「六大」決議，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機會主義史等等，也從未指出「三大」時陳獨秀便有了右傾機會主義思想。相反的，陳獨秀在告同志書中指斥國際代表為機會主義者，他說：「在此時期前後，中共所染機會主義（按：係指第三國際代表的機會主義）還不很深，所以還能够領導二七鐵路大罷工（一九二三年）和五卅運動（一九二五年），都未受國民黨政策的牽制，并且還嚴厲的批評國民黨的妥協政策」。而且在「三大」宣言中也確確實實批評了「中國國民黨常有兩個錯誤的觀念」。另外值得注意的一點，就是所有有關「三大」論爭中陳獨秀右傾思想的記載，都是在陳獨秀被開除出黨以後的補述，其真實性如何，實在值得懷疑。

在這論爭的記述中，從鄧中夏之「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一九三〇年），華崗的「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的中國共產黨」（一九三二年）起，以至以後所有匪黨黨史書刊止，大都取材於「嚮導」、

「前鋒」等資料，從這些刊物中摘取陳獨秀的若干言論，來證明當時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然而在同一時期也有陳獨秀非「機會主義」的論點。比如匪黨批評陳獨秀低估工人階級的力量，忽視無產階級的革命領導權；可是在「三大」開會的同時，「新青年」改為中共的理論機關刊物（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五日改版後第一期出版）發表了「新青年之新宣言」，在這新宣言中指出：「因此，中國黑暗反動的舊勢力，憑藉世界帝國主義要永久作威作福，中國資產階級自然依賴世界資本主義而時時力謀妥協。於是中國的眞革命，乃獨有勞動階級方能擔任此等偉大使命。中國社會中近年來已有無數事實，足以證明此種現象——即使資產階級的革命亦非勞動階級爲之指導，不能成就；何況資產階級其勢必半途而輒失節自賣，眞正的解放中國，終究是勞動階級的事業；……」。

在「新青年」第四期中，陳獨秀發表了「二十七年以來中國國民運動所得教訓」一文，文末結論稱：「二十餘年來國民運動給我們的總教訓是：社會各階級中，祇有人類最後一階級——無產階級，是最不妥協的革命階級，而且是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之天然對敵者；不但在資本帝國主義的社會革命他是主力軍；即在被資本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之國民革命，也須他做一個督戰者，督促一切常有妥協性的友軍——農民手工業者革命的知識階級游民無產者（兵與會匪）及小商人，不妥協的向外國帝國主義者及其走向——國內的軍閥官僚富商劣紳大地主反革命的知識階級進攻，才能够達到國民革命之眞正目的——民族解放。」在同一期中，彭述之以「誰是中國國民革命之領導者」爲題，詳論「中國的資產階級不能領導國民革命」，「祇有中國的工人階級能够作領導者」，「所以牠一方面須極力領導國民革命，推動國民

革命到底；另一方面又須準備將來之無產階級革命」。

還在「三大」召開之前，即一九二三年四月十八日出版的嚮導週報第二十一期，陳獨秀就曾以「怎樣打倒軍閥」爲題，高度估計了工人階級的重要性，他說：「必須認定勞動階級是國民運動中的重要部分」，「他們離了工人貧農的勞動羣衆便沒有當真革命的可能」，「勞動階級不僅要求眞民主主義最切，而且能爲眞民主主義奮鬥的力量也最大。并且此時中國的國民運動，勞動階級不但是重要的部分，已經是最勇敢急進的先鋒了。」

可見陳獨秀於「三大」前後，在另一些文章裏，不僅沒有低估工人階級的力量，沒有忽視無產階級革命的領導權，而且認爲勞動階級「已經是最勇敢急進的先鋒了」。匪黨史家祇是片面的斷章取義的摘取其若干語句，作爲「三大」爭論中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思想的證據，這種主觀的論斷，實難使人置信。

誠然，正如若干匪黨黨史資料所說，「三大」有過爭論。除若干爭論可能爲對第三國際指示的不同解釋外，就決議宣言研究，「三大」的爭論，係以反對張國燾的左傾主張爲中心。因爲：第一，這一爭論已有匪黨「四大」決議案的記載，爭論記載於大會決議，足見論爭的激烈。第二，張國燾從主持勞動組合書記部起，即從事工人運動，他在「三大」，根據不隱藏自己特殊旗幟的國際指示，主張工人在自己旗幟下參加民族革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第三，張國燾曾主持「一大」，擔任「一大」大會主席，「一大」通過的黨綱決議都是極左的；到了「三大」，反對在勞動羣衆中發展國民黨的組織，主張工人不參加

國民黨，是他一貫的左傾觀點。同時從「三大」決議研究，大會批判了他的左傾傾向，因而在「三大」決議中明白規定，中共要在勞動羣衆中擴充國民黨的組織；可見大會打消了張國燾的主張。

「三大」會議中，除發現左傾傾向并予以批判外，有沒有發現右傾思想呢？如果有，究竟有沒有把右傾機會主義思想加以克服呢？華崗的前期說法認爲「沒有把這樣的機會主義的思想駁斥下去」，「歷史簡編」的後期說法則稱「這兩種傾向受到了大會的批判」，也就是說已予克服，「因而加速了中國革命的步伐」。其實就決議與宣言看來，陳獨秀的思想不僅沒有受到批判，而且統治了「三大」，爲「三大」代表所擁護，因而「三大」宣言除公開承認國民黨的領袖地位和中心勢力外，同時也正如陳獨秀所說嚴厲批評了國民黨的妥協政策。在決議中則指出工人階級尚未強大起來，目前的政治鬥爭，祇是國民運動；要在勞動羣衆中擴充國民革命的國民黨。也正因爲陳獨秀的思想取得了代表們的支持，決議和宣言才能通過，陳獨秀才被選爲總書記而領導全黨。事實上，陳獨秀當時的思想以及三大決議和宣言，也就是第三國際特別決議的翻版，「三大」代表對此可能有不同的瞭解，可能有若干解釋，但是誰也不敢推翻這一國際的指示。「中國共產黨歷史簡編」的編者所以說「這兩種傾向受到了大會的批判」，係爲毛匪澤東在「三大」堅持了正確的意見，反對了錯誤的意見」作伏筆，其出諸僞造，似可斷言。

如果說，由於承認了國民黨的領導地位和中心勢力，承認了工人階級尚未強大起來，目前的鬥爭祇能是國民運動，便是右傾機會主義；那麼，第三國際的特別決議認爲國民黨是中國唯一強大的民族革命

組織，認爲中國獨立的工人運動尙居薄弱，要在一切運動中幫助國民黨，豈不是同樣右傾機會主義麼？何況，「三大」宣言和決議正是根據此一指示引申而來，如果要追查機會主義根源，便要向第三國際清算了。

至於所謂革命領導權問題，既然工人運動尙居薄弱，中共黨員亦僅有三百餘人，便無從去爭奪領導權。何況當時建築在滇桂軍基礎上的廣東政府仍在動搖中，東江、北江正受到陳炯明、沈鴻英叛軍的攻擊。國民黨的容共政策雖已確定，但還沒有認真推行，國民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也還沒有召開，所謂「國共合作」尙未真正開始，從何進行領導權之爭奪？匪黨史家的想法未免太天真了。

當然，匪黨史家的這種寫法，是有其用心的，第一爲第三國際解除指導錯誤的責任，把錯誤責任完全歸罪於陳獨秀。第二爲後來中共的失敗預備一套口實，說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是有其深遠根源的。第三爲神化毛匪澤東作準備，說從「一大」「三大」（可惜毛匪沒有出席「二大」，否則關於「二大」又有欽定的黨史了）起，便「堅持了正確的意見」，成爲「最正確的領導者」。然而偽造的贗品，終歸會被史實所粉碎的。

註 一：「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上冊一二八頁。

註 二：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三三三頁。

註 三：「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上冊一二九頁。

註 四：陳公博「寒風集」甲二〇六頁。

- 註五：「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上冊一六五、一六六頁。
- 註六：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一一二、一一三頁。
- 註七：「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上冊一六七頁。
- 註八：陳公博「寒風集」甲二三〇頁。
- 註九：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
- 註一〇：中共「四大」對於民族革命運動之議決案」。
- 註一一：一九三二年五月十日匪黨中央機關刊物「布爾塞維克」第四卷第三期：華崗「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的中國共產黨」。
- 註一二：周佛海「逃出了赤都武漢」。
- 註一三：諾斯（Robert Carver North）「莫斯科與中共」中譯本六二頁，一九五六年七月香港亞洲出版社。

附錄一：第三次全國大會決議

中國共產黨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摘錄）

工人階級尚未強大起來，自然不能發生一個強大的共產黨，以應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議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議決：中國共產黨須與國民黨合作，共產黨員應加入國民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曾感此需要，遵行此議決，此次全國大會亦通過此議決。

我們加入國民黨，但仍舊保存我們的組織，并須努力從各工人團體中，從國民黨左派中，呼吸真有階級覺悟的革命份子，漸漸擴大我們的組織，謹嚴我們的紀律，以立強大的羣衆共產黨之基礎。

我們在國民黨中，須注意下列各事：

（一）政治的宣傳上，保存我們不和任何帝國主義者任何軍閥妥協之真面目。

(二)阻止國民黨集全力於軍事行動，而忽視對於民衆之政治宣傳；并阻止國民黨在政治運動上妥協的傾向，在勞動運動上改良的傾向。

(三)共產黨員及青年團員言語行動都須團結一致。

(四)須努力使國民黨與蘇俄接近，時時警惕國民黨，勿爲貪而狡的列強所愚。

我們須努力擴大國民黨的組織於全中國，使全中國革命份子集中於國民黨，以應目前中國國民革命之需要。……目前政治的爭鬥，自然亦是國民運動，排除外力及軍閥的運動，因此在勞動羣衆中，須有大規模的國民運動的宣傳，擴充國民革命的國民黨。同時凡已了解國民革命之必要，更進而階級覺悟的革命份子，當盡量加入我們的組織。并當於羣衆中普遍宣傳「國民運動中擁護勞動階級利益的必要。」

附錄二：第三次全國大會宣言

中國人民受外國及軍閥兩層暴力的壓迫，國家生命和人民自由都危險到了極點，不但工人農民學生感覺着，即和平穩健的商人也漸漸感覺着了。

目前北京政局之紛亂兒戲；北洋軍閥統治之下工會學生日在壓迫摧殘中；山東河南兵匪之猖獗，外人之藉端要挾，並要拿回華盛頓會議所賞的利益；沙市長沙日本水兵之暴行；外人強令棉花出口；吳佩孚齊燮元爭相製造廣東之戰禍；吳佩孚蕭耀南合力助成川亂；又若未來的奉直戰爭及直系軍閥之內鬩——在在可以證明內憂外患更復加於國民之身，除集合同民自己之勢力，做強大的國民自決運動，別無他途可以自救；也在在可以證明本黨一年以來號召的：「打倒軍閥」「打倒國際帝國主義」之國民革命運動，不是一條錯誤的道路。

中國國民黨應該是國民革命之中心勢力，更應該立在國民革命之領袖地位。不幸中國國民黨常有兩個錯誤的觀念：(一)希望外國援助中國國民革命，這種求救於敵的辦法，不但失了國民革命領袖的面目，而且引導國民依趨外力，滅殺國民獨立自信之精神；(二)集中全力於軍事行動，忽視了對於民衆的宣傳，因此，中國國民黨不但要失去政治上領袖的

地位，而且一個國民革命黨不得全國民衆的同情，是永遠不能單靠軍事行動可以成功的。

我們希望社會上革命分子，大家都集中到中國國民黨，使國民革命運動得以加速實現，同時希望中國國民黨斷然拋棄依賴外力及專力軍事兩個舊觀念，十分注意對於民衆的政治宣傳，勿失去一個宣傳的機會，以造成國民幸福之真正中心勢力，以樹立國民革命之真正領袖地位。

中國共產黨鑑於國際及中國之經濟的政治的狀況，鑑於中國社會的階級（工人農民工商業家）之苦痛及要求，都急需一個國民革命。擁護工人農民的自身利益是我們不能一刻忘忽的；對於工人農民之宣傳與組織是我們特殊的責任；引導工人農民參加國民革命更是我們的中心工作；我們的使命是以國民革命來解放被壓迫的中國民族，更進而謀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壓迫的民族和被壓迫的階級。

中國國民革命萬歲！

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解放萬歲！

全世界被壓迫的階級解放萬歲！

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大會

一九二三年六月

（錄自一九二三年六月廿日出版之嚮導週報第三十期）

第六章 國共兩黨初期的鬥爭

一、中共第四次要求建立聯合戰線

中共三全大會（一九二三年六月）之後，匪黨除收拾「二七」以後工運之「殘破局面」以外，特別重視文字宣傳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工作。匪黨機關刊物除「嚮導」週報早於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創刊外，「新青年」亦於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五日改爲該黨的理論季刊，七月一日又出版了「前鋒月刊」，作爲該黨的理論月刊。這三種刊物，均由陳獨秀任主筆，但編輯業務則分由彭述之（前鋒）、瞿秋白（新青年）、高君宇、蔡和森（嚮導）負責。同年十月二十日，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機關雜誌「中國青年」亦於上海創刊，由該團中央宣傳部長惲代英主編。爲了推廣刊物的發行，匪黨中央在上海民國路開設了上海書店，作爲總發行機關。各省共黨區委亦開設書店，以推銷書刊。當時長沙有文化書社，湘潭有湘潭書店，南昌設開明書社，廣州有國光書店，潮州設韓江書店，太原有明星書店，安慶設新皖書店，青島設青島書店，重慶有新蜀書店，寧波設寧波書店，甚至在海參威，亦由中共支部辦了一個五一書店（註一），這時匪黨的發行網，幾已普及全國了。

至於社會主義青年團，那是「經常在中國共產黨控制之下」（註二）的一種共產主義青年團體。中共臨時中央成立後，一九二〇年八月由俞秀松、施存統等在上海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當時因份子複雜，有馬克斯主義者，亦有無政府主義、基爾特主義、工團主義等份子參加，故於一九二一年五月解散，

至是年十月又重新組織。一九二二年五月五日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大會，「當時全國團員已有四千人」（註三），決定加入少共國際，成爲少共國際在中國的一個支部，少共國際亦曾派大林（A.S. Dainin）出席這次會議。中共三大大會以後，一九二三年八月，社會主義青年團又於廣州舉行第二次全國大會，通過「關於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大會報告決議案」（見附錄一）。一九二五年一月，匪黨四大大會決定將該團改爲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次月該團在上海召開第三次全國大會，決定了新的章程新的綱領，正式更名爲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並選舉張太雷（總書記）、惲代英（宣傳部長）、任弼時（組織部長）、賀昌（勞農部長）等九人爲中央執行委員，張伯簡、陳喬年等五人爲候補委員（註四）。從青年團之成立、解散、重組、更名及歷次會議研究，該團顯然係匪黨運用的一個得力的青年團體，對於匪黨的任何決定與行動，亦步亦趨，絕對服從，可說是匪黨最馴服的工具，無怪匪黨特別加以重視了。

匪黨三大大會期間，適值北京政府之黎元洪爲曹錕派所驅逐，會後於七月，中共發表第二次對於時局的主張，認爲「在北京之國會已成爲封建軍閥的傀儡，國民已否認其代表資格，祇有國民會議才真能代表國民，才能够製定憲法，才能够建設新政府統一中國」。主張「由負有國民革命使命的國民黨，出來號召全國的商會工會農會學生會及其他職業團體，推舉多數代表在適當地點，開一國民會議」。同時在「不隱藏自己特殊的旗幟」原則下，再度批評國民黨，它說：「若是國民黨看不見國民的勢力，在此重大時機不能遂行他的歷史工作，仍舊號召四個實力派的裁兵會議與和平統一，其結果只是軍閥互戰或產生各派軍閥大結合的政局，如此，我們主人翁的國民，斷不能袖手旁觀，……」。另一方面中共再度

呼籲：「祇有以民主的聯合戰線，繼續革命，打倒軍閥及軍閥背後的外國勢力，才是救濟中國的唯一出路」（註五）。這是匪黨第四度公開要求建立聯合戰線的聲明。這時，孫中山先生雖已確定了他的聯俄容共政策，而且也容納了陳獨秀李大劍等個人參加國民黨，但是當時廣州的政局尙未穩定，忙於在軍事上應付叛軍陳炯明沈鴻英的攻擊，而使這一政策拖延下來。直到蘇俄代表（同時也是第三國際代表）鮑羅廷（M. M. Borodin）到粵後，所謂聯合戰線才有進一步的發展。

二、鮑羅廷來華出任國民黨顧問

蘇俄及第三國際代表鮑羅廷，於一九二三年十月到達廣州（註六），十月十九日上海商報曾有記載稱：「十月十九日粵訊云，俄國代表鮑羅廷氏來粵，考察中國政治社會經濟狀況，日昨覺悟社記者趨訪鮑氏，詢以對於中國內情之觀察，鮑氏發揮盡致，極中肯要，茲譯述如下：……中國現已有一種勢力，爲將來引導其國民運動以至於完全成功者，此勢力爲何，即中國國民黨。此最爲余所滿意者也。該黨現尙未自覺其自己之力量，及未組織完備，以完成其歷史的職務，但吾人深信其不久即能自覺，必能組織完備。蓋吾人一想該黨有如是偉大之領袖，如孫中山先生其人便知之也。孫先生之經驗，將能供給彼黨之所缺，其所缺乏者何，軍事精神，及國民的組織二者是也。中國國民黨主義之精神，正在勃興奮鬥，一有軍事精神及國民組織，則國民黨主義之精神，將更爲之增勢。……至於中國之勞工運動，余信其發展之最重要條件，在與國民爲中國統一自由獨立之奮鬥聯合，如俄之工人一般。中國勞工，必須自造發展

必要之境遇，但此境遇須待國民黨所引導之國民之奮鬥之成功，而後能實現，中國一日不脫離半殖民地之狀況，勞工即百無達其目的之希望云云」（註七）。鮑羅廷此一談話，除對 孫中山先生推崇備至以外，其基本觀點，與第三國際特別決議及匪黨三全大會決議和宣言完全相符。

鮑氏旋於十月二十五日爲 孫中山先生聘爲顧問，咨詢國民黨改組有關方法技術事宜，正如後來他自己所說：「孫逸仙博士任我做政治顧問，我於是非常喜歡，我很願意和他合作。我二年來的工作，都是以他的主義和教訓做材料，我祇有這二種材料的工作。除了常常把主義和行爲這二方面想拉在一起外，沒有其他的工作。當我們在工作的时候，常常遇到了困難，遇到了挫折，我就去請教總理的引導。我們依了他的引導去做的時候，我們得到的結果就不會十分錯的」。（註八）但是，在顧問的另一面，鮑羅廷又是第三國際的代表，他以上級代表的資格，直接指揮匪黨，對國民黨內部施展分化打擊操縱的惡毒陰謀，使國民黨內部從此紛爭不已！

孫中山先生於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五日派鄧澤如、林森、廖仲愷、譚平山等九人爲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林直勉等五人爲候補委員，並聘鮑羅廷爲顧問，籌備國民黨改組事宜。十一月三日國民黨發表改組宣言。次年（一九二四）一月二十日，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廣州，實行澈底改組。大會選出的中央執行委員二十四人中，有譚平山、李大釗、于樹德三人爲匪黨份子；候補委員十七人中，有林祖涵、韓麟符、毛澤東、張國燾、于方舟、瞿秋白等六人爲匪黨份子。在國民黨中央所組設的九部會中，匪黨份子譚平山和林祖涵分任組織部長和農民部長。從此匪黨人員正式參加國民黨中央的領導工作，

匪黨呼籲多年的聯合戰線乃正式建立起來，聯合戰線中國共兩黨的鬥爭也從此不斷發生。

三、李大釗發表加入國民黨之聲明

孫中山先生領導中國革命歷經數十年，到了一九二三年，在其繼續領導國民革命過程中，所以決定聯俄容共的政策，係基於如下理由：

「俄國共黨初得政權，以聯合西方無產階級革命和扶助東方民族獨立為號召。我們國民革命得到這一消息，無異認為是中國革命的福音來臨，幾乎視為人類的救星。故對於他的援助，自是竭誠歡迎而有所致疑。國父聯俄政策的決定，當然這是一個重要的關鍵。」

「國父當時聯俄容共的政策，乃是求中國革命力量的集中和意志的統一，如果中共願為國民革命努力，那我們儘可把中共這一分力量納入本黨領導之下。」（註九）

當孫中山先生作此決策之後，當鮑羅廷來華之前，即一九二三年八月，孫先生派蔣總統組成代表團赴俄考察，十二月返滬，次年（一九二四）一月將考察結果面報國父，認為「在我未往蘇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對我們國民革命的援助，是出於平等待我的至誠，而絕無私心惡意的。但是我一到蘇俄考查的結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斷定了本黨聯俄容共的政策，雖可對抗西方殖民地主義於一時，決不能達到國家獨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覺蘇俄所謂『世界革命』的策略與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義，對於東方民族獨立運動，更是危險。我回到廣州報告之後，國父認為我對於中俄將來的關係

，未免顧慮過甚，更不適於當時革命現實的環境。國父深信並言此時祇有使中國共產黨份子能在本黨領導之下，受本黨統一指揮，纔可防制其製造階級鬥爭，來妨礙我國民革命進行。如我們北伐軍事一旦勝利，三民主義就可如期實行。到那時候，縱使共黨要想破壞我們國民革命，亦勢所不能了。何況蘇俄對中國革命，祇承認本黨為唯一領導革命的政黨，並力勸其共產黨員加入本黨，服從領導，而又不否認中國並無實行共產主義的可能呢？故仍堅持其聯俄容共的政策。」（註十）

這些，就是 孫中山先生堅持聯俄容共政策的原因。國民黨第一次全國大會之召開以及國民黨的改組，則是實行這一政策進一步的措施。

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大會中，由於方瑞麟、黃季陸等提議，在黨章中加一條文，規定「本黨黨員不得加入他黨」，於是李大釗不得不提出投降性的聲明書（見附錄二），陳述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理由，他說：

「我們覺得剛是革命派的聯合戰線的力量，還是不够用，所以要投入本黨中，簡直編成一隊伍，在本黨 總理指揮之下，在本黨整齊紀律之下，以同一步驟，為國民革命的奮鬥。」

「我等之加入本黨，是為有所貢獻於本黨，以貢獻於國民革命的事業而來的，斷乎不是為取巧討便宜，借國民黨的名義，作共產黨的運動而來的。」

「我們加入本黨，是一個一個的加入的，不是把一個團體加入的。可以說我們是跨黨，不能說是黨內有黨。因為我們第三國際是一個世界的組織，中國共產主義的團體，是第三國際在中國的支

部，所以我們祇可以一個一個的加入本黨，不能把一個世界的組織納入一個國民的組織」。

「我們可以加入中國國民黨去從事於國民革命運動，但我們不能因為加入中國國民黨便脫離了國際的組織。我們若脫離了國際的組織，不但於中國國民黨沒有利益，且恐有莫大的損失。」

「總之，我們加入本黨，……不是為個人的私利，與夫團體的取巧而有所攘竊於本黨的。」

「不過我們既經參加了本黨，我們留在本黨一日，即當執行本黨的政綱，遵守本黨的章程及紀律，倘有不遵本黨政綱，不守本黨紀律者，理宜受本黨的懲戒。」

如果僅從表面上來看李大釗的書面聲明，以及研究國民黨聯俄容共政策的立場，對於所謂聯合戰線的形成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可以說是很自然的。因為第一、以反對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為主的國民革命運動，國共兩黨的目標和主張是一致的。第二、因接受蘇俄的援助而決定聯俄的政策，國共兩黨也是一致的。第三、國民黨「求中國革命力量的集中和意志的統一」（註十一）的立場與共產黨「不宜使國民革命的勢力分歧而不統一」（註十二）的意見也是完全一致的。可是，如果作進一步的探討，則聯合戰線內部矛盾重重，聯合戰線的形成，也就是國共兩黨鬥爭的開始。因為第一、共產黨人今天參加國民革命，明天他要準備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因而在國民革命過程中，以爭取革命領導權為中心。第二、在聯俄政策上，中共不僅僅在於聯俄，而在於完全聽命於蘇俄和第三國際，在國民革命運動中，要以民族利益去服從國際利益，以國民革命去服從世界革命。同時中共利用俄援，借蘇俄以自重，李大釗的聲明就說明了這一點。第三、在集中革命力量，中共個人參加國民黨問題上，國民黨的用意在於防止中共製造

階級鬥爭，但中共則要「利用國民黨的招牌發展共產黨的勢力」，進而掌握黨權，使國民黨服從共產黨，而且中共的政策是「結成臨時的聯盟」，「對待同盟者要猶如對待敵人一樣」。因此，中共加入國民黨後，不僅要從國民黨左派中發展組織，而且要組織黨團，統一行動，以對付國民黨。所有這些陰謀策略，在中共「二大」「三大」決議中已經暴露無遺。於是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大會之後，國共兩黨的鬥爭便開始了。

在國共兩黨的鬥爭過程中，鮑羅廷當然是中共的指揮者，所以周佛海說：「十三年四月，我應戴季陶先生之命，赴粵工作，當時我還沒有正式脫離共產黨，所以還得參預共產黨黨務，而出入於東山鮑羅廷的住宅。譚平山每週重要的事情，常約我和張崧年（按：張崧年亦為當時的中共黨員，據周佛海稱，張於一九二五年一月脫離共黨。周佛海自己則於一九二四年九月退出共黨）。同赴鮑宅商量。老實說，不是「商量」，實是「請示」。……」

「鮑羅廷告訴我們的策略，最重要的就是把國民黨分做左右兩派，他把當時的中央黨部當作左派的機關，把廣州市黨部當做右派的機關，使這兩級黨部暗中互相排擠。他叫我們以國民黨員的名義，攻擊不接近共產黨的黨員，以捏造所謂左派右派的名義，攻擊胡、廖諸先生「賣黨」，必須國民黨自己分裂，以便共產派乘機壟斷黨務。此外，對於國民黨的領袖，如果要利用，而 he 可利用的，就極力替他鼓吹，替他捧場，……對於不要利用，或雖欲利用他不受利用的國民黨領袖，便極力誣謗，極力誹毀，務使其信用掃地，在黨內及社會上沒有立足的餘地，……。對於民衆團體，更必須設法操縱，如果不能操縱

，務必設法破壞，使其不能成立。他說我們不能操縱的團體多一個，是我們的敵人多一個，至少我們的工作要多一層障礙。」（註十三）

在第三國際代表鮑羅廷指揮之下，陳獨秀於一九二四年四月，公開把國民黨劃分為左右派，他說「將來國民黨左右派之不同的觀念，即不同的出發點是甚麼？我們可以說：採用革命方法的是左派，採用妥協方法的是右派；……左派乃是真的國民黨真的國民主義者，右派乃是拋棄了國民主義，實際上可以說不算是國民黨了。」（註十四）

其實在中共黨內，「三大」決議中就會決定要在國民黨左派中發展共黨的組織，早就開始在黨內劃分國民黨為左右派，在國民黨中進行分化挑撥陰謀了。國民黨第一次全國大會之後，中共中央曾召開第二次全體會議，通過「關於共產黨在國民黨工作及態度決議案」（見附錄三），指示全黨黨員在國民黨中的工作方法，並重申「三大」不能停止發展黨員的決議。社會主義青年團亦於一九二四年三月召開擴大執委會，遵照中共中央的決議，通過多項決議（見附錄四）及「關於國民黨工作及態度決議案」，通飭全團團員在國民黨內部展開工作，尤其要注意下層切實的工作。

在匪黨一連串的滲透、分化、打擊、操縱之下，國民黨黨員的反抗是必然的，於是對共黨的檢舉彈劾案便發生了。

四、國民黨提出檢舉彈劾共產黨案

當孫中山先生決定聯俄容共政策，積極準備改組國民黨時，鄧澤如、林直勉等十一人於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向 國父檢舉共黨陰謀，據稱：

「此回改組，陳獨秀因粵人對伊感情太壞，乃避去，而以其黨徒譚平山出而任事，陳獨秀則在暗中牽線，內裏之陰謀，經爲其黨徒范體仁因爭權利而衝突，遂向國會議員徐清和詳細陳述。」

「陳獨秀此次加入吾黨，乃有系統的有組織的加人。……其大前提，則借國民黨之軀殼，注入共產黨之靈魂。」

「故此改組，陳獨秀實藉俄人之力，聳動我 總理，於有意無意之間，使我黨隱爲彼共產黨所指揮，成則共產黨享其福，敗則吾黨取其禍。」

「要之奸人謀毀吾黨，其計甚毒，不可不防。……」

可見國民黨尚未改組，所謂聯合戰線尚未建立前，國民黨若干人士對於匪黨陰謀早有所悉，因而向孫中山先生提出檢舉。惟當時決策已定，無可改變， 國父對此報告乃作如此之批示：「俄國革命之初，不過行民權、民生二主義而已，及後與列強奮鬥六年，乃始知其用力之最大者，實爲對於民族主義；乃中國少年學生自以爲是，及一時崇拜俄國革命之過當態度，初欲包攬俄國交際，並欲阻止俄國不與吾黨來往，而彼等獨得俄國援助，獨樹一幟，與吾黨爭衡。乃俄國革命黨，……要彼等參加國民黨與我一致動作，且又爲我曉諭之，謂民族主義正這時救時之良藥，並非過去之遺物，故彼等亦多覺悟而參加吾黨。……如不服從吾黨，我亦必棄之。」足見 國父當時認爲可以民族主義感化此批共黨青年

，並有控制彼等之信心，因而對此一檢舉，未作進一步處理。

國民黨改組後，不到半年，國共兩黨便開始正面鬥爭。一九二四年六月一日，國民黨廣州市黨部向中央黨部提出共黨份子破壞組織的檢舉案。接著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張繼、謝持於六月十八日提出彈劾共產黨案，「認爲中國共產黨員及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之加入本黨爲黨員者，實以共產黨黨團在本黨中活動，其言論行動皆不忠實於本黨。違反黨義，破壞黨德，確於本黨之生存發展，有重大妨害。本黨改組以來，首重紀律，今共產黨社會青年團加入本黨之諸黨員如上述，認爲其違反紀律之處，尤爲嚴重。」；提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大會議案及宣言」（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刊行）、「團刊第七號，即擴大執行委員會特號」（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一日刊行）作爲彈劾的證據，致書中央執行委員會，要求「從速嚴重處分」。另加具意見，說明本案之提出「完全爲本黨之生存發展起見，認爲絕對不宜黨中有黨。」，惟事實證明「共產黨員、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之加入本黨爲黨員者，純係共產黨在本黨中之一種黨團作用。既有黨團作用，已失其爲本黨黨員之實質與精神，完全不忠實於本黨，且其行爲尤不光明（祕密之決議如彼，李大釗之意見書如此）。」（以上均摘自「彈劾共產黨兩大要案」）

此一彈劾案提出後，六月二十五日，監察委員謝持、張繼爲共黨之黨團問題向鮑羅廷質詢，並作成「謝張兩監察委員與鮑羅廷問答紀要」（見附錄五）。談話中鮑羅廷居然指稱國民黨有左右派，共產黨則爲左派，共產黨「組織黨團可引起舊黨員之競爭心，則黨可復活」，並謂「今日兩者本互相利用，國

民黨利用共產黨，共產黨利用國民黨」。鮑羅廷這種談話，顯係爲共黨撐腰，無疑的，將加深以後國共兩黨的鬥爭。

此一彈劾案，曾經國民黨中央多次討論，瞿秋白對此提出答辯稱：「實際問題上則所謂黨團作用（一致行動）之嫌疑，實爲此次惹起糾紛之端。實則已准跨黨，便不能無黨團之嫌疑。國民黨外既有共產黨存在，則國民黨內便不能使共產黨派無一致之行動；況既謂之派，思想言動必有相類之處。既有黨外之黨，則其一一致行動更無可疑。」（註十五）同時陳獨秀在「嚮導週報」上亦以「我們的回答」爲題，對此公開答辯稱：「他們所謂破壞國民黨的證據、鐵證，都是指社會主義青年團七號團刊所載『中國共產黨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共產黨在國民黨工作及態度決議案』及『青年團在國民黨工作及態度決議案』。在這些決議案中，充滿了『我們須努力擴大國民黨的組織於全中國』、『擴充國民革命的國民黨』、『使全中國革命份子集中於國民黨』、『擴大且改進國民黨的組織』、『在國民黨各種工作中我們同志應努力工作』、『使其（國民黨）變成一個有組織能行動的黨』、『我們要使國民黨眞成爲民主主義的黨』這類文句，如果是一個懂得中國文的人，能說這些議決案是破壞國民黨的鐵證嗎？」（註十六）。最後，國民黨中央對於這一彈劾案作如下的決議：「共產主義者之接受本黨黨綱而加入本黨，即當視爲本黨黨員以管理之」。同時國父又對鄧澤如等作最後指示說：「如果中共份子借本黨的名義來推行其共產主義，從事階級鬥爭，來破壞國民革命，本黨自易加以制裁。就算是陳獨秀想要破壞本黨的組織，本黨也不難加以制裁，而棄絕他於國民革命陣營之外。」（註十七）。

這是國共兩黨鬥爭的開始，這一鬥爭是在國民黨容共政策亦即匪黨所謂聯合戰線形成不到半年之後。這一時期國民黨雖已改組，但內部不健全，意見不統一，對於容共政策亦有不同的看法，授匪黨子分化利用打擊的機會，所謂左右派便在匪黨策劃下逐漸形成；但孫中山先生仍能統御全局，對於匪黨之控制有極大信心，故對於彈劾案，不欲在容共政策剛剛開始之時，把共黨份子驅逐出黨，自亂國民革命步驟。另一方面，匪黨陰謀尚未顯著，雖有黨團組織及分化國民黨等事實，但從匪黨匪團決議中看來，還是高喊國民革命以及「擴大國民黨的組織於全中國」，而且「於不十分妨害本團活動範圍之內應採取容讓的態度」，「宜極力避免無益的競爭」，這也是彈劾案如此處理的又一原因。同時廣東政局尚未穩定，叛軍時時威脅廣州，英國伺機策動叛亂，國民革命的基地處於孤立狀態，從國際關係言，自需蘇俄之援助。處此情況，國共兩黨第一回合的鬥爭，國民黨祇好以重申容共原則加以處理。當然，國共的矛盾並沒有解決，一年以後，特別是孫中山先生逝世之後，匪黨的分化策略導致國民黨內部的分裂，而有西山會議之召開，以及粵滬兩個國民黨中央的對立。這雖然是匪黨的分化策略的成功，但也是它失敗的開始，因為從此匪黨的陰謀已為國民黨所識破，而不能不加以反擊和制裁了。

五、中共對於國民黨一大大會之歪曲

關於國共兩黨的初期鬥爭，匪黨史家祇是說：「國共合作形成後，統一戰線內部就存著複雜的鬥爭。」（註十八）「接著張繼、謝持、鄒魯等反共份子起來反對國共兩黨合作和革命統一戰線。」（註

十九) 具體情形，略而不談。但對於國民黨第一次全國大會則有顯著的歪曲，甚至說：「孫中山在中國共產黨和蘇聯的幫助下，一九二三年三月在廣州成立了革命政府。」(註二〇)這簡直是平空的捏造。事實是：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六日，滇桂軍擊敗叛軍陳炯明，克復廣州。二月十五日孫中山先生由滬返粵。三月一日設大元帥府，孫先生任大元帥。其時，孫中山與越飛的聯合宣言剛剛發表，中共黨員參加國民黨的僅有陳獨秀、李大釗、林祖涵等寥寥數人，而且「對於加入國民黨的組織十分懷疑，因此，在實際上國際的提議未曾實行」(註二一)，「到第三次大會(一九二三年六月)重新討論共產國際加入國民黨的指示……」(註二二)。可見當時中共尚在「懷疑」，「未曾實行」，還要「重新討論」加入國民黨的組織，所謂「幫助」「成立了革命政府」，真不知從何說起。

匪黨的史家說：「一九二四年一月，國民黨在廣州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共產黨員李大釗、毛澤東等都參加了這次大會，並担任重要的領導工作。」(註二三)進一步的說法則稱：「共產黨員毛澤東、李大釗、林伯渠、瞿秋白等同志都參加並領導了這個大會」。(註二四)照匪黨史家這樣的說法，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不是孫中山先生所領導，而是毛澤東等匪黨黨員「領導了這個大會」，這顯然是對史實的最大歪曲。當然，國民黨這次大會是准許共產黨黨員參加國民黨，從事國民革命，也就是共匪所說聯合戰線組成的一次會議，李大釗、毛澤東等也確實參加了這次大會，而且鮑羅廷還是國民黨改組的顧問。可是，第一、這次大會出席代表一六五人中，中共代表僅有陳獨秀等十餘人，其中陳獨秀、李大釗、譚平山、于樹德四人，還是孫中山先生所指定的代表，李大釗所以能列入大會主席團

，也是 國父所指定（按：大會主席團爲胡漢民、汪精衛、林森、謝持、李大釗五人），以示容共的寬宏風度。在國共兩黨代表名額和主席團人數如此懸殊的情況下，真不知共產黨如何「領導了這個大會」。第二、當大會討論容共政策時，有過許多爭論，這一爭論迫使李大釗不能不發表投降性聲明書，雖然聲明中挾第三國際以自重，但是如果不是孫中山先生當時容共的決心，恐怕容共議案還通不過。在大會會議中，處境如此惡劣的共黨黨員，不知如何又「領導了這個大會」。第三、聯俄容共係 孫中山先生主動的決策，爲集中力量統一意志，而准許了第三國際與中共一再的請求。大會宣言，係爲適應當時的國情和表達國民黨三民主義一貫的主張與革命精神而發表的。國父所稱「以俄爲師」，係指吸取俄共組織之若干方法，以爲改組國民黨之參考，也正如鮑羅廷所說「軍事精神」，鮑羅廷之顧問工作主要在此，此與「領導了這個大會」，又有什麼相同之處？第四、毛澤東在國民黨一次大會的情形怎樣呢？當大會討論國民黨黨員不得加入其他政黨的時候，「忽然有一個湖南口音的人在後面大聲喊叫報號發言：『主席，三十九號發言。本席主張本案停止討論，即刻付表決！』我回頭去仔細打量這個粗魯無禮的發言人，祇見他穿一件棉袍，身材中等，面皮發青，態度倔強，一股蠻勁，像一個才到城裏的鄉下人，一點沒有君子風度，不像是個能登大雅之堂的人。我後來查知姓名，才知道他叫毛澤東」。（註二十五）這個粗魯無禮的鄉下人又怎能「領導了這個大會」呢？

註 一：國民黨調查科「中國共產黨之透視」，五八、五九頁。

註 二：中共二全大會「有關青年運動問題之決議」。

- 註三：「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上冊，一六三頁。
- 註四：國民黨調查科「中國共產黨之透視」，六二頁。
- 註五：中國問題指南第二冊「中共第二次對於時局的主張」。
- 註六：「國父年表」及國內書刊若干記載均謂鮑羅廷係於一九二三年八月到達廣州，但「莫斯科與中共」作者諾斯（R. C. North）則引用一九二七年在北京蘇俄大使館所搜獲之文件記述鮑氏於十月六日乘一小船由上海直駛廣州。另據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份之蘇俄「歷史問題」雜誌所載「論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五年間孫逸仙對蘇俄之關係」一文內稱，鮑氏因應孫氏之邀於一九二三年十月到達廣州，旋被孫先生聘為國民黨改組之首席顧問。本文參照當時「嚮導」週報之記載，採用十月到達之說。
- 註七：嚮導週報四十五期——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七日出版。
- 註八：一九二六年一月鮑羅廷在國民政府歡宴國民黨二全代表大會全體代表時講詞——見國民黨二全大會紀錄。
- 註九：蔣總統「蘇俄在中國」中文本二四、二五頁。
- 註十：蔣總統「蘇俄在中國」二五、二六頁。
- 註十一：蔣總統「蘇俄在中國」，二四頁。
- 註十二：李大釗聲明書。
- 註十三：周佛海「逃出了赤都武漢」。
- 註十四：陳獨秀「國民黨左右派之真意義」——嚮導週報第六十二期，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出版。
- 註十五：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一日瞿秋白對於八月十九、二十兩天之中央全體會議議事錄之聲明。
- 註十六：陳獨秀「我們的回答」——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七日嚮導週報第八十三期。
- 註十七：蔣總統「蘇俄在中國」，二三五頁。
- 註十八：「中國共產黨歷史簡編」，五二頁。

註十九：何幹之「中國現代革命史」，六一頁。

註二十：「中國現代革命史」，五九頁。

註二一：中共「四大」決議。

註二二：華崗「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的中國共產黨」。

註二三：何幹之「中國現代革命史」，五九頁。

註二四：「中國共產黨歷史簡編」，五十頁。

註二五：黃季陸「談當年容共一幕」——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台北聯合報。按：黃季陸當時係以加拿大區國民

黨代表身份回國出席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附錄一：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關於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大會報告 決議案（摘錄）

本團應努力協助中國共產黨，「擴大國民黨的組織於全中國」，「在勞動羣衆中須有大規模的國民革命宣傳，擴充國民革命的國民黨」。同時大會指出本團尤須注重強烈的國民運動宣傳，以促進國民革命的實際行動（如示威及政治罷工等）。本團團員加入國民黨，當受本團各級執行委員會之指揮；但本團之各級執行委員會，當受中國共產黨中央及其各級執行委員會對於團員加入國民黨問題之種種指揮。本團團員在國民黨中：

- (1) 應贊助中國共產黨黨員之主張，與其言語行動，完全一致。
- (2) 本團應保存本團的獨立的嚴密的組織。

附錄二：李大釗對共產分子加入國民黨之聲明

諸位同志們：兄弟深不願在本黨改造的新建中，潛植下猜疑與不安的種子；所以不能不就我個人及一般青年同志們

加入本黨的理由及其原委，並我們在本黨中的工作及態度，誠懇的講幾句話。

兄弟們到廣州來，承本黨總理及先進同志歡悅的接受，令我們在國民革命的工作上得有盡其棉薄的機會，我等不能不敬服本黨總理及黨中先進諸同志熱誠的促進負責國民革命的使命的國民黨的精神。但有少數先進的同志終不免對於我等加入本黨致其懷疑者，使此懷疑不能渙然冰釋，則於本黨改造的新機中，即預伏一種妨害將來發展的危機，此斷非吾輩之所願，想亦非先進諸同志之所願。用是不能不將我等加入本黨的理由，開誠布公的講出來，以求得一共同的了解，而消除那方在潛萌的危機。

我們相信在今日列強的半殖民地之中國，也就是本黨總理所說的次殖民地之中國，想脫除列強的帝國主義及那媚事列強的軍閥的二重壓迫，非依全國國民即全民族的力量去做國民革命運動不可。若想完成此國民革命的事業非有一個統一而普遍的國民革命黨不可。我們認為在這種國民革命運動中，不宜使國民革命的勢力分歧而不統一，以減弱其勢力，而遲阻其進行，非以全民族之心力，集中於一黨不可。我們環顧國中，有歷史有主義有領袖的革命黨，祇有國民黨，祇有國民黨可以造成一個偉大而普遍的國民革命黨，能負解放民族，恢復民權，奠定民生的重任，所以毅然投入本黨來。我們覺得剛是革命派的聯合戰線，力量還是不夠，所以要投入本黨，簡直編成一個隊伍。在本黨總理指揮之下，在本黨整齊紀律之下，以同一的步驟，為國民革命而奮鬥。我等之加入本黨，是為有所貢獻於本黨，以貢獻於國民革命的事業而來的，斷乎不是為取巧討便宜，借國民黨的名義作共產黨的運動而來的。因為在今日經濟落後淪為帝國主義下半殖民地之中國，祇有國民革命是我民族唯一的生路，所以國民革命的事業，便是我們的事業，本黨主張的勝利，即是我們的勝利。我們以此理由，不但自己願來加入本黨，並願全國國民一齊加入本黨，這種發展本黨的責任是要先進諸同志與我們共同擔負的。

有一部份同志疑惑因為我們加入了本黨，本黨便成了共產黨，這亦是一種誤會。我們加入本黨是來接受本黨的政綱，不是強本黨接受共產黨的黨綱。試看本黨新定的政綱，絲毫沒有共產主義在內，便知本黨並沒有因為我們一部分人加入，便變成共產黨了。

又一部份同志提議：本黨章程應規定不許黨內有黨，黨員不許跨黨。這或者亦是因為我們加入本黨而起的。我們加入本黨，是一個一個的加入的，不是把一個團體加入的，可以說我們是跨黨，不能說是黨內有黨。因為我們第三國際是一個世界的組織，中國共產主義的團體，是第三國際在中國的支部，所以我們祇可以一個一個的加入本黨，不能把一個世界的組織納入一個國民的組織。中國國民黨祇能容納我們這一班的個人，不能容納我們曾加入國際的團體。我們可以加入中國國民黨去從事於國民革命的運動，但我們不能因為加入中國國民黨便脫離了國際的組織。我們若脫離了國際的組織，不但於中國國民黨沒有利益，且恐有莫大的損失。因為現代的革命運動是國民的，同時亦是世界的，有我們在中國國民黨組織與國際的組織的中間作個聯絡，作個連鎖，使革命的運動，益能前進，是本黨所希望的，亦是第三國際所希望的。由此說來，我們對於本黨實應負著二重的責任：一種是本黨黨員普通的責任；一種是為本黨連絡世界的革命運動，以圖共進的責任。所懼我們的才力不勝，不能担当此任，還望先進諸同志不吝指導而匡助之，是我們的欣幸。

總之，我們加入本黨，是幾經研究再四審慎而始加入的，不是胡里胡塗進來的，是想為國民革命運動而有所貢獻於本黨的。土耳其的共產黨人加入土耳其的國民黨，於土耳其國民黨不但無損而有益。美國共產黨人加入美國勞動黨，於美國勞動黨不但無損而有益。英國共產黨人加入英國勞動黨，於英之勞動黨不但無損而有益。那麼我們加入本黨，雖不敢說必能有多大的貢獻，其為無損而有益，亦宜與土美英的先例一樣。我們加入本黨的時候，自己先從理論上事實上作過詳密的研究。本黨總理孫先生亦曾允許我們仍跨第三國際在中國的組織，所以我們來參加本黨而跨固有黨籍，是光明正大的行為，不是陰謀鬼祟的舉動。不過我們既經參加了本黨，我們留在本黨一日，即當執行本黨的政綱，遵守本黨的章程及紀律；倘有不遵本黨政綱，不守本黨紀律者，理宜受本黨的懲戒。我們所希望於先輩諸同志者，本黨既許我們以參加，即不必對於我們發生疑猜，而在在加以防制。倘認我們參加本黨為不合，則儘可詳細磋商，苟有利於本黨，則我們之為發展本黨而來者，亦不難為發展本黨而去；惟有猜疑防制，實為本黨發展前途的障害，斷斷乎不可不於本黨改造之日明揭而掃除之。自今以往，我們與先輩諸同志共事之日正長，我們在黨中的行為與態度，當能徵驗我們是否忠於國民革命事業，即以盡忠於本黨。願我先輩諸同志提攜而教導之。北京代表李大劍意見書。

附錄三：中共中央關於共產黨在國民黨工作及態度決議案（摘

錄）

我們的同志在參與國民黨每種組織每種工作時，應於該項組織或工作，詳加討論辦法，以爲我們一致努力的根據，以免臨時慌張分歧，不能收良好的效果。教育本黨同志在國民黨進行組織及工作的事，如關於開會報告議事，表決分配工作，考核成績。進行黨員教育，向外活動方法等之教育事項，應由區及地方委員會負其責任。

本黨以後一切宣傳、出版、人民組織及其他實際運動，凡關於國民革命的，均應用國民黨名義，歸爲國民黨的工作。此因（一）可減省人力財力；（二）可使國民黨易於發展；（三）可使各種努力的聲勢與功效比較擴大而且集中。但對於我們所認爲必要事項，而國民黨不願用其名義活動的，仍作爲本黨獨立的活動。

在發展國民黨組織之時，關於本黨組織之發展，當然不能停止。

附錄四：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決議案（摘

錄）

（註：擴大執行委員會會期係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二日起至同年四月一日止，共通過議案十六案均列入團刊第七號）。

一、北京報告決議案

我們加入國民黨合作，要注意下層切實的工作，宜極力避免無益的競爭。我們於國民黨中高級機關位置之競爭，對內

既易發生不良影響，對外又易引起其他團體的反動。於不十分妨害本團活動範圍之內應採取容讓的態度，而致全力於區分部或市黨部等切實工作。對於國民黨下面的各種團體，我們的同志應注意聯絡其感情，非必要時不宜取敵視態度。

二、上海報告決議案

應注意學生運動，設法整頓上海學生聯合會。此種工作最好督促國民黨青年部，要他們命令在校黨員，向各校活動改組學生聯合會。

三、關於國民黨工作及態度決議案

本團爲求擴大且改進國民黨的組織，以督促中國國民革命的進行，對於C、P、中央之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關於此項之決議案，完全接受其指導。（按：議文中所指中央第二次全體會議之決議案，即附錄三）。

附錄五：謝、張兩監察委員與鮑羅廷問答紀要

中華民國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時至五時半在廣州東山鮑寓。

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謝持、張繼與俄人鮑羅廷談話。

孫科翻譯。

監察委員曰：今日吾二人以中央監察委員資格與君說話。

鮑羅廷曰：余以中國國民黨訓練員資格與君談話。

監曰：君見過此小冊子乎（指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大會決議案及宣言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執行委員會印行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及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一日團刊第七號而言）？

鮑曰：未見。

監曰：君知此次發生問題之真象乎？

鮑曰：祇在上海聞陳獨秀君云，黨內發生問題，昨日胡漢民、汪精衛二君來，亦提出黨內問題。

監曰：那是一個問題。

鮑曰：指「非必要時不宜取敵視態度」之謂乎（團刊中語）？

監曰：非僅如是，乃共產黨在國民黨內之黨團問題。

鮑曰：此問題須由根本上解決，勿論及枝葉。

監曰：誠然。我認共產黨不能自己作主，須受第三國際指揮；第三國際爲蘇俄所創造，又須受蘇俄所指揮。然則俄國對中國革命，究取何種態度？是否祇求友國民黨，抑同時扶助共產黨雙方並進乎？

鮑曰：余先述國民黨之真象，再提出問題。遂列舉金佛郎問題，德債問題，中俄協定問題，吳佩孚捕殺工人問題，皆關係極大者，不見國民黨有何等主張，中央執行委員會已開會數十次，不見議事日程有關於國民大問題之討論。：

監曰：請君不必歷數。此等缺點，本黨確不能免，或尚可加舉數十件。今春改組全由於此。今既改組，須先解決組織上之大問題，至於黨之作用如何，乃組織完好後之問題。本體上既發生問題，作用如何，可暫不提，組織上最重要問題，是否承認黨中有黨，即指共產黨及社會主義青年團在國民黨內組織黨團而言。

鮑曰：黨中分派是不能免。黨之中央執行委員會實際上不能作黨之中心，當然黨內發生小團體，有左派、右派之分，如方瑞麟等對中俄協定之宣言，可認爲右派，共產黨則爲左派。

監曰：君以共產黨加入國民黨而在黨內作黨團活動，認爲合理乎？

鮑曰：國民黨已死，國民黨已不成黨，祇可說有國民黨員，不可說有國民黨。加入新份子如共產黨者，組織黨團可引起舊黨員之競爭心，則黨可復活。

鮑又曰：小冊子何時發刊？

監曰：一爲去年八月，一爲今年四月。

鮑曰：不錯。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三個月之後，見國民黨不振作，中央執行委員會提不起來，並有許多右派分子加雜其中，乃不得不組織黨團。

監曰：依吾輩見解，君所用方法，欲令國民黨復活者適足以使國民黨死亡耳！使多數小團體在同一範圍內相傾軋相競爭，乃致死之道也。

鮑曰：誠然。或可致國民黨死命，惟不希望如是結果，希望右派左派相爭，發生一中央派作黨之中心。

監張曰：余個人素來贊成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共同從事革命。此次問題發生，仍主張友誼的解決，今聞君之言論，則不能不變更主意。國民黨是一腐敗革命黨，余亦不能全否認，假如君所說共產黨是新生革命團體，如斯則兩種性質

不相容，不如分道揚鑣，腐敗者團結起來，加以改良；新生者一往直前，兩無阻礙，分作兩起，豈不更佳？

鮑曰：第三國際認定中國革命祇能用國民黨綱，不能用他種主義，故使中國共產黨及社會主義青年團全部加入國民黨，如果不奉命者，則認爲違反革命。

監曰：中國共產黨及社會主義青年團，是否全體加入本黨，抑祇加入一部分？

鮑曰：不知。按原則就應該全體加入。

鮑又曰：假令將共產黨分出去，共產黨或者更換黨名，而主義仍與國民黨同，徒分離革命實力也，前途必不利。

監曰：吾輩亦非絕對主張分離者，惟黨團作用萬不能容許耳。

鮑曰：今日兩者本互相利用，國民黨利用共產黨，共產黨利用國民黨，惟兩相利用之結果，國民黨得更多利益。

監曰：此爲一重要問題，正願與君明言，中國革命與俄國革命，互相提攜，或可得互相利用之好結果。如祇有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自今春以來，祇見有害不見有利。

鮑曰：中國共產黨歷史甚短，在中國社會無十分勢力，假使祇有一個共產黨人，爲國民黨計，亦當招之來，不可揮之去

鮑曰：中國共產黨原無足輕重，因其不過第三國際所差遣，第三國際為蘇俄所創，俄國對中國革命政策，將用中國共產黨人加入中國國民黨以操縱左右之。俄國認中國共產黨為俄國之子，中國國民黨或可為俄國之友尚不可知，余之觀察如是。

鮑曰：誤解。然吾知國民黨人許多反對與俄國共產黨合作。

監曰：社會主義青年團決議案及團刊第七號所登載關於國民黨者，君是否認為正當？

鮑曰：此兩種印刷，未經莫斯科本部審查許可，尚不能承認。

監曰：如君所說國民黨已成待斃之人，中國共產黨及社會主義青年團為一復活劑，將打注射針而救濟乎？

鮑曰：事相類而話不能如此說，我們合作，我們合作。

監曰：國民黨腐敗分子，僅為退步的而已，並未表明反對國民黨宗旨，亦未組織團體與本黨相抗衡；即使有一時的組織，亦不過一時之作用而已，並未將國民黨作一對象的研究物。照此種印刷物視之，共產黨持永久之計劃，將國民黨作一對象，日日以如何對付國民黨為切要目的，國民黨不能不認共產黨團為本黨本體上之大問題。

鮑曰：無妨。凡黨皆有左、右派之分。

監曰：國民黨與共產黨祇能說是兩黨，不能說是兩派，君如認此為合理，吾不料所謂組織者竟如斯，直欺人之談耳。

鮑曰：中國國民黨宗旨，最適用於中國，尚可應用一百年。假使國民黨改為共產黨，吾亦不贊成，祇有提皮包離廣州耳。

監曰：誠如君所言，反面說，在中國行共產主義，尚須待至一百年之後，共產黨全體既入國民黨實行國民黨革命主義，又何必另掛中國共產黨招牌，保留共產黨組織耶？

鮑曰：國民黨中央幹部尚未能組織完好，不能指揮全體黨員，又未能對全國最有關係之問題，時時有所主張，共產黨不能取消自己的組織。

鮑又曰：國民黨依多數決議，可自由的驅逐共產黨員出黨，但不希望如此作。

監曰：今日談話，祇如是，改日再繼續討論。（完）

（以上各附錄均錄自國民黨黨史會藏「彈劾共產黨兩大要案」，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一九二七年九月初版）

第七章 中共的四全大會

一、商團事件之爭辯

國共兩黨初期鬥爭告一段落後，國內局勢有了若干變化：首先便是江浙戰爭的爆發，即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直系軍閥齊燮元孫傳芳進攻皖系軍閥盧永祥。九月十六日第二次奉（張作霖）直（吳佩孚）戰爭又開始，激戰於榆關一帶。軍閥的混戰當然有利於革命的軍事行動，孫中山先生乃於九月五日決定再度北伐，分路向江西湖南進軍，發表宣言，宣佈北伐目的，不僅推倒曹吳軍閥，尤在打倒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中國國民黨於九月七日發出宣言，勸民衆與國民黨合作，打倒帝國主義。國父且於九月八日親赴韶關督師北伐。中國共產黨亦於九月十日發表第三次對於時局宣言，除歷數直系軍閥吳佩孚曹錕之罪惡及分析江浙戰爭與帝國主義之關係外，并指出「目前解救中國的唯一道路祇有人民組織起來，在國民革命的旗幟下，推翻直系，解除一切軍閥的武裝，尤其要在根本上推翻外國帝國主義在中國一切既得的權利與勢力。祇有這樣才能免除定期的慘殺與戰爭，祇有這樣才能得到永久真正的和平。」（註一）在這一時局宣言中匪黨對於國父的北伐進軍和宣言，隻字未提，足見當時匪黨仍一本三全大會的宣言和決議，反對國民黨偏於軍事行動的主張。

在南方，革命政府統治下的廣州，英帝國主義以香港爲基地，祕密武裝廣州商團，圖謀不軌，國父乃下令扣留其軍械。至一九二四年十月十日商團再度陰謀叛亂，國父不得已率軍返穗，於十五日

加以擊潰并予解散。廣州革命政權乃得鞏固。可是匪黨卻利用這一商團事件，大肆攻擊國民黨，他們說：

「這次廣州商團事件，可謂極帝國主義買辦階級雇傭軍隊以及國民黨右派分子夥同宰割革命政府之奇觀：組織這次叛亂的是英國在廣州各機關之職員；領導這次叛亂的是陳廉伯陳恭受諸買辦；……而勾結於帝國主義買辦階級雇傭軍閥之間的是國民黨右派分子……這次事變的罪魁陳廉伯不僅是匯豐銀行的買辦，而且是國民黨右派把持的廣州市黨部的職員。」（註二）

「這次廣州商團事件，對於國民黨內部各派之革命成分要算實際做了一次最佳的試驗。右派反革命的原形，勾結帝國主義的劣跡，在這次事變中已暴露無遺，此處無庸贅述；所最可注意的是中派在這次事變中的態度，據本報巨緣君廣州通訊所記述，中派諸要人在這次事變中的態度可以「猶夷妥協，居中取巧」八大字包括之。」（註三）

「此外我們還須明白這次商團事變之擴大，完全是國民黨的右派和幾個土匪軍隊頭腦起來的，如果當已經查獲商團偷運軍械謀倒廣州政府之時，廣州政府出以快雷不及掩耳之手腕，立即解散商團，迫令繳還槍械，何至有十月十五日之事。」（註四）

從這些言論中說明自從國共兩黨開始鬥爭後，匪黨第一、更積極分化國民黨并集中全力打擊所謂國民黨右派。第二、把一切壞事和商團事件推在所謂右派身上；雖然商團事件是英帝國主義所策動，不僅與國民黨任何方面無關，而且是國民黨加以鎮壓收平的，但是匪黨卻一口咬定為「右派反革命」所釀成

。（按：現在匪黨史家對於商團事件的記述，不敢再說是國民黨右派所釀成，而且說孫中山先生這時表現了很大的革命毅力，以武力平定商團，且向英國麥克唐納政府提出了嚴重的抗議——見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上冊）第三、把國民黨廣州市黨部當作右派大本營全力加以打擊，正如鮑羅廷對譚平山周佛海所指示的策略一樣，硬說陳廉伯是市黨部的職員。第四、鮑羅廷說：「希望右派左派相爭，發生一中央派作黨之中心」（註五）曾幾何時，匪黨便製造出了所謂中派，而且還要「警告國民黨中派諸領袖」了！

匪黨的造謠當然引起了國民黨憤慨，於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於廣州民國日報公開警告嚮導週報，指斥其強分國民黨為左中右三派的錯誤及陳廉伯陳恭受并非國民黨黨員。匪黨乃以「答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為題辯稱：「本報之所以一再根據事實，指出國民黨內派別之分，不僅在使民衆了解國民革命之必然的方向，亦在喚起國民黨諸領袖之注意，對於黨的組織有所整頓。……至於陳廉伯等是否為國民黨黨員，這個問題我們認為對於國民黨和本報都沒有什麼重要，……因為反革命的右派領袖十有九個都是現在和將來的陳廉伯，現在貴黨以內如陳廉伯其人者還多得呢！」（註六）。顯然的，這時匪黨對於國民黨滿懷敵意，而把所謂右派當作反革命來攻擊，這樣國共兩黨以後的鬥爭自然更趨劇烈了

二、放棄政權與北伐的謬論

正當 孫中山先生利用軍閥混戰再度北伐的時候，匪黨不僅反對國民黨的軍事行動和北伐，而且主張放棄廣州政府。陳獨秀以「國民黨的一個根本問題」爲題寫道：

「國民黨在國民革命的策略上，目前應否停止軍事行動及放棄廣州政府，乃是一個重要的根本問題。我希望每個忠實的國民黨黨員，對於這個根本問題，都有就理論上事實上仔細研究并發表意見的必要，慎勿固執『主張停止軍事行動放棄廣州政府便是破壞國民黨』的偏見，硬閉起眼睛不理」。『

「國民黨此時絕對沒有做革命的軍事行動之可能，現在的所謂軍事行動（北伐包括在內）若不停止，和反動的滇軍妥協，和反動的西南將領妥協，和反動的段系牽張妥協，都成了必要的政策」。

「實際上，這革命政府完全建立在反革命的軍隊反革命的官僚及反革命的商人階級力量上面，這反革命的軍隊官僚與商人，不但是支持政府的力量，并且是國民黨右派的反動勢力之大本營」。

「我們一方面視察得國民黨的內容，還沒有進到軍事行動及建設革命政府的時期，勉強假用種種反革命的力量來做革命的軍事行動及建設革命政府，實在是此路不通！一方面我們視察得國際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力量及國內軍閥的力量，要想佔據一隅之地，養數萬軍隊，來打倒他們，那更是此路不通」！

「現在有一條雖較遠而可通的路給我們走，就是祇有全國工人農民兵士之聯合的大暴動，才可

以破壞全國軍閥階級的軍事勢力……」

「因此，我們希望國民黨毅然決然改走這條新路，毅然決然拋棄以前的舊政策。……」（註七）

在同一時期，匪黨的嚮導週報連篇累牘的發表反對北伐攻擊廣州政府的文章，如八十三期蔡和森的「北伐呢？抵抗英國帝國主義及反革命呢」，八十五期巨緣的「帝國主義與反革命壓迫下的孫中山政府」，彭述之的「我們爲什麼反對國民黨之軍事行動」，八十期蔡和森的「商團擊敗後廣州政府的地位」，八十九期陳獨秀的「肅清內部」，九十一期陳獨秀的「國民黨的政治態度」等等都一致主張「放棄政權與軍事行動」，「祇有革命的大民衆之長期的暴動，打破此循環仍舊的局面，別開一新局面，是唯一出路」（註八）。匪黨不厭其煩的闡揚此種主張，顯然是當時匪黨中央的決策，這一決策是根據匪黨三大大會決議：「阻止國民黨集全力於軍事行動而忽視對於民衆之政治宣傳」（註九）而來的。這種決策從任何角度來研究都是錯誤的，以匪黨的觀點來分析，正如列寧所說的，這是左派共產黨人的左傾幼稚病，而不是現在匪黨史家所說的右傾機會主義。

以當時國內形勢而論，東南有江浙戰爭，東北有二次奉直戰爭，各派軍閥和各個帝國主義間的矛盾尖銳無比，因而爆發了混戰。敵人的尖銳矛盾和戰爭，正有利於革命的軍事行動，孫中山先生掌握此一時機，採取利用矛盾打擊敵人的策略，這是無可非議的；何況北方的國民黨人在馮玉祥部隊中做了許多內應工作，隨時準備響應南方的北伐進軍。如果當時不是廣州內部的商團謀叛，如果當時所謂聯合戰線

中的中共分子能全力支持北伐，不在後方扯腿，也許這一北伐進軍早已有了新的發展。

就以共產黨人的觀點來說，妥協有時是必要的。列寧於十月革命後簽訂屈辱的布勒斯特（Brest）條約，這是最大的妥協，爲的渡過當時的難關。孫中山先生當時正確地估計到國內形勢，而以直系軍閥爲主要打擊對象，爲了集中力量打擊主要敵人，而與動搖的不堅定的勢力和次要敵人或者就如匪黨所說的反動的滇軍和西南將領等妥協，在策略上說也是必要的與可能的，這又有甚麼不對呢？

再以當時廣州的革命政府而論，現在的匪黨史家還誇稱中共與蘇俄支持和幫助。孫中山先生建立了廣東革命政府（請參閱「國共兩黨初期的鬥爭」一文），殊不知當時的匪黨不僅不予支持和幫助，而且要取消廣州政府。理由是因爲這個政府建立在反革命的軍隊官僚和商人的力量上面，「并且是國民黨右派的反動勢力之大本營」。共產黨人既然說國民革命是各階級聯合的民主主義革命，何以商人就註定是反革命呢？軍隊固然複雜，可是爲甚麼不能加以改造？何況當時還有黃埔軍校的學生軍爲骨幹。國民黨人組成的革命政府，其官員怎能與北方曹吳政權的官僚視同一體，而稱之爲反革命的官僚？唯一的原因還是「國民黨右派的反動勢力之大本營」，因爲要反對右派，就連一切也加以否定了！甚麼是右派？那就是在四個月以前揭露了匪黨陰謀，主張彈劾共產分子的一些國民黨人士。準此而論，國民革命陣營中，除了匪黨以外，政府和軍隊等等都是反革命了，那麼又還有甚麼「聯合戰線」可談呢？

原來所謂「此路不通」，是由於視察到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力量太大，「養數萬軍隊，來打倒他們，那更是此路不通！」，足見匪黨當時是如何的害怕帝國主義和軍閥。由於害怕敵人，便要停止軍事行動

，便要放棄革命政府，匪黨當時的這種主張，客觀上是幫助了帝國主義和軍閥。英帝國主義和曹吳軍閥正要顛覆這一革命政府，匪黨的論點正切合了他們的要求。

至於「唯一出路」是甚麼呢？匪黨說就是「全國工人農民兵士之聯合的大暴動」，「革命的大民衆之長期的暴動」。再以共黨觀點來說，這才是「此路不通」！恩格斯說暴動是藝術，絕不能玩弄暴動。列寧也說，祇有當革命高潮到來時，才可以暴動。既然客觀上敵人的力量太大，主觀上又要取消革命政府，停止軍事行動，那還有甚麼條件甚麼力量可以暴動呢？如果國民黨當時真的實行中共主張，那簡直是革命的自殺！

三、全國的國民會議運動

國民黨原來在北方的工作是薄弱的，所以「十一年」總理在滬籌劃改進黨務，早就注意到這方面，認爲必須設法補救，於是陸續派同志北上，祕密工作，先後被派者，有王法勤、劉守中、張繼、王用賓、焦易堂、徐謙、孔祥熙等。北方軍人馮玉祥、續西峯、孫岳、胡景翼、岳維峻、鄧寶珊等，或爲本黨舊同志，或對本黨主義素表同情，至是遂與北上諸同志暗相往返，互通聲氣，沈寂已久的北方，自此醞釀著新的變化。」（註十）至一九二四年九月第二次奉直戰爭爆發，馮玉祥等於十月二十三日，乘機發動政變，佔領北京，并電請 國父北上主持大局。 國父乃由韶關返穗，於十一月十二日離粵北上，臨行發表北上宣言，申述國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獨立自由的國家，對內必須剷除軍閥，使軍閥永不復起

，對外必須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取消列強所加予中國之一切不平等條約，并提出對時局的意見，主張召開國民會議，以謀中國之統一與建設，在國民會議召集之前，先召集一預備會議，由各民衆團體推派代表參加組織。十一月十七日 國父到達上海，對新聞記者發表談話，再鄭重提起：「故余到京後，在國民會議中第一項提議者，爲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收回租界及領事裁判權……」。中國禍亂之癥結，實爲軍閥專制，與軍閥所依賴之帝國主義；必須打倒此二者，中國乃可進於治平。……」

孫中山先生到滬之第三天，即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中國共產黨發表第四次對於時局之主張，對國民會議提出最低要求，并說：「我們希望國民黨領袖們努力號召全國人民的團結，促成此國民會議，并須力使他們所主張的國民會議預備會急速在北京召集，更應極力反對軍閥們拿甚麼各省軍民長官會議來代替此會，執行此會職權。此預備會之任務不但是籌備國民會議，我們更應號召各階級的民衆及與各派帝國主義者尚無確定的關係之武力，擁護此預備會，在正式政府未成立以前，即爲臨時國民政府——號令全國的唯一政府。」（註十一）時間相隔不過一月，匪黨一面主張放棄現成的廣州革命政府，一面主張建立渺不可期的包括軍閥官僚在內（即所謂與帝國主義尚無確定關係之武力）的臨時國民政府，前後矛盾，一目瞭然，其居心究竟如何，實在使人難以瞭解。

在國民黨的號召下，同時也在共產黨的支持下，全國各地紛紛成立國民會議促成會，召開國民會議的運動蓬勃發展。孫中山先生在全國人民的熱望下，於十二月四日經日本到達天津，受到民衆的熱烈歡迎。這時北京的臨時執政段祺瑞，也正在策劃召開善後會議，以與國民會議相對抗。這一善後會議受

到了全國民衆以及孫中山先生的反對，國民黨中央於一九二五年一月三十日議決該黨黨員概不參加善後會議，二月二日國民黨通電全國說：「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仰體本黨總理意旨，議決對於善後會議不能贊同。」同月十日國民黨又通電主張：國民自製「國民會議組織法」。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大會宣言（見附錄）也反對段祺瑞的善後會議。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段祺瑞御用的善後會議終於開幕。三月一日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也在北京召開，以對抗善後會議。促成會雖沒有獲得什麼結果，但在對抗善後會議以及擴大國民革命影響方面則有其一定的意義。

孫中山先生抵津後即感不適，入京療治亦無效，終於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與世長辭，噩耗傳出，四海同悲，這是中國革命最大的損失，正如蔣總統所說：「如果國父親手領導革命的時間，能再延長五年至十年，同時本黨的領導幹部，能深切體會國父聯俄容共的本旨，及其反對馬克斯唯物主義和階級鬥爭的訓示和精神，我們可以相信北伐不會受到共黨分子的阻撓，北伐時期國民革命陣營也不至發生分裂。不幸我們中國國民黨改組之後不過一年，國父離粵北上，隨卽在北京逝世。」（註十二）事實也確實如此，自從國父病逝後，匪黨對國民黨的分化破壞工作更無顧忌地積極推行，遂造成了國民黨內部的分裂。

四、四大大會宣言和決議

正在全國醞釀召開國民會議的時期，匪黨於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日前後（註十三）在上海舉行第四

次全國大會，到會代表二十人，代表黨員九百五十人（註十四）。「大會首先討論了國民會議問題以及國共合作中的一些具體問題。大會不僅克服了勞動運動中與國共合作中的一些左的傾向，而且確定了領導召集國民會議運動的具體方針。」（註十五）因此大會宣言除分析帝國主義陰謀、軍閥混戰原因以及聯合世界勞農革命以外，最主要的內容就是反對善後會議，支持國民會議，宣言說：

「中國共產黨正式向中國人民說：段祺瑞的善後會議，是段祺瑞要用軍閥制度而藉着帝國主義的幫助以統治中國人民的工具……。」

「中國共產黨號召全中國的勞動羣衆，起來制止段氏這種惡劣計劃……。」

「我們號召工人和農民，手工業者和知識階級鞏固自己的組織，并極力贊助國民會議促成會，要求國民會議之召集……。」

「大會討論并通過了關於民族革命運動的決議案。這個決議案反映了黨在一定程度上已開始認識到無產階級領導權的重要。」

「決議案指出『……中國的民族革命運動，必須最革命的無產階級有力的參加，并且取得領導的地位，才能够得到勝利』，『無產階級的政黨，應該知道無產階級參加民族運動，不是附屬資產階級而參加，乃是以自己階級獨立的地位與目的參加……』。」

「決議案批判了一年來黨在民族統一戰線工作中左右傾錯誤。同時指出了我黨和國民黨的關係及對國民黨內左右派的方針，指出國民黨自改組以來，已形成左、中、右三派，黨的方針是要擴大國民黨左

派，批評中派的動搖，共同反對右派。」

「其次，大會通過了關於職工運動的決議案，指出職工運動已經由『二七』慘案以後的退守趨勢轉變為復興的趨勢，工人必須積極參加民族革命運動，并應把反帝國主義鬥爭和經濟鬥爭密切的配合起來。提出要努力發展各種工會，以壯大無產階級的組織力量。此外，大會還討論了農民運動、婦女運動、青年運動，并通過了關於這些問題的決議。」（註十六）

「大會指出農民是民族民主革命中的基本力量，農民是工人階級的主要同盟軍。共產黨必須盡可能地組織各地農民進行政治鬥爭和經濟鬥爭，因而決定普遍地組織農民協會和農民自衛軍，反對地主政權和地主武裝。」（註十七）

「再次，大會修改了黨章，通過了關於組織問題的決議，指出爲了適應日益發展的革命形勢，必須加強黨的組織工作和宣傳工作，決定在全國範圍內建立黨的組織，使黨『由宣傳小團體的工作進到鼓動廣大的工農階級和一般的革命羣衆的工作。』」

「黨的第四次代表大會爲羣衆革命鬥爭的新高潮作了組織上的準備。」

「大會的缺點是對農民土地問題和革命軍隊問題仍然沒有給予應有的注意……并且還有『不宜輕率由農會決定實行減租運動』的顯然錯誤的規定。」（註十八）

匪黨「四大」選舉結果，陳獨秀第四度當選匪黨中央總書記。

從匪黨「四大」決議和宣言來研究，除召開國民會議一點支持國民黨的號召與決定外，其餘決定顯

然是以奪取國民革命領導權爲中心，也就是說在聯合戰線中要壓倒國民黨，以攫取革命果實，所以在決議中說要「取得領導的地位，才能够得到勝利」。爲了達到這一目的，又必須分化強大的國民黨，在國民黨內拉攏與擴大所謂左派，使之聽命匪黨，爲匪黨所利用，孤立和批評中派的動搖，迫使中派與左派共同反對右派，使國民黨成爲共黨的外圍和傀儡。這種聯左打右、又聯合又鬥爭的統戰策略，在「四大」決議中已經明白的提出來了。

根據「四大」決議，利用 國父逝世減少顧忌的有利時機，匪黨分化國民黨的陰謀活動，更爲積極。所以 蔣總統說：

「十四年三月十二日， 國父逝世，當時我正率領黨軍，在東江討伐陳炯明，已經平定潮梅。四月五日，我回到廣州，又發現滇桂軍勾結北方軍閥，以反對本黨聯俄容共爲名，乘我黨軍未回廣州以前，積極圖謀叛亂。我乃再往潮梅，親率黨軍回師，平定楊希閔、劉震寰的叛變，卒於六月十三日收復廣州。十五日，大元帥府改組爲國民政府，黨軍改稱爲國民革命軍。國民革命至此始有完整的廣州，與統一的廣東，做了革命根據地。」

「……但是共產黨這時對本黨內部的分化作用，更加積極，挑撥構煽，製造左右兩派，指胡漢民戴季陶及反共的本黨黨員爲『右派』，指汪兆銘廖仲凱及親共的本黨黨員爲『左派』，而挑撥胡汪間之互相猜疑與衝突。八月二十日，廖仲凱被刺，本黨中央更陷入危疑震撼的境地。」

「共黨這時竭盡其對本黨分化的伎倆，又在其所謂對『右派』鬥爭之中，更加緊其對汪的包圍

，而汪亦竟受其煽惑，并在共產黨派壓力之下藉廖案嫌疑關係，強迫國民政府主席胡漢民以出使俄國的名義，離粵出國。於是國民政府主席與軍事委員會主席皆由汪兆銘兼任。而共黨乃以往日挑撥胡漢民與汪兆銘的慣技，轉施於汪兆銘與蔣中正之間，製造本黨的另一新矛盾。」（註十九）

可見匪黨「四大」以後，其所施展的統戰陰謀是極爲惡毒，而且收到了相當的效果。後來匪黨中央機關刊物「布爾塞維克」也自詡這一政策的成功，它說：「當時廣東黨的路線，一方面發展羣衆的組織與鬥爭，另一方面在國民黨內採取不斷的向右派進攻的政策，一般人叫他剝削政策。征服了商團事變之後，馬上肅清東江，削平楊、劉，繼續又驅逐胡漢民許崇智等，左派與共產黨的勢力一天一天的發展起來。」（註二〇）在此，匪黨把征服商團，肅清東江，削平楊、劉也歸功於廣東黨的路線，其爲虛構，那是不言而喻的，不過「驅逐胡漢民許崇智等」則確係匪黨分化挑撥伎倆的成功。當時匪黨所採取向國民黨不斷進攻的「剝削政策」繼「驅逐胡漢民許崇智」之後，當然接踵而來的「另一新矛盾」便是中山艦事變了。

五、中共羣衆運動的陰謀

匪黨「四大」另一重要決定便是全面展開羣衆運動，對於工運、農運、青運、婦運都通過了單獨的議案。這時，整個環境對於匪黨進行羣衆工作也是有利的：第一、匪黨黨員團員都是跨黨分子，他們儘可利用國民黨的影響、運用國民黨的招牌展開羣衆工作，實際上國民黨的各種羣衆組織絕大部份爲匪黨

所控制，并在工廠和農村中進行階級鬥爭。所以鄧中夏說：「共產黨當時的職工運動，在一定的條件之下，也用國民黨的旗幟去做，如在上海，我們曾用國民黨的名義，在楊樹浦、小沙渡、吳淞、浦東等處開辦工人補習學校，這種工人教育運動，的確給了我們公開工作的可能，找出不少線索，於是不久就成立工人團體，如楊樹浦，我們成立了『工人進德會』，小沙渡，我們成立『滬西工人俱樂部』等。」（註二一）

第二、國民黨中央的農工部工人部等實際操縱在共產黨分子手中，因此，民衆運動的各種措施均由匪黨設計執行和包辦。當時周佛海還是共產黨員，他說：「關於農工運動，共產黨一意自辦，不許有真正的國民黨員染指，我祇舉出一件事實，便可證明。民國十三年中央黨部還設在廣州惠州會館時，農工部第一次與辦農民運動講習班，招生考試，記得是在譚平山的私宅閱卷，閱卷的方法，就和普通的不同，不是閱文，乃是先看投考者的名字，凡屬於共產黨或為共產黨作工具的人，不必閱其文，即行錄取。真正的國民黨員，均棄置不錄，結果非共產派，不要想參加農民運動，這是我親身經歷的，共產黨無論如何，不能置辯。總而言之，我親見親聞的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行動，就是發展共產黨的勢力，包辦農工運動，吸收有爲份子，和破壞國民黨的基礎，分離國民黨的中心，操縱各級黨部，和詆毀三民主義！」（註二二）

第三、這時全國正展開國民會議運動。自孫中山先生於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到滬之後，國民會議運動從上海爲起點向全國各地發展，「上海總商會於孫中山先生離滬北上之時即通電全國商會請一致要求職業團體加入國民會議；同日有學生聯合會店員聯合會等六十二公團發出通啓擁護孫中山先生主張」。

到了十四日（按：指十二月十四日）上海國民會議促成會遂正式由一百四十三公團，

四百餘代表宣言成立。」（註二三）接著其他各省亦紛紛成立國民會議促成會，這一澎湃的國民會議運動，正是匪黨展開羣衆工作的大好時機，所以當時的嚮導週報說：「全國各被壓迫階級已應聲而起，自己團結起來，依照本報和孫中山先生的主張，去實現這個國民會議了。」（註二四）第四、連年的軍閥混戰以及帝國主義的壓迫剝削，民衆的生活在水深火熱中，極易發動鬥爭，而且往往由日常的經濟鬥爭轉向政治鬥爭甚至武裝衝突，而匪黨亦乘機武裝農民工人，組織農民自衛軍和工人糾察隊，這樣許多地方的流血鬥爭便不斷發生了。在這些有利的情勢下，匪黨的羣衆運動在「四大」以後，「五卅」以前便發展起來了：

「至一九二五年『二七』紀念日於廣州召集了全國鐵路總工會第二次代表大會……這次會議對於以後的鐵路工人的鬥爭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全國鐵路工人代表會後不久，一九二五年『五一』勞動紀念節日又在廣州舉行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在會議中決定加入赤色職工國際，並產生了中華全國總工會，通過了許多決議，特別指出工人階級參加反帝反軍閥的國民革命運動之重要性，而且著重的指出工人階級應該成爲國民革命的指導的力量與運動的樞紐。會議開幕那天，全體代表參加廣州十萬人的盛大的遊行示威，並與農民代表、青年軍人代表舉行工農兵聯席會，顯示工農兵的大聯合……。」

「五卅運動前，不僅工人的反帝鬥爭在猛烈的發展著，而且農民運動也開始表現活躍與發展，特別在革命政府統治下的廣東農民運動得到長足的進步。當時廣東省二十個縣已經組織農民協會，

……在鄉村中農民已開始了反對苛捐雜稅的鬥爭，有的地方不斷與豪紳地主發生衝突。……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廣東農民第一次代表大會開幕，代表一百二十餘縣的農民。這次會議成立了省農民協會，統一了廣東農民運動的領導。……」（註二五）

一九二五年五月卅日，上海工人學生為反對日本紗廠槍殺罷工工人顧正紅而舉行遊行示威，當遊行隊伍經過南京路時，英國巡捕突然向羣衆開槍射擊，當場死十人，重傷十五人，捕去五十三人，造成震動中外的五卅慘案。這一慘案掀起了上海的罷工罷市罷課以及全國各地的反帝高潮，接著有廣州六月二十三日的沙基慘案和省港罷工。五卅運動中匪黨接連發出告民衆書和宣言，號召反帝鬥爭，於五卅二週月紀念日又提出四大主張：「第一、我們應當有全國統一的指揮機關。……第二、我們應當集中工人階級的力量。……第三、組織真正統一的中國國民政府。……第四、我們民衆應當要求武裝，……」（註二六）

匪黨這一主張剛剛提出，八月起，奉系軍閥開始在各地壓迫罷工運動，「當時上海有一部分共產黨員與先進的工人確有這樣一種意見，想以武力暴動來救此種危機。但共產黨中央認為『……現在是羣衆的宣傳及組織工作時期，是準備武裝反抗時期，還不是直接武裝暴動的時期』，於是武裝暴動的意見被打消。此時共產黨中央決定『……應改變罷工的政策，以經濟的要求及地方性質的政治要求為最低條件……』，於是準備結束上海罷工而開始反奉戰爭」（註二七）陳獨秀根據匪黨中央的決定於八月下旬在滬導週報指出「不應該在羣衆恐慌之時，拿武裝暴動當做一種浪漫的『拚命』辦法」并提

出「今後我們的總口號應該是『武裝平民』『打倒奉天軍閥』『廢除不平等條約』『建立平民的革命統一政府』。」（註二八）

匪黨此時一面準備結束罷工，一面積極發展黨員團員。八月十八日匪黨匪團中央共同發出告工人、學生、兵士書號召「工人應當一致團結，以全力擁護工會，工會組織應當特別嚴密……工人們！趕快加入共產黨罷。……學生們！趕快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註二九）因此，五卅運動不僅使匪黨的羣衆工作有長足的進步，同時匪黨的組織也有很大的發展，五卅運動以後，匪黨的黨員已由「四大」時期的九百五十人，發展到六千餘人，這是匪黨大量吸收黨員走向「羣衆黨」的開始，也是「四大」決議「由宣傳小團體的工作進到鼓動廣大的工農階級和一般的革命羣衆的工作」的體現。

綜觀這一時期匪黨的羣衆工作，是通過黨團組織和工會農會學生會等羣衆團體，加以切實的控制和領導，隨時發動羣衆政治和經濟的鬥爭，使之圍繞在共產黨周圍，作爲匪黨在聯合戰線中鬥爭的資本，以羣衆力量壓迫國民黨，以配合其不斷向國民黨進攻的剝削政策。爲此，對農民運動講習班之招生絕對加以壟斷，排除國民黨人員參加，使農運爲其掌握。對於國民黨的工運加以猛烈攻擊，指馬超俊（當時馬任國民黨廣州市黨部工人部長）爲右派領袖之一，捏造馬超俊壓迫工人的十大罪狀（註三〇），指國民黨的工運幹部爲工賊，國民黨所領導的工會爲工賊工會，使國民黨與工人農民及各階級民衆隔絕，而爲匪黨所獨佔。所以在省港罷工時，匪黨人員也認爲「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罷工是無產階級的事情，所以省港罷工應完全由共產黨獨立領導，不要國民黨來過問；國民黨來過問，便會奪去領導權。」

(註三二)同時積極武裝工人農民，組織工人糾察隊、工團軍和農民自衛軍，在黃埔軍校和部隊中則於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就開始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作為匪黨在軍中掌握武力的骨幹。顯然的，匪黨這時不僅以汪精衛為傀儡掌握了國民政府主席和軍事委員會主席，而且進一步打算以羣衆力量和軍事力量篡奪全部革命的成果，因而造成了國民黨生存發展的危機，西山會議的召開便是一部份國民黨人士企圖挽救危機的嘗試。

六、四全大會與黨內鬥爭

匪黨的四全大會和已往各次大會一樣，展開了匪黨的黨內鬥爭。不過匪黨史書的記述前後有若干不同，前期的記載說「大會不僅克服了勞動運動中與國共合作中的一些左的傾向」(註三二)，後期的記載則說「決議案批判了一年來在民族統一戰線工作中的左右傾錯誤」。(註三三)但從「四大」前後匪黨的主張與工作來研究，大會是以批判左傾傾向為主，也就是說「四大」鬥爭的鋒芒是指向「左傾幼稚病」，下述四種錯誤是其鬥爭的重點：

第一、祇注意一般的反帝反軍閥的政治鬥爭，而忽略了日常的局部的爭取迫切利益的鬥爭。所以「第四次代表大會，并著重指出工人階級經濟鬥爭的重要意義，在決議中說『忽略工人經濟鬥爭，不僅要使工人階級本身受到損害，而且必然要滅弱民族解放運動』。」(註三四)

第二、張國燾的左傾主張，即「反對在勞動羣衆中發展國民黨的組織，主張工人應該在自己的政黨

旗幟之下參加民族革命」，再次受到批判，并把這種錯誤傾向列入「四大」通過的「對於民族革命運動之決議案」中，作為檢討聯合戰線決策的經驗和教訓。

第三、一九二四年十月匪黨主張放棄廣州政府停止軍事行動號召聯合大暴動，這是非常明顯的左傾幼稚病的錯誤，必然在大會中受到批判，因此「四大」以後，這種主張便無形取消了。

第四、「四大」以前，匪黨的組織正如「四大」決議所說還是一個「宣傳小團體」，因為犯了左傾關門主義錯誤，把鬥爭中積極分子排斥於黨外，這種傾向當然受到大會批判。因而「四大」「決定在全國範圍內建立黨的組織」，大量發展黨員，建立「羣衆的黨」，「爲羣衆革命鬥爭的新高潮作了組織上的準備」。

總之，匪黨的四全大會，在匪黨黨史上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會議，是準備篡奪革命領導權的一次會議，同時也是分化破壞國民黨，造成國民黨危機的決策會議；會後不到一年，國共兩黨的鬥爭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註一：嚮導週報第八十二期——一九二四年九月十日出版。

註二：蔡和森「商團事件的教訓」——一九二四年九月十日嚮導週報第八十二期。

註三：蔡和森「警告國民黨中派諸領袖」——一九二四年十月一月嚮導週報第八十五期。

註四：彭述之「廣州商團事變之根本原因及其對中國國民革命上所與之教訓」——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嚮導週報第八十八期。

註五：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五日「謝張兩監察委員與鮑羅廷問答紀要」。

註六：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嚮導週報第九十二期「答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

註七：一九二四年十月一日嚮導週報第八十五期「國民黨一個根本問題」。

註八：陳獨秀「國民黨的政治態度」——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嚮導週報第九十一期。

註九：匪黨三全大會「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

註十：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略」第七章第五節。

註十一：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之主張——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嚮導週報第九十二期。

註十二：蔣總統「蘇俄在中國」中文本第一編第二章第十二節。

註十三：現在匪黨之黨史書刊對於「四大」召開時間祇說於一九二五年一月在上海舉行，并未說明日期。查「四大」對於列寧逝世一週年紀念宣言係一月二十一日發表，「四大」宣言則於一月二十二日發表，故「四大」開會日期應為一月二十日之前。至於「四大」代表姓名及選出之中央委員，中共前後期書刊均無記載。張國燾亦未參加「四大」，惟張之回憶錄稱：當選之中央委員，只記得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蔡和森、瞿秋白、譚平山、彭述之、羅章龍、項英、王荷波等十人是當選的。并謂會後中共中央之分工為：陳獨秀任書記兼組織部部长，彭述之任宣傳部部长，張國燾則主持職工運動委員會。

註十四：「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說「四次大會時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已經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黨員數量已達到九百八十八人」。「中國共產黨歷史簡編」以及其他共產黨黨史書刊則說「到會代表二十人，代表著黨員九百八十八人。」查一九二七年五月八日出版的嚮導週報第一九五期載有羅易所作「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之意義」一文，該文開頭就說：「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大會是在二年又四個月以前舉行的。那時黨還是祕密的組織，黨員數目只九百五十人，現在第五次大會所代表者竟達五萬餘人。」本文採用嚮導週報當時記載之資料，較為可靠。

註十五：「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上冊一九四七年七月香港初版一七四頁。

註十六：「中國共產黨歷史簡編」一九五八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五五頁。

註十七：「中國現代革命史」——何幹之主編一九五八年九月香港一版六三頁。

註十八：「中國共產黨歷史簡編」五六頁。

註十九：蔣總統：「蘇俄在中國」中文本第一編第二章第十二節。

註二〇：華崗「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中的中國共產黨」——一九三一年五月十日「布爾塞維克」雜誌四卷三期
(中共中央機關刊物)。

註二一：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中文本一九四九年九月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二二頁。

註二二：周佛海「逃出了赤都武漢」。

註二三：嚮導週報第九十五期「國民會議之怒潮」——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出版。

註二四：全上

註二五：「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上冊一八二、一八五、一八六頁。

註二六：中共中央少共中央「五卅二週月紀念告上海工人學生兵士商人」——嚮導週報第一百二十三期。

註二七：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二〇九、二一〇頁。

註二八：陳獨秀「我們如何繼續反帝國主義鬥爭」——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嚮導週報第一百二十六期。

註二九：中共中央少共中央「全國被壓迫階級在中國共產黨旗幟下聯合起來呵！」——嚮導週報第一百二十六期。

註三〇：嚮導週報八十七期——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五日出版。

註三一：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二三九頁。

註三二：「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上冊一七四頁。

註三三：「中國共產黨歷史簡編」五五頁。

註三四：「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上冊一七五頁。

附錄：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大會宣言（摘錄）

工農們，和被壓迫的民衆！在這些事實之前，世界帝國主義努力擴充軍備，努力發展軍事工業以及那些被金錢收買的各國的學者盡力尋找殺人的武器之時，東方的人民是如何危險！東方人民自衛的武器，比較起來，不過是帝國主義者的小玩意兒，如何是他們的對手！將我們的國土變爲荒漠，將我們的城市和鄉村變爲墳墓——這一種危險就在眼前啊！但若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和農民暴動起來，反對自己的壓迫者，將這些武器拿到手裏，同時東方被壓迫的民衆起來反對自己的軍閥，用自己的力量發展國家，向外國帝國主義施以最後的總攻擊，那末，世界帝國主義之破壞力量也可轉變爲反對自己的工具。

全世界革命的無產階級之總機關——共產國際，已經組織了無數萬的工人立在社會革命的紅旗之下。共產國際下的紅色農民國際，也已經聚集了無數萬的農民環繞著紅旗。世界工農的軍隊和帝國主義的武備并排生長，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勞農與資本統治之最後的爭鬥日見逼近了。

中國共產黨在自己的責任上，很誠懇地向中國的勞動羣衆不斷地說，勞農反對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壓迫之鬥爭已臨近了，這種鬥爭將永遠把人類解放出來，將永遠消滅一切的戰爭。中國共產黨以爲不斷地向羣衆解釋用什麼方法，中國人民纔可以脫離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壓迫，如何纔能與世界勞農革命運動聯合起來……是自己惟一的責任。

中國的解放運動現在已日見膨漲起來，全國各城市裏面的羣衆現正努力達到召集國民會議的要求，差不多都組織了國民會議促成會。工人、農民、手工業者、商人、學生現正組織這種機關，並且高叫著消滅一切軍閥陰謀，反對段祺瑞所要召集的軍閥善後會議。中國共產黨正式向中國人民說，段祺瑞的善後會議是段祺瑞要用軍閥制度而藉著帝國主義者的幫助，以統治中國人民的工具。這個善後會議，如段祺瑞所預料的，將成爲段氏團結已派軍閥的工具，藉此工具以對

付別派軍閥，而引起將來無窮的戰爭。

中國共產黨號召全中國的勞動羣衆，起來制止段氏這種惡劣的計劃。倘若國民要求派自己的代表參加段氏所要召集的善後會議，段氏對於召集國民會議之虛偽的宣言一定要被揭破。國民會議促成會是人民真正的機關，應當要求在善後會議中有最大多數之國民代表。

中國共產黨不僅盡力向羣衆解釋軍閥愚弄國家之巨大的危險和帝國主義者擴張軍備對於我們是如何的可怕，并且要使中國人民衆知道國內軍閥不給人民召集國民會議及組織羣衆的保護國家利益的機會，則帝國主義者及其工具所加予我們的危險將更爲擴充。

我們號召工人和農民，手工業者 and 知識階級鞏固自己的組織，并極力贊助國民會議促成會，要求國民會議之召集。無數萬中國人民衆的命運不能再靜聽軍閥們的愚弄了！革命的力量在我們國家中日長一日，軍閥和帝國主義者的鎖鍊已經開始搖動。英美所扶植的直系勢力之崩壞是民族革命運動進展的機會，但軍閥和帝國主義者又謀重新制服民衆的運動。他們正在那裏預備最嚴酷的反動，我們應當明白現在時機之迫切啊！

中國共產黨將使中國解放運動由自然的歷程生長進於覺悟的狀況。我們惟有在民衆的組織中，在召集國民會議的要求中，在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奮鬥中，才能找出一條出路，才能避免現在資本帝國主義世界的危險。

工人、農民、學生、手工業者，你們趕快組織起來，趕快制止軍閥的陰謀，趕快要求在善後會議中參加最大多數的國民代表，趕快努力國民會議之召集！你們趕快組織大示威運動反對外艦駛入中國內地，要求外兵不得駐紮在我們的領土以內，取消一切領事裁判權！要使中國不陷於奴隸的地位，完全靠著中國勞苦羣衆的努力，完全靠著全世界勞農聯合起來反對資本主義的奮鬥！

打倒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

推翻國內的軍閥！

國民會議萬歲！

中共史論 第一冊

一六二

中國勞動羣衆萬歲！

中國共產黨萬歲！

共產國際萬歲！

全世界勞農反對資本主義的同盟萬歲！

（錄自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八日「嚮導」週報一〇〇期）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二日

第八章 國共兩黨再次的鬥爭

一、理論的鬥爭

匪黨四全大會及五卅運動以後，黨與團的組織和羣衆工作都有長足的進展。匪黨以此爲基礎，在羣衆中煽動階級鬥爭，在國民黨內進行分化挑撥工作，妄圖篡奪革命領導權。同時在宣傳上不斷攻擊所謂國民黨右派，批評中派，並以馬列主義曲解三民主義和國民革命，使之適應匪黨的觀點和要求。匪黨這種全面的攻勢，造成了國民黨內部的紛擾和危機，組織上醞釀著重大的分裂，思想上則陷入混亂與分歧。在這一危疑激盪的關頭，挺胸出來與匪黨作理論鬥爭的，便是戴季陶先生。

戴先生與匪黨作理論鬥爭的代表作除「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外，主要的是一本「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這本書於一九二五年七月底寫成，八月發行全國，「散布的數目，不下十餘萬冊，有了幾國文字的翻譯。莫斯科的第三國際，視爲共產黨在中國的唯一勁敵，研究批評和攻擊，布滿了第三國際所支配的言論機關」。「共產黨的人，一致對這本小冊子下總攻擊。」（註一）可見這本書，正擊中了匪黨的要害，使匪黨不能不起而應戰了。

這本書對於國民革命的歷史發展，思想變遷，國民黨一次大會的精神，國父逝世後的中心，三民主義及其世界意義，聯俄容共政策，黨的組織原則及其排他性等等都有透澈與精闢的闡述，對中國國民黨下了一個恰當的定義，並指斥黨內右傾病的錯誤爲「自己爲自己利益而奮鬥」，左傾病的毛病在於「

祇顧說過算數，不問實際效用」，應知「我們今天在國民革命進程中，爲農民工人而奮鬥，絕不須用唯物史觀做最高原則，爭得一個唯物史觀，打破了一個國民革命，絕不是革命者應取的途徑。」同時對於匪黨匪團也作了如下的指斥和忠告。他說：

「大家所以要進中國國民黨的緣故，我想最少總不必一定希望鬧完了中國國民黨，就算是達到革命的目的。既然這樣，就要足踏實地，從中國國民黨的組織上做工夫。如果已經加進了中國國民黨，不把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和團結，作爲自己的責任，祇是盡量在中國國民黨當中，擴張C P或C Y的組織，並且盡力的使非C P非C Y的黨員，失卻訓練工作的餘地，一定會使實際的政治工作上，祇有反對和盲動兩種勢力，磨擦鼓盪。……大家如果不把中國國家和民族的真實需要認清楚，單是一味的盲進，而且拼命阻止多數青年走健全的道路，弄到真正國家和民族的現實責任，沒有人來負擔，豈不是罪過麼？……」

「現在我們中國需要的是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就要老實做信奉三民主義，老實是以國民革命爲目的；……如果心裏想的是共產革命，口裏說的是半共產革命，手上作的是國民革命，……到困難發生的時候，祇用一句『排反革命』的空說來掩護真實的主義問題、思想問題，這樣作法，那裏可以服得大衆？更那裏可以救得中國？……三民主義的必要，和國民革命的必要，這是空間和時間的真實性，你們大家爲什麼不把C P C Y的名義拿出來，還不是因爲時代不需要嗎？既然知道時代不需要，卻又不肯實心實意做時代需要的工作，豈不是自相矛盾？至於說到無產階級的團體

問題，這就更沒有必定要CPCY才能作的道理。你們去工作，表面上並不用你們黨的名義和黨的理論，而且還要極力避開這一種名義和理論，就是一個證據。……

「CPCY的寄生政策，……祇借中國國民黨的軀壳，發展他自己本身組織，……所以我認為CPCY的人，既然已經加進了中國國民黨做同志，至少在中國國民黨裏面，應該要停止他為CPCY或CPCY吸收黨員的工作，……尤其有幾個沒有常識的CPCY黨徒，自己已經加進了中國國民黨，並且作了中國國民黨的最高幹部，而把自己的地位，把國民黨的關係，都完全忘卻，公然說國民黨的政策中有反革命的政策。譬如譚平山今年在『革命』第一期所載的文字，就是一個證據。……」

最後戴先生警惕國民黨人員說：「在方法上，尤其特別注意的，就是要真實的三民主義信徒，很勇猛精進的團結起來，中國國民黨中，已經有了一個很堅固而祕密的CPCY的小團體，如果我們真正的三民主義信徒沒有特殊的團結，深刻的覺悟，嚴密的訓練和組織，是一定不能完成國民革命大事業的。」

戴先生這本書，號召「愛中華民國的中國國民黨員，三民主義的信徒團結起來」（註二），並以此為武器，從理論上組織上去抵抗共黨的分化挑撥和進攻；這樣當然引起了匪黨的「圍剿」。直到現在，匪黨的黨史書刊，在記述當年國共兩黨的關係時，無不對所謂「戴季陶主義」繼續加以攻擊，可見這本書影響之廣大與深遠和當時對匪黨打擊之重大。當時匪黨以陳獨秀為代表，於一九二五年八月三十日撰就「給戴季陶的一封信」，發表於「嚮導週報」，這封信除為共黨辯護外，並指出「在理論方面：你

及你們的根本錯誤，乃是祇看見民族爭鬥的需要，而不看見階級爭鬥的需要。……」，「在態度方面：你及你們的根本錯誤，乃是以共產派加入國民黨，不是促進國民黨，而是陰謀破壞國民黨。……」（註三）在匪黨黨內，北方區委發出了「我們最近在北方國民黨工作中應取的態度」的指示（見附錄一），指導北方黨員「應該首先要使普遍的遊移的羣衆，明白戴季陶主義不是真正的中山主義」，「是反動派理論的武器」，向羣衆宣傳解釋「階級鬥爭並不妨害國民革命」，「共產黨在國民革命運動中，決無消滅國民黨之可能。」（註四），以掩飾匪黨在國民黨內外所施展的陰謀策略。

一九二五年十月，匪黨在北京舉行中共中央擴大會議，爲戴先生這本書引起了爭論，陳獨秀甚至因此而主張退出國民黨，他說：「是年十月在北京召集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我在政治決議案委員會提議：戴季陶的小冊子不是他個人的偶然的事，乃是資產階級企圖鞏固自己階級的勢力，以控制無產階級而走向反動的表现，我們應該即時準備退出國民黨而獨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領導羣衆，而不爲國民黨的政策所牽制。當時的國際代表和中央負責同志一致嚴厲的反對我的提議，說這是暗示中共黨員羣衆走向反對國民黨的道路。主張不堅決的我，遂以尊重國際紀律和中央多數意見，而未能堅持我的提議。」（註五）雖然如此，對中共「更加獨立」一點，擴大會接受了陳獨秀的意見，因而是次會議，關於國民黨問題有兩項重要決定：

「一、我們留在國民黨裏與左派結合密切的聯盟，幫助他們發展國民黨，並且反對右派，但是我們自己不可以代替左派。」

二、我們自己的黨，政治上更加獨立起來」（註六）

從匪黨反應看來，戴先生這本書的確曾給匪黨沉重的打擊，而使其領導者不得不考慮「即時準備退出國民黨而獨立」，因為這本書從思想上事實上揭穿了匪黨的陰謀，使其無法爭辯，無所遁形。於是這一場理論鬥爭上，匪黨顯然是處於劣勢而落居下風，尤其在北方，匪黨簡直沒有活動的餘地。所以當時匪黨的北方區委說：「北方尤其是北京的政治環境，既是全國的反動中心，又沒有堅強有組織的廣大無產階級的羣衆，所以一般城市的小資產階級，完全受反動空氣的包圍，政治觀念極爲模糊，自然很容易受戴季陶主義之影響。因此在北京國民黨中，除了極少數幾個老黨員外，實在沒有真正的左派，所有黨員沒有不是戴季陶主義的傾向。」（註七）雖然在這場理論鬥爭上，匪黨受了挫折，可是在廣東則力謀補救。在國民黨中央方面，匪黨通過鮑羅廷，利用汪精衛，運用政治委員會，對所謂右派加以更猛烈的攻擊，這樣就造成了國民黨內部的分裂。

二、內部的分裂

匪黨在國民黨內的統戰陰謀及其「剝奪政策」所以得逞，一面得力於鮑羅廷之分化挑撥伎倆，一面得力於汪精衛之甘被利用，所以鄒魯在「再告字木」一文中說：「至於共產派之能够把持排擠，其陰謀完全由我一部份同志偏護所至。不管工、農、商、學、兵的人，共產派是好的，非共產派就是壞的；一有爭端，共產派是直的，非共產派是曲的；甚至工人打死人，被警察當場拿著，也有人函迫公安局叫他

立即釋放。農民協會招集土匪，被軍隊奉令拿著，也有人函林拯民（時爲師長）云：『不論是非匪，須即釋放，否則於兄前途有礙』，迫其釋放。積威所至，不特普通人民，普通黨員，受其壓迫，敢怒不敢言；甚至監察委員鄧澤如，接到海豐人陳訴共產派人在海豐勒索，用一鐵線貫穿十餘婦女之乳頭，繫成一堆；用一鐵線串十餘男子之腳根，繫成一堆，亦不敢提出彈劾。」（註八）足見匪黨在廣東是如何的跋扈！

至於鮑羅廷，則以政治委員會顧問的資格，利用汪精衛操縱黨政大權。具體情形，國民黨西山會議在其告同志書中曾列舉如下事例：

「（一）前年鮑羅廷因欲消滅本黨之歷史和同志們愛國愛黨之觀念，竟趁商團叛抗總理，兼綜不遑的時候，嗾令共產黨擅發通電，改雙十節爲警告節，並在共黨的週刊上，常常醜詆本黨創造中華民國之歷史。

（二）鮑羅廷因伍同志朝樞對英國新聞記者談話，有「俄人之供職係雇傭」一語，卽變更伍同志外交部長的職務。

（三）廣三鐵路罷工，握有最高黨權政權之汪精衛，不能行使命令，反囑局長陳耀祖疏通鮑羅廷。

（四）本黨政府曾規定教育經費獨立，因鮑羅廷說「教育經費獨立，甚於軍隊盤據財政」，就借統一財政的名義，取消教育經費獨立。

（五）廖仲愷同志被刺後，鮑羅廷向特別委員會提出名單，要求拿辦胡展堂、鄧澤如、鄒海濱諸同志

，特別委員會詰他「毫無證據，何以拿辦？」鮑羅廷說「政治上祇問政見同否，不問證據有無。」現在胡同志已變相的發往莫斯科監視，鄒同志等亦已先以他種名義，使離國民政府所在地，繼續開除他們的職務。……」（註九）

可見匪黨「不斷的向右派進攻」的「剝筍政策」，利用廖仲愷被刺，把他目為右派的國民黨人士，盡量加以驅逐，這就使國民黨「一部份中央委員林森、居正、張繼、覃振、謝持、鄒魯等，不忍坐視本黨被共產黨蠶食鯨吞，乃於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北京西山總理靈前，舉行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議決取消共產黨黨員在本黨的黨籍，及解雇蘇俄顧問鮑羅廷等案。以不得廣州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接納，為貫徹主張，另設中央執行委員會於北京，其後移設於上海。十五年一月一日廣州中央召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第二屆中央執監委員，而上海方面亦於三月二十九日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另產生第二屆中央執行、監察委員會，與廣州中央對立，是為上海中央黨部。這是本黨改組後，因共產黨問題而產生的裂痕。廣州本黨諸同志之不同意於對共產黨遽加制裁，並不是漠視共產黨危害本黨的事實，而是因感受帝國主義與軍閥的環伺，大敵當前，希望以容忍的精神與大公無私的態度，可促共產黨萬一的覺悟，共同奮鬥。」（註十）這是國民黨內部為容共問題的爭執而發生的第一次大分裂。這一分裂，固然為匪黨分化挑撥及其「剝筍政策」所促成，固然西山會議的召開，係一種挽救國民黨危機的嘗試，其動機未可厚非；然而，國民黨的內部分裂，不但削弱了領導國民革命的力量，而且授予匪黨爭奪革命領導權更好的機會，這實在是國民黨的不幸。究其原因，在於一部份國民黨領導幹部未能

「深切體會 國父聯俄容共的本旨。」未能審察「帝國主義與軍閥的環伺，大敵當前」的情勢；在方法與步驟上，也未能先求黨內「特殊的團結，深刻的覺悟，嚴密的訓練和組織，」遽然出諸分裂，實屬失策。

由於國民黨西山會議，曾議決開除李大釗譚平山等中央委員，和毛澤東張國燾等候補中央委員，於是匪黨方面由張國燾出面，撰文刊登「嚮導週報」，聲稱「就算他們的決議有效，古今中外，也沒有中央委員開除中央委員的道理。……：如果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以後，於革命前途真不利，在國民黨內又是引起糾紛而阻礙革命工作，亦應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加以善意的討論而決定之，方為合法。」（註十一）這封信說明匪黨正通過其掌握的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競選國民黨二全大會代表，準備運用大會，打擊西山會議派。果然，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於廣州召開的國民黨二全大會，在全體到會代表二百五十六人中，跨黨份子佔了百人以上，選舉結果，二屆中委三十六名中，有匪黨份子譚平山、林祖涵、李大釗、于樹德、吳玉章、楊匏安、惲代英等七人，候補委員二十四人中有毛澤東、鄧穎超、夏曦、韓麟符、董用威、許甦魂等七人為匪黨份子。大會通過了「西山會議」處分案，以打擊所謂右派份子。會後張國燾又撰文稱：「也許有人以為大會處罰西山會議幾個最反動份子，還應寬大一點。但是就事實上說，已經是寬大得無以復加，……：這幾個反動份子雖然是老同志，但是為了全黨的生存，也就不能不割愛了。」（註十二）可見，國民黨內部的分裂，不但推進了匪黨的分化政策，同時也助長了匪黨奪取國民革命領導權的野心，中山艦事變就是在這一情況下發生的。

三、中山艦事變

國民黨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在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的選舉中，匪黨份子譚平山、吳玉章、林祖涵三人當選爲常務委員（全體常委共九人），組織農民等部仍由譚平山林祖涵等把持，整個形勢有利於匪黨奪取革命領導權，唯一的顧忌，便是當時任黃埔軍校校長兼廣州衛戍司令的蔣先生。於是匪黨又施展故技，照處理胡漢民的辦法，擬挾持蔣先生前往莫斯科，中山艦事變的作用在此。事變的經過蔣總統說：

「三月十八日，海軍局代理局長李之龍（共產黨員），矯令我的坐艦中山號由廣州駛回黃埔。他對軍校教育長鄧演達報告『奉校長命令，調艦特來守候。』這時我在廣州省城，鄧來電話問我此事如何，我茫然無所知。隨後李之龍亦打電話問我：『中山艦是否仍要來廣州迎接？』我很駭異，就問他道：『是誰的命令要中山艦開回黃埔去的？』他答不出來。其實他駛回黃埔，是要先在黃埔裝足煤斤，以備臨時遠航。到了十九日的晚間，中山艦開回廣州，艦上升火，通夜不熄，戒備極嚴。我知道共黨陰謀的爆發，就在於此。但我在當時，祇知道他們是要叛變，要害我，還不知道他們的企圖究竟是什麼。一直到了這一叛亂平定之後，我纔知道他們的計劃，就是要在我從廣州省城乘艦回黃埔軍校的途中，強迫我離粵，直駛海參威，送往俄國，以消除他們假借國民革命來實行其『無產階級專政』的唯一障礙。」

「在十九日的夜間，我認爲革命形勢至此，個人的生死，自不足惜，而黨與革命的存亡絕續，是不許我再有猶豫的。我乃於二十日清晨，即在廣州衛戍司令部宣佈戒嚴，逮捕李之龍及各軍黨代表共黨分子，收繳共黨分子所操縱的省港罷工委員會的槍械，並派兵收回中山艦。」（註十三）

匪黨陰謀失敗之後，對於此次事變，力加辯白和否認，陳獨秀在「嚮導週報」聲稱：「他們（按：指所謂國民黨右派）宣傳此次事變是由於共產黨陰謀推倒蔣○○改建工農政府。我們現在可以回答他們：第一，照全中國的政治環境，共產黨若不是一個瘋子的黨，當然不會就要在廣州建設工農政府；第二，蔣○○是中華民族革命運動中的一個柱石，共產黨若不是帝國主義者的工具，決不會採用這種破壞中國革命勢力統一的政策；第三，汪精衛譚延闓朱培德李濟程潛都不是瘋子，共產黨如果忽然發瘋想建設工農政府，單單推倒蔣○○是不够的。」（註十四）陳獨秀的聲明是牽強的，而且是狡辯的。因爲：第一，建設工農政府與否和「消除」「唯一障礙」是兩回事，縱不建設工農政府，但除去「障礙」之後，可以使國民政府更加「左傾」「赤化」，共產黨人從此可以爲所欲爲。第二、共產黨人曾經自詡「驅逐胡漢民許崇智等」的成功，而且因此而使「左派與共產黨的勢力一天一天的發展起來」（註十五），並未認爲這是「破壞中國革命勢力統一的政策」，現在再施故技，如果陰謀得逞，不但不會說這是破壞統一的政策，而且又要慶祝勝利了。第三、「單單推倒蔣○○是不够的」，試問「驅逐出來的右派領袖孫科葉楚儉邵元冲等到了上海」是否够了呢？爲什麼又要「驅逐胡漢民許崇智等」？當時共產黨人的「剝筍政策」，就是一層一層的剝下去，一個一個的「推倒」下去，中山艦事變，正是匪黨又一次「剝筍」的

陰謀，不過沒有成功罷了。

事變的主角是中共黨員李之龍，這是匪黨無法爭辯的事實，於是匪黨祇好以李之龍係受處分的共黨黨員，及上了反動派的圈套來掩飾。所以「嚮導週報」寫道：「李之龍方被共產黨處以留黨察看之處分，中山艦案初起，共產黨頗疑心是李之龍受反動派運動所爲。」（註十六）陳獨秀進一步說：「當李之龍因中山艦案被捕消息傳到此間時，我們因爲李最近曾受留黨察看的處分，以爲他已加入反動派了，後來見報載中山艦案乃是李之龍受命於共產黨的倒蔣陰謀，我們更覺得離奇，最後接恩來來信，才知道李之龍是上了反動派的圈套。」（註十七）匪黨的這種詭辯，顯然是想推卸責任，好像李之龍雖然是中共黨員，但已受了處分，因而可能「受反動派運動所爲」，這樣匪黨便沒有責任了。後來周恩來的來信，則又說是「上了反動派的圈套」，而不是共產黨所指使，爲匪黨自己解脫主使謀叛的罪責，可是提不出任何事證，而李之龍之矯令調動艦隻，圖謀不軌，則是不容爭辯的事實，匪黨的陰謀罪行，不是詭辯所能推卸的。

中山艦事變以後，蔣先生在宴會全體黨代表訓話時，曾指出：「當三月二十日事情未出以前，就有一派人想誣陷我，並且想拆散本校，就造出一種空氣，說校長是不革命的，這不革命的話，分明就是說反革命的話一樣的。……至於在學校裏面，政治主任教官高語罕（按高係中共黨員即跨黨分子，國民黨二全大會被選爲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每次演講，有形無形之間，詆毀本校不革命的言論是公開的，大家知道，不必我說了。總之他的用心，先暗示一般同志，對我失了信仰，並且還有彰明昭著說

我們團體裏有一個段祺瑞，要打倒北方段祺瑞，就要先打倒這裏的段祺瑞，各位同志想一想，這些話是指那一個？……」（註十八）可見在事變之前，匪黨早就在黃埔軍校中做準備工作，醞釀「倒蔣運動」，李之龍之謀叛，不過是事變之爆發而已。對此，陳獨秀和高語罕均曾加以解釋，陳獨秀說：「我們早已聞有此說，曾函詢廣東的同志，他們回信說：『語罕同志初回國，要好心太急切，期望國民黨尤其期望黃埔軍校也太急切，因此語罕態度都不免急切一點，至於「打倒我們的段祺瑞」之說，絕對沒有，乃翻譯之誤，語罕已在報上聲明過，當不至因此發生誤會。』語罕來此，我亦當面詰責過，他亦力辯無此事。」（註十九）陳獨秀高語罕雖以翻譯錯誤（按：高以國語演講，用粵語翻譯，據高稱：翻譯人員把「我們思想上的段祺瑞」一句話中之「思想上」三字落掉了。）來掩飾，依然不能自圓其說，因為打倒我們思想上的段祺瑞和打倒這裏實體上的段祺瑞並無根本的區別，何況陳獨秀也承認「語罕態度」太急切」呢！

當時蘇俄派在廣州的俄國軍事顧問斯切潘諾夫（Sapa-Notf），在其向蘇俄駐北京大使館的報告中，承認中山艦事變的起因，完全由蘇俄顧問及中共錯誤所造成，他說：「中國共產黨於黨務之工作及軍隊中之宣傳，亦鑄成許多錯誤，彼等不知盡力於組織國民黨默為轉移，祇知以明顯的擴充共產黨為工作之總方針，欲在各處完全把持一切指揮之權，致使國民黨因嫉忌而解體。惟中國共產黨之錯誤，實由於吾輩指揮力之不足，及欠缺聯絡未能一致行動之故，此不應獨歸咎於中國共產黨，其過當雙方負之也。……中國共產黨黨員亦正在改正其根本政策上之誤點，尼羅夫（Nirof）關於此事將續有詳細陳

述。」（註二〇）接著尼羅夫之回答稱：「現時共產黨已知從前彼輩在國民黨及軍隊中之工作，均有極大之錯誤，不合策略矣。當初共產黨人於工作時，祇知利用國民黨，在其覆翼之下，擴大己黨之力量，不知從事於國民黨之建設，及注意於國民黨之左翼，公然攫取國民黨之最高管理機關，及軍隊中之政治機關，包辦工農運動，以此引起國民黨大多數之不滿，暨國民黨內兩極端派暨右派與共黨之分裂。刻下召集農民會議，成立組織委員會，為顧全體面起見，擬加入若干之國民黨，繼知此節不能做到，因在農民中工作人員，並無國民黨黨員。不特右派如此，左派亦然，不特農民中如此，即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及其他各部分，亦莫不然。至共產黨中國同志之招攬權勢，乃是一種習氣，如中國之官吏將領，既居要職，莫不援引其同黨暨其好友（如李之龍之在艦隊）。前項情形，在軍隊中為尤甚。軍隊中政治工作人員，佔據重要地位，遍佈黨羽，祕密從事於該部分長官所不知之工作，……」（註二一）這是中共的「兄弟黨」「老大哥」所派的顧問，在廣州親聞親見之報告，在這些報告中，不但指稱中山艦事變匪黨應負其責，而且把匪黨把持黨部，包辦工農運動，結黨營私，製造分裂，滲透軍隊，圖謀不軌等等惡毒陰謀也揭發出來了，這不能再事抵賴又說是「誤會」或「反動派的圈套」了吧！

四、暫時的退守

中山艦事變，暴露了匪黨的陰謀，國民黨提高了警覺，對於跨黨份子不能不加以限制；於是國民黨便有整理黨務案的決定，經過情形 蔣總統寫道：

「二十二日（按：指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蘇俄駐廣州的領事館代表爲了這一事件（按：指中山艦事變）來見。他問我：「這是對人問題，還是對俄問題？」我答以對人不對俄，並表示希望鮑羅廷速回之意。他表示如此即可安心，乃令季山嘉（Kissarka）回俄。同日中央政治委員會開會，接受汪兆銘的意見，決議令俄顧問季山嘉等離粵回俄。但是會後，汪即稱病，遷居就醫，并致函中央監察委員張人傑，表示他不再負政治責任。直至五月十一日，汪竟祕密離粵，赴法養病。

四月二十九日，鮑羅廷自俄回粵，他與我屢次會商國共合作問題，訂定整理黨務辦法，於五月十五日，提出本黨第二屆中央委員第二次全體會議。這辦法一共八點：

一、共產黨應訓令其黨員改善對於國民黨之言論態度，尤其對於 總理及三民主義，不許加以批評及懷疑；

二、共產黨應將國民黨內之共產黨員全部名冊，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保管；

三、中央黨部各部長須不跨黨者方能充任；

四、凡屬於國民黨籍者，不許在黨的許可以外，有任何以國民黨名義召集黨務會議；

五、凡屬於國民黨籍者，非得最高黨部之命令，不得別有組織及行動；

六、中國共產黨及第三國際對於國民黨內共產分子所發一切訓令及策略，應先交國共聯席會議

通過；

七、國民黨員未經准許脫黨以前，不得入其他黨籍；如已脫黨籍而入共產黨者，以後不得再入

國民黨：

八、黨員違反以上各項時，應立即取消其黨籍，并依其所犯之程度加以懲罰。

當鮑羅廷與我會商這個辦法時，對我的態度極爲緩和。凡我所提主張，都作合理的解決，同時我恪守國父的遺訓，不因聯俄而對共黨姑息和遷就。所以我們的會商能夠達到這八點的協定。

此時共黨奪取廣州基地的陰謀既已失敗，北伐的阻力亦告消失。五月二十一日，本黨中央全會發佈對時局宣言，決定北伐。這是我們中國國民革命成敗的關鍵，也就是本黨與共黨消長的分水嶺。」（註二二）

自中山艦事變後，直至北伐以前，這一時期，匪黨的策略，已由積極的進攻轉爲暫時的退守，以保存力量，準備再次的攻擊。這一策略的轉變係由於：第一，整個形勢對於匪黨不利。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日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議決案（見附錄二）中指出：「廣東方面，現在攬得政權者是武裝的中派，而全國則有右派的反赤運動，他們都向共產黨進攻。這種進攻之所以有可能，固然是因爲客觀政治形勢，大有變動（國民軍敗退北方，帝國主義軍閥反革命勝利，吳佩孚重登政治舞台與英國勾結，日本又扶起張作霖，并借中東路事件，反對蘇聯等等）然而，我們的黨自身亦作了些錯誤。」在「客觀形勢」「大有變動」對匪不利之時，匪黨策略乃轉變爲進攻中的退守，以避免損失，爲繼續的進攻積蓄力量。第二，係匪黨檢討已往政策錯誤的結果。匪黨決議案說：「國民黨右派以至中派之所以容易向我們進攻，提出要求我們退出國民黨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我們前次指導國民黨的方式錯誤

，實際上簡直使左派自己不參與黨務及反對右派的鬥爭，我們自己造成了國民黨與共產黨鬥爭的形勢。」「如果有些同志仍舊認為共產派應當包辦國民黨機關，自己佔領發展國民黨組織及黨部的工作，那麼這已經有廣東的經驗，證明這種觀念亦是錯誤的。」（註二三）匪黨由於操縱國民黨及發動中山艦事變之失敗，「自己造成了國民黨與共產黨鬥爭的形勢」，檢討結果，匪黨策略乃由明目張膽的進攻一變而為隱蔽滲入，幕後策劃，以遂行其挑撥國民黨自己反對自己的陰謀。第三，為第三國際指示。中山艦事變之後，第三國際代表鮑羅廷自俄返粵，一反其過去咄咄逼人的姿態，同意國民黨整理黨務案，勒令匪黨交出名單，轉飭跨黨份子辭去國民黨各部部长，約束匪黨黨員之言行等，足見第三國際鑒於匪黨羽毛未豐，力量不足，既不同意陳獨秀退出國民黨的主張，祇有採取讓步妥協暫時退守的政策，當時鮑羅廷說：「現在是共產黨應為國民黨當苦力的時代。」（註二四）

在第三國際這一讓步妥協的決策下，匪黨中央於六月四日為國民黨整理黨務案發出了「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委婉地敘述中共的態度，信中說：「貴黨『黨務整理案』原本關及貴黨內部問題，無論如何決定，他黨均無權贊否。凡為貴黨黨員者，當然有遵守之義務，而於貴黨黨外之團體，則殊無所關涉。至於『黨務整理案』中，關於以後兩黨合作方式之問題，則吾兩黨本為革命聯盟中之友軍，可各自根據其黨之議決以相協商，文函會議皆可。……」（註二五）按著匪黨四屆中央委員會，於七月十二日至十八日舉行了第二次擴大執委會會議。這次會議除匪黨中央政治報告（參閱第九章附錄一）及檢討已往錯誤外，并通過了十二項議決案，各項議案均以建立羣衆化的聯合戰線為骨幹，使聯合戰線深入羣衆

，壯大力量，準備再次的進攻。因此，以後的北伐進軍，匪黨又乘機猖獗起來了。

五、策略的爭論

在這一時期，即一九二五年八月至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以前，將近一年的期間，國共兩黨間進行著不斷的複雜的鬥爭。匪黨的策略是驅逐「右派」，利用「左派」，圖謀攫取廣東革命根據地，以掌握整個革命領導權。國民黨的政策則是遵行 國父遺教及其聯俄容共本旨，抵抗共黨內外挑撥和攻擊，鞏固革命根據地，準備北伐，以完成國民革命。在這一針鋒相對的政策下，國共兩黨再次的鬥爭，表現了如下特點：

第一，由於 國父逝世，國民黨一時失却領導中心，黨內不團結，加以共黨的分化，造成了內部的分裂，形成兩個中央的對立，削弱了國民革命的領導力量。

第二，由於國民黨內部分裂，及汪精衛爲共黨所利用，助長了共黨的野心，操縱國民黨二全大會，把持國民黨中央黨部，發動中山艦事變，企圖一舉而赤化廣東。

第三，由於共黨陰謀的暴露，提高了國民黨的警惕，先有戴先生與共黨作理論鬥爭，後有 蔣先生平定中山艦事變，再有整理黨務案對跨黨份子之限制，迫使匪黨不能不由猖狂的進攻轉入暫時的讓步和退守。

第四，由於大敵當前，帝國主義軍閥環伺廣東，國共兩黨均不願在這一連串鬥爭中破裂，維持又聯合又鬥爭的合作局面，而把鋒芒轉向北伐，以緩和內部矛盾，進而完成國民革命。

在這複雜鬥爭過程中，匪黨黨內也引起了一連串的爭論，爭論的重點集中於下列各個問題：

第一，爲國共合作的方式問題。自從「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小冊子發行以後，陳獨秀就主張共產黨人應即準備退出國民黨，聯合戰線的形式應由黨內合作轉變爲黨外聯盟，但第三國際代表堅決反對，并嚴厲加以批評。中山艦事變失敗以後，陳獨秀又主張退出國民黨，同樣爲第三國際所否定。陳獨秀說：「我在三月二十日事變後對國際報告中，陳述我個人的意見，主張由黨內合作改爲黨外聯盟，否則其勢必不能執行自己的獨立政策獲得羣衆的信任。國際見了我的報告，一面在真理報上發表布哈林（Bukharin）的論文，嚴厲批評中共有退出國民黨的意見，說：『主張退出黃色工會與英俄職工委員會，已經是兩個錯誤，現在又發生第三個錯誤——中共主張退出國民黨。』一面派遠東部長吳廷康（Gregory Voitinsky）到中國來，矯正中共退出國民黨之傾向；那時，我又以尊重國際紀律和中央多數意見，而未能堅持我的提議。」（註二六）後來史達林在攻擊反對派時也說：「他們（托洛茨基 Leon Trotsky — 季諾維也夫 C. Zinoviev —— 拉狄克 Radek）破壞了這個策略原則，企圖『跳過』中國革命運動的民族特點（國民黨），『跳過』中國人民羣衆的落後性，於一九二六年四月要求共產黨人立刻退出國民黨」，「這就是射遠了的策略」。（註二七）

第二，對國民黨二全大會的政策問題。既然第三國際嚴令匪黨不得退出國民黨，要保持與國民黨的黨內合作，因而匪黨中央的策略「乃是認凡半封建勢力的西山會議派爲右派，而以戴季陶主義爲中心的資產階級爲中派，採取向中派讓步，以孤立右派的策略」，「認爲當時革命形勢（郭松齡反奉失敗後）

，在全國各處都受到了打擊，因此必須向右派讓步以保持聯合戰線。」註（二八）於是「共產黨內右傾機會主義者在『領導』這次大會（按：指國民黨二全大會）中犯了嚴重的錯誤。……把戴季陶孫科等從上海召回來參加這次大會選舉他們爲國民黨中央委員。選舉的結果，三十六個中央委員中，共產黨祇有七人，……」（註二九）。可是，當中山艦事變之後，俄國顧問尼羅夫等却批評匪黨「公然攫取國民黨之最高管理機關，……以此引起國民黨大多數之不滿，」造成中山艦事變；這也就是批評匪黨在國民黨二全大會及大會前後，對國民黨的妥協讓步政策，還讓步得不够徹底。當時俄國顧問的這種意見恰好與匪黨史家對陳獨秀的批評完全相反，何是何非，連匪黨自己也莫之所云了。

第三，有關中山艦事變後採取進攻抑退守的策略問題。對此，匪黨前期的記述說：「在這一事變中，廣東黨與中央又有不同的意見：第一，討論這一事變發生的原因，廣東黨認爲是『當進攻而沒有進攻』的結果，中央的主張又確實相反，認爲是『當退讓而沒有退讓』的結果。第二個爭論就是對於三月二十號事變的策略問題。廣東黨認爲『退出國民黨就等於放棄廣大的工農勞苦羣衆，放棄革命的國民黨旗幟給資產階級，這就是莫可補救的損失，在這個時候應該採取暫時讓步的政策，以保留在國民黨之內，同時積極的準備着新的進攻，以繼續奪取領導權的爭鬥』。另外在上海有少數同志的意見，認爲三月二十號事變是莫大的恥辱，應該毫不猶疑的退出國民黨，當時中央的主張却是第三種意見：陳獨秀在當時提出來的有名的一句話，可以完全表現出當時中央的意見。就是『辦而不包，退而不出』。這一句話的意思說：三月二十號的事變是共產黨的急進政策，是想包辦國民黨的事逼出來的，所以以後祇應『辦而

「不包」；馬上退出國民黨是錯誤的，但是一定要向右派退讓，所以祇要『退而不出』。當時主張退出國民黨固然是錯誤的，可是陳獨秀的名言『辦而不包，退而不出』，却正是十足的表現了專一服役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的精神。」（註三〇）如果把陳獨秀這句「名言」和當時俄國顧問的報告細加比較，就不難瞭解，兩者係同出一轍，陳獨秀不過是傳播俄共和第三國際的指示而已。

不過，匪黨的後期記載則說：「三月二十日事件後，毛澤東等同志曾經主張……加以反擊，採取進攻的策略，……當時進攻的政策是可能勝利的，……但是陳獨秀機會主義者拒絕這樣做，總是強調聯合，不敢進行鬥爭。」（註三一）這種記述，顯然是出諸欽定和杜撰，因為第一，在所有匪黨黨史的前期記載中，沒有任何一種意見說是要採取進攻的策略，主張最激烈的也不過是退出國民黨而已。第二，當時毛匪正在廣東，廣東黨的意見不但不主張進攻，而且還要「讓步」。第三，俄共和第三國際代表不但不主張進攻，而且還馴服的接受「整理黨務案」中對匪黨的各種限制，毛匪的代理宣傳部長也聽令下台。第四，如果說：毛匪真有這種主張，那麼，這和俄共反對派托洛茨基等「射遠了的策略」又有什麼基本不同呢？何況這種「進攻」造成的分裂正是帝國主義和軍閥所希望的。

第四，關於國民黨整理黨務案的態度問題。對此，匪黨前後期黨史書刊的記載，祇列舉該案的內容，當時匪黨中央有無爭論，均未敘述。「中國共產黨歷史簡編」也祇是說：「在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上提出了限制共產黨的所謂『黨務整理案』……在這次會議上，由於共產黨的領導機關會前毫無準備，黨務整理案被通過」了。其實不是匪黨中央沒有準備，而是服從國際代表的指示：因為整理黨務案是鮑

羅廷直接與 蔣先生商定的，匪黨中央祇好服從聽命。會後祇有陳獨秀憤憤不平。對第三國際代表痛加斥責，他說：「國民黨中央議決共產黨分子退出國民黨最高黨部……我們都一一接受了；同時我們主張準備獨立的軍事勢力和蔣○○對抗，特派彭述之同志代表中央到廣州和國際代表面商計劃。國際代表不贊成，並且還繼續極力武裝蔣○○，極力主張我們應將所有的力量擁護蔣○○……來鞏固廣州國民政府和進行北伐。我們要求把供給蔣○○李濟琛等槍械，勻出五千枝武裝廣東農民，國際代表說：『武裝農民不能去打陳炯明和北伐，而且要惹起國民黨的疑忌及農民反抗國民黨。』這一時期是最嚴重的時期，具體的說是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公開的強迫無產階級服從他的領導與指揮的時期，是無產階級自己正式宣告投降階級服從資產階級，甘心作他的附屬品之時期（國際代表公然說：『現在是共產黨應為國民黨當苦力的時代』），黨到了這一時期，已經不是無產階級的黨，完全成了資產階級的極左派，而開始墮入機會主義的深淵了。」（註三二）

第五，對於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問題。據「中國共產黨歷史簡編」說：「黨內正確路線的代表者毛澤東同志於一九二六年三月，發表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這一傑出的著作」但是「被當時黨內領導者陳獨秀分子所拒絕」。并為該文之未能印成單行本或刊登於「嚮導週報」「新青年」而大抱不平。其實如果細加查考，類此階級分析文章，早於一九二二年七月，匪黨二全大會的決議宣言，及以後的「嚮導」「新青年」「前鋒」等匪黨刊物中，陳獨秀、彭述之、瞿秋白等的文章早已連篇累牘的不斷分析過，直到數年之後，毛匪才開始抄襲改寫為文，無怪陳獨秀要拒絕發表了。現在的匪黨史家居然譽之為「傑作」，不過是為神化毛匪吶喊而已。

註一：戴季陶「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重刊序言，中文本。原書於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三日於上海寫成，八月印行。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四日重刊，并作「重刊序言」。

註二：戴季陶「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導言。

註三：陳獨秀「給戴季陶的一封信」——一九二五年九月七日、十八日「嚮導週報」第一二九、一三〇期。

註四：中共北方區委「我們最近在北方國民黨工作中應取的態度」指示文件——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摘自「蘇聯陰謀文證彙編」，即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北京當局搜查蘇俄大使館所獲之文件彙編。

註五：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印發於上海。

註六：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會議決案。該會於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日至十八日舉行。摘自中共中央祕書處印發之油印原本。

註七：中共北方區委「我們最近在北方國民黨工作中應取的態度」。

註八：鄒魯「再告爭木」——一九二六年二月印行。

註九：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即西山會議）「爲取消共產派在本黨的黨籍告同志書」——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印行。

註一〇：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略」中文本一五八、一五九頁。

註一一：張國燾「一封公開的信致國民黨全體黨員」——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嚮導週報」第一三九期。

註一二：張國燾「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大會的教訓」——一九二六年二月十日「嚮導週報」第一四五期。

註一三：蔣總統「蘇俄在中國」中文本第一編第二章第十三節。

註一四：陳獨秀「中國革命勢力統一政策與廣州事變」，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嚮導週報」第一四八期。

註一五：華崗「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刊於一九三一年五月十日在上海出版之匪黨中央機關刊物「布爾塞維克」雜誌四卷三期。

註一六：致中「廣州事變之研究」——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嚮導週報」一四八期。

註一七：陳獨秀「給蔣○○的一封信」——一九二六年六月九日「嚮導週報」第一五七期。

註一八：蔣總統「校長宴會全體黨代表訓話對中山艦案有關的經過之事實」——一九二六年五月印於上海。

註一九：陳獨秀「給蔣○○的一封信」。

註二〇：斯切潘諾夫（Stepanoff）出席廣東蘇聯委員會團共產黨分部集會對於蔣○○與俄共產黨之裂痕及利用蔣○○計劃之報告（極要第十七卷第六六號）——「蘇聯陰謀文證彙編」。

註二一：斯切潘諾夫關於蔣○○與俄人衝突後俄人在廣東現時情形之報告（極要第十七卷第六六號）——「蘇聯陰謀文證彙編」。

註二二：蔣總統「蘇俄在中國」中文本第一編第二章第十三節。

註二三：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決議決案之一「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係問題議決案」——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日至七月十八日。

註二四：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

註二五：「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一九二六年六月九日「嚮導週報」第一五七期。

註二六：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

註二七：斯達林「時事問題簡評——關於中國」——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史達林全集」第九卷中譯本三一七頁，一九五四年四月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

註二八：華崗「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中的中國共產黨」。

註二九：何幹之主編「中國現代革命史」七七頁，一九五八年九月香港一版。

註三〇：華崗「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中的中國共產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布爾塞維克」四卷三期。

註三一：何幹之主編「中國現代革命史」七一八頁。

註三二：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

附錄一：我們最近在北方國民黨工作中應取的態度（摘錄）

（一）

幾個月來，在北方國民黨中反動的空氣非常濃厚，而且這種反動的勢力，有日漸集中的趨勢，這種現象我們可以從下列的事實中看出來：

1. 普遍的反共產與反蘇俄的宣傳；
2. 鄭奮與林森之北上及其反對廣東革命政府的態度；
3. 謝持等強佔北京執行部的舉動；
4. 新右派首領戴季陶等之北來，及最近在西山所召集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

（二）

以上所舉各種現象，證明國民革命的右派一天一天的右傾，而且右派勢力日漸集中於北京，但這種右派勢力的集中，不是右派勢力的發展，而反是右派勢力的縮小。

（三）

戴季陶主義所得的結果，不過是國民黨中形成右派：「舉起左手驅逐共產派，舉起右手打倒反動派」工作的原則而已。但此種原則不但不能使右派左傾，而反使其更往右傾，因為戴季陶理論的價值，除了供給反動派的一個武器，拿來打擊左派和共產派及軟化右派而外，便一文不值。所以自從戴季陶主義出現後，右派愈往右傾，甚至於聯合反動派來破壞左派與共產派的聯合。

(四)

右派勢力之集中於北方，並不是由於右派勢力發展而集中起來的，而是由於被革命勢力包圍的結果。因為右派的反動行爲，既不能容身於南方革命政權之下的廣東，又不能立足在中部無產階級組織堅強的上海，所以祇有跑到北方的反動政治中心的北京來，以維持其將死的生命。

(五)

北方尤其是北京的政治環境，既是全國反動的中心，又沒有堅強有組織的廣大無產階級的羣衆，所以一般城市的小資產階級，完全受反動空氣的包圍，政治觀念極爲模糊，自然很容易受戴季陶主義之影響。因此在北京國民黨中，除了極少數幾個老黨員外，實在沒有真正的左派，所有黨員沒有不是戴季陶主義的傾向。在這樣情形之下，反動派得了戴季陶主義如同至寶，乘機而入，拿了戴季陶主義，首先打破左派與共產黨的聯合，然後再拿著這個武器去威嚇製造這個武器的人，如現在反動派攻擊右派戴季陶等之事件，完全是這種勾當，但右派仍不自覺其理論之錯誤與危險，所以終被反動派所屈服而愈右傾。

(六)

北方雖然有幾個老黨員可以算是左派，但他向來少注意到羣衆的工作，不能在黨中形成有實力基礎的左派。另一方面，他們正因爲自己沒有抓住廣大羣衆和別種感情，對於右派反動的行爲，不取「一刀見血」的手段去反對，而還持觀望的態度，遊移不定。所以現在北方國民黨中鬥爭的形式，是陷於這樣狀況：右派已與反動派勾結起來，破壞革命的組織國民黨，而共產派在北方國民黨中尚未找著廣大堅強左派之聯合，以抵制右派反動的行爲。

(七)

在這樣狀況之下，共產派在國民黨中單獨的與右派作戰，這是非常之危險的。因為共產派這樣孤軍奮鬥的結果，但是不能把右派打倒，而使右派強大起來。因為如果共產派單獨的與右派作戰，一般短視的遊移分子，認不清這個鬥爭，是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而誤以為共產與反共產的鬥爭。所以現在我們在國民黨工作最高原則，當是要求在國民黨中形成廣大羣衆的左派，和左派與共產派的聯合戰線，從下層羣衆到上部機關，一致的反對右派勾結反動派來破壞國民黨基礎的行爲。

(八)

根據上列的原則，我們在羣衆中，在日常實際工作中，應努力進行下列主要的宣傳工作。因為必先在羣衆中具備反右派的空氣，方能實現形成廣大羣衆的左派，方能達到左派與共產派聯合戰線的目的。

第一、應該首先要使普遍的遊移的羣衆，明白戴季陶主義不是真正的中山主義，攻擊右派所號召的「左手打倒共產黨，右手打倒反動派」反革命的口號。

第二、應該揭穿最近右派勾結反動派，實行破壞國民黨的組織和違反紀律的行動。

第三、應該向羣衆解釋國民黨員對於共產黨的誤會，並表明共產黨黨員對於國民黨的態度，要使羣衆了解共產黨與國民黨在國民革命運動中互相的關係及合作的必要。(下略)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柏蔚(按：「柏蔚」係匪黨北方區委之簡稱代名)

(錄自「蘇聯陰謀文證彙編」)

附錄二：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係問題議決案

(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日至十八日中共四屆二次中央擴大執委會議決案之一)

一、廣州三月二十日事變，國民黨中央五月十五日會議，黃埔軍校六月七日又提出處置共產派問題，凡此一切都是

貫的，對共產派的進攻。廣東方面現時獲得政權者是武裝的中派，而全國則有右派的反赤運動。他們都向共產黨進攻，這種進攻之所以可能，固然是因為客觀政治形勢大有變動（國民軍敗退北方，帝國主義軍閥反革命勝利，吳佩孚重登政治舞臺與英國勾結，日本又扶起張作霖並借中東路事件反對蘇聯等等），然而我們的黨自身亦作了些錯誤。因此，我們一方面從中央直到支部，應當宣傳解釋此次右派及一部分中派國民黨，對我們的進攻是和帝國主義軍閥的反赤運動相呼應的，實質上確是反革命的行為。但是，別一方面，我們還要研究右派中派之所以容易利用最近政治形勢向我們進攻的原因，並且要設法消滅這些原因。

二、國民黨右派以至中派之所以容易向我們進攻，提出要求我們退出國民黨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我們前次指導國民黨的方式錯誤，實際上簡直使左派自己不參與黨務及反對右派的鬥爭，我們自己造成了國民黨與共產黨鬥爭的形勢，而使實質上是左右派之爭的性質隱蔽起來。同時，我們既使左派在政治上及組織上自己形成起來，當然國民黨的發展便因此遇見妨礙，不能充分吸收革命的知識分子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可是右派及中派都正利用機會而在這些分子之中發生影響。我們既沒有實行去年十月中央擴大會議的決定，我們自己各地黨部更加獨立行動及結合左派，與右派實行思想上組織上的鬥爭，我們因此也就沒有能充分的在羣衆中建立鞏固的基礎（工會、農民協會、學生會等），更沒有能在北方政治形勢惡化之後，以民衆革命化的勢力反對右派及武裝的中派之進攻。

三、去年中央擴大會議關於國民黨問題的意義是：一、我們留在國民黨裏與左派結合密切的聯盟，幫助他們發展國民黨，並且反對右派，但是我們自己不可以代替左派。二、我們自己的黨，政治上更加獨立起來。這種決議的理由，是因為我們看國民黨的性質是各種社會力量的政治聯盟（革命的知識分子，中等工商業的民族資產階級，手工業及小商人的小資產階級、農民和工人），並且仍舊認為國民黨的發展及我們參加國民黨的指導是中國革命勝利的前提之一。我們在國民革命中的策略應當更加明確規定：一方面我們黨應當更加緊在政治上表現自己的獨立，確立自己在工人及多數農民中的勢力，取得革命化的一般民衆中的政治影響；別方面組織這些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潮流而集合之於國民黨，以充實其左翼，更加以無產階級農民的羣衆革命力量影響國民黨，這樣去和左派國民黨結合強大的鬥爭聯盟，以與資產階級爭

國民運動的指導，如此纔能保證無產階級政黨爭取國民革命的領導權。所以現時我們在國民黨內的政策，應當是擴大左派，與左派的密切聯合，和他們共同的應付中派，而公開的反攻右派。

如果有些同志認為共產黨應當與國民黨完全脫離組織上的關係，現在就要消滅這一各階級聯盟的政黨，以為共產黨已經就能獨自領着無產階級，使其他被壓迫民衆跟着他來完成資產階級的民權革命。那麼，這種觀點是完全不對的，完全看錯了中國民族解放革命的遠景。主張現在就與國民黨脫離組織關係，而僅僅和他合作的理由，其實和國民黨右派及新右派（中派）要求共產派退出國民黨的理由是一樣的，這種傾向是表現最近一年來日益形成的資產階級要想奪取國民運動的指導。

如果有些同志仍舊認為共產派應當包辦國民黨機關，自己佔領發展國民黨組織及黨部的工作，那麼這已經有廣東的經驗證明這種觀點亦是錯誤的。因為國民黨現在的組織形式和他的社會基礎，本不適當，再加之以我們的佔領，自然因過分的集權而實際上變成狹隘的小團體，反使大多數革命化的小資產階級羣衆因散亂遊離而消失其力量。

這兩種觀點雖然恰恰相反，然而卻有同樣的政策上的錯誤。對於中國解放運動有同樣的危險，最終的結果是使共產黨及無產階級與大多數城鄉小資產階級隔離，實際上是將這些羣衆的指導交給大資產階級。

四、我們的黨裏現時所以有這些錯誤的傾向，因為最近形成的客觀形勢的確是非常之複雜。一年來無產階級及資產階級雙方的「自我形成」，必然直接反映於國民黨，這就是共產派與右派互爭對於中派及左派的影響。我們的黨所以現時應當格外對於國民革命發展的遠景有明顯的觀察，對於國民黨有確定的策略，須使中央對於共產黨與國民黨相互關係的觀點，真正能為黨員羣衆所了解而造成相當的正確觀念。

本次（一九二六年七月）中央擴大會議認為解決我們和國民黨組織關係的正當形式問題，雖然是下次大會問題，但是現在已經必須有下列的決定：

- (一) 實行去年十月擴大會議的議決，我們各地及廣東黨部的獨立行動。
- (二) 積極發展國民黨左派，同時改正以前來束縛左派及實際上不使左派管理黨務參與反對右派鬥爭之策略上的錯誤。

(三)積極發展左派的黨外羣衆的組織，尤其是城市資產階級之中（政治的俱樂部等），以這些社會團體擴大國民黨的基礎。

(四)我們應當使國民黨左派明瞭國民黨的組織不能是一階級式的集權的政黨，有太嚴格的紀律和章程，現在必須引進許多小資產階級革命化的羣衆於國民黨，所以黨的組織形式可以通融而寬大些，例如國民黨下級黨部至少要有政治俱樂部性質，使與羣衆接近，不必太側重於死板的章程，而自己束縛自己，例如革命的社會團體未始不可整個的加入，這樣則使國民黨成爲極大的羣衆的黨。

(五)我們應當和左派共同進行更實際的反對右派的經常鬥爭，暴露他們的妥協及賣黨賣民的罪惡，祇有這樣纔能使中派與右派隔離。

五、我們對於現時的國民黨的目前緊迫的責任，尤其以實行反右鬥爭爲最重要。我們在現在國民政府與國民黨中央及對廣東內外反革命勢力之鬥爭裏，雖然他們在中派指導之下，當然還要竭力贊助他們，我們同時應當有擁護勞動民衆利益的自己的政策，而且以這一政策做贊助他們的根本條件。

（錄自中共中央祕密印發之油印原件）

中共史論 第一冊

第九章 北伐期間的中共

一、兩種不同的北伐觀

國共兩黨再次的鬥爭，雖然複雜與劇烈，終因國民黨積極準備北伐，以及共產黨改取暫時退守的策略而緩和下來了。於是國民黨在擊破了共黨陰謀，消除了後顧之憂以後，於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便開始北伐進軍。當時的情勢和經過，蔣總統寫道：

「這時候北洋軍閥的勢力：吳佩孚所部號稱二十五萬人，據有河南、湖北，遠及湖南、四川、貴州，並結納兩廣殘餘部隊。孫傳芳亦擁二十萬眾，盤據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張作霖所部及依附奉軍之直軍魯軍，合計不下五十萬人，據有東北、熱河、察哈爾、及河北山東諸省。國民政府既已統一兩廣，尅期北伐，於是吳張妥協，共謀對付國民政府的北伐戰爭。孫雖以『保境安民』爲號召，其實他與直魯軍仍是彼此呼應，反抗我們北伐的。我國民革命軍無論兵力或財力，都遠不如北洋軍閥十分之一，北伐的任務之艱鉅是可以想見的。

民國十五年七月一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頒發北伐軍動員令。……北伐的第一步，是先行肅清湖南省境內的敵軍，以便會師武漢。七月九日國民革命軍誓師，並發表宣言，指出『革命戰爭之目的，在造成獨立之國家，以三民主義爲基礎，擁護國家及人民之利益』，號召全國軍人，共同爲國民革命奮鬥，並要求全國人民，共負國民革命的責任。七月十日，國民革命軍克復長沙。於是國民革命軍分三路

前進。中央軍爲第四軍、第七軍、第八軍，以武漢及武勝關爲作戰目標。右翼軍爲第二軍、第三軍、第五軍和獨立第一師，由我親自督師（按：蔣總統當時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以南昌及九江爲作戰目標。另以第一軍之一部由福建向浙江轉進，再會合右翼軍而以上海南京爲作戰目標。左翼爲第九軍，和第十軍，以荆沙爲作戰目標。十月十日，中央軍克復武昌。十一月九日，右翼軍克復南昌。國民革命軍聲勢之盛，進展之速，不僅使北洋軍閥爲之膽懾，亦且使世界爲之震驚。」（註一）

匪黨、俄共和第三國際，對於國民黨的北伐進軍持反對立場。最初，「自鮑回俄後，俄國軍事顧問團長季山嘉（Kissatka）忽在軍校會議中，極力宣傳北伐必敗之謬論。他對我面談的時候，反對北伐的意思，也逐漸暴露出來。廣州市面接連的播散傳單，反對北伐，並攻擊我個人爲新軍閥。最後季山嘉更是明目張胆，破壞本黨的北伐計劃。」（註二）這種反對北伐的重大決策，季山嘉當然不敢擅作主張，顯然是俄共及第三國際的指示。既係國際指示，於是陳獨秀張國燾等便紛紛爲文攻擊北伐。

最先是張國燾於六月三十日撰文稱：「目前高唱入雲的北伐問題，目的固然在於完成國民革命和建立統一全國的國民政府，同時卻也是抵禦反動勢力的南侵。無論是完成北伐事業，或是抵禦反動勢力的南侵，都必須先鞏固廣東內部，……不然，革命黨拿到了廣東，並不能把廣東弄好，這又有甚麼益處？如果北伐軍打到湖南，仍是不能肅清湖南的土匪和貪官污吏，打到湖北，也是一樣，那更爲危險；而且廣東有這班土匪和貪官污吏，廣東內部又怎能穩固呢？」（註三）張國燾把廣東目爲「土匪和貪官污吏」的世界，認爲如不加以肅清，便不能北伐，縱使「打到湖南」，「打到湖北」，「那更爲危險」，

其反對北伐的居心，已經躍然紙上了。

接著，陳獨秀以「論國民政府之北伐」爲題，正面反對北伐，他說：「北伐的意義，是南方的革命勢力向北發展，討伐北洋軍閥的一種軍事行動，而不能代表中國民族革命之全部意義。」「北伐祇是討伐北洋軍閥的一種軍事行動，還說不上是和帝國主義者直接的武裝衝突。」「若誤認北伐是推翻軍閥解放人民之唯一無二的希望，……這便是大錯。」「再論到北伐軍之本身，……若其中夾雜有投機的軍人政客個人權位慾的活動，即有相當的成功，也祇是軍事投機之勝利，而不是革命之勝利。至於因北伐增籌戰費而搜括及於人民，因北伐而剝削人民之自由，那更是犧牲了革命之目的，連弔民伐罪的意義都沒有了。」「在上述情形之下，……都可以看出革命的北伐時期尚未成熟。現在的實際問題，不是怎樣北伐，乃是怎樣防禦，怎樣防禦吳佩孚之南伐，……所以現時國民政府的職任，已經不是北伐，而是『防禦戰爭』，……全國民衆的口號，也已經不是響應北伐，而是『擁護革命根據地廣東！』」

（註四）

國民革命軍北伐誓師後的第四天，即七月十二日，匪黨四屆中委舉行了第二次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在這次會議上，匪黨的「中央政治報告」，仍舊認爲「南方國民政府之出兵，亦尙祇是防禦反赤軍攻入湘粵的防禦戰，而不是真正革命勢力充實的北伐。」（註五）因此，以擴大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發表的「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連「北伐」字樣也不願提到，足見匪黨對北伐是如何的消極和反對了。

直到九月十日，中共的「嚮導週報」才發表「我們的北伐觀」一文，彭述之在這篇長文中除重複陳獨秀張國燾的北伐觀點外，特別指出：「這次的北伐是反赤的直接影響，是反赤運動逼出來的」，「此次北伐雖然比以前進步了很多，可是還不能說是革命羣衆的軍事行動」，因為「北伐軍大部分是由小軍閥的軍隊投誠改名或改編的」，「黨的力量很薄弱，……實際上還是幾個軍事領袖的作用」，「羣衆的力量還很幼稚」，因此匪黨主張：「（甲）黨的權威應該在一切軍事領袖之上，在任何軍事領袖之上，以黨來支配一切。」「（乙）現在的國民政府是很軟弱的，有名無實的，……因此國民政府的政治領袖如汪精衛應使之趕快銷假復職，使政治上有所領導的重心。」「至於民衆此時對北伐的根本責任是：（一）盡力參加北伐，幫助北伐軍在客觀上達到儘可能的勝利；（二）在參加北伐中發展自身的力量，儘可能的建立自己的政治地位，取得應得的一切政治權利。」（註六）

從這裏可以清楚的看出，當時國共兩黨對於北伐存在著不同的對立觀點：國民黨以爲北伐的任務固屬艱鉅，但義無反顧，一往直前，「在造成獨立之國家」，「擁護國家及人民之利益」。共產黨最初遵照國際指示，以種種理由反對和破壞北伐，後來破壞不成，北伐軍節節勝利，轉而利用北伐，要「儘可能的建立自己的政治地位，取得應得的一切政治權利」，同時再施分化挑撥故技，利用所謂左派，假借「黨的權威」來厭制「軍事領袖」，並主張汪精衛「趕快銷假復職」。後來的「迎汪復職」運動，以及「打倒新軍閥」的叫囂，就是匪黨發動起來的。

二、中共中央的擴大會議

匪黨之所以積極反對北伐，自然不是偶然的，除第三國際的指示（表現於季山嘉之反對北伐）及匪黨三大大會以來反對國民黨偏於軍事行動之一貫主張外，還基於匪黨中央擴大會對於當時國內形勢之分析。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日召開的匪黨中央擴大會，在其「中央政治報告」（詳附錄一）中說：「去年十月擴大會至現在九個月的政治變動可分爲三個時期，我們均有不同的策略，這三個時期的分劃是自直奉戰爭至郭松齡反戈爲第一時期，自郭松齡失敗至國民軍退出北京爲第二時期，自國民軍退出北京至張吳會面爲第三時期。」「第一時期是軍閥政權動搖時期」，「第二時期是帝國主義者想消滅此革命高潮」，「第三時期的重要現象是一方面軍閥政權重新穩定」時期（註七），匪黨判斷當時是軍閥政權重新穩定時期，在此一時期北伐是沒有前途的，祇能進行「防禦戰」以自保。匪黨並沒有看見全國民衆的北伐要求，也沒有分析軍閥的腐敗崩潰以及革命軍之旺盛士氣，而貿然反對北伐，正如後來匪黨所說，那是過高估計敵人力量的「右傾機會主義」。

匪黨反對北伐的另一因素，就是「防止中派之發展」。匪黨中央的報告說：「所以我們對於國民黨的政策與對全國各階級的政策是一致的，就是我們聯合左派並逼中派向反動的右派進攻，同時防止中派之發展，迫其離右向左。」（註八）匪黨認爲當時的軍事領袖爲中派，北伐的勝利，必然是「中派之發展」，因而盡力加以阻撓，當其無法阻撓與破壞時，便欲利用左派，假借「黨的權威」來加以壓制，以

遂其「爭奪民族運動的領導地位」。

匪黨之所以反對北伐最主要的原因，還在於匪黨的力量不足，準備不夠，尤其自中山艦事變失敗以後，削弱了匪黨滲透軍中的力量，在北伐進軍中，無法掌握足夠的武力，以奪取革命領導權。同時匪黨的組織力量，還不能擔當「爭取這個民族革命指導權」的任務。所以匪黨擴大會之「中央政治報告」說：

「固然，我們的黨是發展了，但在發展中也包含了不少的缺點：

一、是黨員數量雖然增加，而質量確退化了，……。

二、是各級黨部自中央以至支部指導訓練的力量均不充分。

三、支部組織不健全。

四、理論宣傳非常缺乏，鼓動工作亦多不切實際，不能深入羣衆。

五、職工運動多祇是機關運動，沒有羣衆充實這一機關，……。

六、農民運動在各地均發生左傾的毛病，或提出口號過高，或行動過左，往往敵人尚未打著而自己已受很大的損失。」（註九）

這一報告說明，匪黨黨員數量雖經五卅運動之擴充，至一九二五年十月增至六千餘人，到一九二六年七月「本黨組織在數量上又發展了三倍以上」（註一〇），約近兩萬黨員，但由於質量的脆弱，尚不能適應北伐期中搶奪領導權的情勢，因而必須設法阻撓北伐，使之延遲。另一方面，以深入民衆爲中心，

展開「國民的聯合戰線」，以期壯大力量，追趕形勢的發展。所以在擴大會通過的職工運動議決案中說：「中國工人階級目前的主要職任，是領導全民族的解放鬥爭，工會與其他階級民衆團體建立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行動的聯合戰線，就是實現這一職任的唯一策略。」（註一一）在農民運動議決案中則主張建立鄉村的聯合戰線，並指出：「我們的黨要想領導中國民族解放運動順利的進行，就在取得這項農民的勢力，取得農民運動的指導權。」（註一二）而在軍事工作方面，則決議：「本黨是無產階級革命的黨，隨時都須準備武裝暴動的黨，在民族革命的過程中，應該參加武裝鬥爭的工作，助長進步的軍事勢力，摧毀反動的軍閥勢力，並漸次發展工農羣衆的武裝勢力，同時此項工作就是使本黨獲得有條理的準備武裝暴動的經驗。」（註一三）

這些便是匪黨反對北伐的真實原因。因而擴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主張」，把國民革命軍的北伐進軍地止一邊，祇顧號召中共自己的「國民的聯合戰線」，時局主張說：「國民會議的運動就是國民革命時代『國民的聯合戰線』之具體的表現，也就是國民革命時代自始至終一切運動的骨幹。」「現在本黨對於時局的主張，仍舊主張國民會議是解決中國政治問題的道路。因為國民會議及國民會議的運動無論在全國或在地方都是民衆聯合戰線之具體的表現。」（註一四）

北伐軍在前線作戰，克復長沙後，乘勝向岳陽武漢挺進，匪黨不但不去動員黨員號召羣衆支持前線作戰，反而在後方在全國大搞國民會議運動，其居心如何，已是昭然若揭了。

三、共產國際的決議

正當北伐軍乘勝前進並克復武漢南昌之後，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十六日，共產國際舉行了第七次擴大執行委員會會議，通過了「中國問題決議案」，在這決議案中指出：

「國民革命軍北伐勝利的結果，實際上掃除了帝國主義在半個中國的統治。為中國廣大羣衆所擁護的廣東革命軍之日後的勝利，將戰勝帝國主義，完成中國之獨立及革命的統一……」。

中國革命運動發展之連續階段，可以各種社會力量的改變結合來證明。在第一個階段裏，民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為主要推動力之一，……第二階段，……工人階級在中國鬥爭場上出現，成為最重要的政治因素。……現在革命運動已到了第三階段之門，正是階級新結合的前夜。在這階段裏，發展運動的主力，將是一個更有革命性的結合——無產階級、農人及城市小資產階級的結合，而離開一大部分大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領導權，將日漸落在無產階級身上。……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應該在策略上利用離開革命的各种資產階級間的衝突，猶如利用各帝國主義間的一切衝突一樣。……

中國革命的結果，……不會是純粹的資產階級的民權國家，而將成為無產階級、農民以及其他剝削階級的民權獨裁制的國家。他將成為過渡到非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發展時期中的革命的反帝國主義的政府。中國共產黨決定要用全力去實現過渡到非資本主義的發展之革命的前途。……

在現時革命發展的過程階段裏，土地問題開始緊急起來，成爲現在局面的中心問題。那個階級能够毅然攫住這個問題，而給以澈底的答復，這個階級就是革命的領袖。……………。

國民革命政府的機關，是接近農民很實際的道路，故共產黨必須利用這機關。……………共產黨離開國民黨的觀念是錯誤的。中國革命的整個發展過程，他的性質及其前途，均需要共產黨留在國民黨，並加緊在其中的工作。……………共產黨應當加入廣東政府。……………中國共產黨應使國民黨發展成爲真正平民的政黨——包括無產階級、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及其他能堅決反對帝國主義及其經紀人的被壓迫者等之堅實之革命聯盟。因此共產黨照以下幾點行動：

甲、有系統的堅決的反對國民黨右派及戴季陶思想，反對他們想把國民黨變成資產階級的企圖。

乙、形成左派，而與之親密合作，並不企圖以共產黨分子代替左派之領導工作。

丙、澈底的批評在左派右派之間搖動、在繼續革命或和帝國主義妥協之間搖動的中派。……………。

要在革命中占領導的地位，無產階級必需堅強其政治的經濟的階級組織。共產黨的第一任務，就是組織和訓練無產階級，使他能盡這個歷史使命。……………。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有組織的力量；他有領袖，他鍛鍊出中堅分子，他領導羣衆。現在中國共產黨的

工作，已經有很廣闊的範圍及穩固的組織形式。最近半年以來，中國共產黨又大進了一步，擴充了許多黨員，且多爲工人份子。共產黨的農人份子不多，但共產黨在農民中，現在已經有繼續不斷的日益增長的工作。……黨做了許多組織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工作……黨的基本工作之一是爭取黨的公開存在。……應當發展新黨員，應特別注意工業區域。」（註一五）

這就是第三國際當時對中國問題決議的重點，在這決議中，改變了以前對北伐的看法，否定了匪黨中央對北伐估計不足的判斷，同時也打消了陳獨秀屢次提出的退出國民黨的建議，著重指出在「中國革命的整個發展過程」都要「留在國民黨並加緊在其中的工作」。後來匪黨發動南昌暴動，仍然掛起國民黨的招牌，其根據即爲第三國際的指示。

在這一決議中指導匪黨「要在革命中占領導地位」，除「組織和訓練無產階級」外，必須「勇敢地接近土地問題」，並「全力去實現過渡到非資本主義的發展之革命的前途。」北伐期中的上海工人暴動，兩湖農民的「過火行動」，以及武漢政權的赤化就是這一決議的具體實施。

共產國際在這一決議中同時指示匪黨要「加入廣東政府」利用國民政府，「應使國民黨發展成爲真正平民的政黨」，採取「幾點行動」來分化國民黨，「應該在策略上……利用各帝國主義間的一切衝突……」。於是鮑羅廷和匪黨便利用左派在武漢組織「聯席會議」分化國民黨，製造南京事件，發起迎汪復職運動等等。

共產國際在決議中沒有提到軍事工作問題，不過史大林在通過「中國問題決議案」的這一次會議的

中國委員會上，曾以「論中國革命的前途」爲題發表了演說，在演詞中強調軍隊問題的重要。史大林說：「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中國共產黨人應當特別注意軍隊工作。第一，中國共產黨人應當盡力加強軍隊中的政治工作，竭力使軍隊成爲中國革命思想的真正的和模範的體現者……：第二，中國革命者，連共產黨人在內，應當著手深入研究軍事，他們不應當把軍事看做次要的事情，因爲軍事在中國現在是中國革命極重要的因素。……：以便逐漸前進，并在軍隊中擔任某些領導職務。……」（註一六）後來史大林在駁斥俄共反對派時又說：共產國際曾於一九二七年三月對中共發出指示說：「必須在軍隊中加強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支部工作，在沒有這種支部而又可能成立支部的地方，必須把他們成立起來，在不可能成立共產黨支部的地方，必須靠隱蔽的共產黨員加緊進行工作。必須堅持武裝工農，把各地農民委員會變爲擁有自衛武裝的實際權力機關等方針。」（註一七）在史大林這一指示下，匪黨對軍中的滲透工作，利用北伐進軍又發展起來了。後來南昌暴動的武力，就是匪黨滲透工作的成果。

共產國際通過了「中國問題」決議案之後，爲加強這一議案的執行，派譚平山回國（後來任武漢政權的農政部長），并增派羅易（M.N. Roy）來華，與鮑羅廷同爲「國際代表」指揮匪黨的活動，足見莫斯科對「中國問題」的重視了。

四、南京事件與上海暴動

由於北伐軍進展神速，國民黨人士的注意力集中到前線和新收復地區，對於遠處後方的廣州無形放鬆了，於是鮑羅廷又乘機施展其分化手段，拉攏一部份國民黨中央左派人士，前往武漢，於十二月十三日組織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的「聯席會議」，推徐謙爲主席，執行所謂「黨的最高職權」。十二月三十一日，當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由廣州遷抵南昌後，武漢的「聯席會議」抗不撤消，而且否決南昌中央的決議。一九二七年三月十日，又在漢口召開國民黨三中全會，改組國民黨中央和各軍政機關，牽引共黨人員參加中央和省級政府，組織了鮑羅廷和匪黨所操縱的武漢聯合政權。

在這一情勢下，國民革命軍右翼軍，依然照原定作戰計劃向長江下游前進，以克復南京上海爲目標。當北伐軍擊潰了敵軍進佔南京時，發生了「南京事件」，事件發生經過和原因 蔣總統指出：「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國民革命軍克復南京，南京市內忽發生軍人侵入英美領事館，殺害館員，同時又有侵入教堂殺害外國傳教士之事。當北伐軍事開始之時，我以總司令名義於十五年八月二十日發表『對外宣言』，剴切聲明『中正躬行北伐，不止統一中國，實爲完成世界和平。無論何國人士，能不妨礙國民革命之行動及作戰者，一切生命財產，中正皆負完全保護之責』。所以國民革命軍的部隊，無論到了長沙、漢口、或是九江、杭州，從來沒有違令殺害外人的行爲。現在南京竟發生這種暴行，顯然是部隊中的共黨分子，製造事變，企圖激起列強與國民革命軍的直接衝突。」（註一八）

「南京事件」發生之初，衆說紛紜，有謂爲北方敗軍所爲，有謂是反動份子所煽動，其實都不是；後來調查結果，證明是匪黨製造對外糾紛，中途破壞北伐的又一陰謀。如果從下列文件和事實加以研究

，就不難瞭解匪黨陰謀所在了。

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中說：「當此時際，無產階級應該很廣泛的利用現時在事實上還作反帝國主義反軍閥鬥爭的各種資產階級。另一方面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應該在策略上利用離開革命的各種資產階級間的衝突，就如利用各帝國主義間的一切衝突一樣。」故必須打擊帝國主義在中國勢力之根基。取消不平等條約與收回租界，尚不足削弱帝國主義之地位，必須從經濟上打擊帝國主義勢力的基礎。」這一指示的眞意，就是要採取進一步的直接的反帝行動，來打擊帝國主義，以挑起國民黨與列強間的衝突。匪黨人員就是按照這一直接行動製造矛盾的指示而掀起南京事件的。

共產國際擴大執委會之後，莫斯科根據國際執委會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發出了對駐華武官的訓令（見附錄二），訓令中說：「必須設定一切方法激動國民羣衆排斥外國人，爲達到此種目的起見，必須設法獲得各國對於國民羣衆之適用武力戰鬥。爲引起各國之干涉，應貫徹到底，不惜任何方法，甚至搶掠及多數慘殺，亦可實行。遇有與歐洲軍隊衝突發生時，更應利用此種機會，實行激動。」匪黨人員正是採用搶掠慘殺手段製造南京事件，并引起英美軍艦砲轟下關及城內，達到了「適用武力戰鬥」的目的。

根據莫斯科的指示，陳獨秀曾經大肆攻擊英國，并以質問的口吻尖銳的提出：「以上是英帝國主義者軟的進攻。我們怎樣抵禦他的進攻呢？一直到今天，我們還并未打算現在即與帝國主義者直接的武裝衝突，更不主張加害於任何外國的或個人私人機關（商店工廠教堂醫院學校等）……。」（註一九

（）這無異號召共黨黨員直接行動與英國武裝衝突并「加害」外國人。「南京事件」之殺害外國館員與傳教士，顯然是匪黨當時的政策及其號召的結果。

南京事件係於程潛的第六軍進入南京後發生的，事後根據各方調查，肇事者操湖南口音，且穿國民革命軍制服，其為程部所為，殆無疑義；當時共黨要角林祖涵任程部第六軍副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程潛與林祖涵關係素密，第六軍之共黨份子乃乘機煽動事件，以圖激起列強之干涉。其時鮑羅廷且欲煽動六軍二軍叛變，竊據南京，後為形勢所迫，陰謀失敗，程潛林祖涵乃相率離京赴漢。（註二〇）足見南京事件，係匪黨在鮑羅廷策劃下有計劃的陰謀。

當國民革命軍向滬寧推進時，鮑羅廷所操縱的武漢政權，曾擬訂外交政策及「訓令上海民眾文」，文內「單獨指出保護日本僑民」，武漢中央政治委員會研討此一文件時，決定「照原文加：因日本并非無派兵到上海，故對於日僑特別保護意」。（註二一）南京事件發生後，鮑羅廷說：「現在假定英已準備干涉，美或中立，或贊助英日；如果我們有適當的方法，可以使她不致同英美聯合。所以在危急局面時，要有一定的政策。用那個政策，可以使英日分離，可以使帝國主義分化。……：我曾接日本財政界名人正金銀行的加能來電，說日本人民很願意同中國人民有公開的諒解。所以我對陳部長（按：指陳友仁）保護日人生命財產安全的提議很表贊同。」（註二二）此一文告及鮑羅廷的意見與莫斯科致駐華武官的訓令：「務使日本僑民無被害之人」完全相符。可見南京事件不僅為匪黨掀起列強干涉之陰謀，且為分化帝國主義，「保存各國間之不協調」，「故令日本與各國隔離尤為特別重要」（註二三）的策

略。

南京事件前兩日，上海工人舉行罷工和暴動。上海工人前後爲響應國民革命軍的進軍，有過三次的罷工和暴動：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國民黨黨員鈕永建，策動上海工人罷工起義，旋遭駐軍鎮壓而失敗。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八日，北伐東路軍佔領嘉興，十九日上海工人又舉行五日之總同盟罷工，若干地區工人試行奪取武裝，與警署發生衝突，結果又歸失敗，二十四日乃結束罷工。三月二十日北伐軍到達上海郊外龍華，上海垂手可得，因上海之直魯軍畢庶澄接洽投降，而暫緩進入上海。上海工人聞悉北伐軍到達龍華，即於二十一日午開始總罷工，接著與軍警巷戰，二十二日下午國民革命軍直趨上海，擊潰直魯軍佔領上海。

當時中共的「嚮導週報」曾作如此的記載：「三月二十夕，國民革命軍佔領逼近上海之龍華。但國民革命軍預奉有令，令避免與上海租界帝國主義之衝突。佔領龍華後革命軍的策略，尙欲納降擁有雄厚兵力的畢庶澄率領下之直魯聯軍。但畢庶澄欲有上海而降，降而求爲革命軍軍長之一。」（註二四）此一記載對於國民革命軍之延遲一日進攻上海，似有怨言，該報又說：「當各處行動開始後，總工會代表乘汽車至龍華請兵，國民革命軍東路前敵軍白崇禧總指揮方遲疑間，又接駐滬軍事特務委員鈕永建報告，請緩一日進兵，以待畢庶澄投降。總工會代表涕泣力請，最後第一師師長薛岳始率全師進攻。」（註二五）

平情而論，國民革命軍之佔領上海，係指顧問事，上海工人之有無暴動，已無關宏旨，所以國民黨

在滬之工運領導人鈕永建（曾領導第一次暴動）主張待敵軍投降，以便和平進入上海。但中共則搶先發動罷工和暴動，其目的不外奪取直魯軍槍械，以武裝工人糾察隊，建立赤色政權，并進而「引起各國之干涉」，以貫徹莫斯科之訓令；幸而國民革命軍及時趕到，否則又將發生類似之「南京事件」矣。

五、國民黨的清黨運動

自南京事件及上海暴動以後，東南各省，國共兩黨關係，到了劍拔弩張的階段。尤其在上海，暴動中，共黨已武裝了二千七百名的糾察隊，（按：據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嚮導週報」一九四期載稱，糾察隊二千七百名，共有槍一千七百餘，機關槍連手機關槍數十架），正籌組上海市政府，準備掌握上海政權。在這緊張關頭，四月一日汪精衛回到了上海。

早在一九二六年九月，匪黨「嚮導週報」就主張「汪精衛應使之趕快銷假復職」，隨後若干為共黨把持的國民黨黨部亦電請「汪主席銷假視事」，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五日，在廣州舉行的而為共黨操縱的「中央暨各省市黨部聯席會議」，正式決議「迎汪復職」，至一九二七年二月八日，武漢政權再次電請汪氏回國，汪精衛乃經莫斯科取得蘇俄之支持後返國。

汪精衛到上海後，經吳稚暉先生等規勸勿去武漢，免被鮑羅廷利用，惟汪氏當予拒絕，且兩度與駐滬之共黨首領陳獨秀洽商國共兩黨關係問題，四月五日與陳獨秀發表聯合宣言後即行赴漢。

「汪精衛陳獨秀聯合宣言」(見附錄三)之發表，窺其原意，似在緩和當時國共兩黨間之緊張空氣。從宣言觀察，汪陳間協商之交換條件，似爲：第一，陳獨秀聲明不實行「無產階級獨裁」而建立「民主獨裁制」；汪精衛則把孫中山先生的容共政策改爲「聯共」政策，承認國共兩黨的平等地位。第二，陳獨秀聲明贊成「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政策」，不「單獨衝入租界」；汪精衛則主張「決無有驅逐友黨摧殘工會之事」。這一宣言之發表，同時也表明汪、陳共同支持武漢政權，反對東南國民黨諸領袖之政策，因而宣言發表後，不但汪精衛匆匆西行，陳獨秀及匪黨中央亦隨即遷往武漢。

汪陳宣言之發表，提高了共黨的地位，好像國民黨已由容共一變而爲聯共，因而受到了國民黨人員的反對。當時「國聞週報」有如此的記述：「滬訊：四月五日午前，汪君精衛……蔡君元培、李君石曾、吳君稚暉，開一談話會於滬海道道尹公署樓上，所談預先聲明暫不公佈。惟吳君報告：因今日報紙登載國民黨共產黨兩首領之宣言，外間誤會者甚多，以爲從此中國歸兩黨共同治理，信有之乎？汪君大笑，以爲那讀報的太不辯文字了。……吳君又補充幾句說：我們國民黨黨員，止有老實不客氣說治理中國，止有國民黨，沒有聯了共產黨來共治之可能。……聯共二字，本不見條文，我們國民黨之條文上，止有容納共產黨員入國民黨而已。……。」(註二六)

另一方面，陳獨秀好像討了便宜，但後來被共黨內部斥爲「可恥的聯名宣言」。匪黨的中央機關刊物寫道：「當時共產黨領袖陳獨秀竟和國民黨左派領袖汪精衛發出那種可恥的聯名宣言(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汪陳宣言)。因此有人說，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合作，可以說是以一九二三年『越飛與孫中山的宣

言」始，以「汪陳宣言」終。」（註二七）其實「孫越宣言」之蘇維埃制度不能引用於中國，和「汪陳宣言」之不實行無產階級獨裁制，又有甚麼不同呢？

汪陳宣言發表後的第二日，即四月六日，北平軍警搜查蘇俄駐華使館，俄館員聞警，趕緊焚燬文件，湮滅證據。軍警見武官室起火，乃往搶救，在烈火中搶出文件千餘卷，後經摘譯三百件，整編為「蘇聯陰謀文證彙編」，其中有「蘇聯在華密探局組織法」、「系統表」、「經費預算書」等等。這些蘇俄情報機關本身編組之極機密文件，暴露了蘇俄的惡毒陰謀和匪黨的漢奸面目。機密文件說明下列事實：

等一、蘇俄對中國之援助，不但完全為蘇俄本國利益着想，且以中國為預定之敵國。「密探局組織法」之「宗旨」一節中說：「（甲）須認定蘇聯與日本及中國有戰爭之可能；（乙）須認定中國國民革命運動能以發展，因之歐洲帝國主義國家及新大陸不致與蘇聯以封鎖。」（註二八）

第二、蘇俄派至馮玉祥之國民軍及國民革命軍中之顧問技師，同時又係蘇俄情報工作人員。關於密探局分支機關之掩護問題，該「組織法」稱：「又如廣東俄國技師顧問，能與該司令部（按：指蘇俄西伯利亞軍司令部）有直接關係者，分機關於即可藏匿彼處，以資保障。」「國民軍中之顧問技師，係遵照大使館武官處給予之方針，單獨工作，……：……吾等探員辦理事項，或假借顧問技術等名義。……：……」（註二九）

第三、第三國際不但為俄共傀儡，同時又是蘇俄情報機關運用之機構。該「組織法」規定「在當地

之工作，必須與大使館及大使館武官處（指導機關）及國際共產黨部三處之動作一致。」「六、與國際共產黨機關部之關係：共產黨各機關部，須在當地隨時協助本局分機關部尋覓祕密住所，幫同搜羅探員，其軍務處亦須時時與本局各分部接洽，互換軍事材料，接洽方法須斟酌當地情形，祕密辦理。」（註三〇）

第四、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左派人士充當蘇俄情報人員，成爲蘇俄密探局之有力工具。該「組織法」，在「密探之分類」中指出：「在中國本地物色密探人員頗感困難，因此須先由中國共產黨或中國國民黨左派內挑選曾受過教練，且有經驗之同志，自願充密探者三十人，至少須使彼等傳習一月或兩星期，以備在各要地充密探分團長或密探員之用。」在「實行擬定計劃之時期」一節中又稱：「現在應設速成科三處，每科十人，徵集強健之國民黨人或華籍共產黨人入學，以便造成外勤分部密探長，或各密探分機關之密探員。」（註三一）在擴充大連密探範圍之函件中又說：「當地（按：指大連）之中國共產黨機關職員，現已增至一百七十人，於工作上定能得力，……故爲擴充南滿線密探團起見，中國共產黨機關想能爲吾人引用較爲可靠之人員。」（註三二）

第五、蘇俄情報經費，用之於中國者爲數甚鉅，而中國共產黨之軍事工作人員直接向密探局領取薪俸，成爲標準之漢奸。蘇俄密探局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半年度在中國軍事政治工作經費預算書列明：「（甲）對於中國全部之經費總額共計美金九三三八三元。」其中第八項開列「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人員薪俸五〇〇〇〇元」美圓。「（乙）對於馮玉祥軍隊之經費總共計美金一四八八三〇元」「（丙）對

於國民二軍三軍之經費總共計美金一四一二四〇元。」「(丁)對於廣東方面之經費，總共計美金三八三九三三元。」半年度總預算爲七六七八六六美元。(註三三)

北平軍警當局搜查蘇俄使館，機密文件完全公開，使蘇俄陰謀及匪黨面目暴露無遺。而國民黨之清黨運動亦適於此時開始，經過情形，蔣總統寫道：

「國民革命軍佔領了上海。我即於三月二十六日由九江進駐上海，親自鎮懾這遠東第一個國際市場，免爲武漢之續。四月十二日，爲了防制共黨的暴動，我軍與當地的工會及商會合作，收繳赤色工人糾察隊的槍械，監視共產煽亂分子，上海遂得歸於平定。

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業於四月二日在上海召開全體緊急會議，由蔡元培先生主席。吳敬恆先生提出共黨謀叛證據案，出席各委員亦報告共黨在湘鄂贛浙皖及上海各地，受共產國際指示，破壞革命，擾亂社會的違法事實。會議乃一致決議，咨請中央執行委員會，採取非常緊急處置，將各地共黨首要危險分子，就近知照治安機關，分別看管，制止活動。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隨即決議清黨。五月五日，中央常務委員及各部部長聯席會議通過清黨原則，并組織清黨委員會，執行清黨工作。南京、上海和廣州各地都積極進行全面肅清共黨分子，社會秩序得於保持，而東南各省纔算沒有替俄國布爾雪維克做試驗場，更沒有爲莫斯科俄黨內爭做犧牲品。

四月十八日，本黨中央常會及國民政府委員會，秉承 國父的遺志，定都南京，國民政府各機關即日在首都南京成立。」(註三四)

這樣，共黨操縱的武漢政權便與國民黨的南京政府對立起來，在民國史上稱之爲寧漢分裂。

國民黨在東南各省的清黨運動，給中共以致命打擊，共黨則以更急速的步伐來赤化武漢政權，以圖挽回失敗的命運。

六、中共的檢討和爭論

國民革命軍北伐的迅速勝利，以及全國革命運動的蓬勃發展，這種汹涌的革命怒潮，考驗了匪黨的工作和政策，把中共拋在形勢發展的後面，因而造成了共黨內部決策的論爭。

首先是關於北伐的估計問題。中山艦事變以後，共黨國際和匪黨採取了暫時退卻的策略，七月十二日召開的匪黨中央第二次擴大執委會，便是這一退卻策略的總結。這一會議全部決議的基本精神，是以穩紮穩打的政策來開展工作，以保持又團結又鬥爭的聯合戰線；對於七月九日國民革命軍的誓師北伐，做了「防禦戰」的錯誤估計，進而公開反對北伐。匪黨的反對北伐，不僅僅是反對國民黨的政策，同時也是反對全國人民呼籲北伐進軍的要求，使匪黨脫離了羣衆，落入「機會主義的泥坑」。可是在事後，匪黨的史家却認爲匪黨中央是正確的，錯誤的祇是陳獨秀個人。他們初期這樣說：「一九二六年七月國民革命軍的北伐是完全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就是當時北伐的最有力的主動者，……但當時陳獨秀個人卻反對北伐，違反中共中央的決定，在『嚮導週報』上發表論北伐一文，對於時局有了很錯誤的估計，對於北伐採取消極的態度。這是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思想表現的一方面，是完全錯誤的。」（註三

五) 後期他們也有類似的說法：「一九二六年七月，中共中央發表了對於時局的主張，號召全國工農商學兵團結起來，鞏固革命的民族統一戰線，推翻國內軍閥和帝國主義的統治，因而積極推動廣東革命政府進行北伐戰爭。但是陳獨秀當時却違反黨中央的決定在『嚮導週報』上發表了『論國民政府之北伐』一文，過低估計了北伐戰爭的意義，認為北伐條件還沒有成熟，當前任務不是北伐而是防禦，……」

「(註三二六)最後，共產黨人居然自我表功寫道：「北伐——這是在中國共產黨推動下進行的戰爭，……對於戰爭的勝利，共產黨是起了決定的作用的。」(註三七)

共黨史家的前期與後期的這些說法，顯然是對史實明目張膽的歪曲。因為：第一，當時中共中央沒有任何一項決定或任何一篇文字說要支持北伐，而成爲「北伐最有力的主動者」，相反的，七月九日北伐開始了，七月十日北伐軍就佔領了長沙，七月十二至十八日的中共中央擴大會還說這是「防禦戰」，擴大會的「中央政治報告」以及十二個議決案，都沒有提到任何有關北伐問題。第二，誠然，七月十二日匪黨曾以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名義，發表了對於時局的主張，佔了「嚮導週報」的全期，成爲該報一六三期的專刊；當時北伐軍佔領長沙後，正向岳陽武漢挺進，可是在這一時局主張裏，連「北伐」字樣也沒有提到，而祇是主張開國民會議。前線在浴血奮戰，後方鬧開國民會議，難道說這就是推動北伐戰爭？第三，由於中共中央對國內形勢估計的錯誤，認爲第三時期是軍閥政權重新穩定時期，因而陳獨秀便代表中共中央撰文反對北伐，陳獨秀是當時中共中央的總書記，那有違反中央決定的道理，而且陳獨秀反對北伐的論文於七月七日發表後，中共中央二次擴大會才召開，在會議中，「中央政治報告」及會議

議決案的精神和內容，與陳獨秀反對北伐論文的觀點也是一致的，所謂「違反黨中央的決定」，真不知從何說起？第四，當然，在北伐戰爭中，軍中的共黨人員和國民黨黨員一樣是有犧牲的，可是要知道，這些人同時又是國民黨黨員（當時稱爲跨黨份子），而且這些人之參加北伐，除國民革命以外，還有另目的，北伐過程中所發生的南京事件，上海第三次暴動，「過火」的工農運動，以及武漢政權的對立，便是這些跨黨分子目的之所在，這怎能說是「對於戰爭的勝利」「起了決定的作用」？相反的，這是對北伐最大的阻撓和破壞。由此可知，對於北伐問題，匪黨史家現在的論點，是把當時匪黨反對和破壞的醜態推給死了的陳獨秀，爲匪黨遮羞；以便篡改史實，說匪黨是「最有力的主動者」，「起了決定的作用」！

其次是關於農民運動與「資產階級」問題。從北伐開始至一九二六年底，匪黨中央對於農民運動和土地問題，的確是採取小心謹慎的保守與緩和政策。因而在第二次擴大會的政治報告中，批評農民運動「發生左傾的毛病」，在農民運動的議決案中，則主張建立鄉村的聯合戰線。於是現在的匪黨史家就大肆咆哮的說：「一九二六年七月黨召開了第三次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會議（按：根據當時中共中央秘書處印發並加說明的議決案油印原件，稱爲第二次擴大會，而非第三次擴大會），這次會議通過了陳獨秀所寫的決議案，這是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思想發展到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標誌。陳獨秀所提出的『鄉村聯合戰』，主張農民協會的組織不能帶有『階級色彩』，農民協會除貧農雇農中農以外，還包括中小地主在內。……」（註三八）可是匪黨史家却忘記了：中山艦事變後整個退守策略正是共產國際的指示

，到了十月，共產國際還指示中共「暫時不應當加強土地運動」。後來史大林與俄共反對派鬥爭時，被逼承認了這一指示的錯誤，他說：「加米涅夫（Kamenev）和季諾維也夫（Zinoviev）在這裏引證了一九二六年十月發往上海的一封唯一的電報，電報中說：在佔領上海以前，暫時不應當加強土地運動。我絕不承認這封電報是正確的。我從來沒有認爲並且現在也不認爲共產國際是毫無過錯的。個別的錯誤是會有的，而這封電報無疑是錯誤的。」（註三九）到十一月底至十二月半，共產國際通過了「中國問題決議案」之後，莫斯科的訓令中還是說：「吾人已向鮑羅廷嚴重訓令，暫時停止對於資產階級之過激手段。張作霖失敗以前，應抱定自己之宗旨，即在國民黨內暫時保留國民之各種階級，資產階級亦應保留。」（見附錄二）共產國際公開的決議如彼，祕密的指示又如此，前後矛盾，使匪黨無所適從，難怪陳獨秀要成爲機會主義者了。類此錯誤的指示，史大林都承認了錯誤，匪黨史家爲甚麼還沒有勇氣批評批評共產國際和俄共呢？

再次是匪黨路線的貫徹問題。既然匪黨對北伐是消極的、反對的，而陳獨秀的整個路線又是機會主義的，那麼，如何解釋北伐期中匪黨「決定的作用」之「功績」呢？於是聰明的匪黨史家就說：「不過在這個時期，他的（按：指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的理論和綱領，還沒有能貫徹到全黨的實際工作中去，當時全黨的實際工作者，並沒有按照陳獨秀的錯誤綱領辦事，而是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按照以毛澤東同志爲代表的正確主張辦事，所以羣衆鬥爭和革命規模仍然向前發展。」（註四〇）其實客觀的史實絕非如此，應知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執委會係於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六日閉幕的，共產國際的指示（中

國問題決議案）最快也要到十二月底才能到中國，傳達到「實際工作者」的手中，應是一九二七年一月或二月了，（後來事實證明，共產國際指示，遲至五月一日召開的五全大會，匪黨才加以討論和接受）何況接着又有莫斯科的訓令，這一訓令恰好抵消了共產國際的決議，使「實際工作者」無所適從，何能「按照」指示「辦事」呢？至於毛匪澤東，於中山艦事變失敗及整理黨務案通過後，便到了上海，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小小的祕書，一切聽命陳獨秀，何來「正確主張」，又何能發佈「正確主張」？毛匪所寫的，現在被譽為「經典文件」的一篇「湖南農民運動考查報告」，係以「長沙通信」方式，發表於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嚮導週報」一九一期，「實際工作者」對於這篇無關重要的地方通訊，有無注意還大有問題；在時間上，東南各省就要清黨了，縱使照這「正確主張辦事」，也來不及了。可見在這期間，匪黨全黨的「實際工作者」祇能聽命陳獨秀，照「機會主義路線」「辦事」，而不會照「長沙通信」「辦事」的。

再其次是關於上海暴動的配合問題。匪黨史家對當時的國民革命軍，也作了惡意的中傷。他們說：「這時由反動派白崇禧所率領的北伐軍停止進攻上海，坐視上海工人單獨同孫傳芳軍隊作戰，期待兩敗俱傷。」（註四一）又說：「然而當時白崇禧却……按兵不動，讓北洋軍閥去削弱工人的力量。」（註四二）事實究竟如何呢？最好的辯證便是當時中共自己的「紀實」，「嚮導週報」說，當時直魯軍畢庶澄決定投降。因此，工人如果不暴動，北伐軍可以不戰而入上海，延遲一日進攻，目的在於納降，這又有什麼不對呢？何況在工人代表請求下，「最後第一師師長薛岳始率全師進攻」。（註四三）這是當

時中共上海工運負責人趙世炎的「紀實」，而且刊登於「嚮導週報」的反證，可是現在的匪黨史家，却把「全師進攻」有意歪曲爲「按兵不動」了。

最後是上海暴動以後的政權建立以及清黨問題。匪黨內部對此也有不同的看法和爭論。有的說：「起義後，由共產黨的發動召集了上海市內及其四郊，發動最廣大的民衆選舉運動以從事於這政府的建立，……行這事業中，沒有能在上海市內及其四郊，發動最廣大的民衆選舉運動以從事於這政府的建立，……忙著拉攏資產者的代表參加市民政府。……機會主義的領導者，沒有找到資產者的代表，所以市民政府祇是形式上的成立了，而沒有切實進行任何工作。」（註四四）有的說：「陳獨秀不去發動羣衆來支持這個政府，反而恐怕政府中沒有資產階級的代表就不能進行工作，而無原則地無立場地去拉攏他們，……四月五日陳獨秀和汪精衛發表了所謂聯合宣言，在這個宣言上沒有一個字指責反革命的陰謀，……。」（註四五）關於國民黨的清黨運動，也作了嚴厲的批評，匪黨史家指斥稱：「如果革命在苦迭捷（Coup d'état）的陰謀前面，能事先進行警戒，……即使不能防止苦迭捷的發生，也將給苦迭捷以有效力的抵抗，……陳獨秀機會主義者事先既完全解除了革命的警戒，事後又完全解除了真正的革命準備，這就是他罪惡的繼續。」（註四六）

陳獨秀的說法則與匪黨史家的批評完全不同，他說這是共產國際的主張，共產國際駐上海的遠東部認爲上海暴動如成功，政權應屬於資產階級，同時在國民黨清黨前面，共產國際電令將工人的槍械埋藏起來，所以陳獨秀曾理直氣壯的寫道：「同時上海工人將近要起來暴動驅逐直魯軍，暴動如成功，必然

發生政權問題。此時我在中央擴大會議政治決議案中提議：中國革命有兩條道路：一是由無產階級領導始能貫徹目的；一是由資產階級領導，必然中途背叛革命；我們此時雖然可以與資產階級合作，同時要奪取領導權。國際駐上海的遠東部一致反對我的意見，說這樣的意見會影響同志們過早的反對資產階級，並且肯定的說上海暴動如成功，政權應屬於資產階級，工人不必有代表參加；那時我又因他們的批評，而未能堅持我的意見。一九二七年北伐軍佔領上海前後，秋白（按：指瞿秋白）所重視的是上海市政府選舉及聯合小資產階級（中小商人）反對大資產階級；彭述之、羅亦農和我的意見以為：當時市政府選舉及就職並不是中心問題，中心問題乃是無產階級的力量若不能戰勝蔣○○的軍事勢力，小資產階級不會傾向我們，蔣○○必然在帝國主義指揮之下屠殺羣衆，那時不但市政府是一句空話，勢必引起我們在全國範圍內的失敗；因為蔣○○如果公開的背叛革命，決不是簡單的他個人行動，乃是全中國資產階級走到反動營壘的信號。當時由述之親到漢口向國際代表及中共中央多數負責同志陳述意見和決定進攻口軍的計劃。那時他們對上海事變都不甚措意，連電催我到武漢，他們以為國民政府在武漢，一切國家大事都該集中力量在武漢謀解決，同時國際又電令我們將工人的槍械埋藏起來，避免和蔣○○軍隊衝突，勿以武裝力量擾亂租界等，亦農看了這個電報，很憤激的把牠摔在地下；那時我又以服從國際命令，未能堅持我的意見，而且根據國際對國民黨及帝國主義的政策，和汪精衛聯名發表那樣可恥的宣言。

「（註四七）」

陳獨秀的這些說明，如果和當時共產國際的指示加以對照，就可以瞭解是完全可信的。第一、共產

國際七次擴大執委會後，莫斯科即發出了秘密訓令，訓令中說在張作霖失敗以前，停止對於資產階級的過激手段，要保留資產階級在國民黨之內，此種指示與「政權應屬於資產階級」如出一轍。第二、國民黨清黨之後，共產國際指示中共說：「共產國際特別以為，有些同志在蔣口口上海政變時建議實行暴動的策略，十分謬誤。」（註四八）既然十分謬誤而不宜暴動，那祇好把「工人的槍械埋藏起來」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張國燾致匪黨中央擴大會函中也說：「上海事變前，國際曾電令中央把工人糾察隊槍械埋藏起來，保存實力，以圖再舉（見匪黨中央通信）。第三、爲了國民黨的清黨，俄共黨爭也激烈起來了，「托洛茨基主義者藉口『四一二』苦迭撻當時大吹大擂，非難國共合作，非難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第一階段與民族資產者合作」。（註四九），「反對派要求中國革命以類似十月革命的速度發展起來。反對派不滿上海工人沒有去和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們進行決戰。」（註五〇）史大林與反對派爲了國民黨清黨的這些事後爭論，正說明陳獨秀的說法是當時的事實。

至於陳獨秀對清黨有沒有「事先進行警戒」一節，除陳獨秀自己有聲辯外，同樣可以從「嚮導週報」中瞭解真象。還在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八日，彭述之以「目前革命中的聯合戰線問題」爲題，大聲疾呼，提出「警戒」說：「至於革命的聯合戰線方面，不惟不日見鞏固，反而有日見破裂之傾向」，「這是我們最危險的關頭！」（註五一）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八日匪黨發表了「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宣言」，宣言中說：「帝國主義者向中國國民運動的勢力進攻，不但用直接的和間接的武裝勢力硬的方法，而且還用軟的方法，從國民運動營壘中誘惑所謂穩健份子所謂溫和派，和他們妥協，以打擊所謂急進派，

根本削弱革命勢力，破壞國民運動的聯合戰線。……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現在已經到了一個最嚴重的歷史時期！……很明顯的表現出中國革命勝負的決死戰之時期日近一日了！我們須立即準備！在此時期中，我們比以前要有更艱苦的戰鬥！」（註五二）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三日，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也在「嚮導週報」一九二期發表了，提出了「爲肅清軍閥勢力及團結革命勢力問題」。所有這些，就是陳獨秀除祕密以外的公開「警戒」，安能說是「完全解除了革命的警戒」呢？由此可見，匪黨史家的論點是違背史實的。如果說「完全解除了這警戒，這是很大的罪惡」，（註五三）那麼，這種所謂「罪惡」，便應該由共產國際負擔了。

註 一：蔣總統「蘇俄在中國」中文本第一編第二章第十四節。

註 二：蔣總統「蘇俄在中國」中文本第一編第二章第十三節。

註 三：張國燾「民眾心目中的廣東」一九二六年六月三十日「嚮導週報」第一六〇期。

註 四：陳獨秀「論國民政府之北伐」一九二六年七月七日「嚮導週報」第一六一期。

註 五：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議決案「中央政治報告」（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日至十八日）中共中央祕書處印發之油印原件。

註 六：彭述之「我們的北伐觀」一九二六年九月十日「嚮導週報」第一七〇期。

註 七：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議決案「中央政治報告」。

註 八：同註七。

註 九：同註七。

註 十：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組織問題議決案」。

- 註一：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職工運動議決案」。
- 註二：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農民運動議決案」。
- 註三：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軍事運動議決案」。
- 註四：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日中國共產黨擴大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嚮導週報」第一六三期。
- 註五：中共中央「中國問題指南」第一冊第一篇，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五日延安新華書局出版。
- 註六：史大林「論中國革命的前途」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中國委員會會議上的演說。
- 「史大林全集」中譯本第八卷第三二六頁，一九五〇年九月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第一版。
- 註七：史大林「國際形勢和保衛蘇聯」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上的演說，「史大林全集」中譯本第十卷一九、二十頁。
- 註八：蔣總統「蘇俄在中國」中文本第一章第十四節。
- 註九：陳獨秀「英帝國主義最近對中國進攻政策」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嚮導週報」一八五期。
- 註一〇：蔣永敬「鮑羅廷與武漢政權」第二章第二節，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台北初版。
- 註一一：一九二七年三月廿三及廿五日武漢中央政治委員會紀錄，摘自「鮑羅廷與武漢政權」。
- 註一二：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武漢中央政治委員會會議紀錄，見「鮑羅廷與武漢政權」。
- 註一三：莫斯科致駐華武官訓令——「蘇聯陰謀文證彙編」。
- 註一四：施英（按：即趙世炎）「上海工人三月暴動記實」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嚮導週報」一九三期。
- 註一五：同註二四。
- 註一六：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國聞週報」第四卷第十六期。
- 註一七：華崗「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的中國共產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布爾塞維克」四卷三期。

註二八：「蘇聯在華密探局組織法（極要第一七九卷原件註明特別親密送）」——「蘇聯陰謀文證彙編」。

註二九：同註二八。

註三〇：同註二八。

註三一：同註二八。

註三二：列維斯基爲擴充大連密探範圍事致哈爾濱蘇聯密探分部部長馬爾克函（譯自極要第五十六號卷第七至十七頁原文註明極密字樣）——「蘇聯陰謀文證彙編」。

註三三：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半年度蘇聯在中國軍事政治工作經費預算書（原文註明極密）——「蘇聯陰謀文證彙編」。

註三四：蔣總統「蘇俄在中國」中文本第一編第二章第十四節。

註三五：中國現代史研究委員會「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上冊二〇九、二一〇頁，一九四七年七月香港初版。

註三六：何幹之主編「中國現代革命史」八一、八二頁，一九五八年九月香港一版。

註三七：胡華編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初稿）」修訂本七九、八〇頁，一九五二年「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

註三八：何幹之主編「中國現代革命史」九〇頁。

註三九：史大林「國際形勢與保衛蘇聯」、「史大林全集」中譯本第十卷一七一頁。

註四〇：王實、王翹、馬奇兵、章陵編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簡編」八四頁，一九五八年九月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一版。

註四一：何幹之主編「中國現代革命史」九七頁。

註四二：王實等編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簡編」七四頁。

註四三：施英「上海工人三月暴動紀實」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嚮導週報」一九三期。

註四四：「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上冊二二一、二二二頁。

註四五：何幹之主編「中國現代革命史」一〇〇頁。

註四六：「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上册二三〇頁。

註四七：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

註四八：一九二七年五月共產國際第八次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通過「中國問題決議案」——「中國問題指南」第一冊第二篇。

註四九：「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上册二三〇頁。

註五〇：史大林「中國革命問題」——聯共（布）中央批准的給宣傳員的提綱。「史大林全集」中譯本第九卷二〇五頁。

註五一：「嚮導週報」一八五期——一九二七年一月廿七日出版。

註五二：「嚮導週報」一八六期——一九二七年一月卅一日出版。

註五三：「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上册二三〇頁。

附錄一：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會議決案

（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日至七月十八日）

壹、中央政治報告

一、去歲擴大會議至現時政治狀況的變遷與我黨各時期的政策

去歲十月擴大會議至現在九個月間的政治變動可分為三個時期，我們均有不同的策略，這三個時期的分割是自直奉戰爭至郭松齡反戈為第一時期，自郭松齡失敗至國民軍退出北京為第二時期，自國民軍退出北京至張吳會面為第三時期

第一時期是軍閥政權動搖時期。在此時期中奉系軍閥已經潰敗，皖系軍閥沒有實力，直系軍閥猶未起來，帝國主義者一時亦失去馭制各派軍閥之能力，表現非常恐慌，段政府極力勾結國民軍，吳佩孚亦向國民政府示好，彷彿南方國民黨與北方國民軍可以會合起來支配全國政權成立一比較赤色的政府之形勢。在此時期中本黨之策略是自孫傳芳反奉軍事發動，即提出擴大此次戰爭性質之口號，說明反奉戰爭應該是「爲民衆爭自由而戰」，集合一切革命力量於反奉旗幟之下。這個宣傳在民衆中是發生很大的影響，並深入軍閥的隊伍中去，於是有了郭松齡的倒戈。本部同時又提出反對直系護憲運動，防止奉直聯合之口號，蓋已預見直系得勢必然護憲，奉系若敗必力求與直系妥協，企圖穩定軍閥統治的政權。本會回視過去政策，一點都沒有錯。

第二時期是帝國主義者想消滅此革命高潮，一方面努力促成英日張吳間暗潮極烈，同時廣東國民政府實際出兵北伐，大的，反赤宣傳，欲將此革命勝利打消下去。在此時期中，我們的策略是要先破壞反赤的聯合戰線，所以主張在北京暫時成立一灰色的政府，可以容納皖直兩系參加專門對奉，但此政策終未實行，而吳佩孚正在漢口發動攻豫，遂又主張廣東速出兵討吳，然結果此策仍不能行，所以如此原因是由我們黨的政治力量還不很強大，故雖有好的政治，仍不能影響國民黨國民軍充分實現。

第三時期的重要現象是一方面軍閥政權重新穩定，一方面英日張吳間暗潮極烈，同時廣東國民政府實際出兵北伐，英日張吳衝突雖很嚴重，但國民軍還在有力的存在，奉直咸有戒心，所以祇是暗潮而未進於明顯的破裂。在此時期中我們政策，在北方是和奉反直，在南方是援湘禦吳，北方的反赤軍（奉直晉三方）若能一致合作進攻國民軍，則國民軍很難存在，但三方合作均無十分誠意，各是私圖，國民軍似不至於失敗。然在奉直間無大變化時，國民軍亦祇能自保而難於衝出，南方國民政府之出兵，亦尙祇是防禦反赤軍攻入湘粵的防禦戰，而不是真正革命勢力充實的北伐。

總之，目前軍閥政權的穩定，祇能在國民軍不死不活的狀態中得到很短時期的穩定。這個穩定是決不能持久的。

二、帝國主義對華的政策

帝國主義政策在中國最有權威的是英日兩國，現時他們共同的目的，是討平南北二赤，其不同的意見是對於關稅會議，日本因欲得關款增收以整理西原借款主張繼續，英國因增收影響於英貨之輸入遂想拖延。又，在對於軍事問題上，英國的規模很大，有囊括全國的野心；日本則偏重東三省一隅，量力而進，沒英國這樣誇張。

除英日帝國主義政策之外，在中國影響較重要的要算美國帝國主義政策。從表面看去，美國人現正計劃幫助中國人反對英日帝國主義之可怕侵略，幫助中國資產階級和平發展實業的要求，反對不能滿足中國人民願望的關稅會議。然而他的目的，就在用大美國資本的道威士計劃來代替英日的統治。

我們對付這些帝國主義的政策是特別注重反對英國，其次日本、美國。因為英國在華的勢力根深蒂固，領域極廣，日本祇是一部分，美國更無固定的地盤，所以應利用其相互間之衝突，利用分裂的政策，以破壞其聯合。

三、各部份社會力量對於民族革命的態度

在民族革命過程中，我們應知道社會各部分力量及其趨向。現時中國社會各部分的力量，可以分爲以下四種：

第一種是軍閥、買辦、官僚、新舊士紳（新士紳如大學教授）之反赤運動，這都是反革命的力量，是結合於帝國主義勢力的。

第二種是工農學生的革命運動，這是新的革命的勢力，剛與第一種舊的反動勢力正對抗。

第三種是中小商人之反抗運動（如抗捐抗稅）。

第四種是資產階級的改良運動。資產階級在現時，尙多未脫盡買辦階級的思想，但他終將隨着產業之發展而日漸分化，他與買辦階級對帝國主義不同的態度是：一爲無條件的合作；一爲有條件的合作。換言之，即他傾向帝國主義要點東西得到之後，便可與帝國主義妥協。中國的資產階級是很難獨立發展的，因爲帝國主義不容許其這樣做。資產階級現時是一種不可忽視的力量，在未來也是一種反動的阻力。

在以上四種力量中，我們將用何種力量來革命呢？當然的祇有第二種工農學生是革命的基本力量，第三種中小商人

，帝國主義經濟上之壓迫，苛捐雜稅之剝削，祇有感覺革命之必要，并無反對革命之必要，工農方面應該拉到他們才能免自己陷於孤立。第四種資產階級因感中國經濟為外資外貨所佔去，不革命沒有出路，加以苛捐雜稅之搜括，軍閥戰爭之破壞，按理是應比較小資產階級更革命的，但事實確相反。一因中國資產階級并非由本國資產積累而成，乃由發洋財（買辦借款）或搜括地皮而來，本身不能斷絕與帝國主義關係；二因見着無產階級發展起來了，他們一方面想向帝國主義要點東西，一方面又恐怕助長無產階級革命勢力，遂覺進退維谷，踟躕不前。資產階級有兩條出路：一是完全不革命，與帝國主義妥協；二是由自己專作民族革命運動，不要無產階級有革命的領導權。一方面向帝國主義要東西，一方面壓迫無產階級不要動，到東西得了便不革命。我們知道第一條路是不會有的，中國資產階級正走的是第二條。現時的問題就是這個革命要不要資產階級參加，我們的回答是：暫時，我們還是要利用資產階級，如果我們攻擊他太利害，他可以完全被帝國主義拉去，更增強敵人的力量是革命的一個損失。

我們對資產階級的態度應與對第一種軍閥、買辦、官僚、新舊士紳不同，對前者是要根本消滅，對後者是在與之爭取革命中的領導權。中國資產階級確已有了一些力量，上海五卅運動事實上是總商會領導而不是總工會領導（指後一段期間言），落後的富有宗法思想的工人亦易被資產階級拉去，小資產階級更不用說。我們應該鞏固工農力量，拉住小商人，脅迫資產階級左傾。

四、國民黨內部之分化

國民黨內部之分化，正是反映上面四種社會力量；反動的右派（馮自由、馬素、孫科、古應芬等）代表第一種；共產派代表第二種；左派（汪精衛、甘乃光等）代表第三種；新右派（即中派，如戴季陶、蔣介石等）代表第四種。所以我們對於國民黨的政策與對全國各階級的政策是一致的，就是我們聯合左派并逼中派向反動的右派進攻，同時防止中派之發展，迫其離右向左，如果我們聯合戰線的策略應用得好，則民族革命的勝利是有把握的。

五、民族革命運動之前途

民族革命運動的前途，我們可以預見有兩條道路：一是由工農領導小資產階級推動資產階級，以革命的手段到民族的資本主義的建設；一是由買辦性的資產階級拿住小資產階級，并結合買辦階級與帝國主義妥協，撲滅革命運動，實現道威士的資本主義之侵略，此時甚至連工人亦可發生一部分右傾。前一條路是革命的，後一條路是很悲慘的，將來實現何種，我們尚不能預言。我們的責任，就在努力擴大和鞏固工農的力量，拿住小資產階級對大資產階級爭奪民族運動的領導地位，如果小資產階級被大資產階級抓去做改良運動，則我們一定失敗。革命的前途是非常明顯，我們要能領導這個革命，必須我們的黨先有很好的組織，否則不但抓不住小資產階級，恐連工農亦組織不好，更何望於領導革命。

說到我們黨的現狀，在全國一般的宣傳上，固然有很大的影響，但實際我們的力量還說不上就能抓住全國小資產階級，領導革命，進行我們的工作還須更大的努力。

六、九個月中黨的發展及工作

黨的發展在九個月以來從好的方面看：一、黨員數量是已增加了三倍；二、我們雖不能在組織上完全取得小資產階級，但很模糊的能領導全國的民主運動，尤其是在京滬粵湘等地；三、在全國的政治鼓動，是有很大的影響，我們對於每個重大的政治事變所發出口號及政策，均能領導民衆要求；四、上海、天津、唐山、湖南的職工運動均較前有基礎，特別是上海職工運動已漸充實起來。唐山、天津雖在反動勢力嚴重壓迫之下，而根基尚未破壞。

從上而看，固然我們的黨是發展了，但在發展中也包含了不少的缺點：

一、是黨員數量雖然增加，而質量確退化了，可從幾方面看出：

A 同志都缺乏理論及實際應用經驗，沒有確定的革命人生觀。

B 負責的工作同志有僱傭勞動傾向，缺乏從前那樣勞苦奮鬥的精神。

C 同志中的一部分，發生貪官污吏化（即有經濟不清楚，揩油等情弊）。

二、是各級黨部自中央以至支部，指導訓練的力量均不充分。

三、支部組織不健全（惟我們現時能注意到建立支部工作，也可說是進步的現象）。

四、理論宣傳非常缺乏，鼓動工作亦多不切實際，不能深入羣衆。

五、職工運動多祇是機關運動，沒有羣衆充實這一機關，惟上海工會現在總算往羣衆中去了。

六、農民運動在各地均發生左傾的毛病，或提出口號過高，或行動過左，往往敵人尚未打着而自己已受很大損失。

總之，現時全國的政治情形，是軍閥政治的穩定并且不能持久，革命運動仍向前發展。但，究竟這個革命是資產階級領導呢？抑是無產階級領導，就全看無產階級的黨有沒有好的組織。我們必須有一個爲列寧主義所指導的多數黨的組織，才能爭取這個民族革命的指導權。

貳、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係問題議決案

（即第八章之附錄二）

參、組織問題議決案（摘錄）

一、自從上次擴大會議之後，本黨組織在數量上又發展了三倍以上，最近八個月來，雖在五卅運動潮流已經低落之後，而本黨在全國各地的組織，仍能於各種形勢之下，領導民衆運動。從全國革命運動的實質看來，本黨確成了一個政治核心，從各地羣衆運動的實質上看來，許多方面本黨確已漸漸的站在領導地位。

二、在過去的組織工作中，我們有了下列的經驗：

A 經過各種的運動，我們得以接近廣大的民衆，得到民衆組織的發達和黨自身的發展。

B 因爲注重於發展工作的結果，已使本黨在幾處革命潮流較高民衆運動較發達的區域，取得了羣衆，並從羣衆中建築了基礎的組織。

C 因爲開始注重支部工作的結果，已使本黨有了較好的社會成分，吸收進步的分子深入在無產階級羣衆裡，於祕

密工作形式下種下了初步的基礎。

三、這些經驗從實際工作上得來是條件好的結果，但是本黨在組織上，仍是非常幼稚，有許多大的缺點，這些缺點之最大者有四：第一、是各級黨部尚不認識組織工作的意義，多以爲組織工作只是技術的，而不了解組織工作的政治意義；第二、是支部工作尚未真正建立，過去的支部都僅有其形式，各級黨部尚不明瞭支部的意義，亦尚不知支部工作的方法；第三、是黨團的工作不太好；第四、是黨的機關不健全。（下略）

（錄自匪黨中央祕書處印發之議決案原件。尙有四至十三項議決案從略）

附錄二：莫斯科根據共產國際執委關於中國問題之決議案致

駐華武官訓令

筆者按：此一訓令因被焚，致無發出之年月日，亦未註明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幾次會議決議，經查證該會第八次會議係在一九二七年五月舉行，而查抄北平俄使館乃在是年四月六日，從而推知該訓令係執行該會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廿二日至十二月十六日第七次會議之決議。

（按此件已被焚原文上端左角及下部均已焚燬僅遺原文二分之一照譯如左）。

茲特附送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全體大會通過關於中國問題議決案，並將根據該次議決案所擬定之訓令寄發，仰即遵照辦理可也。

一、現時應全力注意增長中國革命運動之國民性質，爲達到此種目的起見，必須以國民黨爲中國國民獨立黨，而爲有利於國民黨之宣傳。應擴大利用漢口各種事件，及英國對於各該事件之態度，資爲證據，第一可以證明國民黨國民工作之進步，第二可以證明歐洲各國反對中國革命戰鬥力之顯然薄弱。

二、必須於張作霖軍隊所佔領之地域內，造成排歐之混亂。

三、破壞張作霖之威信，宣傳張氏爲國際間各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妨害中國國民黨自由工作之受僱者。

四、激動反抗歐洲暴行之風潮及英國之計劃。（以下被焚）。

五、必須設定一切方法激動國民黨羣衆排斥外國人，爲達到此種目的起見，必須設法獲得各國對於國民黨羣衆之適用武力戰鬥。爲引起各國之干涉，應貫徹到底，不惜任何方法，甚至搶掠及多數慘殺，亦可實行。遇有與歐洲軍隊衝突發生時，更應利用此種機會，實行激動。

六、現時應暫緩實行共產黨綱，因此時實行，可使張作霖之地位鞏固，並加重國民黨之分裂，吾人已向鮑羅廷嚴重訓令，暫時停止對於資產階級之過激手段。張作霖失敗以前，應抱定自己之宗旨，即在國民黨內暫時保留國民之各種階級，資產階級亦應保留。

七、實行此種排斥歐人之運動時，保存各國間之不協調，頗爲重要。日本能於最短期間派多數軍隊來華，故令日本與各國隔離，尤爲特別重要。爲達到此種目的起見，於一切運動之中，必須嚴加監視，務使日本僑民無被害之人。但於激動排外風潮之時，將日本除外殊足引起不愉快之觀感，故實行激動排外風潮時，必須假托反對不列顛（英國）運動之名義也。本件抄本迅速分送各分部及指導人員（以下被焚）

（錄自「蘇聯陰謀文證彙編」）

附錄三：汪精衛陳獨秀聯合宣言

國民黨、共產黨同志們！此時我們的國民革命，雖然得到了勝利，我們的敵人，不但仍然大部份存在，並且還在那裏伺察我們的弱點，想乘機進攻，推翻我們的勝利。所以我們的團結，此時更非常必要。

中國共產黨堅決的承認：中國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在中國革命中毫無疑義的需要，祇有不願意中國革命向前進展的人，纔想打倒國民黨，纔想打倒三民主義。中國共產黨無論如何錯誤，也不至於主張打倒自己的友黨，主張打倒我們的敵人（帝國主義軍閥）素所反對之三民主義的國民黨，使敵人稱快。

無產階級獨裁制，本是各國共產黨最大限度的政綱之一，在俄國雖然實現了，照殖民地、半殖民地政治經濟的環境，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程，是否要一定死板的經過同樣形式的同樣階段，還是一個問題。何況依中國國民革命發展之趨勢，現在固然不發生這樣問題，即將來也不致發生。中國所需要的是建立一個各被壓迫階級的民主獨裁來對付反革命，不是甚麼無產階級獨裁。

兩黨合作大有各種不同的方式，重要之點是在兩黨大多數黨員羣衆，雙方以善意的態度解決此問題，方不違背合作之精神。

中國國民黨多數同志，凡是瞭解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理論及其對於中國國民黨真實態度的人，都不會懷疑 孫總理的聯共政策。

現在國民革命發展到帝國主義的最後根據地上海，驚醒了國內外一切反革命者，造謠、中傷、離間，無所不用其極。甲則曰：共產黨將組織工人政府，將入租界，貽害北伐軍，將打倒國民黨。乙則曰：國民黨領袖將驅逐共產黨，將壓迫工會與糾察隊。這類謠言，不審自何而起，國民黨最高黨部最近全體會議之議決，已示全世界，決無有驅逐友黨摧殘工會之事。上海軍事當局表示服從中央，即或有些意見與誤會，亦未必終不可解釋。在共產黨方面，愛護地方，安寧秩序，未必敢後於他人，對於國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政策亦表贊同，總工會亦已發表不單獨衝入租界之宣言，對於市政府表示贊同各階級合作政策，事實俱在，更無造謠之餘地。

國共兩黨同志們！我們強大的敵人，以武力對待我們，並且想以流言離間我們，以達其「以赤制赤」之計。我們應該站在革命的觀點上，立即拋棄相互間的懷疑，不聽信任何謠言，相互尊敬，事事開誠，協商進行。政見即不盡同，然如兄弟般親密，反間之言，自不得乘間而入也。披瀝陳詞，萬希各自省察，勿致爲親者所悲，仇者所快，則中國革命幸甚，兩黨幸甚。

汪精衛、陳獨秀 十六年四月五日

（錄自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國聞週報」第四卷第十六期）

第十章 五全大會與機會主義

一、鮑羅廷的退卻

國民黨的清黨運動給共匪以嚴重打擊，共產國際認爲這是「中國革命的部分失敗。」（註一）從此「革命已進入其發展的第二個階段，已開始從全民族聯合戰線的革命，轉變爲千百萬工農羣衆的革命，轉變爲土地革命。」（註二）於是匪黨便以全力來赤化武漢政權，以圖挽回其失敗的命運。

處於四面包圍的武漢政權，首先着眼於軍事，想從軍事上打開一條出路。當南京國民政府準備沿津浦路揮軍北上時，武漢「左派」亦於四月十九日舉行「第二次北伐」，由唐生智率軍向河南進發，期與馮玉祥會師後進佔平津。這一戰略，共產國際和匪黨曾予積極支持。共產國際決議說：「在中國目前一般情形看來，共產黨須採用如下之軍事政治戰略：共產黨擁護向北發展之軍事計劃，而同時無條件的加深武漢政府統治全區內之農民革命。」（註三）當時斯大林也說：「武漢政府對奉軍進攻，至少有兩個原因：第一、因爲奉軍向武漢進發。要肅清武漢，所以進攻奉軍是刻不容緩的防禦措施。第二、因爲武漢派想和馮玉祥軍隊會師並向前推進以擴大革命根據地，這在目前對於武漢來說又是極重要的軍事政治事件。在反對蔣○○和張作霖這兩條重要戰線上同時進攻，目前對於武漢政府是不能勝任的事情。關於西攻楊森和南伐李濟琛，就更不用說了。」（註四）

斯大林之所以積極支持武漢向北進軍與馮玉祥部會師，緣因馮玉祥早已與莫斯科有所勾結。遠在一

九二五年四月，蘇俄就曾派遣三十六名軍事政治人員至張家口馮軍工作，並以武器裝備及款項支援馮軍。（註五）廣東國民革命軍北伐開始後，馮玉祥於一九二六年九月八日自俄返國，十八日發表回國宣言，就任國民軍聯軍總司令，誓師五原，參加國民黨並任國民政府委員。（註六）武漢時期出任「聯席會議」主席之徐謙，即為當時馮玉祥派駐廣州之代表。武漢「左派」之第二次北伐，如能與馮部會師，進而擊潰奉軍，不僅可「擴大革命根據地」，甚至可赤化整個北方。鮑羅廷及匪黨中央，其支持第二期北伐，不過是執行莫斯科之命令而已。

武漢之二次北伐，雖於五月底擊潰奉軍，六月一日與馮玉祥軍會師鄭州，但因唐生智不願遠離其兩湖根據地，武漢北伐軍不能不班師而同，馮玉祥乃不戰而據有河南。此時南京 蔣總司令所指揮之北伐軍，擊潰了張宗昌褚玉璞的直魯聯軍後，於六月二日佔領徐州。此一形勢影響了馮玉祥態度的轉變，馮玉祥由親近莫斯科一變而為傾向南京政府，對武漢共黨持反對態度，於是「左派」及匪俄企圖均告失敗，武漢政權反處於四面包圍之不利形勢中。

還在二次北伐之前，鮑羅廷與匪黨就已操縱了武漢政權。繼「聯席會議」之後，於一九二七年三月十日召開所謂國民黨中央三中全會，改選結果，共黨分子譚平山、吳玉章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林祖涵、譚平山、吳玉章被選為中央政治委員，譚平山且為政治委員會主席團之一。國民政府中，以譚平山、吳玉章為委員，譚兼農政部長，蘇兆徵則任勞工部長。三中全會所通過的「統一革命勢力案」中規定：「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兩黨聯席會議，須立即開會，討論一般的合作辦法。」至此，共黨

分子不僅再度參加國民黨中央的領導工作，而且參加武漢政權和各級政府，武漢政權正式成爲「左派」與共黨之聯合政府。這樣，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之指示：利用「國民革命政府的機關」以及「使國民黨發展成爲真正平民的政黨」也開始實現了。

可是，自從寧漢對立以後，武漢政權即處於四面包圍封鎖的環境中：交通斷絕，導至商店倒閉，原料缺乏，工廠因而減產或關門，失業工人逐日增加；「農民在鄉裏造反」「不准穀米出境。」（註七）引起糧食恐慌，物價飛漲；大量發行紙幣，以彌補財政赤字，結果通貨膨脹，財政經濟陷入破產狀態。在此一困難關頭，鮑羅廷於四月二十日向「左派」中央提出「戰略退卻」建議，並加說明稱：「……爲應付這種惡劣的環境，祇有暫時採取戰略上退卻的辦法。……帝國主義者或因我們改變策略而停止進攻，……他們憑藉武力而施壓迫的唯一理由，就是說在國民政府之下，外國的僑民不能繼續經商。而我們自己的民衆，也常常誤解了打倒了帝國主義的意思，以爲打倒了一家洋行，或打倒了一家商店，就是整個的帝國主義授命之時；……如果退卻的策略，可以糾正湖南、湖北一部份民衆的誤解，是應該作的；如果退卻的策略，可以使帝國主義國家的人民在國民政府之下的安全營業，也是應該作的。……據外交部據外國商人的報告，說他們運貨來時，常被劫掠，都是失業工人所作的事。工人失業者是這樣的多；銅元的價格又飛漲不已，所以工人的生活，實是困苦萬狀。同時又有許多流氓、地痞、反動份子乘機擾亂，處處都有發生意外的可能。所以在交通未恢復以前，武漢的市面很難有安定的秩序。……根據種種理由，所以本席用書面提出了五項辦法。……」（註八）鮑羅廷所提五項辦法如下：

「(一)政府與工會人員合組一委員會，其目的在執行工人中之革命紀律，同時由工會組織裁判所，審判並處罰違犯革命紀律的工人；(二)由政府與外國銀行商店協商，使他們在湘、鄂、贛、皖南、豫南、西至於萬縣等處，都可以公開的貿易，並由政府與工會代表組織委員會，執行政府與外國銀行商店所定之協商，此委員會有調用糾察隊與武裝勢力之權；(三)除得第二條所規定之委員會同意外，外國銀行商店中工人不得自由罷工；(四)政府應盡可能力量，迅速規定銅元及一切必需品之最高價格；(五)立刻設立失業局與失業者飯堂。」(註九)

這五項辦法，經修正頒行。事後，共產國際亦予認可，並在「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指稱：「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以爲：武漢政府在這種困難的條件下，對於外國帝國主義縱橫捭闔的策略，根本上是可用的。……共產黨不能『根本上』反對縱橫捭闔的策略。負責武漢政府的共產黨，如果永遠而且在一切條件下，反對妥協的策略，這就是說：共產黨要無條件的同時向各方作戰，這真是大愚特愚。……這縱橫捭闔的可用性，也必須適用於政府的經濟政策。政府絕不能無條件的沒收一切外國企業。在這裏，妥協也是根本上可以應用的。」(註一〇)

鮑羅廷這一「戰略退卻」建議，如能順利推行，不失爲暫時挽救武漢危機的辦法，但由於共黨與工會之橫行，繼續扣留船隻，搶掠貨物，騷擾廠商，原辦法無法執行，以致危機日益加深，終於走向政治經濟之全面崩潰。

二、中共的五全大會

在武漢政權的掙扎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於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舉行，（註一一）到會代表八十人，代表黨員五萬七千九百餘人。共產國際代表團和職工國際代表團也參加了這次大會。大會開幕時還邀請國民黨「左派」人士列席。共產國際代表羅易（M. N. Roy）在「嚮導週報」撰文稱：「大會開幕時國民黨領袖親自參加，並宣佈他們鞏固國共兩黨合作的決心。當國際代表報告中國革命的性質及前途時，汪精衛同志亦曾到會。汪同志對國際代表的報告，表示完全同意，並認為小資產階級必與無產階級同向社會主義的方面前進。」（註一二）

汪精衛亦於參加會議之當日向武漢中央報告稱：「本席今天（五月四日）承中國共產黨第五次代表大會之請，前往列席，可將與本黨有關的決議，扼要的向各位報告。開會之初，由魯依（Roy）同志解釋第三國際第七次擴大會議對於中國革命之觀察的決議案。大意是說：中國革命的特質，應當往非資本主義那一條路上走；否則受帝國主義之支配，在國際財政勢力之下，永沒有自由獨立的希望。至於革命的成分，可分為三種：（一）工人；（二）農民；（三）城市的小資產階級。這三種人都是被壓迫者，在事實上有聯合的可能，也有聯合的必要。關於小資產階級，應該承認他們的私有財產，承認私人商業主義，這不但無妨於國民革命的政策，而且還必須如此。所以無產階級應當尊重農民及小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照這個決議案的大意看來，中國國民黨是可以採用的。……國共兩黨是可以攜手合作。」（註一

三)

匪黨五全大會接受了共產國際七次擴大執委會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大會認為，共產國際指示革命運動第三階段之階級新結合，以及革命新聯合已爲形勢發展所證實：自從「大資產階級脫離革命後，國民黨內部的衝突因之減少，國共兩黨的關係比從前更加密切，工農小資產階級的政治同盟遂因之實現。民族資產階級之一部也隨著這個同盟向前進行。無產階級就是推動這個同盟的骨幹。國共兩黨關係之更加改善，聯席會議的組織就是一個證明」。(註一四) 共產國際指示「加入新政府的機關」以及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也已開始實現，因爲「在大會舉行前兩月，中國共產黨被中國國民黨邀請參加國民政府。這就是表示共產黨地位的重要，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已爲全國所承認。……共產黨根據共產國際決議案所指示，允許參加勞工部及農政部。在現在革命的階段中，這兩部都十分重要。所以共產黨不僅變成一個公開的影響政治環境的廣大的羣衆黨，並且已經參加政府機關，以促進革命的進展了。」(註一五) 共產國際指示「過渡到非資本主義前途」一點，大會亦給予樂觀的答復，認爲「第五次大會歷史的意義，是在他能將革命要如何破壞資本主義的方面進展，告訴給無產階級和他的同盟軍。中國革命如果讓資產階級指導，勢必將中國局面造成適合於世界資本主義的穩定，而消滅中國的革命。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證明以無產階級取得領導權的中國革命，必能超越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達到最終的目的(帝國主義的經濟在此處佔優越勢力)。所以第五次大會，不僅在中國，即在世界亦有重要的意義。我們敢說中國共產黨之第五次大會是世界社會主義鬥爭史上的一個新標界。」(註一六)

匪黨五全大會的頭一個議案，是「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議決案」，因為「當大會召集的時候，革命的中國已處於帝國主義干涉恐嚇之下，……革命戰線中，甚至小資產階級份子，都發生恐慌。全部革命正需要明晰的觀察與堅決的指導，以防止悲觀與失敗主義的發生，……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的重要職任是給現在的環境以正確的估計，……第五次大會關於革命勢力在此時期之升降問題，已經明白的答復。……第五次大會絕對否認：『因大資產階級脫離革命，帝國主義武裝干涉的威嚇等原因，會使革命運動停止或降低』的理論。實際上，這種事實不但不能阻礙革命，反能促進革命，因為大資產階級脫離後，革命的勢力完全建築在被剝削的各階級身上；他們為保障自己經濟政治的利益起見，決不能和帝國主義及國內反動派妥協。中國的無產階級和農民羣衆必須堅決的反抗帝國主義和他的工具才有出路。在此鬥爭中，全部無產階級的精力可以磨勵起來，使革命的基礎深入，促進他的發展，保證他的勝利。」（註一七）此次大會「並指出無產階級是革命的骨幹。因為現時的革命仍建築在數個階級的聯合上，無產階級不能單獨指導革命，不過無產階級是唯一的勢力，祇有他可以並且能够保障革命的前進，使他不至於搖動，成走入歧途。所以無產階級並非革命的唯一指導者（Leadership），不過他在革命鬥爭中執行領導者（Hegemony）罷了。」（註一八）

五次大會的第二個重要決議，為「土地問題議決案」，事實上，「國民革命軍所在的地域，農民運動都有偉大的發展，有幾省內，農民協會的組織變成最大的勢力。農民正在解除反動派的武裝，而武裝自己。他們自己正在沒收大地主的土地。……此種情形反映到大會，大會經過熟慮之後，決議領導農民

從事鬥爭，並領導少有田地的小資產階級共同奮鬥。」（註一九）「所以第五次大會鄭重聲明：此時的國民革命必變成土地革命。……大會決議以全力領導農民向封建勢力鬥爭。我們的口號是『耕者有其田』，農民要有政治及軍事的力量，以取得大地主所佔據的田地。在執行此決議上，大會證明祇有無產階級才能領導農民從事土地革命，以保障反帝國主義的勝利，使全國的經濟自由發展。」（註二〇）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代表大會所決定的國民革命之農民政綱是：

一、沒收一切所謂公有的田產，以及祠堂、寺廟、教堂、學校、農業公司的土地，交諸耕種的農民。所沒收的土地之管理，應付諸土地委員會。此種土地之管理形式，是否採用公有制度或分配於耕種者，皆由土地委員會決定之。

二、甲、無代價的沒收地主租與農民的田地；經過土地委員會，將此種土地交諸耕種的農民。

乙、屬於小地主的土地不沒收。

丙、革命軍長官現時已有土地可不沒收。

丁、革命軍兵士之無土地者，於革命戰爭完終後，可領得土地耕種。

三、耕種已沒收之土地的農民，除繳納累進的田稅於政府外，不納任何雜稅。

未沒收的土地之租率，祇減至與累進的田稅相當的程度。

耕種未沒收的土地之農民，祇繳納確定的田租，不納任何雜稅，並永久享有租佃權

四、取消地主紳士所有的一切政權及權利。

建立農民的鄉村自治政府，對農村中各被壓迫階級所組織之鄉民會議負責。

五、解除鄉村中反動勢力的武裝。

組織農民自衛軍，保障鄉村自治政府及革命的勝利。

六、建立國家農業銀行及農民的消費生產信用合作社，改良水利。

七、取消重利債務的利息，限制重利盤剝，規定最高度的利率。」（註二一）

「大會的第三個重要決議，是關於革命政權的性質問題。大會看出在無產階級領導權之下的革命，必須築立工農小資產階級的民權獨裁制。現時革命的國民政府就包含著民權獨裁制之原素。共產黨參加國民政府以下各級機關，更能保證國民政府的民權獨裁制。大會也不忽視小資產階級之中有一部分猶豫懷疑的分子，並認為欲鞏固工農小資產階級同盟，必須努力去掉這些猶豫懷疑。」（註二二）

五次大會依然選舉陳獨秀為中共中央總書記，毛匪澤東雖然參加了這次大會，但無表決權，中央委員改選時也沒有當選。（註二三）

匪黨五次大會發表了為「五一」節告中國民衆書（見附錄）和告世界無產階級書，以代替大會宣言。

三、過火的農民運動

匪黨五次大會前後，南方各省的工農運動在匪黨的煽動下，正如火如荼的展開，「在武漢政府統治

下的工農運動更飛速的發展起來。爲著鞏固革命，工人反抗了資本家的怠工，而且爲着鎮壓反革命的活動，組織了工人糾察隊，工人已部分地武裝起來。工會的組織更形擴大，把手工業以至大工業的工人都組織起來了。而總工會則在工人羣衆中樹立了無上的威信。」（註二四）「在黨的直接領導下的工人有二百八十多萬，農民九百多萬。」（註二五）

「農民運動在湖南、湖北、江西三省，在革命政府領導之下也暴風驟雨般地爆發起來。」

「一九二七年六月全國農民協會會員共有九百一十五萬人，其中湖南最多，四百五十一萬人，湖北其次，二百五十萬人。」

「在馬日事變前，湖南掀起了農村革命的風暴。農民起來管理和分配糧食。農民起來掃蕩了土豪劣紳在鄉村中的統治權。農民起來解決土地問題。……………」

「在北伐軍攻克武漢後，湖北的農民運動也有極大的發展。一九二七年三月第一次全省農民代表大會以後，農民在農村中發展了激烈的階級鬥爭。……………」

「一九二七年二月江西成立了全省農民協會，農民進行了打倒土豪劣紳和減租減息的鬥爭。……………」

「廣東的農民運動，發展最早，農民羣衆早已要求分配土地。……………」（註二六）

匪黨當時的工農運動，推展的結果，在城市方面，進一步促使商店倒閉，工廠關門，經濟危機日益加深；在農村中，則造成一片混亂騷動，軍人家屬亦受侵害；夏斗寅、許克祥之起而反共，原因在此。所以鮑羅廷說：「一切錯誤都是工農運動過火，我們同志太幼稚，不能真正領導農民運動，領導湖南農

民的是「地痞」與哥老會而不是我們。」（註二七）

當時中共中央農民部部長瞿秋白，也承認這些過火行爲，他說：「農民爲摧毀買辦封建制度軍閥制度，……就必須用猛烈的攻擊：例如逮捕豪紳，使之遊街示衆，罰款罰米等等，……譬如，革命軍官，多有是小地主的。而農民運動居然侵犯了革命軍官的田產。」（註二八）

陳獨秀認爲這些過火行爲與「馬日事變」有關，他寫道：「湖南初期的農民運動，缺少黨的指導，遂不免有些原始的幼稚行動，……如捕人、罰款、阻禁、企圖均分土地，同時舉行宗教革命（毀廟毀祖宗牌位）道德革命（婦女解放）等，以致引起一般社會之驚恐，土豪劣紳復捏造許多事實，在軍隊中宣傳，反對土地改革及根本反對民衆運動之右傾分子更從而張皇其詞，使湖南出身的軍官咸抱不安，對湖南農民運動多少都表示不滿，這些都是不可否認的事實。長沙五月二十一日事變，自然和湖南農民運動的幼稚行爲不無關係；……」（註二九）

馬日事變發生後，在共黨策動下，湖南各團體組織了所謂請願代表團，這一代表團的報告不僅承認有幼稚行爲，而且「首先認錯」。報告刊於「嚮導週報」，報告中說：「長沙事變之原因可以概述如下——遠因：主觀方面的——湖南農工運動起來太速，不免有幼稚的行動，以致敵人乘機以逞；黨的發展較民衆團體的發展爲慢，所以沒有全部領導的能力，這是我們應該首先認錯的地方。」（註三〇）

一九二七年六月四日，中共中央發表告全國農民羣衆書，除號召打倒馬日事變主角許克祥外，也不能不勸告農民說：「革命軍人正在向帝國主義與軍閥作戰，也是農民的友軍。對於他們的土地也不能沒

收，對於他們的家屬更不能波及。革命兵士大部分是無土地的貧農出身。對於他們家屬有侵害，對於他們有奪取財物的行爲，都是有害於農民運動。這些幼稚行動給反動派的軍閥官僚有很好機會去鼓動兵士來反對農民運動。禁止這些幼稚行動是農民協會的重大責任。」（註三一）

共產國際和中共都認定武漢時期是土地革命的階段，打算以土地革命來團結農民，鞏固革命，渡過難關。可是，土地改革剛開始，便激起軍人的反抗，導致武漢「左派」的分共。匪黨的失敗固有各類因素，但過火的湖南農民運動則是失敗主因之一，毛匪澤東對此是逃避不了責任的。

四、兩湖的反共事件

共黨過火的工農運動，從當時共黨文件及刊物的記述看來，不但侵害了軍官的家屬，而且擾及一般士兵的家庭，這種行爲勢必激起軍人的反抗，於是兩湖的反共運動便接踵而來。首先發難的是夏斗寅和許克祥。夏爲獨立第十四師師長，駐於鄂西宜昌，於五月十八日率軍東下抵紙坊，向武漢進攻。武漢因而謠言紛起，內部混亂，大有不可終日之勢。後經葉挺師及獨立第一師予以擊退，武漢局勢始暫時復趨安定。在夏斗寅進攻武漢的後幾日，即五月二十一日（馬日，一般稱爲「馬日事變」或「長沙事件」），駐守長沙的三十五軍第三十三團團長許克祥，聯合附近駐軍發動「馬日事變」，封閉省總工會和省農民協會，收繳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軍的武裝，在許克祥的打擊下，共黨人員紛紛逃散，共黨的工農運動從此一蹶不振。繼兩湖反共事件之後，江西的第三軍軍長朱培德（兼江西省政府主席），亦於五月二

十九日遣送共黨人員出境，先後將第三軍政治工作人員及江西重要共黨分子禮送離贛。至此，湘鄂贛三省瀰漫之共運動，武漢政權處於動搖崩潰中。

在這一反共浪潮下，共黨中央和第三國際代表手足無措，「喪失了頭腦」。當時情形蔡和森（此時蔡暫代中共中央祕書長）寫道：「夏斗寅叛變一起，進攻武漢，距武昌祇四十里（抵紙坊），所謂左派首領皆嚇得面無人色，魂飛天外；民衆間亦大起恐怖，紛紛逃亡，即工人糾察隊亦有逃亡者。」「和森、立三（按：指李立三）提議葉挺及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全部武力立即佔領粵漢路，兜剿夏斗寅……」
「當時魯易（按：即國際代表羅易Roy）與秋白同志（按：即瞿秋白）以爲現在中心問題還不是軍事問題，乃是與左派關係的問題，祇有與左派關係弄好，一切政策才有中心，現在急務便在建立此中心。……魯易當此緊張之時，不僅未把政治局的中心問題置在鎮壓反革命上，反而把他建立在所謂與左派的關係上，這是與老鮑（按：即鮑羅廷）全然相同的。……於是對於夏斗寅的叛變祇當作是一件臨時的事變去應付，中央政治局的全副精神力量自然祇集中於所謂左派關係問題。這便是我們在兩湖失敗的致命傷。」（註三二）

「在夏斗寅叛變時的緊急會議上，除了決定一些葉挺出軍及發動民衆勢力，擴充糾察隊等辦法之外，又推魯易起草一個關於夏斗寅叛變的宣言，在此宣言中，現在可指出兩點錯誤：（1）承認農民運動的過火，但不是CP做出來的，乃是農民自己做出來的。便是說CP不負此過火的責任。（2）承認CP不僅保護工農利益，並要保護中等階級工商業者之利益，……從這兩點看來，可見魯易也喪失了頭腦

和原則！」（註三三）

從共黨應付夏斗寅事件看來，可以瞭解：第一、第三國際代表如羅易鮑羅廷等不像代表共產國際到中國來做指導工作，而是直接代替了中共中央的領導，連一篇宣言或一項決議均由國際代表起草，其餘一切決定自然也就操諸國際代表之手了。第二、共黨「八七會議」時，反對陳獨秀機會主義最爲激烈的瞿秋白，以後接替陳獨秀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在當時，其「右傾」與「投降」較陳獨秀更爲徹底，所染「機會主義」毒素也較陳獨秀更爲深厚。

接着，對於「馬日事變」的處置，共黨的政策亦復如此，蔡和森繼續寫道：「從五月十八日以來，省委即知道許克祥將響應夏斗寅，中央特派員（按：爲李維漢）及省委負責人，先日分析政治，謂將是唐生智整個的叛變，武漢一定已沒有了，以爲沒有辦法抵抗，祇有逃赴江西邊境去。明日知道河南鄭州已下，武漢無恙，則又分析政治，以爲許克祥不會暴動了；最後知道許克祥確要暴動，省委乃自行解散，重要人員每人發二百元，次要一百元，各自逃亡，『藏兩個月再說！』後來五人臨時委員會決定號召長沙附近各縣三十萬農民於五月三十日進攻長沙，李維漢同志見此命令大發雷霆，斥爲小孩子的把戲。他的理論是：「即使我們能取得長沙，唐生智便要與武漢政府翻臉，是我們有了長沙而沒有了武漢。現在武漢政府既然存在，便祇有請求國民政府用法律手續來解決。」

「不久湖南許克祥的馬日事變證實，……：老鮑異常焦急，急欲與平山（按：即譚平山）及國民黨中央所決定的查辦代表團（老鮑、平山、彭澤湘、陳公博及唐生智代表二人）赴湘，一面查辦許克祥

的叛變，一面查辦農運的過火。此事是老鮑決定的，魯易是反對的。結果老鮑偕此查辦團行至岳州，許克祥來一逮捕與就地槍決之電，六人皆逃回武漢！老鮑這個主張當然是很錯誤的，……魯易反對是對的；可是魯易也祇知消極的反對，並提不出積極的辦法。」（註三四）

從這裏我們也可以看到：第一、在反共運動前面，共黨負責人動搖不定，驚慌失措，隨時準備逃命。第二、共產國際代表團，兩個主腦羅易與鮑羅廷間意見分歧，各有主張，致共黨中央無所適從，因而共黨政策時而聽命羅易偏左，時而服從鮑羅廷偏右，結果還是「機會主義路線」。第三、過火的農民運動激起許克祥的馬日事變，這是事實，所以鮑羅廷才同意查辦，而且要親自查辦農運的過火。

其時毛匪澤東不僅同意以和平方法解決長沙事件，而且也罵農民運動過火，不過把過火的行動推在哥老會身上。當時汪精衛的報告說得很清楚。他說：「剛才在軍事委員會同程潛、唐生智、譚延闓、毛澤東諸同志的討論，來綜合報告一下。這次（長沙）的事變，毛澤東同志說得很詳細：農民協會確有擾害軍人家屬的舉動，……至於農民協會爲甚麼要擾害軍人的家屬呢？從前不曾調查清楚。據毛澤東同志報告，才曉得農民協會在內把持，他們既不知道國民黨是甚麼，也不知道共產黨是甚麼，祇曉得作殺人放火的勾當。……今天（六月十三日）在軍事委員會討論甚久，……討論的結果，是對於湖南的事件不用武力解決，免得引起糾紛。……毛澤東同志也承認不用武力的辦法是對的。可否由中央訓令唐生智同志，要他到湖南去根據中央歷次的決議案解決這個糾紛。」（註三五）

當唐生智到長沙後，對許克祥加以記過處分，這樣「馬日事變」也就不了了之。

五、共產國際的訓令

在湘鄂贛的反共運動前面，共產國際代表和匪黨中央都充分表現舉棋不定，不知所措，而且各有主張，互不相讓，終於走向領導的破產。當時的實際情形，蔡和森寫道：「在有一場政治局會議上，魯易與老鮑各自發表長篇的演說。老鮑的大意是：（1）現在國民黨的左派還是好的，他們沒有甚麼錯誤和不好的傾向。一切錯誤都是工農運動過火。……（2）我們現在必須向左派讓步，繼續取得與他們合作是中心的問題，……（3）國民黨的中央現在還是好的，離開他的中央，或推翻他的中央這不是決裂便是政變。現在黨內有此危險的傾向，應攻擊此傾向（暗指魯易）；（4）農民運動祇要做到減租減息鄉村自治等便是我們的勝利，便是土地革命；（5）C P中央及一切工會現應發表宣言號召羣衆擁護國民黨中央及其政府最近所公佈之一切取締民衆運動過火和錯誤的法令。」

「魯易的大意是：（1）現在國民黨中央及其政府已經不是左派而是土劣地主軍閥的代表。我們應號召左派羣衆起來推翻他們；（2）推翻國民黨現在的中央，並不是根本決裂與政變；（3）我們現在應一直同工農民主獨裁制（未多說理由）；（4）C P中央應發宣言反對國民黨中央及其政府近日所公佈之一切反動的法令。……」（註三六）

蔡和森對於兩位國際代表相反的意見，認為都「與國際決議不相合」，「老鮑是有辦法而無原則，魯易是有原則而無辦法」；但瞿秋白則反駁蔡和森說：「和森同志的批評是很可笑的，……其實老鮑與

魯易在根本原則上並無不同，祇是對於國民政府內資產階級的成分是否完全排除的估量上有點不同……」（註三七）

「鄭州下，……此時中央政治局開了三次重要會議。一次討論鄭州下後的北伐問題：此時馮玉祥反共態度已較明，獨秀同志已悟前此北伐政策之錯誤，他現在所憂慮的是馮玉祥所唱的『共同北伐』（號召武漢南京共同北伐），他知道共同北伐成功之日，便是共同解決C P之日，所以此時獨秀同志及老鮑都認『東征』是惟一出路。在此次討論中，獨秀立三秋白是主張東征的；魯易平山則仍主張南伐取廣東；和森則主張解決兩湖問題，……當時和森提出所擬之湖南湖北決議案（已在常委會通過）要求政治局討論追認。……恰好國際來了一個電報，責斥對於土地革命的態度不堅決，……魯易看完兩湖決議案之後，表示完全同意，認為與國際來電相合。翌日魯易提議要求國民政府討伐朱培德，同時派五十名軍事同志赴江西，準備暴動推翻朱培德……此時中央政治局有一點『進攻』的新空氣。……於是中央與國際代表之間，組織一個湖南特別委員會，專為指揮湖南暴動。後來此會開會數次，外國同志將暴動計劃改了又改，同時所決定之款項遷延不發，而我們已派去大批軍事同志前去，需要計劃與款項異常之急，最後外國同志聽了一個不關重要的報告，認為我們自己在湖南的勢力已完全瓦解，暴動為不可能，對於前此所決定之款完全翻臉。於是軍部周恩來同志與魯易大鬧一場，取消此委員會。」

「鄭州下後，中央政治局另一場會議，獨秀同志作了一個樂觀的政治報告，大意是：張發奎軍隊已自動的撤回武漢，唐生智軍隊亦繼續撤回武漢，是共同北伐的計劃已被打消，共同解決C P的危機業已

延遲。魯易接着指明現在情形並不容許樂觀，……當時任弼時同志提議發宣言，於是宣言政綱皆推魯易起草。同時魯易提出兩個『驚人』的建議：（1）武漢全體工人總罷工，反抗國民政府縱容許克祥，……（2）發一反對朱培德、馮玉祥、許克祥的宣傳大綱……可是通過此案的消息傳出去之後，真是聞所未聞的駭人聽聞，老鮑聞之，氣得要死；彭述之聞之，到處宣傳中央與湖北省委『荒唐』，……譚平山聞之，臭罵魯易左派幼稚病，不懂中國情形，……於是羣相告語，若大禍之將至：『這不是與國民政府決裂麼？我們有甚麼準備，能這樣開玩笑！』『國民政府，唐生智、朱培德、馮玉祥……一律表示反對，我們有何力量抵得他們一個打擊？』……

「於是下一場會議，要求取消原案（由多數的反對）……魯易自己表示：『現在既然一些職工運動的重要同志都不贊成罷工反抗國民政府，自然可以容納大家的意見修改原案。』秋白亦說『我們進攻是應有準備的，全無準備而冒然進攻是無益的。』於是立三提議改反抗的示威罷工為歡迎北伐軍凱旋的罷工。同時關於朱培德的口號，亦大加修改。」（註三八）

在這一時期，即五月十八至五月三十日，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了第八次執行委員會，通過了「中國問題決議案」，這一議案據說到六月十一日才發表，共產國際根據議案精神先發出了訓令，亦即蔡和森所說的「恰好國際來了一個電報」，電報是簡單的，就是陳獨秀「告全國同志書」中所列的五項，也就是魯易洩露給汪精衛的幾條。不過後來斯達林與反對派鬥爭時，把訓令全文公佈如下：

「沒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勝利。沒有土地革命，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就會變成不可靠的將軍們的可

機的玩物。必須反對過火行爲，但不能用軍隊，而要通過農民協會。我們堅決主張從下面實際奪取土地。對譚平山的巡視產生顧慮是有某些根據的。不應該脫離工農運動，而應該用一切辦法去協助它。否則就會把事情斷送」。

「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某些老領袖害怕事變，正在動搖和妥協。必須從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農領袖到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裏去。這些新的工農領袖的大膽的呼聲會使老頭們堅定起來。或者使他們變爲廢物。國民黨的現存機構必須予以改變。國民黨的上層必須加以革新，以土地革命中提拔起來的新領袖來補充它，必須靠工會和農民協會的千百萬會員來擴大地方組織。否則國民黨就有脫離實際生活並喪失全部威信的危險。」

「必須根除對不可靠的將軍們的依賴性。動員兩萬左右的共產黨員，加上湖南、湖北約五萬的革命工農，編成幾個新軍，用軍官學校的學生來充當指揮人員，組織（目前還不遲）一支可靠的軍隊。否則就不能保證不失敗。這個工作是困難的，但是沒有別的辦法。」

「組織以有聲望的，不是共產黨員的國民黨人爲首的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和蔣○○保持聯系或唆使士兵殘害人民、殘害工農的軍官。不能祇是勸告。現在是開始行動的時候了。必須懲辦那些壞蛋。如果國民黨人不學會做革命的雅各賓黨人，那末他們是被人民和革命所拋棄的。」（註三九）

共產國際這一訓令，雖然與鮑羅廷一派主張向國民黨左派讓步的政策相反，但也與魯易一派主張兩湖暴動，推翻國民黨中央的意見不同。這一訓令是主張經過土地革命，擴充軍隊來改造國民黨左派，並

要國民黨制裁自己的軍官。這一訓令正說明「國際不懂中國情形」。所以陳獨秀說：「長沙馬日事變」後，國際訓令我們的辦法是：

(一)土地革命應從下級沒收土地，不用國民政府下令沒收。然而不要侵犯軍官的土地。(兩湖的資產階級地主豪紳幾乎沒有一個不是當時的兩湖軍官的自家親戚故舊，而或明或暗受他們包庇之沒收土地若以不侵犯軍官為條件，便是一句廢話。)

(二)以黨部的力量制止農民的「過火」行動。(過去就實行了制止農民的「過火」行動這一可恥的政策，然而事後國際却批評中國黨「常常成了羣衆的阻礙物」，指為中國黨三個最大的機會主義的錯誤之一。)

(三)消滅現在不可靠的將領，武裝兩萬共產黨員，加上從兩湖挑選五萬工農份子組織新軍隊。(如果能得到這許多軍器，為甚麼不直接武裝工農而還要擴張國民黨的新軍隊？又為甚麼不能建立工農兵蘇維埃？既沒有工農兵蘇維埃，又沒有武裝工農，試問有甚麼人用甚麼方法消滅那些不可靠的將領？想必仍是哀求國民黨中央撤換他們，國際代表魯易把國際訓令送給汪精衛看，自然是這個用意。)

(四)在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中，以新的工農份子代表老委員。(我們既然能够這樣自由處分老委員重新改組國民黨，為甚麼不能够自己組織蘇維埃，而必須把工農領袖送到已經屠殺工農的資產階級國民黨裏去，替他們裝璜呢？)

所以知名的國民黨做領袖（不是共產黨員）組織革命法庭，裁判反動的軍官。（已經反動的國民黨領袖所組織的革命法庭，事實上將是誰裁判誰呢？）

企圖在國民黨內執行這些政策，仍然是幻想的口頭上左傾的機會主義，根本政策一點也沒有轉變，等於想在黃缸中洗澡。」（註四〇）

雖然如此，但是匪黨中央還是尊重國際訓令，因而兩湖暴動的決議（即湖南、湖北決議案）以及魯易的「驚人」建議通過了，同時對左派表示了強硬的態度：六月四日發出「中國共產黨告全國農民羣衆書」，號召農民起來「打倒長沙兇橫的軍閥許克祥，打倒大地主及土豪劣紳，恢復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在湖南的政權，建設鄉村自治政府，田地給農民與兵士。」（註四一）同日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陳獨秀」名義致函中國國民黨，指出：「在選擇道路上國民黨已無絲毫猶豫的餘地。土地的改革是到革命之道路。」建議國民黨「立即下令討伐這少數叛徒」，「削平湖南的反革命。」（註四二）可是，這一連串的決議建議和主張，終因「暴動爲不可能」，「多數反對」而取消或修改了；長沙事件也爲了拉攏汪精衛，於六月十三日由毛澤東出面不了了之。所以陳獨秀繼續說：「當時要執行左傾的革命政策，根本政策必須轉變，……否則任何較左的政策都是沒有辦法的辦法，當時中央政治局回答國際的電報說接受國際的訓令，並且依照訓令方針進行，惟聲明不能即時都能實現，因爲中央全體同志都認爲國際這些訓令都是一時沒有辦法的辦法，就是列席中央會議的樊克（聽說他是斯大林的特別使者）也以爲沒有即時執行的可能，他同意中央致國際的電報，說：「祇好這樣回答。」（註四三）六月十五

日匪黨中央答復共產國際的電文如下：

「在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會議，中國共產黨接受一項關於沒收反革命及土豪劣紳的土地議案。共產國際綱領提出沒收反革命的土地。中國共產黨實行土地沒收政策較前更爲努力。土地委員會已再三討論這個問題。最初提出沒收全部土地，結果決定僅沒收大地主的土地。汪精衛回到武漢後，國民黨開始討論土地問題。國民黨土地委員會通過一項決議案，除小地主的土地外，其他土地全部沒收。這個決議案被國民黨政治委員會主席團所認可。但由於軍人的反對，決議案未能公佈。大多數軍官出身於中等及小地主階級，因而對於土地革命是反對的。但並非以土地沒收爲軍事的藉口，而是農民運動『過火』。例如：軍官家屬的土地及財產被沒收，他們的親屬被逮捕，官吏遭受拘捕或懲罰；穀米流通被禁止；向小商人強迫捐款；農民擅自在富人家中取米及吃飯；士兵匯回家中的小款被農民沒收及瓜分。這些過火行動是迫使中小地主階級的軍人聯合土豪劣紳反共產反農民的起因，特別是那些家屬被攻擊的軍人。湖南農民運動的進展太快。國民革命軍百分之九十來自湖南。整個軍人對農運過火不滿，夏斗寅的叛變與長沙事件就是這種普遍不滿的一種表現。在此情況中，不僅國民黨，就是共產黨也必須決定一項讓步的政策。須要節制過火行動及延緩實行土地沒收。對於被中小地主所支援的土豪劣紳一種混合攻擊應該避免，俾可集中我們的力量以反抗反革命。同時此將促進鄉村自治機關的建立與農民的武裝，藉以依據精密的計劃實行土地沒收並予充分的組織。此外，與大多數反革命軍人的一個直接衝突即將到來，與國民黨的決裂即將發生，我們即將變爲一

個反對黨。國民黨內一般論調要與口決鬥，並同時壓制共產黨。在最近的將來我們或不可能留在國民黨內。譚平山的就職演說是曖昧的。那是在夏斗寅叛變後發表的。國民黨決定延擱土地問題決議案以先行擊潰夏斗寅。作爲政府一名閣員的譚平山不能公開地抗辯與國民政府歧異的觀點。你們的訓令是正確而重要的，我們表示我們完全的同意；中國共產黨企求一個民主獨裁，但在短期內不可能完成。以改組的方式把汪精衛拋擲出去是特別地困難。直到我們自覺能够完成這些任務時，須同國民黨與國民革命軍領袖之間維持良好的關係。我們必須引誘他們的左派領袖制定一項共同政綱。如果我們同他們決裂。則我們建立自己的軍事武力將形困難或甚至不可能。沒收大地主及反革命的土政策並不停止。農民自行沒收土地是不禁止。我們目前的工作是糾正『過火』，然後沒收土地並揭破誇大的反動宣傳，藉以平息軍官與左派國民黨的恐慌，如此方可消除農運的障礙。失業的、無地的農民是湖南農運的動力。他們不但要求平分土地，而且分所有的財產；這必然的造成與佃東及自耕農的一種衝突。這必須加以改變，且須以貧農爲運動的中心。」（註四四）

六、政治局領導的破產

陳獨秀於六月十五日答覆共產國際的電文中，已經預料到「與國民黨的決裂即將發生，我們即將變爲一個反對黨。」不過匪黨中央和國際代表還想作最後的努力，以挽回失敗的局勢；「老鮑（按：指鮑羅廷）於武漢軍撤回之後，又極力拉攏唐生智經營東征，以爲唐生智野心勃勃，未得東南之時，還不致

與我們決裂，他再三申言『我的箱內還有草（指蘇聯對武漢政府之借款），他（指唐）還要吃我的草還不至跑掉。』……『進攻』之微波被打消之後，魯易亦喪失了方針，仍然回復到所謂左派中心問題，想極力拉攏汪精衛來挽回一般的危局。……於是『東征』與『汪精衛』遂成爲後一階段的送命湯。……最後的買賣是很明白的：老鮑與C P所要的是在東征時期還不要實行分共；汪精衛與唐生智所要的是東征時間還要吃草。還要請蘇俄的借款快些匯來。『請你保留分共案到南京取下後再談呵！』『請你電催蘇聯借款迅速全數匯來呵！』這是最後的交易。」（註四五）

此時，匪黨中央政治局「完全表現是一種指導破產的階段」，蔡和森起草了一個通告和給上海黨的信，主張提高反帝運動，甚至不惜掀起武裝干涉。鮑羅廷則繼續灌輸他的「機會主義」，在一次政治局的會議上說「土地革命不即是沒收土地」，而是減租減息，鄉村自治，保護佃農，武裝自衛，辦農運講習所等；當時陳獨秀說：「老鮑這種辦法好是好，但是修改了國際土地革命的意義」，瞿秋白當即辯稱：「這不是修改國際土地革命意義，按照中國目前的狀況，確實祇能如此做。」「魯易亦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便是中了『汪毒』。他還想拉住這個唐生智的小老婆（汪精衛）來做左派的『中心』，來擴大左派的武力，他竟把國際來電和盤托出告知汪精衛！……：……在這個嚴重的錯誤之下，中央政治局全體反對魯易，大約老鮑也有電致國際，所以國際調他回去。」「汪精衛知道這個電報之後，謝謝魯易先生，跑向唐生智及其部下將領大大的鼓動起來，說第三國際及C P即要解決國民黨及其一切軍隊，實行共產革命。」（註四六）汪精衛得到魯易的幫助，找到了分共的根據，於是武漢的分共已如箭在弦上。

六月底，三十五軍何鍵部移駐漢口，發表反共宣言，採取積極的反共行動。匪黨中央軍事部於六月二十七夜接到一個緊急報告，說何鍵有今夜舉事之說，次晨陳獨秀在鮑羅廷宅召開緊急會議，蔡和森主張解散糾察隊「以消滅何鍵暴動之藉口」，張國燾提議中央機關立即移往武昌。不料當日處理糾察隊時，手忙腳亂，一時混亂不堪，糾察隊及辦事人員棄槍棄職，逃走一空。（註四七）

「和森在武昌佈置機關妥當後，翌日（按：指二十八日）黃昏獨秀國燾過來，不久秋白亦偕一駝背毛子來。是夜開會於武昌之新機關：（1）國燾提出整軍經武，注意軍事工作；（2）C P中央來一決議，批評黨的中央迴避土地革命，獨秀大發雷霆，碎之於地；（3）秋白有甚長之書面提議，……；主張土地革命，……；待有武力再實行沒收土地，中心問題仍在貫徹對國民黨左派讓步政策；（4）駝背毛子出一答覆國際之電稿，內有『凡不遵守國際訓令者剝奪其中央之指導權』之語句。國燾之提議未注意討論，獨秀看完秋白書面提議，深以為然，決定請秋白本此提議起草一正式決議案，於七月一日召集一次活動分子會，或中央擴大會。」

六月二十九日，「有幾位同志激烈反對中央移於武昌」，「於是又決定中央機關仍回漢口」，當日再開會鮑宅，正式決定七月一日開匪黨中央擴大會。

「翌日（按：為六月三十日）又開會於鮑宅，老鮑出席做了一個很長的演說。大意是：（1）現在國際方面有一種空氣，認我們中國黨有改良主義，其實此改良主義並不存在，我的每一政策至少要比魯易十倍以上；（2）中國現狀在客觀上是很有利於我們的，在客觀上無產階級本有取得領導權

之可能，……可是我們主觀的力量沒有成熟，我們不能真正領導農民（是地痞領導的），……（斯大林（俄黨首領）主張土地革命的政策是對的，可是斯大林他所接受於季諾維夫（國際第七次大會前的委員長，反對派首領）的遺產太壞了。以前季諾維夫及其在中國的代表（大約指魏琴斯克 Voinisky）祇教我們幫助中國資產階級，武裝中國資產階級，未教我們武裝工農，準備與資產階級決裂。所以現在斯大林的政策難以實行……」。

「獨秀接著說『以前季諾維夫一向教我們幫助資產階級，現在斯大林叫我們二十四點鐘內實行土地革命！』駝背毛子與少年國際代表則提出一反對老鮑演說的決議，指明第三國際對於中國革命的方針前後是一致的。從前季諾維夫的政策是經過俄國C P中央批准的，不是季諾維夫個人決定的。老鮑巧得很，反指他們是幫助季諾維夫說話，是幫助反對派。」

「最後的破產到了，七月一日武昌的中央擴大會是五次大會後機會主義的總結。但這不是秋白同志獨秀同志個人的責任；秋白主持的決議和說明中，不過是兩月以來（五次大會後）動搖、猶豫、迴避土地革命，向所謂左派讓步政策之總結罷了。」（註四八）擴大會通過了國共兩黨關係議決案，共十一案，其中有如下幾條：

四、中國國民黨既然是反帝國主義工農及小資產階級所聯盟的黨，當然處於國民革命之領導地位。

五、國民黨中的共黨分子，雖然參加政府（中央及地方）工作，而祇是以國民黨員資格參加，

不是以共產黨黨員資格參加；兩黨聯席會議，是協商決定共同負責，而不是兩黨公開執行形式，這件事多不含有聯合政權的意義（現在參加政府工作之共產黨份子，爲圖減少政局之糾紛，可以請假）。

六、工農等民衆團體均應受國民黨部之領導與監督，工農等民衆運動之要求，應依照國民黨大會與中央會議之議決案及政府公開之法令，但國民黨員亦應該依據黨的議決案及政府之法令保護工農羣衆之組織自由及利益。

七、依照國民黨主義，須武裝農民，但工農武裝隊均應服從政府之管理與訓練。武漢現有的武裝糾察隊，祇因避免政局之糾紛，可以減少或編入軍隊。

八、工會及工人糾察隊不得黨部或政府之許可，不得執行司法行政權，捕人，審判及巡邏街市等事。

九、店員工會應即由黨部會同省總工會派員組織，店員的經濟要求不得超過店東的經濟能力以上，工會不得干涉店東的用人權、管理權，更不能侮辱店東，如逮捕、罰款、戴高帽子等事。

十、童子團執行警察職務，如捕人、干涉行人等事，應嚴行禁止。（註四九）

匪黨擴大會決議，雖極盡讓步之能事，以圖挽救分共危局於萬一，尤盼「吃草」及「東征」渡過難關；可是何鍵卻公開宣稱：「不分共不能東征，不願爲C P東征」。汪精衛乃把譚平山請去，要他與蘇兆徵立即上辭呈退出國民政府，唐生智則提出優待辦法，送譚、蘇出國考察。於是武漢分共正式開始。

「及至七月十三日的前幾日，老鮑才提出國際來電，以C P中央名義發表一批評式的退出國民政府的宣言（國際來電是要我們示威的退出），此宣言之末尾還有『希望』國民黨中央及其政府的幻想。」（註五〇）匪黨這一對時局宣言和譚平山蘇兆徵辭職書，同時在「嚮導週報」最後一期（二〇一期）刊出。武漢國民黨中央亦於七月十五日召開會議，實行分共，武漢時期的悲劇從此結束，匪黨中央政治局的領導也徹底破產。

七、失敗責任的檢討

在匪黨黨史的記述上，把五卅運動至武漢時期稱爲中國第一次大革命（後來又改稱爲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而武漢分共起，則稱之爲大革命的失敗，從此革命轉入了低潮。這一「失敗」，不但在中國黨內引起了劇烈的鬥爭，而且在俄共內部也掀起了風暴般的攻擊，俄共反對派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季諾維也夫（Zinoviev）加米涅夫（Kamenev）等紛紛指責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指導中國共產黨的錯誤，說中國革命的失敗應當歸咎於共產國際的錯誤政策。斯大林爲了反駁反對派，爲了替自己和共產國際辯護，除解釋中國革命是「暫時的失敗」以外，特別強調中國共產黨這一時期的成就，他說：

「中國共產黨在短時期內從一個五六十人的小集團發展爲擁有六萬黨員的羣衆性的政黨；中國共產黨在這個時期內把將近三百萬無產者組織到工會裏來；中國共產黨把千百萬農民從沉睡中喚醒並把幾千

萬農民吸收到革命的農民協會裏來；中國共產黨在這個時期內把整團整師的國民黨革命軍爭取到自己方面來；中國共產黨在這個時期內把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思想由願望變成了事實，——中國共產黨在短期內獲得這一切成就，其原因之一就在於它是遵循列寧所規定的道路、遵循共產國際所指示的道路前進的。

「（註五一）」

斯大林所以強調中共的成就，在於證明他和共產國際指導的正確，證明中共的路線是遵循列寧和共產國際所指示的道路前進。同時對於中共當時的錯誤加以原諒，而且拿俄共的黨史爲中共的錯誤辯護，似乎這些錯誤是不可避免的。斯大林這樣說：

「誠然，中國共產黨不善於利用這一時期的一切可能。誠然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這一時期犯了一系列的極大錯誤。但是以爲中國共產黨能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一下子就成爲真正的布爾塞維克黨，那就可笑了。祇要把我們黨經歷過的一系列的分裂、脫離、變質、叛賣等歷史回憶一下，就能明白真正布爾塞維克黨並不是一下子就能產生出來的。」（註五二）

可是，爲什麼「中國革命遭到了暫時的失敗」呢？斯大林解釋說，那是「因爲帝國主義者和封建主義在中國暫時還較強大，所以革命遭到了暫時的失敗。」（註五三）

同時斯大林還特別解釋，有了正確的政策，如果敵人的力量大於革命的力量，革命還是不可能勝利的。他繼續說道：

「布爾塞維克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的政策是否正確呢？是的，是正確的。既然有蘇維埃的存在，既

然有布爾塞維克的正確政策，一九〇五年的革命爲甚麼還遭到失敗呢？因爲封建殘餘和專制政體當時比工人的革命運動要強大些。」

「布爾塞維克在一九一七年七月的政策是否正確呢？是的，是正確的。既然有蘇維埃的存在（蘇維埃當時背叛了布爾塞維克），既然有布爾塞維克的正確政策，布爾塞維克當時爲甚麼還遭到失敗呢？因爲俄國帝國主義當時比工人的革命運動要強大些。」（註五四）

很明顯的，斯大林對於中國革命「暫時的失敗」歸咎於客觀的敵人的力量太大，對於主觀的中共「一系列的極大的錯誤」不是主要的，而且是難免的；因爲「反革命」力量大於革命力量，縱使有了正確的政策，還是不可能勝利的。這樣，對於當時中共領導的錯誤是一種解脫，對於當時中共的領導者是一種「愛護」。可是陳獨秀並不領情，陳獨秀反而說：「我堅決的認爲中國過去革命的失敗，客觀上原因是次要的，主要的是黨的機會主義之錯誤，即對於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政策之錯誤。」，「若以爲敵人的力量如果強大些，雖有正確的政策還是不能勝利，則俄國一九〇五年的失敗和中國一九二七年的失敗，以及其他一切革命工人運動之失敗都是命定的了！我不願意斯大林爲中國黨有這樣的辯護，我更不願意藉斯大林的話爲我自己辯。」（註五五）

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的認識與斯大林的看法也是不同的。「八七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政
治任務與策略的議決案」，在這議決案中說：「這當然是中國革命的極大的嚴重的失敗。這一失敗的責任，大部份是由於中國共產黨指導之機會主義政策，阻礙了羣衆的革命鬥爭而放任資產階級的行動。」

（註五六）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中共六次全國大會，在總結「過去鬥爭的經驗」時，指出：「中國革命失敗的客觀原因」，「一是帝國主義的力量強大」，「二是民族資產階級背叛革命」，「三是地主領導的軍隊力量很大」，「四是工農發展的不平衡」，「五是小資產階級的動搖」；「然而客觀上的困難，並沒有完全決定中國革命必然要失敗的力量。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大會認為：中國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就是當時無產階級先鋒的共產黨指導機關的機會主義政策。」（註五七）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中央「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又寫道：「由於當時的同盟者國民黨內的反動集團在一九二七年叛變了這個革命，由於當時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集團的聯合力量過於強大，特別是由於在這個革命的最後一個時期（約有半年時間），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思想，發展為投降主義路線，……這次革命終於失敗了。」（註五八）

當然，對於中國革命「失敗」主要原因的不同認識和檢討，是關連到責任問題，是有其重大作用的。史大林把失敗的主要原因推給客觀環境，為的是替自己和共產國際辯護，為的是抵抗俄共反對派的猛烈攻擊。中國共產黨把失敗的主要原因歸咎於主觀的黨的機會主義，目的在於澈底推翻陳獨秀的領導；陳獨秀是中共的始創人，五度担任中共中央的總書記，在中共黨內有高度的信仰和威望，不如此，無法摧毀其根深蒂固的基礎。至於陳獨秀呢，他不要斯大林為其辯護，直認失敗的原因是黨的機會主義錯誤，那又是另一種想法；陳獨秀坦白承認了機會主義的錯誤，因而斷送了中國革命，不過機會主義的來源則是共產國際，把失敗的指導責任交還斯大林和共產國際。他說：

「現有的中央說我們企圖把中國革命失敗的責任推到國際好躲避自己的責任，這簡直是笑話。任何人都不能因為他犯過機會主義而永遠取消他批評上級機關的機會主義及他自己回到馬克斯列寧主義之權利，同時任何人也不能因為機會主義之來源出於上級機關而有躲避自己執行機會主義政策的責任之自由，機會主義政策固然來源於國際，然而中國黨的領導者為甚麼不向國際抗議而忠實的執行，這個責任又推到誰呢？我們應該很坦白的很客觀的認識過去以至現在的機會主義政策，都是來自國際，國際是應該負責任的。幼稚的中國黨還沒有自己發明理論決定政策的能力；至於盲目的執行國際機會主義政策，而沒有絲毫認識與抗議，這是中國黨領導機關應該負責任的。若是互相推諉，大家都各自以為沒有甚麼錯誤，難道是羣衆的錯誤嗎？這不是太滑稽，簡直對革命不負責任！」（註五九）

持平而論，斯大林的分析固然是為自己辯護，但在若干方面尚符合當時的情勢，一般說是比較冷靜的。就武漢時期的局勢而論，兩湖是處於四面強大的反對力量包圍之中，毫無迴環退守或發展的餘地。武漢政權的武裝力量，掌握在反共的將領手中，縱使汪精衛等追隨共黨到底，把政權過渡到工農民主專政，內外的反共力量，隨時可以起來予以推翻。如果共黨和武漢左派澈底實行土地改革，那麼，夏斗寅事件和馬日事變更要提前爆發。所以蔡和森所說的圍攻長沙，兩湖暴動，討伐朱培德等決定，如果真的發動起來，那麼，那些沒有槍械，沒有軍事訓練的農民，絕不是正規軍的對手，其失敗一定更慘。當時共黨所能掌握的部隊，不過是葉挺的一個師和軍校的若干力量，安能抵抗各方的聯合進攻。後來中共所發動的南昌暴動，湘鄂贛粵的四省秋收暴動，以及廣州暴動全都失敗了，這就證明：如果在武漢時期，

共黨就要發動兩湖暴動，實行土改，執行所謂正確的政策，那麼，共黨的失敗必定更大更慘。

就事實而論，陳獨秀的看法，有一部份是對的，那就是機會主義政策係來自國際，因為第一，正如陳獨秀所說，中共還很幼稚，對於所謂馬列主義還沒有足够的理解和修養，對於工作和所謂鬥爭經驗也非常貧乏；在國民革命的大風浪中，表現手足無措，確實沒有「決定政策的能力」，祇好一切依靠上級，聽命共產國際的決策。第二，中國共產黨係在共產國際扶助下建立起來的。從建黨起，中共的經費就依賴共產國際和俄共的供應，人事的調配，中央委員的名單，尤其總書記的決定，事要先經共產國際的審查和批准。領導幹部要經過莫斯科的訓練和考查。養成了共產國際俄共與中國共產黨間主奴關係，也就是中共現在所說的「父子黨」的關係，其聽命於莫斯科幾乎是絕對的。第三，中共從建黨起，其政策路線全部來自莫斯科。一全大會時，中共以為中國應實行社會主義革命，要反對 孫中山先生的南方政府，後來列寧和共產國際加以糾正，說中國是民主主義革命。聯合戰線是莫斯科的決策，中共黨員個人加入國民黨也是共產國際代表以紀律脅迫而成，而且是國際代表馬林和越飛直接與 孫中山先生商議決定的，陳獨秀屢次想退出國民黨，共產國際一再嚴厲予以批評和糾正。中山艦事變後的退守策略，南京事件，上海暴動後的政策，以及參加武漢政權，支持二次北伐，實行土地革命等等，無一不是共產國際的指示。共產國際幾乎完全代替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第四，中國共產黨從建黨起，共產國際經常派有代表在中國直接指揮中共，先有威經斯基、馬林，後有鮑羅廷、羅易和遠東部，而且還有秘密警察和龐大的代表團，分佈在工運、農運、青年團、軍事部等方面，這些代表控制了中共各方面的系統和工作。從

蔡和森所寫的「機會主義史」觀察，武漢時期，中共的一切決定，完全聽命於國際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人員，祇能在鮑羅廷、羅易的矛盾中取得發言的餘地；而鮑羅廷、羅易的決策，恰好又是被認為右傾與左傾的十足的機會主義。這樣一來，中共祇好死心踏地執行來自上級的機會主義了。所有這些事實，都說明中共的政策確是來自莫斯科。如果說，中國共產黨執行了機會主義的政策路線，那麼直接指揮中共，並決定中共政策的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當然就推卸不了指導錯誤的責任。

看來祇有「八七會議」以後歷屆的中共中央，對於「失敗」責任的檢討，近乎主觀和武斷。他們把鬥爭的火力完全集中在陳獨秀身上，其目的除剷除陳獨秀的影響和基礎外，同時要替共產國際解脫指導錯誤的責任。他們一再聲稱共產國際的領導是正確的，錯誤在於陳獨秀「拒絕執行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同志的許多英明指示。」（注六〇）其實所謂「英明指示」，照鮑羅廷的說法，那是俄共反對派季諾維也夫的遺產，斯大林的特別使者樊克「也以爲沒有即時執行的可能」，陳獨秀和「中央全體同志」認定是「沒有辦法的辦法」，羅易却鬧着要推翻國民黨，建立工農專政。可見所謂「英明指示」不過是脫離現實的空談，而堅決拒絕執行指示的，恰好就是共產國際自己所派的代表。可是匪黨史家和中共中央對於國際，對於國際代表，歷來就不敢有半句的批評和異議，雖然在內部的報告上如「機會主義史」已有詳細的紀錄，雖然中共中央的高級人員在武漢是身歷其境的。爲什麼中共的好漢們如此膽怯，連一點批評的勇氣都沒有呢？原因就在於那是「老子黨」呀！

中共中央之所以集中全力攻擊陳獨秀，乃至後來把他開除出黨的另一作用，爲的是掩飾和洗刷新任

中央負責人的機會主義色彩和責任。蔡和森是反對陳獨秀的健將，他所撰的「機會主義史」，除對他本人和毛澤東（按：八七會議前後，中共黨內傳說蔡、毛等人搞小組織）盡量加以掩飾外，所記情形大體是可信的，照他的記述看來：第一、感染機會主義毒素最深的，便是接替陳獨秀任總書記的瞿秋白，當時瞿任中共中央農民部長，後來補任政治局常委，他在「嚮導週報」公開批評農運幼稚，「在農民部通告上大罵農民『過火』」，運動是流氓行動，命令各級黨部須顧到國民政府一般政策。」（註六一）在共黨歷史上，被指斥為「集機會主義之大成的十一條國共關係政綱」。（註六二）亦即武漢時期七月一日，中共中央擴大會議的決議，這一議案正是瞿秋白的主張，而且是他起草和在擴大會中說明的。第二、李立三也是一名機會主義健將，他主張把工人的反抗示威和罷工，改為歡迎北伐軍的凱旋，「馬日事變」後，國際代表魯易說了一聲：『國民黨中央已經是反革命了！』李立三馬上紅著臉提高了嗓子抗議道：『魯易同志說這樣的話，簡直是送棺材給中國黨！』（註六三）。第三、蔡和森雖然為自己掩飾，但也承認曾主動的寫了一封機會主義的信和通告給上海黨，這封信被「八七會議告全黨黨員書」痛加斥責，指為「孟塞維克派似的。」同時「蔡和森力主自行取消漢口總糾察隊武裝，以避免和國民黨軍隊衝突。」（註六四）這點，蔡和森在「機會主義史」中也承認了。第四、至於毛匪澤東，他之反對陳獨秀，係由於五全大會時，陳獨秀剝奪了他的表決權，選舉時沒有讓他當選中央委員。毛澤東同樣是當時機會主義追隨者，他與譚平山代表中共參加國民黨中央的土地委員會（餘三人為左派分子徐謙、顧孟餘、鄧演達），開會多次，決議不少，可是一事無成，毛澤東不無責任。馬日事變後，毛匪代表中共中央與汪

精衛等商量解決湖南長沙事件，在討論中，毛澤東向汪精衛報告說湖南農運是哥老會把持，「祇曉得作殺人放火的勾當」。第五、關於向忠發等人後來彭述之也說：「至於忠發同志，現在是我們黨的總書記，但在武漢時究竟是如何呢？他在六次大會上自己公開承認他在武漢時是作了工賊的工作（見布哈林報告的結論），這「工賊的工作」已經不是機會主義，直是反革命了，然而作過反革命的工賊工作的忠發同志，現在依然還是我們黨的總書記。……至於李維漢同志，大家都知道，是馬夜事變，臨陣脫逃的人，……即如在座的代英同志（按：即惲代英）你能說你當時沒有機會主義的錯誤嗎？……對於當時我黨的機會主義錯誤，我們應當坦白地承認每個人的責任。自然，整個的機會主義指導是國際的，但在中共一方面說，每個會負指導責任的人都不好祇圖塞責，學那「功歸於己，罪卸予人」的市儈行爲，何況像秋白、立三、維漢、恩來等同志不僅是機會主義的負責者，並且同時是盲動主義，即另一種機會主義的負責者，更應該自己明白呢！」（註六五）

由此可見，在武漢時期，中國共產黨過去的和現在的首腦人員，無一而非機會主義好手，其爲機會主義叫喊，有的較陳獨秀還要響亮。八七會議一開，一聲反對陳獨秀機會主義，這些機會主義門徒，立即搖身一變，竟成爲反機會主義的英雄了。

八、兩種機會主義類型

共產國際和匪黨中央指責陳獨秀的機會主義，是說不堅決實行土地革命，儘是向左派讓步的投降主

義。而陳獨秀指責共產國際的機會主義領導，則是不退出國民黨，不與國民黨建立黨外聯盟，留在國民黨內，屈服於國民黨的機會主義政策。這是兩種機會主義的類型，也就是問題爭執的焦點。

斯大林認為國民黨是中國革命的民族特點。中國革命不能跳過這個特點，否則便是射遠了的策略，中共一定要留在國民黨內，在國民黨內奪取領導權，轉變武漢政權為工農民主獨裁制，從而走向非資本主義前途。陳獨秀則以為「當時要執行左傾的革命政策，根本政策必須轉變，即是共產黨退出國民黨真正獨立起來，儘可能的武裝工農，建立工農兵蘇維埃，推倒國民黨的領導。否則任何較左的政策，都是沒有辦法的辦法。」（註六六）於是中共中央許多負責人都認定「國際不懂中國情形，政策過左。」（註六七）

瞿秋白在解釋這一問題時，又是另一種看法，他說：「在魯易及莫斯科的同志們以為中國農工小資產階級聯盟業已成功，國民政府內已經完全沒有資產階級的成分，所以認土地革命可以盡量實行。老鮑則認工農小資產階級聯盟還未成功，因國民政府內還保留許多資產階級成分，所以土地革命不能澈底實行。」（註六八）這就是問題關鍵所在。究竟誰是誰非，已無深究必要，因為兩種機會主義都被歷史的發展所否定了。

陳獨秀被指責的機會主義錯誤之一，便是向左派讓步的投降路線，尤其不澈底實行土地革命，主張勞資仲裁等等。可是要知道，當時第三國際的代表鮑羅廷是國民黨的顧問，也是許多顧問中的總顧問或稱為首席顧問，羅易則是武漢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的名譽主席。國民黨左派首腦「聯俄聯共」商談的

對手，正是這批以俄援爲後盾，箱子裏有「草」的共產國際代表，而不是那批一無所有的陳獨秀等中國人。陳獨秀既是向左派投降而成爲機會主義者，那麼，國際代表又是甚麼呢？何況共產國際六月一日的訓令還指明「必須反對過火行爲」呢！

陳獨秀被指斥爲投降主義的另一錯誤，便是工農武裝問題，而且說「武漢政府準備發一千五百枝槍給工人糾察隊，陳獨秀不要。」（註六九）但是蔡和森的記述則不同，他說：「工人糾察隊要求國民政府漢陽兵工廠發二千枝槍，并幾千元月費，汪精衛等在口頭上答應了」。「但後來他們又故意推延不發。」（註七〇）那裏是「陳獨秀不要，以表示自己沒有『陰謀』和對武漢政府的『忠心』」呢？（註七一）而且還在廣州的時候，陳獨秀就曾要求勻五千枝槍來武裝農民，可是被國際代表拒絕了。上海工人糾察隊有槍一千七百餘枝，機關槍等數十挺，（註七二）被共產國際下令埋藏起來。武漢時期認定「暴動爲不可能」，取消湖南暴動的也是俄共派來的一批「外國同志」。既然陳獨秀是投降主義者，然則這些國際代表「外國同志」又是甚麼？

陳獨秀投降主義者「爲了拉攏國民黨領袖，還透露了共產國際五月的指示」。（註七三）洩漏共產國際電令給汪精衛的是羅易，這是衆所週知的事實，且經羅易承認并加解釋。現在中共史家居然張冠李戴，說是陳獨秀所爲，這種明目張膽的歪曲爲的是什麼呢？還不是爲國際代表的機會主義打掩護嗎？

「陳獨秀另一種機會主義的理論是到西北去的理論。認爲在廣州、上海、漢口、天津以及其他工業區，都不能發展革命，因爲那裏有強大的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反動力量。革命應當轉移到西北各省去

，因爲在那裏，帝國主義的影響比較薄弱，革命力量容易成長起來。因此陳獨秀主張革命要退出東南各省，到西北地區去。」（註七四）其實這種「西北學說」是鮑羅廷的主張（又、中共史家批評陳獨秀的「革命擴大論」同樣是鮑羅廷的主張。）蔡和森在批評鮑羅廷時說：「老鮑堅決主張在此政綱中：（1）不要提土地革命；（2）不要提武裝工農及工人糾察隊；（3）此政綱專爲適於東征之用，……從前北伐是唯一出路，現在東征是唯一出路。……前後照應，一氣相承，這是西北學說的精神。」（註七五）又，現在匪黨史家，把鮑羅廷的「東征」「交易」也推在陳獨秀身上，好像陳獨秀箱裏也有「草」！另據羅易所記，也說：「鮑羅廷另外提議一個失敗的理論。他爭辯武漢革命軍力過於膽弱，武漢未必能固守，因此他主張遺留部隊應安全撤退至西北建立新基地。」（註七六）既然是鮑羅廷的主張，何必一定說是陳獨秀的理論呢？陳獨秀早已聲明他還沒有「發明理論」的能力呀！其實後來毛澤東失敗於江西，逃到西北，利用抗日，壯大力量，終於竊據大陸，這正是「西北學說」的衣鉢，毛匪澤東理應感拜鮑羅廷的遺訓呢！

關於陳獨秀所主持的五次全國大會，共黨也有幾種不同的估價：共產國際代表羅易給予最高的評價，他說五次大會是「世界社會主義鬥爭史上的一個新標界。」蔡和森認爲機會主義僅僅是在五次大會以後的兩個月中產生的，五次大會決議是正確的，譬如「五次大會決定軍事工作的方針是破壞一切舊軍隊，和武裝工農。」「假如我們能……堅決的實行國際及五次大會的決議，……武漢政府及國民黨中央完全可在我們的勢力之下改組，……。」（註七七）「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對於五大雖有批評

，但認為「大會關於中央報告所通過的決議，大部份是與國際立場相符的。」（註七八）一般說，共黨的前期黨史書刊對於五次大會的估價是肯定的；後期的記述則又不同了，「中國共產黨歷史簡編」及「中國現代革命史」等，一面說「第五次代表大會接受了共產國際第七次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關於中國問題的提綱」。（註七九）一面又說「第五次大會在事實上，就沒有解決任何問題。」（註八〇）此種說法，雖然自相矛盾，但是有一個共同目的，那就是便於指斥陳獨秀的機會主義。因為「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既然判定了陳獨秀的機會主義，在黨內佔了統治地位約有半年時間，那麼，在這半年中，何能自打嘴巴，又說有一個非機會主義的五次大會呢？

註 一：「中國問題決議案」——一九二七年五月共產國際第八次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通過——「中國問題指南」第一冊。

註 二：斯大林「中國革命問題」——聯共（布）中央批准的給宣傳員的提綱。「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九卷二〇三頁。

註 三：同註一。

註 四：斯大林「和中山大學學生的談話」（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九卷二二九、二三〇頁。

註 五：「蘇聯陰謀文證彙編」第三冊。

註 六：陳獨秀「對於國民黨再起的希望」——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日「嚮導週報」第七七期。

註 七：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註 八、九：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日武漢中央政治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議速記錄。

註一〇：一九二七年五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中國問題指南」第一冊。
註一一：據共黨前期書刊之記載如「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上冊稱：「五大」係於四月二十四日舉行。後期之記述如「中國現代革命史」「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中國共產黨歷史簡編」等則稱：「五大」係於四月二十七日召開。蔡和森之「機會主義史」又謂：「五次大會開幕兩星期，五月十八日夏斗寅在湖北叛變」，則開幕應為五月四日，即汪精衛到會聽取國際代表報告之日。查「五大」告中國民衆書及告世界無產階級書，均署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本文即根據「嚮導週報」此一記載，判為五月一日正式開會。
註一二：羅易(M. N. Roy)「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之意義」——一九二七年五月八日「嚮導週報」一九五期。

註一三：一九二七年五月四日武漢中央政治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速記錄。

註一四—二〇：羅易「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之意義」。

註二一：瞿秋白「農民政權與土地革命」——一九二七年五月八日「嚮導週報」一九五期。
註二二：羅易「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之意義」。

註二三：何幹之主編「中國現代革命史」一〇八、一〇九頁。

據國際關係研究所出版之「中共人名錄」載稱：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了二十九個中央委員和十一個候補中央委員，其中主要人員爲：陳獨秀、張國燾、譚平山、蔡和森、瞿秋白、李維漢、李立三、周恩來、鄧中夏、羅亦農、項英、向忠發、彭公達、陸沉、陳譚秋、彭湃、趙士炎、陳延年、陳喬年、張太雷、蘇兆徵、羅章龍、任弼時等。

註二四：「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上冊二三五頁。

註二五：何幹之主編「中國現代革命史」一〇二頁。

註二六：何幹之主編「中國現代革命史」一〇二、一〇三頁。

註二七：蔡和森「機會主義史」——黎民魂編著「謀叛黨國之赤色檔案」一九二八年七月出版。

註二八：瞿秋白「五卅二週紀念與國民革命聯合戰線」——一九二七年五月三十日「嚮導週報」一九六期。

註二九：陳獨秀「湖南政變與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嚮導週報」一九九期。

註三〇：「長沙事變經過情形」——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嚮導週報」一九九期。

註三一：「中國共產黨告全國農民羣衆書」——一九二七年六月八日「嚮導週報」一九七期。

註三二—三四：蔡和森「機會主義史」。

註三五：武漢中央政治委員會第二十八次會議速記錄。

註三六—三八：蔡和森「機會主義史」。

註三九：斯大林「國際形勢和保衛蘇聯」——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上演說。「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十卷三一、三二頁。

註四〇：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印發。

註四一、四二：一九二七年六月八日「嚮導週報」一九七期。

註四三：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

註四四：蔣永敬「鮑羅廷與武漢政權」三四八—三五〇頁。原引自「Robert C. North and Xenia J. Fudin,

M. N. Roy's mission to China Document 29, P. 338—34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

註四五—四八：蔡和森「機會主義史」

註四九：中共中央「八七會議告全黨黨員書」——「中國問題指南」第二冊。

註五〇：蔡和森「機會主義史」。

註五一：斯大林「國際形勢和保衛蘇聯」——「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十卷三四頁。

註五二：斯大林「時事問題簡評」——「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九卷三〇八頁。

註五三：斯大林「時事問題簡評」——「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九卷三〇八、三〇九頁。

註五四：斯大林「時事問題簡評」——「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九卷三〇九頁。

註五五：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

註五六：中共中央「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任務與策略的議決案」——匪黨中央密件「中央通訊」第二期，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註五七：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政治決議案」——「中國問題指南」第二冊。

註五八：「毛澤東選集」第三卷（附錄）中文本九五六、九五七頁。一九五三年五月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

註五九：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

註六〇：中共中央「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中文本九五六頁。

註六一：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

註六二：華崗「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國共產黨」——「布爾塞維克」（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四卷三期。

註六三、六四：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

註六五：彭述之「聯席會議談話」。即：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二日在支部幹事會及中央省委區委各代表參加的聯席會議上所發表之意見。

註六六：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

註六七、六八：蔡和森「機會主義史」。

註六九：王實等「中國共產黨歷史簡編」九一頁——一九五八年九月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一版。

註七〇：蔡和森「機會主義史」。

註七一：同注六九。

註七二：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嚮導週報」一九四期。

註七三：何幹之主編「中國現代革命史」一一三頁。

註七四：何幹之主編「中國現代革命史」一〇七頁。

註七五：蔡和森「機會主義史」。

註七六：諾斯「莫斯科與中共」(Robert Carver North: Moscow and Chinese Communists) 中譯本·八八

頁——一九五六年七月香港亞洲出版社出版。

註七七：蔡和森「機會主義史」。

註七八：「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上册二四三頁。

註七九：何幹之主編「中國現代革命史」一〇七頁。

註八〇：王實等「中國共產黨歷史簡編」八七頁。

何幹之主編「中國現代革命史」一〇九頁。

附錄：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為「五一」節紀念告中

國民衆書 (摘錄)

中國的工人和一切被壓迫的民衆！

一九二七年的「五一」到了！今年的「五一」不單是中國無產階級檢閱自己的革命隊伍的日子。今年的「五一」正是中國革命急劇進展的時機，也正是帝國主義軍閥及反動的大資產階級四面圍攻中國革命的時候。中國工人階級歷來當國民革命的急先鋒，他的目的，是要反抗中外大資本家的剝削及一切帝國主義的統治，是要推翻軍閥地主買辦的政權，而使革命的勝利擴大到了半個中國，他的勇猛犧牲的精神是中國歷史上所從沒有見過前例的，他在事實上證明自己是唯

一能解放中國民族及一切民衆的階級；非他做中國革命的領袖階級中國革命是決不能徹底勝利的。

現在革命的進展，正朝著徹底勝利的道路上走去。今年中國工人階級的「五一」運動——每日八小時工作的運動，決不僅是宣傳示威而已，中國工人階級已經要力爭自己階級利益的保障，要用自己的力量保障革命的勝利和工人階級的利

益——他要求在最短期間確定勞動法，親自參與監督勞動法的實施，如工作時間、工廠衛生、最低工資、女工童工的保護等——設立勞工檢查院。因為祇有革命能如此的逐步深入，才能摧毀帝國主義軍閥大資產階級土豪劣紳的反革命勢力。而後國民革命的勝利方能鞏固。

中國的大資產階級在經濟上不能不依賴帝國主義，他要剝削工人和農民，要剝削小商人及一般民衆，但是工人階級要領導革命來解放一般民衆，擁護一般民衆的自由和權利，於是資產階級看見革命的真正發展，危害他的私利，所以他寧可接受帝國主義的命令而開始屠殺工人，摧殘共產黨和革命的國民黨，壓迫一般民衆——跑到反革命的道路上去。他現在和帝國主義共同進攻無產階級，就是因為無產階級是革命中的主力軍，如果無產階級勢力不被摧殘，他是無從破壞革命的。如果革命破壞而中途停止，那末，中國一切被壓迫民衆，都要受著帝國主義軍閥及反動資產階級的更加嚴厲殘暴的壓迫。所以中國工人階級現在要聯合農民及一切被壓迫民衆，反抗軍閥和大資產階級。工人階級要聯合農民實行推翻土豪劣紳的政權并沒收大地主的土地；要聯合革命軍人及兵士，實行革命戰爭，改善革命的兵士生活；要聯合一般民衆參加并鞏固革命政權，廢除苛捐雜稅，實現民主政權的獨裁，鎮壓一切反革命。因為祇有如此，才能一方面摧毀軍閥及反動派的根基，別方面鞏固并發展革命。今年的「五一」紀念正中表示工農商學兵等一切被壓迫民衆的革命團結，去鎮壓反動，殲滅軍閥。

帝國主義呢，也因為中國革命急劇的進展，除利用軍閥及反動的資產階級之外，還在實行對於革命根據地的封鎖，并且開始以武力直接干涉中國革命。中國一切被壓迫民衆，都應當在中國工人階級領導之下，去和世界無產階級及被壓迫民族，結合更密切的聯盟，反對帝國主義干涉。中國革命現在成爲世界革命主要的勢力之一。今年世界無產階級的「五一」紀念，可以稱爲反對帝國主義干涉中國的示威運動了！中國工人階級及被壓迫民衆，應當做世界的「五一」運動

中的主要隊伍。中國工人及被壓迫民衆和世界無產階級及被壓迫民族的聯合，在今年的「五一」紀念中，真正表示他的現實的意義。這一件大的革命的世界聯合，終竟要打破世界資本帝國主義的穩定，而得到最終的勝利！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

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

（錄自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出版之「嚮導」週報第一九四期）

第十一章 中共的盲動主義

一、八一南昌暴動

武漢「左派」七月十五日的分共，最初是採取和平的方法，即武漢國民黨中央在分共會議中，曾議決：「保護共產黨員個人身體自由」（註一），因而分共之後，匪黨首要分子及其幹部人員，得以從容轉入爲其所掌握的部隊之中；一面求得安全掩護，一面積極策劃暴動。

武漢「左派」自決定「東征」之後，第二方面軍張發奎之四軍，十一軍、二十軍紛紛移駐九江南昌一線。張發奎並收容共黨分子譚代英爲其總指揮部之總參議，高語罕爲祕書長。（註二）十一軍二十四師師長葉挺爲共黨分子，二十軍軍長賀龍爲共黨同路人，而朱德教導團（屬朱培德部）之一部亦駐南昌（朱德兼任南昌省會公安局局長），這樣，當時共黨所掌握的兵力計有葉挺部五個團，賀龍部六個團，朱德兩個連，共約一萬六千人。匪黨乃以此一兵力爲基礎，並裹脅十一軍第十師蔡廷鍇部五千人（蔡部後來軍行至江西進賢始脫離葉賀軍），於八月一日在南昌舉行暴動，收繳三、六、九軍駐南昌的部隊四個團，規奪銀行現金九十七萬四千餘元，鈔票八十餘萬元。（註三）。繼續利用國民黨名義，成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以共黨分子譚平山、周恩來、張國燾、李立三、高語罕、林祖涵、吳玉章、賀龍（南昌暴動後加入共黨）、郭沫若、惲代英、夏曦、徐特立、葉挺、蘇兆徵、向忠發、韓麟符、楊匏安、方維夏及左派分子鄧演達、姜濟寰、張時曙、彭澤民等爲委員；並以譚平山等爲主席團，吳玉章爲祕書長。

林祖涵爲財政委員會主席，張國燾爲農工委員會主席，郭沫若爲宣傳委員會主席（惲代英代），劉伯承爲參謀團主席，李立三任政治保衛處處長，郭沫若任總政治部主任，賀龍任總指揮兼二十軍軍長，葉挺任前敵總指揮兼十一軍軍長，朱德爲第九軍軍長。（註四）

八月五日，暴動部隊撤離南昌，向南逃竄，軍行三日抵臨川，「沿途全無農民運動……農民聞風而逃。食物與飲料全買不到。甚至終日難得一粥。渴則飲田溝污水，以故兵士病死極多，沿途倒斃者絡繹不絕。……因此軍心大爲動搖，逃走極多。僅行軍三日，實力損失已在三分之一以上，遺棄子彈將近半數，迫擊砲完全丟盡，大砲亦丟了幾尊，逃跑及病死的兵士將近四千。」（註五）在臨川休息三日，續向南行，經宜黃、廣昌、石城，於八月十九日入瑞金。距瑞金三十里之壬田市與錢大鈞部接觸，錢部被擊退，惟葉賀部亦有傷亡。八月二十四日，再攻會昌錢部，獲勝後於二十七日折回瑞金。「此時我軍戰鬥兵祇剩八千人，出發時共有二萬一千人，十師叛變去掉五千人（按：卽爲蔡廷鍇部），沿途疾病落伍及逃亡者不下七千人，瑞金、會昌之役損失千人。」（註六）旋經長汀、上杭、大埔、三河壩而於九月二十四日入據潮汕。九月二十八日，葉賀部自揭陽向湯坑進擊，與王俊、黃紹竑部激戰兩日一夜，終不支而潰退。九月三十日，葉賀部遂放棄潮汕，向海陸豐退卻，沿途屢遭截擊，潰不成軍，入陸豐時僅存殘部九百餘人。另被截斷留駐三河壩之朱德部千餘人，亦向平和退却，經閩贛邊山區入粵北韶關，爲范石生所留，編成一團，朱德化名王楷任團長。這支殘部，後來叛離范石生，成爲井崗山工農紅軍第四軍的基礎。

匪黨發動的南昌暴動，初期聲勢頗大，但僅兩月而全軍覆沒。事後，匪黨中央於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發出第十三號「中央通告」（見附錄一），檢討「葉賀失敗事件」，通告中一面誇大暴動的意義說：「南昌暴動在湘鄂粵各省工農武裝暴動的總政策之中，始終是中國革命史上最光榮的一頁」，「是黨拋棄機會主義而走上布爾塞維克道路的新紀元」。另一方面檢討失敗原因，係由於「南昌暴動中之指導，不能完全脫離機會主義餘毒」所致。前敵委員會（書記周恩來）政綱的錯誤，在於提出「沒收二百畝以上的地主土地」，「這叫做耕者無其田」。策略上「並未猛力殲滅土豪劣紳」，而是「偏於猶豫妥協的策略」。「政權認識上的錯誤」為「繼承國民黨的傳統」。「軍事上的錯誤」，「最顯明的是：一開始便有與張發奎妥協之等待猶豫的傾向；對於不穩的部隊，如蔡廷鍇部，採取非常軟弱的搖動的政策，致使蔡廷鍇得以詐術損毀我軍很多很好的部隊。再則，既在瑞金，會昌打了勝仗之後，又不追蹤南下，直到梅縣，匯合當地已經奮起的農軍，發動當地農民暴動，擊敗黃紹竑等敵軍，直取興寧、五華，佔領全東江區域；卻又折回走上杭、汀州，與敵人避道而行，使敵人得以騰出十多天的工夫從容佈置。」「總之，……這種機會主義的指導之下的軍隊，……將富有歷史和偉大的意義之『八一革命』，變成僅僅是投機的行動。」（註七）

根據這一檢討，於是在十一月九日召開的匪黨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了「政治紀律決議案」（見附錄六），對於譚平山、張國燾、徐光英等大加處分，藉以殺雞教猴，貫徹暴動政策。後來匪黨黨史上，斥之為策略路線上的盲動主義，組織紀律上的懲辦打擊政策。

二、八七緊急會議

還在武漢分共以前，「共產國際的緊急訓令到了，這一緊急訓令，嚴厲斥責中國共產黨所犯機會主義的錯誤，訓令中國共產黨要立即示威式的宣言退出國民政府。……對於國民黨的策略則說：『不退出國民黨，雖國民黨的指導機關要大批的開除共產黨員，但仍留在內，要密切的與國民黨的下層羣衆聯合，由下層羣衆提出堅決的反抗國民黨中央的決議案，要求撤換現在的國民黨的領導機關，並且在此基礎上就準備國民黨的大會』。於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宣言退出國民政府（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三日）但是並不退出國民黨。」（註八）同時在組織上採取了一連串的措施，據蔡和森說：「不知道是七月初幾，……老鮑提議獨秀、平山去莫斯科與國際討論中國革命問題，秋白、和森赴海參威辦黨校，新指定國燾、太雷、維漢、立三、恩來五人組織政治局常委。自此獨秀即不視事。」（註九）政治局常委改由張國燾主持。

武漢分共之後，共產國際派新代表羅民那直（Besso Lominadze）和紐曼（Heinz Neumann）二人到漢口，「態度異常嚴厲，主張立即懲罰獨秀、平山、維漢，又罵張國燾等不贊成土地革命，不配當中央指導人，又向國燾、太雷、維漢（常委）聲明『如果你們反對開中央改組會，我直接召集各地代表開會，』同時果派去一個毛子直接赴湖南宣佈中央機會主義的錯誤和立即改組中央。」（註一〇）爲了便於改組匪黨中央，七月下旬，共產國際新代表把舊常委五人中之張國燾、周恩來、李立三派往南昌，策

劃八一暴動，尤其對於常委主持人張國燾，遲至七月二十六日下午四時常委開會時，新的國際代表始藉口傳達指示至前方說：「可否派國燾去，當時國燾即說：既然責任是送信，就不一定派國燾。當時國燾之所以這樣說，因中央擴大會議開會在即，如能不離開中央，還是不離開好。」（註一一）殊不知新國際代表之目的，正是要把舊人派走，以便改組匪黨中央。

八月七日，亦即南昌暴動後的第七天，在國際代表羅民那直主持下，匪黨中央於漢口召開了緊急會議，這就是匪黨黨史上著名的反陳獨秀機會主義的「八七會議」，到會中委僅有瞿秋白、向忠發、李維漢、蔡和森、鄧中夏、蘇兆徵、張太雷、任弼時、彭公達、陸沉、候補中委毛澤東等十一人。會中，以瞿秋白爲代表痛斥陳獨秀的機會主義，從此，一手創建匪黨的陳獨秀被趕下臺，由瞿秋白、向忠發、李維漢三人組成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並以瞿秋白爲中共中央總書記。

「八七會議」通過了「八七會議告全黨黨員書」，把匪黨失敗責任一起推在陳獨秀身上，除歷數機會主義的錯誤外，還說：「中國共產黨不但執行極不正確的政策，使革命限於失敗的政策，自動的取消革命而投降；並且很堅決的不承認自己的錯誤而服從國際的指導。不但如此，還要故意破壞國際的責任與紀律。」「這已經不單是簡單的破壞紀律問題，而是直接對於中國的及國際的共產主義運動的罪惡。」因此，八七會議認爲：「共產國際嚴厲的批評我們的中央，客觀上出賣革命的機會主義的政策。我們承認這一批評完全是應該的，並且承認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對於中國問題的政策是對的。我們認爲共產國際最近的指示給我們以發現這種過去指導錯誤之可能；救了我們的黨，是非常之好的。我們是很堅決

的承認過去中央指導有機會主義的不革命的政策，必須根據這種過去的教訓根本改變方針。」（註一二）

八七會議同時通過了「最近農民鬥爭的決議案」、「最近職工運動的決議案」以及「黨的組織問題決議案」。在農民決議案中規定：「共產黨現時最主要的任務是有系統的有計劃的盡可能的在廣大區域中準備農民的總暴動。」同時提出「在最近的期間，農民暴動的口號」十一條，其中仍主張「沒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對於小地主則減租」。（註一三）在職工運動決議案中除提出「經濟鬥爭之目前要求」以及「各工會應有秘密的組織」，「工人更應當有自衛的祕密組織」外，特別強調「注意於武裝工人及其暴動巷戰等軍事訓練，即刻準備能響應鄉村農民的暴動。」（註一四）關於「黨的組織問題決議案」（參閱附錄三），有如下的規定：

「（一）中央委員會緊急會議選舉中央委員之臨時政治局，以正式委員九人，候補委員七人組織之。

（二）中央臨時政治局應在六個月內準備召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三）中央所在地最近數月內仍在武漢。同時須組織南方局於廣東……。

（六）現在主要之組織問題上的任務，就是造成堅固的能奮鬥的祕密機關……。

（八）嚴守黨的紀律尤其為祕密黨之必要條件……。

（十二）每一黨部委員會之下，現時須即組織審查委員會，（各省委就是監查委員會）以審查各

級黨部之黨員有否不可靠的份子……。

(十四)自省委以下各級黨部委員會之成份，都應經過上級機關重新審查，使能更新而鞏固。應當注意提拔工人同志到黨部委員會裏負重大責任，而肅清其中曾經在最近幾月表現機會主義的份子。

(十五)現在祕密狀態之中，需要最大限度的集權。但是集權制度不應當變成消滅黨內的民權主義。……」(註一五)

根據組織議決案的精神，匪黨中央發出了「中央通告」第二號，指出：「這一個『黨的組織問題議決案』，再總括的說，又有兩點：就是改正黨的組織上的機會主義，和建立堅固的能奮鬥的祕密機關。」(註一六)通告中又指出：黨要提拔工農份子到指導機關，並批評過去「黨對於流氓性的工農份子或會黨份子入黨，每每取的懷疑或拒絕的態度」是不對的。(註一七)

八七會議最重要的一個議案，便是「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任務與策略的議決案」(參閱附錄二)。在這一議決案中指出：

一、「中國革命在現時這階段之中，還是資產階級的民權革命」，「完成中國的民族解放及資產階級民權革命之任務，現在已經完全放到工農運動身上，祇有工農的民權獨裁，才能履行這個任務。」「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生長而成爲社會主義革命，將以中國工人階級自己的組織與力量之程度如何而定，並且要靠革命的國際無產階級方面的幫助。然而這一轉變始終將要是一個無間斷的過程。」

二、「據一般的客觀形勢看來，資產階級軍閥的反動，其勝利是極不鞏固的，而革命之重新高漲，不但在最近期內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凡此一切，總合起來，便使中國共產黨員負着極大的任務，就要在一切客觀上有可能的地方，都立刻準備組織革命的暴動。」

三、「因為中國各省的情形不大相同，因為沒有集權的政府，所以中國共產黨不能預定一個時期舉行全國暴動，以推翻中央政府來決定暴動的勝負。現在本黨總方針應當是：準備並組織那些已成農民運動中心的各省之武裝暴動，現時便趁秋收時期而實行抗租抗稅，在這樣的時期當中，各省暴動的時日，祇能看當地情形及一般情形去決定。……中國共產黨應當堅決的準備鎮壓一切反革命的企圖，實行猛烈的革命戰爭……採用最嚴厲的鎮壓政策，實行革命的獨裁。」

四、「中國共產黨應當組織工農暴動於革命的左派國民黨旗幟之下。這有以下幾個理由：（1）國民黨是各種革命階級的政治聯盟之特殊的形式，這種形式是中國歷史上所集累生長出來的。（2）國民黨是一種民族解放運動之特別的旗幟，中國共產黨員加入了國民黨，而且一直形成了國民黨內左派的中心。……（3）中國共產黨在革命的國民黨旗幟之下組織暴動，還有一個目的，便是吸引小資產階級的革命份子。……」

五、「本黨現時不提出組織蘇維埃的口號，……為指導各地暴動起見，應當在各地建立革命委員會，暴動成功之後，……革命委員會就變成臨時的革命政府之性質。……」

六、「本黨應當努力的改組現時參加革命的雇傭軍隊，同時應當想種種辦法武裝工農，……從這

些工農武裝，是造成新的革命軍隊之中心勢力。」

七、「民衆暴動勝利的地方，如果可以遇見與資本主義列強直接的接觸（例如廣東以及其他有海口的地方），那麼，本黨應當在反帝國主義鬥爭中有應付的策略，使與帝國主義的武裝衝突不至於過早的發動。……」（註一八）

這些，就是所謂「布爾塞維克化開始」的八七會議的決定。這一會議的重點，爲清算陳獨秀的機會主義和決定暴動政策。因此蔡和森說：「有人以爲八七以後的暴動政策是國際對付反對派的作用。」（註一九）這一說法是不無道理的。

三、四省秋收暴動

中共「八七黨的緊急會議的政策卽是暴動政策。」（註二〇）「並且決定於秋收時間於湘鄂贛粵四省領導農民舉行暴動，去進行土地革命的鬥爭。」（註二一）「此一政策決定後，我們的工作可分三部分：一、賀葉南昌起義及廣東的農民暴動；二、湖南的農民暴動；三、湖北的農民暴動。」（註二二）匪黨這一四省暴動計劃，在江西方面，「中央政治局決定南昌暴動是四省暴動的一部份。」（註二三）可是由於賀葉軍的南竄入粵，江西暴動等於失敗了，「因此中央認爲江西省委不得不暫時放棄全省整個的暴動計劃，而變更戰略，立即開始各地繼續不斷的局部零星的暴動，一直到匯合發展到成爲整個的暴動，其內容在敵人防備薄弱的地方，我們黨和農協有點力量的地方，要求不客氣的實施紅色恐怖：

實行殺土豪劣紳，殺政府官吏及一切反革命派；……」（註二四）

匪黨中央對於廣東的暴動，希望很大，九月九日曾函廣東省委說：「中央對於你們的暴動計劃均大致同意，惟須立即開始，不要等待賀葉軍隊到來，技術上並可參照兩湖暴動計劃。……」（註二五）九月二十三日再函告廣東省委，除對「暴動後各縣市工作大綱」、「農軍作戰方法」加以指示外，再度指出：「葉賀軍隊不知已達到什麼地方？此時廣東全省應不等待賀葉軍之達到，即行發展普遍的暴動。……」（註二六）

這時匪黨中央還沒有移到上海，在武漢直接指揮兩湖秋收暴動，並通過「兩湖暴動計劃決議案」（參閱附錄四），規定：「兩湖的農民暴動必須開始於九月十號」，暴動的部隊「合稱工農革命軍」，「對於土匪的政策應當以我們的口號去宣傳他們組織他們於農民協會之下」，「暴動為實行澈底的土地革命，即沒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事實的結果是全部），殺盡土豪劣紳及一切反動派與沒收其財產」，「暴動之前須極端注意兵士中的宣傳，鼓動他們起來殺戮反革命的軍官」等等。（註二七）

在匪黨這一暴動政策下，兩湖及廣東農民的暴動果然發動起來了，當時情形，匪黨中央有如下的記述：

「湖北：——八月底，湖北南邊通城縣的農民便暴動起來，不久暴動發展到通山、崇陽兩縣。這些暴動的農民軍，匯合鄰縣蒲圻咸寧的農民，於九月九日襲擊從武昌到長沙的火車，進攻咸寧縣城。……九月二十日，鄂西的公安、石首、松滋、沙市等縣農民也是如此起來暴動，佔領公安縣

城……。」

「湖南：——九月初安源的工人武裝隊及農民取醴陵，同時瀏陽、平江的農民也起來暴動，共同進攻長沙。九月十二、三日的時候，長沙的反動政府已經非常恐慌。不過因為湖南這次的暴動，太偏重於軍事的行動，沒有引起農民極廣泛的羣衆參加，所以暫時失敗；……」

「廣東：——到八月底，葉賀的軍隊接近廣東，農民又起來奮鬥，海陸豐的農軍佔領縣城，……梅縣、興寧、松口等據報載也有農民暴動的興起。廣東南路高雷一帶農民暴動佔領許多縣份，海南島的農民軍已經佔領全島，所剩祇有海口一隅還在反動軍隊之手……。」（註二八）

在四省暴動的同一時期，匪黨又發動江浙、順直等地之暴動。江浙方面雖有無錫、宜興、蘭溪、瑞安等地之農民暴動，但旋即歸於失敗。而所謂順直暴動，則僅僅在京東之玉田有若干農民之騷動而已。

由於匪黨中央提出的暴動口號爲「殺盡土豪劣紳及一切反動派」，於是各地暴動中均採取燒殺政策（即所謂「紅色恐怖」，也就是後來共產國際所指斥的「恐怖主義」），即大肆殺人放火（燒房屋），「還有主張燒毀城市的傾向」（註二九），廣東東江潮（陽）、普（寧）、惠（來）農民暴動中，就曾把惠來縣城燒個精光。海陸豐農民暴動的燒殺情形，匪黨曾作如此記述：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五日，紅二師第五團和海陸豐工農革命軍第一、第四兩中隊，進駐距海豐城六十里的黃羌墟。三十日東特委軍事委員會下令進軍收復海陸豐各市鎮。進了海豐城以後，成

立了『海豐縣臨時革命政府』，堅決地執行土地革命政策和鎮壓反革命份子，公佈了七條禁令（農民稱爲七殺令），禁令如下：

一、凡地主有向農民取租者槍決！

二、有勾結地主私還租穀者槍決！

三、凡私藏土地契約者，應繳交本政府，否則槍決！

四、取消一切債務，如有債主向工農討債者槍決！

五、爲地主作工役向工農勒債者槍決！

六、窩藏地主土地契約者槍決！

七、如已向農民勒取租穀，應一律即刻繳出，否則槍決！……第二天，會議開始後，彭湃報告：『今早六時，對捷勝城下總攻擊令，八時許破城，生擒俘虜三十餘人，繳槍七十多桿，殺逆黨無數。現在搜捕一切反革命派，並焚燒其房屋。』……現在講到殺人，這是地主豪紳資產階級所最引爲痛心疾首的一章。我們是不諱言殺人的……海豐一縣之大，幾個月來，殺戮地主豪紳，據最近確實的統計，共一千八百二十二人。（註三〇）由於七殺令牽涉範圍寬廣，與地主有關人員處處均被株連，於是殺人之風，一發而不可收拾，據最後統計，海陸豐兩縣被殺者竟達萬餘人。兩湖之燒殺亦復如是，故當時湖南民間流傳這樣的歌謠：「殺！殺！殺！同志殺同志的頭！燒！燒！燒！同志燒同志的家！」（註三一）由此可見，當時共黨燒殺政策之一般了。

這類燒殺的暴動政策，其失敗是必然的。到十月底，共黨的四省暴動便完全失敗了。失敗的原因，當時匪黨中央認為係機會主義餘毒所害。他說：「例如：一、湖南省委暴動的計劃，祇注意借某某兩團的兵力來打長沙，不注意去發展全省的農民暴動，直到安源、醴陵的農軍行動起來，尚且不領導農民自動手進行土地革命，而使所過諸地農民羣衆有客軍過境之感。二、湖北西部張兆豐的部隊，原定要他幫助農民暴動，而當地的指導者祇想著張兆豐當聯絡樊鍾秀倒方振武，以恢復實力，然後才可以打出政治口號（土地革命）；因此；不願農民自己已經提倒樊的口號，不注意農民羣衆之取得。三、鄂南農軍劫車之後，農民已經集合兩三萬人，要撲蒲圻縣城，但是當地指導者認為農民武裝不夠，不會打仗，竟命令退却。四、廣東海南南路各處，雖然農民暴動起來了，東江海陸豐也已起來暴動，但西江各縣，有五百槍，有二百槍，竟不會指導他們起來；各地農民始終等著等待葉賀軍隊的心理，西江的不起來，使黃紹竑得以從容集中來打葉賀。五、前敵（葉賀軍隊中的）指導者所定的土地革命政綱，竟祇說沒收二百畝以上之土地主的土地。凡此一切，都是機會主義的餘波和餘毒。」（註三二）

暴動失敗之後，匪黨中央對於直接領導兩湖暴動的彭公達、毛澤東、易禮容、夏明翰、陸沉等同樣予以嚴重處分（見附錄六），同時對於善後問題，作了如下的處理：

第一，對於廣東及葉賀殘部，指示廣東省委：「（一）中央認為葉賀既已潰敗，在最短期間暴動奪取廣東全省政權的計劃，暫時已經不可能，因葉賀潰敗而停止各地之暴動。……（二）……現時葉賀殘部無論退到何地，必須堅守二個宗旨：第一不投降敵人，第二盡力幫助農民暴動，不得已時再向湖南發展

，最後失敗始上山。……(四)廣州暴動的計劃應即停止。……(五)關於從前線潰散之同志，南方局應即在香、港、廈門、汕頭等處設一招待處招待他們，用費由各國國際代表給予你們的款中支用，招待的詳細辦法，由昌頤兄面商，……」(註三三)

第二，對於兩湖，則「同時命令兩湖省委，利用唐生智系軍閥崩潰與大小軍閥混戰」，「創造部份的暴動，匯合而成爲總的奪取政權、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的政權的暴動，鄉村與城市都應一致的動作與準備。」「在鄉村中大發展游擊戰爭，殺盡土豪劣紳大地主，燒地主的房子，分地主的東西，分配土地，搗毀與搶劫所有政府的徵收機關。……鄂省委應當在極短的時間內領導農民割據公安、石首、當陽向西發展，並與湘西聯合。割據天門、沔陽向四週發展。割據麻城、黃安向鄂東與京漢路發展。恢復鄂南的工作成爲一獨立割據的局面，與湘北聯合。恢復鄂東的工作。湘省委應當發動廣大的農民羣衆割據湘西、湘南、湘北各縣與鄂西鄂南聯合。應該恢復長沙附近數縣的農民運動，以至與長沙工人聯合撲城……」(註三四)

第三，對於江西，匪黨中央指出：「江西黨過去中機會主義的毒太深，所以「八一」以後，反動的壓迫一來，幾乎全體瓦解，最近各地鬥爭中，一般黨員，尤其是知識份子，更表現了畏縮投機，甚至反革命的傾向，這是江西黨的致命傷。江西黨此後應當極力注意城市工人運動，單純的農民鬥爭，即令勝利，也不能成功一個真正的工農蘇維埃政府。」「農民運動……實行屠殺土豪劣紳政府官吏……一直到總暴動的局面……」，「過去負責工農運動責任的同志，給了羣衆很壞的影響，黨應嚴重的予以處分

一併向羣衆公開宣佈，以挽回黨在羣衆中的信仰。」（註三五）

第四，對於葉賀殘餘朱德部，匪黨中央曾通過廣東、湖南、江西各省委並派李鳴珂等六度與之聯絡，同時指示朱德說（參閱附錄八、九）：「假使你們已經與范石生發生了組織的關係，你們便應很堅決根據上述的使命，從他的軍隊中分化出來，這就是說不但將我們的軍隊抽回來，還將范石生的隊伍拉出一部份來……。」（註三六）「你們在脫離范石生時，必須擴大這個『叛變』的影響到他的軍中去，盡可能的帶去他們的隊伍，拆散或消滅他的軍隊……。」（註三七）

在匪黨黨史的記述上，認爲這一階段是瞿秋白盲動主義發展最高峯的時期，但是，匪黨的叛亂武裝所謂工農紅軍，就是在這一燒殺搶掠的盲動主義中產生出來的，這正是瞿秋白的「傑作」與「功勞」。假如沒有當時的盲動主義，便沒有以後的匪黨武裝，這個道理是顯而易見的。

四、十一月擴大會議

匪黨中央臨時政治局，於十一月九日至十日，召開了擴大會議，「召集的時候，正是九月兩湖農民暴動失敗及葉賀軍隊與廣東農民暴動失敗之後。」（註三八）擴大會通過了下列決議案：「中國現狀與黨的任務決議案」，「最近組織問題的重要任務議決案」（參閱附錄五），「政治紀律議決案」（參閱附錄六）「關於召集第六次全黨代表大會之決議」，「中國共產黨土地問題黨綱草案」，「職工運動決議案」等。

「中國現狀與黨的任務決議」案指出：「現時全中國的狀況是直接革命形勢……中國革命帶著長期的性質，但是是無間斷的性質。中國革命是馬克斯所稱爲『無間斷的革命』——（一）在革命性質上，因爲中國資產階級沒有能力實行推翻封建軍閥的民權革命，所以中國革命的進展過程中決不能有民權革命自告一段落的局勢（所謂二次革命的理論），這一革命必然是急轉直下從解決民權的責任進於社會主義的革命。（二）在革命速度上，中國革命的進展，雖然受著歷次的挫折，但是他始終繼續不斷的高漲，……這種繼續不斷的革命爆發，顯然證明中國革命之無間斷性。總之，……現在的革命鬥爭，已經必然要超越民權主義的範圍而急遽的進展……。」

「現時形勢中之中國共產黨的總策略，便是（一）努力使羣衆自發的革命鬥爭得有最高限度的組織的性質；（二）努力使互相隔離零星散亂的農民暴動，變成儘可能的大範圍內的農民總暴動；（三）努力保證工人階級的爆發與農民暴動互相贊助互相聯絡。……如果這種暴動事實上不能估量到較大範圍內的勝利，那麼黨應當使這種暴動採取游擊式的戰爭。……黨的責任是努力領導工人日常鬥爭，發展廣大羣衆的革命高潮，組織暴動，領導他們到武裝暴動，使暴動的城市能成爲自發的農民暴動的中心及指導者。」

「現時革命階段之中，黨的主要口號就是蘇維埃——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工農民權獨裁制性質的政權，祇能在蘇維埃制度的型式裏建立起來。」「一切政權歸工農兵士貧民代表會議，是武裝暴動的總口號。」（註三九）

擴大會關於「最近組織問題的重要任務議決案」中指出：「中國共產黨組織上的主要缺點：一、有

很大的政治意義的——就是本黨領導幹部並非工人，甚至於非貧農而是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代表。」
「因此而得的結論，自然便是：中國共產黨最重要的組織任務是——將工農份子的新幹部替換非無產階級的知識份子之幹部。」
「黨的組織上的第二個弱點，便是許多大工廠大商店尤其是鄉村和軍隊之中，至今幾沒有黨的支部。」
「今後須特別注意支部工作，經過支部起羣衆的作用……。」
「嚴格的整飭紀律和建立黨的祕密組織，實在是黨的工作成效之最必須的條件之一，對違背組織上政治上的紀律的份子，必須要嚴厲的處分。……凡是稍稍破壞黨的祕密組織紀律的，立刻應當停止他的工作，或者簡直開除黨籍。」
「黨員的數量自從國民黨反動以後有極大的減少，從五萬餘黨員減至萬餘黨員……黨的組織重要責任之一便是吸收新的工農兵士革命份子入黨……然後本黨才能負擔新的使命。」（註四〇）

擴大會「關於第六次全黨代表大會之決議」規定：「第六次全黨代表大會決於一九二八年三月初至三月半之間召集。大會會期和地點，由中央常委決定。」（註四一）

十一月擴大會分發了「土地問題黨綱草案」，並作成決議，要求各級黨部及「一般同志」提出書面的增改意見。「這一草案及增改的意見，應當提出第六次代表大會討論作最後之決定。」（註四二）

擴大會「關於職工運動則特別組織一委員會，有專門的決議案，尤其特別指明的，便是建立廣大羣衆的革命工會的系統，注意恢復發展全國的海員及鐵路工作。」

「關於軍事運動有更新的決定：應將極大部份的力量，用到兵士方面，從提出兵士切身要求，運動兵士反抗革命的軍官，一直到參加暴動。……。」

「最後，此次會議實行整飭政治紀律，對於不堅決的執行布爾塞維克的策略，甚至故意違背中央命令，以及顯然有叛黨行爲的黨員，都有明顯的批評和分別的處罰。」

「總之，此次會議所給的總路線，是非常之重要，與八七會議同樣是黨的歷史上的重要關鍵。」（註四三）

此次匪黨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雖然是在四省暴動失敗之後舉行，可是擴大會認爲中國革命爲無間斷革命，認爲現時全中國的狀況是直接革命形勢，因而決定匪黨的總路線，依然是武裝暴動政策。一個月後的廣州暴動，便是在這一決策之下發動的。

五、十二月廣州暴動

葉賀部於南昌暴動後南竄入粵，第二方面軍張發奎所剩部隊亦於九月由江西開抵廣州。十一月十七日，張發奎黃琪翔以「護黨運動」爲名舉行政變，推翻李濟陳黃紹竑的統治，掌握了廣州政權，因而在廣東西江發生了粵桂戰爭。十二月初，陳濟棠由潮汕趨惠州，陳銘樞部自閩入粵向東江進發，張發奎黃琪翔部不得不分兵迎戰，廣州乃更形紊亂與空虛，造成了共黨暴動的客觀有利形勢。

另一方面，廣州一部分工人在共黨煽動下，「十二月初，羣衆的憤激達到了極點，海員罷了工。公共汽車工人宣佈了怠工，許多小企業武裝起來，自己準備炸彈等等。暴動的主張，普及了一般無產階級，至於農民方面，……最近農民在各縣又重新暴動起來，——這是一九二七年廣東農民的第三次暴動了。各縣農民暴動之中，以海陸豐的勝利爲最大。這次暴動的開始，有葉賀殘部很少的軍力參加，這軍隊

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改編爲工農革命軍的一師。……廣州的駐軍（教導團等）的兵士……十二月初在許多次祕密會議之上，這些士兵整連整營的表示贊成共產黨的政策和舉行暴動。」（註四四）這是共黨舉行廣州暴動的主觀條件。

「張發奎、黃琪翔的政變之後，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國共產黨廣東省委員會遵從中央委員會十一月十八日的決議案和指令，討論暴動問題。當日便一致決議堅決進行暴動的政策。……本黨廣東省委員會決定十二月十一日的暴動日期，是很正確的。」

「暴動的直接準備與組織，經過下列的六種準備：（一）確定暴動之總政綱；（二）暴動之軍事上的準備；（三）廣州蘇維埃之組織；（四）經過赤色工會動員工人羣衆；（五）兵士中急進的工作；（六）農民中的準備與聯絡。」

「共產黨……舉出最主要的口號，飯給工人吃，土地給農民耕，打倒軍閥戰爭，一切政權歸蘇維埃，一切政權歸工農兵，這些口號便能對一般民衆表示將要起來的暴動之明確的政綱。」

「對於軍事的準備，……組織二千工人的赤衛隊，……敢死隊兩連，……廣州市內的教導團，尤其完全在共產黨的影響之下，……再則廣州的警備團的大多數兵士，砲兵營一部分，也都贊成廣州的蘇維埃的口號。」（註四五）這是共黨發動廣州暴動的準備工作。

十二月十一日，廣州暴動開始發動，「暴動的開始，恰恰在革命軍事委員會所規定的時刻：十二月十一日午前三時三十分——工人和兵士同時發動。」「教導團鎗斃十五名反動軍官，豎起鐮刀斧頭的紅

旗。」「同時同刻工人赤衛隊敢死隊用手鎗炸彈進攻公安局及保安隊」，「二千政治犯立即釋放」，「教導團的一營人，用突然攻襲的手段，解除兩團反動軍隊，取得張發奎全部砲隊之三分之二，一千枝槍，還有很多子彈。」「十一日中午除長堤及還在頑抗的反革命巢穴之外，全廣州已在新建的蘇維埃政府之手。」（註四六）

匪黨廣州暴動得手後，成立了廣州蘇維埃政府，偽政府之名單爲：主席蘇兆徵（未到前由張太雷代），人民委員會委員長蘇兆徵（未到前由張太雷代），海陸軍委員張太雷，外交委員黃平，內務委員黃平，經濟委員何來，職工委員周文雍，司法委員陳郁，土地委員彭湃，祕書長惲代英，農業委員會委員長彭湃，紅軍總司令葉挺，紅軍副總司令葉劍英、總參謀長徐光英、肅反委員會主席楊殷，紅軍日報總主筆惲代英，羣衆運動委員會主席穆清。（註四七）

「暴動開始以後，卽厲行燒殺政策，中央銀行首成焦土，約計被燒民房萬餘棟，殺死人民一萬五千以上，爲廣州歷史上之空前浩劫。但因共黨本身力量微弱，民衆堅決反對，甚至工人組織敢死隊進攻爲蘇維埃（廣東總工會及機器工會所組織之工人割共敢死隊），以致廣州暴動在三日之內，卽告慘敗。」（註四八）領導暴動之張太雷（匪黨廣東省委書記）亦被擊斃。

暴動失敗後，匪黨中央檢討失敗的原因爲：（一）反動軍隊的數量很多。（二）赤軍的大多數是工農，他們在軍事上沒有經驗。（三）各派軍閥立刻聯合起來撲滅蘇維埃……（四）帝國主義的列強幫助白色國民黨的軍閥。……這些客觀的失敗原因之外，革命的指導機關在主觀上也有些缺點和錯誤：（一）沒有一

開始便舉行對於市外反革命軍事中心的進攻。再則指揮作戰之某同志（按：指葉挺——「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上冊二六三頁載：「紅軍總司令葉挺本身陷於動搖」）表現的非常之弱，非常之遲疑，後來弄得省委不能不撤換他。（二）破壞反革命軍隊工作，非常之不充分。（三）對於機器工會中的無產階級分子，沒有充分的去宣傳吸引他們。（四）沒有能在廣州市內暴亂期間，立刻發動幾十萬市郊農民的暴動。（五）放火燒燬倉庫，於是沒收的幾百萬元，都沒有能取出使用。（六）赤軍突圍而退的行動，沒有充分的規劃。」（註四九）

暴動雖然失敗了，但匪黨中央給予很高的估計，認為「廣州暴動的基礎，無疑的是共產國際在中國革命歷來政策之正確」所建立起來的，是「城市中的蘇維埃政權第一次出現於中國及整個殖民地的亞洲」，「廣州暴動使無產階級與農民結為親密的革命聯盟」，「廣州暴動之國際意義」在於「自始至終成爲國際階級鬥爭之一幕。」（註五〇）

六、機會主義餘毒

以共黨觀點看來，武漢時期，陳獨秀執行的機會主義，係來自共產國際，這已經爲各種事實所證明。武漢分共之後，匪黨的所謂「機會主義餘毒」，同樣係來自國際，這又是不爭的事實。當時共產國際的訓令是「宣言退出國民政府」，「不退出國民黨」，而且「就準備國民黨的大會」。根據這一指示，共黨的八七會議，便決定「中國共產黨應當組織工農暴動於革命的左派國民黨旗幟之下」。南昌暴動所

建立的政權，當然祇能是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且幻想拉攏張發奎等「共同回粵」（按：南昌成立的革命委員會中，列有國民黨人員張發奎、鄧演達、宋慶齡、黃琪翔、朱暉日、何香凝、經亨頤、陳友仁等人爲委員。鄧演達、張發奎、宋慶齡，且列入革命委員會主席團名單之內）。所謂「機會主義餘毒」也在土地問題上表現出來：八七會議通過的「最近農民鬥爭的議決案」，規定「沒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對於小地主則減租」；這與武漢時期的「機會主義」，即共產國際指示及陳獨秀等主張並無二致。所以，被譽爲「布爾塞維克化開始」的八七會議，除清算陳獨秀決定暴動這兩點外，其餘對國民黨政策，對土地問題還是「老機會主義」，即所謂「機會主義餘毒」。當新的國際代表羅民那直初到漢口時，威風十足，罵這個，罵那個，可是自己的指導和決定，還是脫不了「機會主義餘毒」！難怪陳獨秀要罵共產國際了。

於是陳獨秀便振振有詞的抨擊共產國際說：「國際始終承認國民黨是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主體，『國民黨領導』這句話，在斯大林口中叫得異常響亮，（見中國革命問題中反對派的錯誤）所以始終要我們屈服在國民黨組織之內，用國民黨的名義，國民黨的旗幟，領導羣衆，直到馮玉祥汪精衛唐生智何鍵等全部國民黨公開的反動，公開的取銷了聯俄容共（他們老早就說：『祇承認容共而不承認聯共』）及幫助工農運動等所謂三大政策，國際還電令我們『退出國民政府而不退出國民黨』。所以八七會議以後，自從南昌暴動一直到佔領汕頭，共產黨仍舊是隱藏在左派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幟之下，在羣衆中祇看做是國民黨的內鬨並沒別的什麼。」（註五一）

華崗也批評八七會議的錯誤，他說：「於是八七會議……竟還通過復與左派國民黨的決議，甚至決定中國共產黨還應當組織工農暴動於革命的左派國民黨旗幟之下，認為『革命的國民黨的這種組織，可以使將來發展到更高的階段時，政權形式將要進於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那時的過渡更容易些，更沒有流弊些。』當然是很大的錯誤。」（註五二）

這種所謂「機會主義餘毒」直到九月十九日匪黨政治局會議，才有若干改變，這次會議通過了「關於『左派國民黨』及蘇維埃口號問題決議案」，決議中說：「最近幾月的經驗（包括南昌軍隊中的暴動與兩湖廣東革命的農民暴動的爆發）指示出中央以前復與左派國民黨的估計不能實現。……澈底的民權革命——掃除封建制度的土地，已經不用國民黨做自己的旗幟。中央根據此點，所以認為八月決議案中關於左派國民黨運動與在其旗幟下執行暴動的一條必須取消。……對於國民黨左派問題既有不同，則對於八月中央決議案中的蘇維埃的問題自然亦有異點。現在的任務不僅宣傳蘇維埃的思想，並且在革命鬥爭新的高潮中應成立蘇維埃。」（註五三）

匪黨「機會主義餘毒」固然來自國際，但執行則是瞿秋白的匪黨中央。當南昌暴動、秋收暴動失敗之後，追查失敗責任時，對於這種「機會主義遺毒」，既不能還諸共產國際，又不好由中央自己認錯，祇好把所有責任都推給直接執行的人員了。於是，十一月擴大會議通過的「政治紀律決議案」，便把譚平山、張國燾等作為代罪羔羊加以嚴重處分。

這種處分當然難以服人，所以張國燾在遭受處分之前，便向擴大會申辯。緣因葉賀軍在粵失敗之後

，隨軍之匪黨幹部大都逃亡香港，抵港後紛紛向匪黨中央報告失敗經過，報告中互相攻訐互推責任。李立三、張太雷、張國燾、周逸羣（二十軍第三師師長）、陳恭（二十軍第二師黨代表）等都有報告。其中張太雷說：「……不料國燾假傳聖旨，說國際不主張幹，他亦極力反對幹，……故此國燾的行動，實應受處分。」（註五四）張國燾看見「中央通信」所刊張太雷報告之後，乃致函擴大會議，「根據事實慎重申明」說：

「（一）當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之間，中央常委得悉在潯同志主張在潯一帶發動暴動的時候，中央常委及國際代表都表示贊成。……後來決定派恩來同志去爲前敵委員會書記，其任務是去指導前敵方面工作，準備於必要時，在南潯起義，由贛東入粵，與廣東東江農民結合……。」

（二）七月二十六日下午四時，中央常委開會，出席者爲秋白、羅邁（按：即李維漢）、太雷、國際代表，少年國際代表、加倫（Blucher）范克同志（按：即斯大林之特別使者），翻譯若克、家辰兩同志及國燾。當由加倫報告，加倫說：今日會到張發奎，和他討論軍事，他已贊成，……不再前進，第一步按兵不動，第二步暫次往南昌移動回粵。加同志說，據他的意思，張發奎如贊成回粵，又不強迫葉挺等退出CP，在此兩條件下（其他條件如汪精衛、李濟琛等態度可暫時不管）可與張發奎共同回粵。但回粵後，我們與張發奎之間的分化是不可避免的（我記得加倫將這句話重說了兩遍）。接著又說：因我推測，假如我們在南昌與張分化，做得好可得八千兵，不好祇有五千兵，軍事上在江西卽要遇著朱培德錢大鈞的部隊及張發奎剩餘部隊種種阻礙，恐難於到達東江。若張共同回

粵有二利：一、共有三萬兵，易於打破朱培德錢大鈞種種阻礙。二、我們既然推延我們與張間之分化，將來可更多分化張一部勢力。若張不能同意上述二條件，那我們就不得已要在南昌幹起來。加倫報告後，大家並未發言，當時情形大家是默許他的意見。接著國際代表報告說：現在經費一時無著，又國際電：不許俄顧問以任何形式參加這次暴動，現在較之我們以前所討論者，又有這兩件不同的新事實。接著說：國際來電內容：如暴動毫無勝利希望，則不如不進行暴動，張發奎軍中同志盡行退出，派往農民中工作。現在此二件新事實及國際來電，既不能寄信告知前方同志，須派一得力同志當面將這些情形告知他們。說罷乃目視國燾，並說可否派國燾去。……。

(三)……曾經向恩來同志說過兩次，……我接著又說：這新國際代表願意如此主張（按：指延遲與張發奎軍隊分化），你看其他俄同志意見如何？恩來說：新國際代表來，范克等都不敢表示意見，看加倫意似不主張在南昌發動。我接著說：所以呀！恩來說：到那裏再看情形罷……。

(四)七月十三日我黨發表宣言，……我記得當時曾問國際代表：我們現在對國民黨態度如何？他說：國民黨的旗幟還是要用的。當時中央實際贊助所謂國民黨左派聯盟在滯結合的運動。……。

(五)……新國際代表來時，中央常委已擬好一個農民運動議決案，主張沒收大地主土地，秋季進行抗租減租的運動，他看了表示贊成，祇說農民運動應以沒收土地為重心，此議案祇是太把減租看重了。他是對於小地主始終說准其享有土地所有權。七月十八日我黨發表的目前行動綱領，還是

說沒收大地主土地，至於說沒收一切土地決議，那是八七會議以後的事，爲前敵同志所不知道者……。

(六)當武漢唐生智汪精衛政府日見反動時，彼時我黨與張發奎關係尚好，事實上我們曾將農民的槍枝送給他，並答應他給他種種幫助。……

(七)我記得有一次我問平山，爲什麼我們不可以一面堅決進行，一面派人與張辦外交。平山說，賀龍想取張發奎的地位而代之，我們正要利用這一點以拉攏賀，所以我們不好主張與張辦外交。我記得有一次和代英說：我們若不與張辦點外交，表示拉攏，七十七團及教導團中幾百同志不是都犧牲了麼？代英說：現在那裏管得許多。又關於暴動日期問題，我主張推遲一、二日，但須在張未到南昌之前。理由：因我們這裏幹起來，漢口中央及其餘未到南昌在張部隊中的同志尚不知道，恐防備不及遭他們毒手，須留一、二日時間，等他們得到通知，好作準備。後來算是將暴動日期由三十晚改至三十一日晚。至於推張發奎爲主席團之一，並將黃琪翔朱暉日亦參加革委，這也是我主張的，理由如上述。……

(八)當提出沒收二百畝以上土地時，我也是贊成者之一，當然是一大錯誤。後來在瑞金及上杭時，我提出必須修改，減至五十畝以上土地應沒收。……

(九)對於沒收和徵發的經濟政策，工農化的軍隊，嚴懲反動派三主張，我爲堅決贊成者之一，縣市區村政府須實施工農政權，我爲堅決提議者。……」(註五五)

「政治紀律議決案」發表後，王若飛表示不服，致函匪黨中央辯稱：「常委分工，命若飛負參加KMT同志會指導KMT工作，本來照過去組織的習慣，有處理臨時發生問題之權。」「中央是在這次擴大會才決定不派遣同志到反動團體內去活動，而在從前是並不禁止的。」（註五六）

匪黨中央對於張國燾、王若飛申辯的答復都是否定的。雖然張國燾的申辯中已說明，推延分化拉攏張發奎是俄國顧問加倫的主張，且經新國際代表同意的，雖然准許小地主享有土地所有權也是新國際代表的意見；同時據周逸羣的報告（見「中央通信」第七期），主張走撫州，走小路，避戰繞道而行，速到汀州上杭入粵的，又是隨軍的俄國顧問紀功的主張；可是爲了維持國際代表和匪黨中央的尊嚴，祇好堅持已定的處分。其實就是南昌暴動後的八七會議，對南昌暴動也不重視，未作討論，事後蔡和森批評說：「八七會議未鄭重討論南昌暴動問題是一缺點。會議之末，和森曾提議討論此問題，以爲未宣佈沒收土地，掀起江西本省的農民暴動，未完全解除敵人的武裝，而即出走爲失策。然當日已沒有時間容許討論此問題。第二日新中央開會，和森又提議前敵主要負責同志有懷疑新政策之弱點，應注意指導人問題，然是日亦不容許討論此問題」（註五七）事前既不「鄭重討論」，事後又諉過他人，無怪後來匪黨斥責瞿秋白爲命令主義，懲辦主義了。

瞿秋白所指責的「小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之遺毒的特點，便是不相信羣衆運動的力量，不去依據工農民衆，而總想依靠靠不住的軍隊力量，總祇想做勾結雜色軍隊的把戲。」（註五八）其實當時的工人農民，並不同情和支持共黨的暴動，廣州一千一百三十六名機器工人，進攻共黨暴動部隊，各地農民之

逃避葉賀軍即是明證；尤其共黨的燒殺政策，更嚇退了一般民衆。除了少數爲共黨分子及爲其裹脅的工人農民，或少數爲搶掠財物而來的流氓、暴徒、土匪、農匪以外，一般人民對共黨的燒殺暴動，大都望而卻步。這樣，各地共黨當然「不相信羣衆運動的力量」，當然無法去「依據工農」，祇好依靠「軍隊力量」，祇好「軍事投機」。兩湖暴動在「攻長沙」「攻蒲圻」面前退卻失敗，原因就在於此。

羅民那直和瞿秋白，當時認爲武裝暴動是糾正機會主義最正確的路線，在反機會主義聲中，在命令懲罰，燒殺盲動政策前面，匪黨黨內，對「新路線」誰都不敢有任何懷疑或異議，否則便是「機會主義餘毒」。當時祇有倚老賣老的陳獨秀敢於提出不同意見，寫了幾封信給匪黨中央（見附錄七），不過沒有被接受。後來陳獨秀憤憤不平地寫道：「自從八七會議『定出武裝暴動的總方針』，各處實行暴動，我曾寫過好幾封信給當時的中央，指出當時羣衆的革命情緒並不是高漲，國民黨政權也不會很快的崩潰，沒有客觀條件的隨便暴動。祇有更加削弱黨的力量，更加使黨離開羣衆。應該改變政策，在日常鬥爭中爭取羣衆，團結羣衆，當時的中央以爲普遍的武裝暴動是糾正機會主義之絕對正確的路線，主張要估量暴動的條件和計較成敗，便是機會主義。當然對我的意見，不但絲毫不加考慮，而且當做笑話到處宣傳，說這是我仍舊沒有改正機會主義的錯誤之證據。」（註五九）陳獨秀之被共黨開除，這是原因之一。可是，廣州暴動失敗兩個月以後，共產國際第九次執委會，通過了「關於中國問題的議決案」，斥責匪黨玩弄暴動，盲動主義，這種指責，恰好和陳獨秀的「笑話」一樣，這種「笑話」，出之於「老子黨」，便一變而爲「金科玉律」了！

七、左傾盲動主義

自從瞿秋白接替陳獨秀主持匪黨中央以後，在新國際代表指揮下，他所執行的「國際路線」，便是「武裝暴動的總方針」；從南昌暴動、秋收暴動以至廣州暴動，一直在貫徹其大燒大殺的「盲動主義」。各次暴動失敗後，一九二八年一月三日，匪黨中央關於「廣州暴動之意義與教訓」的決議案中，認為「中國的總形勢，仍舊是直接革命的形勢」，仍舊要不斷暴動。這些暴動，驚醒了斯大林和布哈林，他們於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向共產國際執委第九次會議提出了「關於中國問題的議決案」，對於羅民那直和瞿秋白的盲動主義大加指斥說：「這是消滅革命的『正確方法』」；於是匪黨的政策路線，又由陳獨秀的機會主義被判定為瞿秋白的盲動主義了。

這一次共產國際的決議，和以前不同之點，便是直指共產國際代表的錯誤，等於承認盲動主義來自國際代表，議決案說：「認為中國革命現時的階段已經生長成了社會主義的革命之主張，是不對的。同樣，認為中國革命是『不斷革命』（共產國際執委駐中國代表之主張）也是不對的。要想跳過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階段同時並認革命為『不斷革命』之傾向，其錯誤與托洛茨基一九〇五年時的錯誤相類似。」（註六〇）在同一議案中，當檢討廣州暴動的錯誤時，把另一國際代表紐曼同樣加以批評說：「對於這些，直接指導者應負責的，就是政治上對共產國際執委負責的同志（某同志及其他）。」（註六一）這裏所指「某同志」，在議決案原文為「N同志」，也就是紐曼。前面所指主張「不斷革命」的，當然是

羅民那直了。

在議案裏，共產國際已經非常明顯而又嚴厲斥責兩個國際代表。認爲其錯誤與托洛茨基的錯誤相類似，而且也率直指明，中共擴大會決議之「無間斷革命」理論，係國際代表的主張，廣州暴動之「直接指導者」爲紐曼，應負廣州暴動的錯誤和失敗的責任。可是現在匪黨的中央和匪黨史家，都把國際代表的錯誤轉移給瞿秋白，對於國際代表不敢有任何批評，他們說：

「這時黨的主要負責人瞿秋白等同志，錯誤的認爲中國革命的性質是『不斷革命』，把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混淆起來，否認革命有階段的區別，認爲民主革命沒有自己的一定時間和一定任務，而可以把祇能在另一時間去完成的任務，合併在民主主義的任務中去完成。」

「他們錯誤地認爲中國革命的形勢是在『不斷高漲』，認爲革命失敗後中國革命形勢不但不是低落，而正是高漲的、上升的，認爲當時各省農民起義，已經發展到奪取幾省政權的局面，而接近於奪取工商業中心。」（註六二）

共產國際在同一決議案中，非常嚴厲的斥責中國共產黨的盲動主義，決議說：「現時形勢之中的最大危險，就是工農運動的先鋒，因爲估計現時形勢的不正確而過於輕視敵人的力量，可以脫離羣衆而過於前進，散亂自己的力量，而使敵人得以各個擊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因此特別指示中國共產黨，要他注意加緊工農之間的羣衆工作。……必須同時永久拋棄職工運動中的恐怖政策，這是對於黨有非常之大的危險的。必須最堅決的反對以強迫的方法舉行罷工。……必須堅決的反對工人階級某種成

分之中的盲動主義，反對無準備無組織的城市與鄉村的發動暴動，反對玩弄暴動，不做工農的羣衆暴動，而去玩弄暴動，這是消滅革命的『正確方法』。……因此必須反對對於游擊戰爭的溺愛，反對沉溺於散亂的不相關聯的必致失敗的游擊戰爭（這些危險在兩湖等處曾經有過）。……中國共產黨雖然在八七會議之後，大致糾正了自由的機會主義錯誤，這在共產國際以前的決議案就已經說過，可是他還沒有完全適應現時形勢的新條件，表現策略上的動搖（看輕盲動主義的危險，職工運動中之恐怖方法，沉溺於鄉村中的游擊主義），以及組織上的動搖（鞏固黨部組織，吸收新黨員，鞏固中央黨部與地方黨部的聯絡，建立堅強的黨的機關，正確的黨與非黨羣衆關係，反對機會主義的餘毒，反對『左傾高調』（『先鋒主義』『新共產黨』的論調，恐怖主義，盲動主義，強迫罷工等等）——應當是黨的當前任務。』（註六三）

在共產國際這一指示的四個多月以後，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中國共產黨在莫斯科舉行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六大」通過的政治決議案，也批評了當時的盲動主義說：「十一月擴大會議在決議案上，對於中國革命的估計，不正確的採用了『無間斷的革命』的名詞，於是解釋革命爲不斷的高漲之可能。就可以發生由此而得到不正確策略。同時對於布爾塞維克的暴動政策的觀念很久是模糊的，於是有不正確的估量和策略，及過於忽視敵人力量的觀念——這些可以成爲盲動傾向的根據。因此，沒有嚴厲的防止當時黨內已經發現的盲動主義的傾向（這種極左派的傾向正是很有害的）。」（註六四）

到了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七次全體會議時，通過了「關

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決議中更明確指出了瞿秋白的盲動主義，決議寫道：「這種『左』傾情緒在『八七會議』後繼續發展。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黨中央的擴大會議，就形成爲『左』傾盲動主義（即冒險主義）路線，並使『左』傾路線第一次在黨中央的領導機關內取得統治地位。」（註六五）

現在的匪黨史家，根據共產國際以及「六大」和匪黨中央的決議，進一步斥責盲動主義，認爲：「他們錯誤地規定了湖南、湖北兩省起義計劃，規定了國民黨統治中心地區江蘇、浙江等省的起義計劃，甚至規定以河北省三特區（按：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九日，順直省委報告說：三特區暴動爲京東（唐山、玉田、天津、直南。但當時中共中央北方局關於北方大暴動之決議和通告，則規定四大暴動區域爲直南、熱河、京東、天津。——見「中央政治通訊」第十四期第十六期。）和京東爲起點的北方各省起義計劃，以及東北起義計劃等等。他們對於城市鬥爭和鄉村鬥爭不加區別，錯誤地認爲城市起義的時機已經成熟，命令上海工人必須同附近各縣農民起義互相呼應。宜興、無錫農民起義後，又命令在南京也必須加速準備起義等等。他們忽視農民根據地的決定作用，把主要的希望寄托於大城市的起義。」

「他們否認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失敗，否認當時的政治形勢是革命低潮，他們反對退却，要求繼續進攻。一定要把城市工人的經濟鬥爭發展到政治鬥爭，發展到武裝起義，一定要把農村的抗捐抗租發展到武裝起義。起義不必經過準備階段，而且一經發動即不得退却。這樣，他們就不顧敵人力量的強大和革命失敗後羣衆的疲憊情況，命令少數黨員和少數革命羣衆進行沒有任何勝利希望的軍事冒險。各地祇要是有黨的組織或有黨員的地方。就命令他們積極準備武裝起義。」

「他們在組織上開始了宗派主義和懲辦打擊的政策，片面地強調幹部的單純工人成分。他們認為黨內幹部不是工人、貧農而是小資產階級出身居多，所以黨的組織任務就是要用工人分子幹部來代替非工人分子幹部。更嚴重的是在整頓組織的借口下，引進『暴徒式的分子』到黨的領導機關來。結果使保存下來的革命力量受到許多損失，同時黨內形成了極端民主化，破壞了黨內生活的民主集中制這個組織原則。」（註六六）

這些都是事後對瞿秋白、羅民那直的盲動主義的批評。在當時，除了陳獨秀二人以外，在匪黨黨內，沒有任何人敢說話，陳獨秀曾說：「萬萬不可隨便做政治的暴動，尤其是上海。」（見附錄六），陳獨秀的這些意見，雖然與共產國際的指示及以後「六大」決議相符，可是在當時，被匪黨中央傳為「笑話」，在現在，則被匪黨史家描述為「取消主義」了。現在的匪黨史家，更進一步重複「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寫道：「這次左傾路線錯誤一開始執行就受到了毛澤東同志和白區工作的許多同志的正確批評。」（註六七）或「非難和批評」。（註六八）這當然又是神化毛匪的杜撰之詞了。查遍當時的匪黨文件，看不見有任何毛匪的批評文字或記載（按：當時各地匪黨幹部之報告、意見或批評，均刊載於匪黨中央的「中央通信」和「中央政治通訊」之內）；相反的，除有毛匪遭受處分的決議外，還有陳獨秀對毛匪的批評。陳獨秀說：王若飛對於江蘇運動，偏重在奪取城市的政權，有些似毛潤之（按：即毛澤東）的意見（參看附錄七）。可見毛匪澤東在當時，不僅沒有「正確批評」盲動主義，而且是「奪取城市的政權」，執行盲動主義的急先鋒，兩湖暴動之進攻長沙及長沙暴動之主持人，就是毛匪澤東，

不過失敗了，毛匪反而受了處分。

當時批評與懷疑盲動主義的第一個是陳獨秀，寫了三封信給匪黨中央常委；第二個便是張國燾，他在致擴大會函中，除爲自己辯護外，並說：「若說對於暴動取慎重的態度一層，近日得讀國際第八次擴大會議中國問題決議案有一段話：上海政變時，建議實行暴動的策略，十分謬誤……。暴動是『玩』不得的……。又憶起……國際曾電令中央說：上海工人糾察隊於必要時，可將槍枝藏起來，保全實力，以圖再舉。現在至少在領導的同志中，是沒有人不主張或懷疑暴動的了。我個人對於八月一日南昌暴動雖然覺得在這過程中，有許多錯誤，但是對於那次暴動取『玩』不得的態度，亦未可一概視之爲機會主義。」（註六九）可見當時張國燾對暴動是採取慎重態度，與盲動主義是有區別的。

羅民那直與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發展到「無往不是暴動」。發展到「恐怖主義」（即大燒大殺），「宗派主義」「懲辦打擊政策」，甚至引進「暴徒式的分子」（即綁匪流氓打手等）到匪黨領導機關來，其嚴重可想而知。因而當時匪黨暴動中的大燒大殺大搶不是偶然的，而是匪黨機關中「暴徒」領導的本色。毛匪澤東在湘東暴動失敗後，收集殘部四百餘人逃入井崗山，和土匪王佐、袁文才結合，正是物以類聚、暴徒與土匪合流。後來如果不是朱德帶了紅四軍（兩個團）與之會合，改變了局面，恐怕毛匪要與王佐落草爲寇到底。

八、不同之估價

匪黨的盲動主義執行經過，照匪黨的記述是這樣的：「八七會議在反對右傾錯誤的時候，却爲左傾錯誤開闢了道路。」（註七〇）由於這次錯誤路線的執行，「在實際工作中招致了許多損失，到了一九二八年初，這個左傾路線的執行在許多地方已經停止，而到同年四月（距左傾路線的開始不到半年時間），就在全國範圍的實際工作中基本上結束了。」（註七一）這就是說，匪黨的盲動主義係從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的緊急會議開始，到次年（一九二八）四月結束，前後約有九個月的時間，但形成爲路線到結束則不到半年。

但匪黨的前期書刊，則持另一說法，「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上册寫道：「廣州起義失敗後，中國革命已經進入低潮時期。……無產階級政黨的政策就沒有能够充分地及時轉變，沒有充分的開展反盲動主義的鬥爭，於是盲動主義錯誤一直到中共六次大會才受到重大的打擊。」（註七二）

事實上，自從八七會議以後，匪黨黨內除陳獨秀等少數人敢於批評匪黨中央外，沒有其他任何人曾經批評過匪黨的盲動路線。一直到匪黨六次大會（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才根據共產國際指示，正式糾正盲動主義的錯誤。由此可見。盲動主義的產生、發展、乃至沒落，實際上將近有一年的時間，而不是「不到半年時間」。如果說，一定要在路線形成之後。才算是盲動主義，那麼、十一月擴大會以前的兩湖暴動、江浙暴動等也不能算是盲動，而祇有擴大會後的廣州暴動才是盲動主義了；這樣一來，匪黨所指責的盲動主義不就成爲「無的放矢」了麼？

匪黨的這種分析，使人對於瞿秋白盲動主義的界說和期間，混淆不清，因而在匪黨黨史上對於盲動

主義也有不同的記述，尤其對於八七會議、十一月擴大會以及南昌、秋收、廣州暴動更有許多不同的看法和估價，同時也出現了許多差異和矛盾。

先以八七會議來說。八七會議本身，認為這次會議是共產國際「救了我們的黨，是非常之好的。」匪黨六次大會對八七會議也給予很高的估價。「六大」決議說：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大會承認，當時共產國際超過中央委員會，直接號召中國的黨員羣衆要求徹底變更黨的路線，改變黨的領導機關——確是對的。」

「八七緊急會議是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從根本上改正舊時機主義的錯誤，因此，他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轉變關鍵，他在使黨布爾塞維克化的事業上，有極重大的意義。八七會議用布爾塞維克的公開的精神，指斥機會主義的錯誤，提出土地革命的中心口號，指出無產階級與農民要推翻反動的國民黨中央政權的目標，定出武裝暴動的總方針，黨員羣衆起來，開始肅清指導機關中的機會主義成份，改變舊的指導機關——這樣，將黨從機會主義的泥坑中救出來重新走上革命的大道。」

「固然，八七會議對於左派國民黨問題，還保存了幻想，對於土地問題還不太澈底。可是這種缺點決不減低八七會議在歷史上的極重大的意義——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大會對於八七會議的主要決議完全贊同。」（註七三）

到了毛澤東統治了中國共產黨以後，對八七會議的估價就大大貶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寫道：「另一方面，由於對國民黨屠殺政策的仇恨和對陳獨秀投降主義的憤怒而加強起來的小資產

階級革命急性病，也反映到黨內，使黨內的左傾情緒也很快地發展起來了。這種左傾情緒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黨中央的緊急會議（「八七會議」）上已經開端。『八七會議』在黨的歷史上是有功績的。它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堅決地糾正了和結束了陳獨秀的投降主義，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的總方針，號召黨和人民羣衆繼續革命的戰鬥，這些都是正確的，是它的主要方面。但是『八七會議』在反對右傾錯誤的時候，却爲左傾錯誤開闢了道路。它在政治上不認識當時應當根據各地不同情況，組織正確的反攻和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藉以有計劃地保存革命陣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許了和助長了冒險主義和命令主義（特別是強迫工人罷工）的傾向。它在組織上開始了宗派主義的過火的黨內鬥爭，過分地或不適當地強調了領導幹部的單純的工人成份的意義，並造成了黨內相當嚴重的極端民主化狀態。」（註七四）

這個「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雖然表面上也承認「八七會議」的功績，但在批評其錯誤時，實質上是否定的，除「結束了陳獨秀的投降主義」以外，它批評八七會議對當時政治形勢的估計，策略的決定，黨的組織問題，幹部政策等等一連串都是錯誤的，而且還「容許了和助長了冒險主義和命令主義的傾向」，這就是說，八七會議固然結束了投降主義，但同時又開始了盲動主義。一九四五年四月，匪黨中央的這種決議，顯然是爲神化毛匪鋪平道路，這也就是說，匪黨的黨史，除毛匪當權時間是執行了所謂正確路線以外，以前的各個時期，不是右傾便是左傾機會主義。因而在同一時期（一九四五年四月）召開的匪黨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便把毛澤東思想列入匪黨黨章，把毛匪捧爲中國斯大林，從此，便完

成了匪黨的「個人崇拜」。

其次，對於十一月擴大大會，也有兩種不同的看法，匪黨六次大會，雖然批評這次會議「對於盲動主義未能充分預防」，但認為：「中央十一月擴大會議，繼續布爾塞維克化的事業，更加詳細深切的確定土地問題與策略，提出蘇維埃的工農民權獨裁的口號，堅決的決定改造黨的組織及引進工人同志來負責導工作的責任，同時，第六次大會認為：十一月會議指出準備好的聯絡好的武裝暴動之必要是非常對的。」（註七五）

「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十一月擴大大會，則完全採取否定與攻擊的態度，認為這次會議「就形成爲左傾的盲動主義（即冒險主義）路線，……因而它仍然不但不去組織有秩序的退却，反而不顧敵人的強大和革命失敗後的羣衆情況，命令少數黨員和少數羣衆，在全國組織毫無勝利希望的地方起義。……」（註七六）對於「六大」所說「引進工人同志來負責導工作」一點，指爲「引進暴徒式的分子」到黨的指導機關來。尤其對於「宗派主義」、「打擊政策」更予猛烈抨擊。究其原因，係由於十一月擴大會所通過的「政治紀律議案」，曾給毛匪以撤消湖南省委委員資格開除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嚴重處分，這一處分，雖然事隔十八年，雖然瞿秋白早已去世，但是毛匪還是耿耿於懷，還是要報此一箭之仇。

再次是關於各次暴動的估價問題。瞿秋白主持的十一月擴大大會，認爲南昌暴動雖有歷史意義，但因「前委因襲著軍事投機的遺毒」，結果成爲「一次軟弱的軍事投機的嘗試」而失敗。兩湖的秋收暴動「

變成了單純的軍事投機的失敗」。(註七七)祇有廣州暴動，瞿秋白的匪黨中央給予很高的評價，認為「對於中國現時革命的整個發展，有非常之重大的意義。」(註七八)

共產國際批評紐曼應負責的，廣州暴動中的一些錯誤為：「工農之中準備的工作不充分，敵人軍隊之中的工作也不充分，對於黃色工會會員的態度不正確，黨部及青年團本身的準備不充分。中央完全沒有接到廣州事件的通知，政治上的調動羣衆也薄弱(沒有廣泛的政治罷工，沒有選舉的廣州蘇維埃以為暴動之機關。)同時又認為「廣州暴動是中國無產階級建立蘇維埃政權之英勇的嘗試，對於工農革命的發展有極大的作用。」(註七九)共產國際六次大會(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七至九月一日)也說：「大會認為將廣州起義認做盲動的企圖是絕對錯誤的。廣州起義雖是中國革命過去時期中中國無產階級之英勇的退兵時的一戰，雖是指導方面有很大的錯誤，但是仍舊是革命之新的蘇維埃階級之旗幟。」(註八〇)

匪黨的六次大會「認為南昌暴動秋收暴動——尤其是廣州暴動在政治上決非盲動主義政策」，「南昌暴動是反對國民黨中央的軍事行動，這一軍事行動是對的」，「秋收暴動取得農民羣衆，但是機械的運用這一政策亦發生玩弄暴動和軍事冒險」，「廣州暴動開始蘇維埃的時期，但他的失敗，使他成爲『退兵時的一戰』」。「廣州暴動後黨的政策沒有能及時轉變，反盲動主義的鬥爭未能充分，這是由於過份估量革命敵人的崩潰」，「在這種關係上不估量環境的兩湖暴動等計劃，就是錯誤了。」(註八一)六次大會一面說兩湖暴動計劃是錯誤了，一面又說秋收暴動決非盲動主義政策，原因就在於「後來繼續發

展農民鬥爭，以至於許多蘇維埃區域的創立，大致亦由秋收暴動的影響。」（註八二）

匪黨第六次大會的基本看法，認為：八七會議是布爾塞維克化的開始，十一月擴大會繼續布爾塞維克化，因而在此期間的南昌、秋收、廣州暴動決非盲動主義，祇是未能對於盲動主義充分預防，因而「秋收暴動之機械的運用，就是發生有些地方玩弄暴動和軍事冒險的行動。」（註八三）到了廣州暴動，那是「革命失敗的過程中『退兵時的一戰』，但是這一點我們黨的指導機關沒有估計到。」於是「反盲動主義的鬥爭未能充分。」（註八四）這也就是說，廣州暴動以後，即經過「退兵時的一戰」以後的暴動，才算是真正的盲動主義。

匪黨第六次大會的基本觀點，後來被毛匪完全推翻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認為武漢分共是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敗，從此策略上應該退却，應該保存革命陣地和收集革命力量，而不應該組織全無勝利希望的地方起義。雖然在決議中沒有指明南昌、秋收、廣州暴動為盲動主義，但在錯誤策略下的起義，而且這些起義又完全失敗了，當然從策略觀點上看來，祇能是盲動主義了。所以「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乃又批評六次大會「對於大革命失敗後黨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卻，……也缺乏必要的認識。」（註八五）由於「缺乏必要的認識」，於是「六大」對於八七會議、十一月擴大會以及南昌、秋收、廣州暴動的估價也就錯誤了。

匪黨所以產生前後不同的估價，似乎發生於一種不同的觀點；六次大會以為，革命的失敗有其一段過程，由一九二七年七月的失敗到十二月的廣州暴動，即是這一必經的失敗過程，到了廣州暴動，那已

經是「退兵時的一戰」了。毛匪中央的後來看法，則以為既然七月起，革命就失敗了，便應即刻退卻，保存力量，而不應該再行暴動，「招至了許多損失。」可是在當時，毛匪自己恰好就是一個盲動主義的健將，領導了「毫無勝利希望」的湖南秋收暴動。

註一：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武漢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第二十次擴大會議速記錄。

註二：武漢國民黨二屆中常會第二十三次擴大會議紀錄——一九二七年八月五日。

註三：一九二七年八月三十日陳其瓛關於中央銀行江西分行被劫經過報告。

註四：國民黨調查科「中國共產黨之透視」——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一日編。一九六二年台北文星書店印行。

另參照「周逸羣報告」——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日匪黨「中央通信」第七期。

註五：李立三報告「八一革命之經過與教訓」——中共中央密件「中央通信」第七期。

註六：張國燾報告——「中央通信」第七期。

註七：「中央通告」第十三號——「中央通信」第七期。

註八：華崗「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之中國共產黨」——布爾塞維克四卷三期，一九三一年五月十日出版。

註九、十：蔡和森「機會主義史」——黎民魂編著「謀叛黨國之赤色檔案」，一九二八年七月出版。

註一一：「張國燾同志致擴大會議函」——中共中央之「中央通信」第十三期，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刊印。

註一二：「八七會議告全黨黨員書」——中共中央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國問題指南」第二冊。另據張國燾的

回憶錄說：「八七」會議後已組的中央政治局，是由翟秋白、蘇兆徵、李維漢、張太雷、項英、向忠發、盧福坦七人爲委員。

註一三：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央緊急會議「最近農民鬥爭的決議案」——「中央通信」第二期，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刊印。

- 註一四：八七會議「最近職工運動議決案」——「中央通信」第二期。
- 註一五：八七會議「黨的組織問題議決案」——「中央通信」第二期。
- 註一六、一七：中共中央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九日「中央通告第二號」——「中央通信」第二期。
- 註一八：八七會議「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任務與策略的議決案」——「中央通信」第二期。
- 註一九：蔡和森「機會主義史」。
- 註二〇：「中央通告」（九月十五日）——「中央通信」第五期，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日。
- 註二一：「政治紀律議案」——「中央通信」第十三期，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 註二二：同註二〇。
- 註二三：同註二一。
- 註二四：中共中央九月五日「致江西省委信」——「中央通信」第四期，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二日。
- 註二五：中共中央九月九日「致廣東省委信」——「中央通信」第五期，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日。
- 註二六：中共中央九月二十三日「致廣東省委函」——「中央通信」第六期，一九二七年九月三十日。
- 註二七：中共中央「兩湖暴動計劃議案」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二日「中央通信」第四期。
- 註二八：中共「中央最近政治狀況報告」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日「中央通信」第七期。
- 註二九：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中共六大大會「政治議案」——「中國問題指南」第二冊。
- 註三〇：鍾貽謀編著「海陸豐農民運動」——中共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十月出版。
- 註三一：秋收暴動時，國民革命軍許多軍人家屬，均被共黨屠殺，並焚燒其房屋；而這些人，在國民黨容共時期，原被共黨所稱爲同志者。
- 註三二：中共「中央最近政治狀況報告」——「中央通信」第七期，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日。

註三三：中共中央十月十二日「致廣東省委函」——「中央通信」第七期。

註三四：中共中央十一月十五日「致兩湖信」——「中央政治通訊」第十四期。

註三五：中共中央「江西工作計劃」——「中央政治通訊」第十六期。

註三六：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致朱德函——「中央政治通訊」第十六期。

註三七：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致朱德信——「中央政治通訊」第十六期。

註三八：中共「中央通告」第十六號——「中央通信」第十三期，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註三九：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中國現狀與黨的任務決議案」——「中央通信」十三期，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註四〇：擴大會議「最近組織問題的重要任務決議案」——「中央通信」第十三期。

註四一：擴大會議「關於第六次全黨代表大會之決議」——「中央通信」第十三期。

註四二：擴大會議「關於土地問題黨綱草案的決議」——「中央通信」第十三期。

註四三：中共「中央通告」第十六號（十一月十八日）——「中央通信」第十三期。

註四四—四六：一九二八年一月三日，中國共產黨臨時政治局會議通過的議決案「廣州暴動之意義與教訓」——「中央通訊」。

註四七、四八：國民黨調查科「中國共產黨之透視」——一〇八—一一〇頁。

註四九、五〇：「廣州暴動之意義與教訓」——「中央通訊」。

註五一：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上海印發。

註五二：華崗「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的中國共產黨」。

註五三：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十九日會議「關於左派國民黨及蘇維埃口號問題決議案」——「中央通信」第六期。

註五四：張太雷報告「八一事件之經過失敗原因及其出路」——「中央通信」第七期。據張國燾的回憶錄說，葉賀軍

到達潮汕後，張太雷始由香港至汕頭葉賀部，傳達八七會議後中共中央之指示。

註五五：張國燾十一月八日「致擴大會函」——「中央通信」第十三期。

註五六：王若飛十一月二十日「致中央函」——「中央通信」第十三期。

註五七：蔡和森「機會主義史」。

註五八：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中國現狀及黨的任務決議案」——「中央通信」第三期。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註五九：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

註六〇：「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的議決案」——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會議通過蘇聯及中國

共產黨代表團斯大林布哈林等所提出之草案——「中國問題指南」第一冊四七頁。

註六一：同註六〇——「中國問題指南」第一冊五三頁。

註六二：何幹之主編「中國現代革命史」——二六、一二七頁——一九五八年九月香港一版。

註六三：「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的議決案」——「中國問題指南」第一冊四九—五二頁。

註六四：中共六大大會「政治決議案」——「中國問題指南」第二冊。

註六五：中共中央六屆中委擴大的七次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毛澤東選集中文本第三卷（附錄

）九六〇頁。

註六六：何幹之主編「中國現代革命史」——二七頁。

註六七：「中國現代革命史」——二七頁，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九六〇頁。

註六八：王實等編「中國共產黨歷史簡編」——〇五頁，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九六〇頁。

註六九：張國燾十一月八日「致擴大會函」——「中央通信」十三期。

註七〇：「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九五九頁。

註七一：同註七〇——九六〇頁。

註七二：中國現代史研究委員會「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上册二六五——二六六頁。

註七三：中共六大大會政治決議案。

註七四：「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九五九、九六〇頁。

註七五：中共六大大會「政治決議案」。

註七六：中共中央「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註七七：中共中央十一月擴大大會「政治紀律決議案」——「中央通信」十三期。

註七八：中共中央「廣州暴動之意義與教訓」——一九二八年一月三日。

註七九：「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的議決案」——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國問題指南」第一册五三頁。

註八〇：「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上册二六四、二六五頁。

註八一—八四：中共六大大會「政治決議案」——「中國問題指南」第二册。

註八五：「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九六一頁。

附錄一：中央通告第十三號

——為葉賀失敗事件——

(一) 南昌暴動與南征的意義

南昌暴動的八一革命在中國革命史上有極重大的意義：從國民黨改組以來，國民黨的所謂革命，始終是擴大他在所謂「青天白日」之下的軍事勢力，全然不肯發動民衆，使民衆自己起來取得政權，取得土地，推翻封建制度的基礎——地主私有土地的制度，恰恰相反，當農民羣衆自己起來實行「耕者有其田」的時候，工人貧民自己起來實現革命民權獨裁

的時候，這些國民黨旗幟之下的「革命軍官」立刻便攻擊農民工人，大施屠殺，蔣○○四月中中的上海屠殺、廣東屠殺，……是如此；湖南唐生智等的馬夜政變及清鄉，以及馮玉祥在陝豫的屠殺政策，也是如此。就此證明國民黨的一切新軍閥都是代表豪紳資產階級而反對工農壓迫工農的。所以中央在宣佈與國民黨的武漢政府破裂之後，立刻決定民衆武裝暴動的新政策，規定湘鄂粵贛的四省秋收暴動的計劃，而葉挺軍隊的南昌暴動，便是這一民衆暴動，推翻「軍閥國民黨」的政權之總政策中的一個計劃。

葉賀南昌暴動，在一般的民衆武裝時期之中，佔有何等重大地位，這是非常明顯的。民衆自己的發動，以及真正革命軍隊的暴動，以推翻新舊軍閥政權，建立民衆的工農政權爲目的，以實行土地革命目的。這歷史的事實，是中國革命中空前的事件。所以現在葉賀雖然是失敗，而南昌暴動在湘鄂粵各省工農武裝暴動的總政策之中，始終是中國革命史上最光榮的一頁。

不但如此，我黨以前的政策——是機會主義的政策，其錯誤的主要點，便是無產階級政黨拋棄獨立的政治行動，側重小資產階級領袖妥協讓步。祇有決定四省民衆武裝暴動，以及率領葉賀軍隊暴動反抗武漢反動政府之政策，是算黨拋棄機會主義而走上布爾什維克道路的新紀元。

因此，凡在南昌暴動之中，有傾向猶豫搖動，如等待張發奎態度之表現等等的，顯然是機會主義的遺毒；南昌暴動之後，祇抱着軍事投機心理，而不信任羣衆，不認識發動羣衆，創造羣衆的工農政權之傾向，甚至於暴動開始之後，仍舊拋棄土地革命之旗幟，那就更是機會主義的遺毒。葉賀軍事上的失敗，不是我黨真正的失敗；祇有南昌暴動中之指導不能完全脫離機會主義的遺毒，致使南昌暴動減少其歷史上應有之意義——這可是我黨政治上的失敗。

(二) 葉賀南征的經過及其失敗

南昌暴動後，葉賀軍隊從南昌經過撫州、瑞金、會昌，遇見錢大鈞的及一部分黃紹竑的軍隊，與他們大戰，結果，南昌暴動軍雖然受了很大的損失，但是也打了很大的勝仗。會昌之後葉賀軍未照預定計劃直下尋鄔，到梅縣，竟改變途

程折回汀州上杭一帶，再經大埔一直往潮汕去。但是等到葉賀軍隊到潮汕，敵人方面陳濟棠、王俊、黃紹竑已從四面合圍來攻擊。

葉賀軍隊雖然在九月二十四日先鋒即到汕頭，汕頭工農軍也起來暴動，然而到九月三十日即被反動軍隊所逼，不得不拋棄汕頭，而竭全力到湯坑去禦戰。這最後一次戰鬥，敵人方面有一萬五千，我軍祇有五千，巷戰一晝夜而我軍竟完全解體。現在的情形是：二十五師一千餘兵因到汕頭時尙留駐三河壩，不久即被敵軍隔斷，現在退向閩邊。湯坑之戰敗後，葉挺祇餘七八百人退甲子港而潰散。尙有賀龍二十軍之第一、二師二三千人奔往海陸豐，這部分的軍官政治意識本甚模糊，離開大隊之後，更是絕無目標的情形，竟要求李濟琛收編。

(三) 葉賀暴動失敗後之政策

南昌暴動軍的失敗，誠然是中國革命中的一個失敗——工農武裝暴動的開始時期，革命方面所有的這一些正式編制訓練過的軍隊，不但不能爭取廣東發展土地革命，而竟潰散了一大部分，這誠然是一個很大的損失。但是武裝反動後，中國革命進到一個更新的時期——工農民衆暴動的時期，葉賀軍隊的革命戰爭，不過是全國民衆暴動中的一個強大的副力。這新時期中，我們的主要政策是組織民衆暴動，贊助民衆暴動，葉賀的南征，不過是這總政策中的部分問題。我黨這個新的武裝暴動政策，完全是合於革命發展到新階段時客觀上所要求的。祇要看看九月初直到現在，湖北的通城、通山、崇陽、咸寧、蒲圻、公安、石首、松滋、江陵等縣，農民甚至於徒手的暴動起來，組織工農革命軍，佔領縣城，革命民衆自己選出縣政府，鄉村之中實行一切政權歸農民協會，沒收地主，殺戮豪紳……湖南安源的工軍和農軍暴動進攻醴陵，株州的農軍以一支槍奪取了株州。平江、瀏陽的農軍會同時暴動佔領縣城，長沙四郊的農民也起來暴動。廣州則自四月十四日李濟琛反動後，四處暴動起來，祇要看看這種情形，便知道客觀上革命的發展，的確已經到了一般工農暴動的時期；我黨的責任，便是組織和準備以及贊助指揮這些民衆武裝暴動，在各地率領民衆起來推翻新舊軍閥豪紳資產階級的政權。在這種暴動之下葉賀軍隊自然有很重大的意義，但是，革命的基礎力量并不是葉賀的部隊，而是工農羣衆，現

在葉賀軍隊固然失敗了，工農民衆的力量還卻正開展，對於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必要之認識正在與新舊軍閥國民黨的劇烈的鬥爭之中，日益廣泛而深入於工農羣衆——不但在兩湖、廣東是如此，現在江、浙、北方豫、陝……差不多各省都有如此的現象。這種情形之下，難道葉賀軍隊一敗，革命便了結麼，當然不是的。葉賀的失敗，僅僅是軍事上的失敗。葉賀的軍隊可以給敵人打散，工農民衆的力量並沒有打散。我黨準備組織發展工農武裝暴動的總政策，仍舊應當積極的進行。

因此，現在廣東雖然已經沒有立刻以大軍攻取廣州奪得全省政權的可能，然而廣東各地的農民暴動仍舊在發動，葉賀所剩餘的勢力應走「到農民中去」幫助當地農民摧毀豪紳的政權，建設農民羣衆的政權，引起農民羣衆自動的起來沒收土地……武裝農民，組織工農革命軍，葉賀所餘軍隊自身要改組變成工農革命軍。

(四) 葉賀南征中我們主觀的錯誤

葉賀軍隊的南征，何以竟至失敗呢？固然，客觀上敵人的軍力比我軍強大，全中國的報紙交通整個兒的權力都在敵人手中。然而失敗的緣因之中屬於我們主觀上的錯誤的亦是很大：

一、前敵委員會政綱的錯誤——主持葉賀南征的我黨指揮機關前敵委員會決定政綱之中，關於土地問題提出「沒收二百畝以上的地主土地」的主張。這是非常之大的錯誤，這證明沒有土地革命之決心，這種政綱可以使葉賀暴動根本上喪失其意義。廣東一個農民聽見這一主張便說道：「這叫做耕者無其田！」這句批評是再正確也沒有。

二、策略上的錯誤——葉賀南征軍所到的地方，對於豪紳資產階級所採取的策略，並不是猛力摧毀他們的組織和政權，都大半偏於猶豫妥協的策略。并未猛力殲滅土豪鄉紳，并未完全解除他們的武裝，摧毀他們的金融機關，摧毀他們的交通聯絡。不敢堅決的實行沒收徵發的政策，卻用軍閥籌餉的老辦法，和他們和平磋商。對於豪紳是如此，然而一到汕頭，對於乘機稍稍搶掠的貧民，卻立刻槍斃了三個人，「爲的是維持秩序」——那還是維持豪紳資產階級的秩序！廣東有一個工人說：「這是孩○第三的軍隊」。這就是說：這次來的軍隊還非工農貧民的軍隊，並沒有大大殺滅豪紳

資產階級的權勢與勢力（葉賀軍隊之中「不擾民」的口號幾乎高於一切）。

三、政權認識上錯誤——「耕者無其田」的「蔣○○第三的軍隊」到廣東做甚麼呢？要創造甚麼樣的政權呢？當然，帶著這種政綱和策略的軍隊，對於政權不會有明瞭的認識。沒有預備去建立工農貧民的政權，沒有深切覺着自己應當代表工農貧民去行使權力。卻祇要「繼承國民黨的正統」。沒有信仰羣衆的力量——羣衆的革命獨裁的力量。沒有在羣衆之中去創造真正自己的軍隊和政權的力量，而是想像着自己是一種軍隊的力量，類似於孫中山的大元帥府，國民黨的國民政府的力量。因此：一、可以亂發委任狀，聯絡雜色軍隊土匪首領；二、可以派人與張發奎談判，弄些縱橫捭闔之術……。

四、宣傳工作上的錯誤——葉賀軍隊行軍的時候，兵士之中並沒有做充分的宣傳及政治工作，所過地方的民衆之中也沒有宣傳。同時，敵人的宣傳都非常之利害，軍隊行過撫州之南，差不多十幾天不見一個人，這是因為朱培德等反宣傳的恐嚇當地居民的緣故，我軍都沒有先行派遣宣傳，說明「八一革命」南昌暴動及南征的意義。

五、軍事上的錯誤——軍事上的錯誤，更是很多，不能詳細敘述，簡單些說：南昌暴動沒有採取直下贛州、吉安，一則可以打散朱培德、錢大鈞，隔絕張發奎，使他們不能與李濟深、黃紹竑連成一片，而如現在之從容佈置，圍攻我們；二則這條是大路，沿途農民運動有些基礎，可以隨處摧毀豪紳政權，引起農民羣衆建立農民的政權，實行土地革命，武裝農民，逐步交農民防守。但南征的路線是取得撫州、會昌、尋鄔等閩贛邊境荒僻之地，農民簡直尚未起來的地方，這已經是一個失着。然而這還可以說，僅僅是一種可能，最明顯的是：一開始便有與張發奎妥協之等待猶豫的傾向；對於不穩的部隊，如蔡廷鍇部，採取非常軟弱的搖動的政策，致使蔡廷鍇得以詐術損壞我軍很多很好的部隊。再則，既在瑞金、會昌打了勝仗之後，又不追蹤南下，直到梅縣，匯合當地已經奮起的農軍，發動當地農民暴動，擊散黃紹竑等敵軍，直取興寧、五華，佔領全東江區域，卻又折回走上杭、汀州，與敵人避道而行，使敵人得以騰出十多天的工夫從容佈置。

總之——前敵的指導，在政治上及策略上并未能真正代表工農，既沒有明顯的土地革命及工農貧民政權的政綱，又

沒有堅決摧毀豪紳政權的策略——工農說是「耕者無其田」、「蔣○○第三的軍隊」。這種機會主義的指導之下的軍隊，如何能責備農民羣衆不起來援助，農民對於這種軍隊自然是不會出力贊助。事實是葉賀軍隊根本不去發動農民羣衆！——前敵指導，祇知道軍隊是主力，「革命委員會」是政權，根本上不信任羣衆的力量，不去發動農民創立真正的民衆政權，因此將富有歷史和偉大的意義之「八一革命」，變成僅僅是投機的行動。這是一切錯誤的總錯誤。總之，這次失敗，并非農民未贊助軍隊而失敗，而是軍隊未發動工農羣衆，甚至反而阻滯民衆革命鬥爭而失敗的（例如普寧農民羣衆數萬圍城攻豪紳的巢穴，軍隊去幫助，打進了城竟反而不准農民進城，不准農民大殺土豪鄉紳，說是維持秩序）。

六、南方局指導廣東農民暴動的錯誤——南方局指導廣東農民暴動的政綱戰術上的錯誤，中央早有信去指正（見中央通訊第六期）。葉賀軍隊與廣東農民接觸之後，尤其見得出：（一）政綱和口號上拘泥規定五十畝以下不沒收，另提減租至百分之三十的口號；（二）戰術上農軍祇取側面攻擊——僅僅作幫助葉賀，牽制敵人之計，而沒有號召農民羣衆自己起來奪取政權和土地，因而沒有強力搏擊的戰術；（三）根本上沒有發動農民羣衆，所謂暴動，大半是，或是完全靠已經組織好的農軍勢力行動——或為純粹的軍事行動，而不是農民羣衆的暴動；（四）地域上海南及高雷雖起，而無關大局，西江方面簡直祇接洽有槍的零星部隊（農軍或土匪）沒有到羣衆中去號召，因此這地方始終沒有暴動，黃紹竑部隊遂得安然渡過；（五）既沒有把廣東農民運動做主力，又沒發動羣衆，所以使羣衆之中發生等待葉賀的心理。自然，一般工農自己沒有深切知道要自己起來奪取政權——這是政治宣傳之大錯誤，就是我各地黨部『沒有詳細考察反動勢力，作種種奪取政權的準備——這是技術工作上的缺點。

（五）葉賀失敗所得的教訓

前敵委員會及南方局的政治上的錯誤，雖然最後改正了些——例如土地問題、政權問題等等，但是已經太遲了，那時軍事上已經近於失敗了。葉賀南征中我們所得的教訓是非常之大的：

一、政權問題——今後革命的任務，應當明顯的確定是要創建工農貧民的革命獨裁的政權——蘇維埃的政權。國民

黨已經死滅，他的旗幟最多不過是「蔣○○第三」的旗幟。必須是工農貧民兵士代表會議（蘇維埃）的政權——必須是羣衆選舉的剝奪反革命的豪紳資產階級選舉權的政權。

二、土地問題——今後應當切實實現「農民羣衆下層自動手沒收土地」之意義。土地問題決非某一政權（自蔣○○第一到蔣○○第三的一切政權）所能出一佈告法令，限制幾畝以上不准沒收的，農民暴動即是實現「耕者有其田」，「分配田地」；農民自動手的幹，我黨應當竭力以贊助，並且要領導他們去幹。耕者有其田及分配土地普遍羣衆鬥爭，客觀上是土地國有的實行，因為祇有羣衆如此行動起來才能創造出工農民衆的國家，祇有工農民衆的國家才能實行土地國有——宣佈耕者有其田是全國人民的，宣佈一切人不得買賣土地。

三、勞動問題——我黨在武裝暴動創立工農貧民政權的總政策之下，自然要有最徹底的：「八小時工作制……等」的工人問題政綱；二、工農政權要沒收中外大企業及銀行，要實行國有銀行大工業及一切交通事業；對小企業手工工場等厲行徹底的勞動法，對於不遵守勞動法的店東廠主嚴厲的處置，一直到沒收。

四、策略問題——對於買辦豪紳資產階級，必須極嚴厲的實行殲滅政策，不能稍有猶豫動搖的態度，并須勇敢的摧毀他們一切權力機關，武裝的，金融的，交通的，一切種種反革命工具。對於小資產階級不可以存着怕他們反動而遷就他們的心理；我們猛烈的摧毀現有的豪紳資產階級的秩序，小資產階級是要動搖甚至反動的。但是工農政權的確立，實際上也是解放小資產階級的羣衆，他們客觀上祇有贊助工農是他們的出路。

五、軍事問題——辛亥革命直到現在，都祇有「將變」——馮玉祥、郭松齡、唐生智、周鳳政等等的倒戈，「民軍」、「游擊隊」等等土匪首領的受編。現時我黨的軍事行動，必須是「兵變」——兵士羣衆、土匪羣衆在我們政治口號之下移轉他們的武器來反抗長官，推翻軍閥國民黨的政權。總之，既名爲民衆武裝暴動，那就必須是民衆的。工農羣衆奮起槍奪敵人的武裝，兵士土匪羣衆舉起武器來幹——打倒一切「上等人」的權力。如此之軍事行動，才是民衆的武裝暴動，這種暴動裏才能產生真正的工農革命軍。這種主力的創造和發動之中，才能偶爾利用「雜色軍隊」和「土匪首領」——「中立」；否則便是國民黨（「上等人」的黨）老方法——純粹利用軍官及土匪首領，結果，是無窮的造成豪紳資產

階級的武裝勢力而已，他們始終是要殺工農的。

六、黨的問題——在這總的武裝暴動工農革命政策之下，黨的作用高於一切，必須有黨的指導，政策上，如這次委任雜色軍隊，及與張發奎接洽等，都是前敵各個人的任意行動。政治指導集中於黨是非常重要的；再則工農革命軍中，必須有黨代表的制度；三則各地黨部必須深深建築於羣衆的基礎上，在日常鬥爭中一步不放鬆的宣傳奪取政權的必要；四則各地黨部必須詳密的探聽敵人武力上、財政上……的情形。總之，黨要在政治上技術上真真實實的做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好準備。

葉賀失敗之中，如上述之許多錯誤，顯然是機會主義的遺毒，我黨必須深切的認明：下極大的決心，重造我們的黨——在思想上組織上徹底肅清小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造成真正羣衆的，革命的，階級的，布爾什維克的黨，然後才能擔負起現時所負的重大使命（十月二十四日）。

（錄自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日中共中央祕密出版的黨內刊物「中央通信」第七期）

附錄二：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任務與策略的議決案

(一)

中國革命，現時正在自己發展之中，經過極危急極劇烈的轉變關鍵。這一轉變關鍵，即是各種階級力量劇烈的變更其結合之形勢；各階級力量之變更其結合形勢，實在早已開始，而以四月十二的上海屠殺，至七月十五的武漢政變爲其結局。所謂民族資產階級，在民族解放運動之初期，即已完結了他們的革命作用。現在呢，這一階級的各種成份，甚至其中最急進的份子，都已完全走入了反革命的營壘，而成爲反革命之最積極的動力之一。革命營壘中，階級分化，已經表演完結。民族資產階級開始與國際帝國主義勾結，並已與反動的封建軍閥聯盟。四月十二屠殺以前，在民族解放運動的一個營壘之中，有兩個傾向並存着：一是民族改良主義的傾向；一是急進的革命主義的傾向，這兩個傾向一直互鬥到現在。現在呢，已經是兩個完全獨立互相仇視而不可調和的營壘相抗衡：一是資產階級軍閥的反動營壘，一是工農的革命營壘。完成中國的民族解放及資產階級民權革命之任務，現在已經完全放到工農運動身上，只有工農的民權獨裁，

才能履行這一任務；只有工農的民權獨裁與國際帝國主義、封建地主階級、以及一切資產階級直接鬥爭，——「民族」資產階級亦在其中——如此，方能履行這一任務。

民族資產階級與工農運動之間的聯盟隨着工農運動的發展，固然日益趨於不可避免的破裂，然而並不一定要像現在這樣的破裂形勢。工農民權獨裁的勝利，亦是各種階級力量之急劇的變更其結合形式，可是這種勝利，只能在反對民族資產階級的鬥爭中去達到。各階級力量之急劇的變更其結合形式，如果要達到工農運動方面的勝利，那就必須是民權革命的急劇的前進與高漲。然而實際上現在是資產階級軍閥的反動得着了勝利，這當然是中國革命的極大的嚴重的失敗。這一失敗的責任，大部份是由於中國共產黨指導之機會主義政策，阻礙了羣衆的革命鬥爭而放任資產階級的行動。資產階級軍閥的反動，居然能吸引幾部份城市小資產階級到自己方面去。（尤其是智識份子及與地主大資產階級勾結的一部份反動份子）這種反動的勝利，其規模很大；如果中國共產黨的指導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以前，尤其是四月以後，不執行那種屈服的取消羣衆運動的方針，而能切切實實執行革命的布爾塞維克的策略，那麼反動的勝利，不能如此之大的規模。現在中國革命經過極厲害的危機，其原因便是革命的羣衆運動之失敗——以前中國共產黨指導羣衆運動的方向，完全是錯誤的不革命的。戰勝這一危機的基本條件之一，便是中國共產黨之正確的革命的策略，要從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出發，而力求解決革命鬥爭中每一階級中客觀上可以解決的一切任務。

(11)

中國革命還沒有解決其許多任務之中的任何一個任務，而民族資產階級已經先變成了反動的力量。中國革命在現時這一階段之中，還是資產階級的民權革命；不但反對封建制度的餘孽，並且反對國際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統治。而且革命已經造成一種力量，足以來解決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任務。在這兩年來，已經發展得非常之偉大。然而正因為這種力量之發展，便把民族資產階級推到反動的營壘之中，而革命却還沒有能使中國之國際地位，政治制度，社會經濟生活之中，得有任何重要的變更呢。資產階級軍閥的反動得着了暫時的勝利，這種情形使中國革命之兩個前途的問題變成目前

緊迫的問題，已經是中國平民的一般鬥爭中心問題了。

如果民族資產階級能夠和國際帝國主義妥協成功，（而民族資產階級正在力求這種協定的成立）如果他竟能在全國範圍內實現與封建勢力的反動聯盟，如果封建資產階級的聯盟能夠完全鎮壓工農的羣衆運動，最後，如果國際資本在政治上經濟上確有充分的力量，足以幫助資產階級軍閥的反動鞏固起來——那麼在這些條件之下，中國的發展就會走上長期的遷延的使幾千百萬工農受着聞所未聞的痛苦，和災禍的道路。——以資本主義來排斥資本主義前期的封建式的社會經濟關係。資產階級軍閥的聯盟如果得有鞏固的勝利，並有外國的贊助，則中國將要進於「普魯士」式的資本主義之發展，不過比較前一世紀的普魯士更加要受阻礙，更加要多受痛苦，因為中國的半殖民地地位及中國資產階級的落後性與野蠻性，實在是一切進步中之巨大阻礙。即使對於向着資本主義前途之進展，亦是極大的阻礙，這種資本主義的道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與世界帝國主義加重其對於中國之殖民地政策的剝削互相聯結。

至於別一種的發展道路，則必須革命能夠戰勝資產階級軍閥的反動，而建立工農的民權獨裁制，方才得有保證。革命在這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階段上，其客觀的內容是：一、完全解放中國於外國資本壓迫之下（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及帝國主義的特權，取消外債，關稅自主，外國人所佔有的生產資料交通機關收歸國有等）；二、建立全國的國外市場，——沒有在政治上統一中國，沒有消滅軍閥的割據，沒有集權的中央政府，這是不可能的；三、肅清一切阻礙中國發展的封建遺毒（取消地主豪紳的私有土地，土地國有，重新分配土地，自上而下堅決的摧毀一切國家機關，而代之革命的民權的新政府，殲滅土豪鄉紳官僚軍閥等）；四、急劇的改良工人階級之經濟的法律的政治的地位，堅決的消滅工人之無權無利窮困不堪的現狀，這是外國資本在中國之經濟力量之主要根源之一。

這些任務，只有工農的革命民權獨裁制，才能够實行。然而中國現狀的特性，更在於這種自無產階級農民來實行的資產階級民權革命，反抗中外的資產階級的革命，能够而且應當直接的生長而成社會主義的革命。無產階級及農民，爲着完成民權主義的革命及中國之民族解放，也不能不進而沒收一切外國工業及一般反革命的財產，這就要超過資產階級制度的範圍。如果無產階級及農民，怕超過資本主義的關係，怕進於社會主義式的道路，那麼，就是民權革命也不能

得到勝利的完成。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生長而成社會主義革命，將以中國工人階級自己的組織與力量之程度如何而定，並且要靠革命的國際無產階級方面的幫助。然而這一轉變始終將要是一個無間斷的過程。中國革命的這種特性，以及無產階級獨裁勝利之存在，就是中國之非資本主義發展之客觀的保證，這就是中國共產黨所認清的主要的目的。

至於這兩種前途中，究竟那一種前途得以實現，那就只有鬥爭可以決定。爲要有正確的指導起見，必須要很清楚的分析一般客觀形勢的及每一時期各種力量之相對關係。

(三)

據一般的客觀形勢看來，資產階級軍閥的反動，其勝利是極不鞏固的，而革命之重新高漲，不但在最近期內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張發奎軍隊之中共黨員在南昌起義，提出土地革命的口號。就可以算得這種革命的重新高漲之先聲。如果革命之重新高漲客觀上的前提不具備，則南昌起義的暴動也就不可能的了，這些主要的客觀前提是：

(一)中國現在任何穩定都不能有——！因爲資產階級軍閥的反動政變，其社會經濟政治的基礎本是如此，中國的革命，本來是由於這封建制度的半殖民地國家內，因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而集聚了許多種的國際國內的矛盾，日益增長激厲所致。革命還沒有能解決其中任何一個矛盾；反而使這些矛盾格外劇烈起來，弄到無以復加的地步。這就可見，爲什麼現在發展全國的大危機，這種危機的急劇，正在資產階級軍閥反動之後。極緊迫的經濟危機，（財政、商業、工業都是如此）和政治軍事的危機互相聯結着（國民革命軍的崩壞，軍閥的分裂和互鬥，蔣介石下野，武漢政府內不可避免的糾紛分裂割據的大擾亂，表面上雖然南京和武漢政府要統一了，其實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最後，國民黨也在崩壞）。資產階級軍閥的聯盟不能夠繼續力爭中國的民族利益，不能夠保障中國國家的統一，不能夠解決工人問題土地問題，不能夠預防經濟的大崩壞，資產階級軍閥自己的營壘裏，土崩瓦解的傾向非常厲害。這種全國的大危機的出路，只有民權革命徹底的勝利，否則，便要使民衆受着無限的痛苦，中國的政治經濟經過極大的崩壞，中國因此而大大的退步，由此而準備「普魯士」式的發展道路。

(一)工農之革命的羣衆運動，雖然受着失敗，然而還沒有大破壞，還沒有因爲受了鎮壓簡直不能夠重新高漲。共產黨員的積極，工人區域中祕密工會的奮鬥，就足以證明；雖然白色恐怖非常厲害，然而羣衆的積極性仍在日益增長。廣東，湖南，湖北，陝西，河南等省，雖然有極殘酷的反革命的壓迫，然而農民運動的革命基礎仍舊存在，革命已經引進極廣大的工農羣衆，他們的生活狀況，在資產階級軍閥的反動統治之下，簡直是日益惡化而沒有出路。所以這種羣衆獨立的自然爆發的鬥爭，不能爲任何恐怖政策所完全鎮服。

(二)中國的國際現況沒有經過任何的變更，使資產階級軍閥的反動得以鞏固，民族資產階級力求與外國資本妥協，然而同時，他至少在口號上不得不代表中國的民族利益而抗爭。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政策，自然又使企圖完全統治中國的外國資本離開他，使外國資本和資產階級軍閥的聯盟發生困難。別方面呢？帝國主義列強自己之間有衝突，資產階級軍閥的反動聯盟之內，亦有衝突——互相爭權奪利的搶地盤主義是他們的天性。這種情形，也是中國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妥協的阻礙。最後蘇聯及國際的革命運動，還是加強中國羣衆革命鬥爭的絕有力的動力。

有了這些客觀條件之後，無產階級的先鋒——共產黨之組織和正確的政策，便是革命的重新高漲之決定勝負的動力。中國共產黨保存了自己的戰鬥隊伍，不怕反動的緝捕壓迫，而且能够改正過去指導的機會主義的錯誤。凡此一切，總合起來，便使中國共產黨負着極大的任務，就要在一切客觀上有可能的地方，都立刻準備組織革命的暴動，認清自己的任務是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而建立無產階級及農民的民權獨裁。

(四)

「因爲中國各省的情形大不相同。因爲沒有集權的政府，所以中國共產黨不能預定一個時期舉行全國暴動，以推翻中央政府來決定暴動的勝負。現在本黨總方針應當是：準備並組織那些已成農民運動中心的各省之武裝暴動，現時便趁秋收時期而實行抗租抗稅，在這樣的時期當中，各省暴動的時日，只能看當地情形及一般情形去決定。」中國共產黨應

當認真的明瞭並且應用馬克斯，昂格斯，列寧的暴動學說，——暴動是一種藝術，不是可以耍着玩的，要極精細的，在技術上組織上政治上準備好。既然決定暴動，便決不可以中途拋棄這一種計劃，一定要引導暴動到底，應當堅決的絕不回頭，勇猛的行動，永久要由自己方面發動，而立刻採取進攻的形勢，應當記着：在緊急關頭採取防禦的戰略和動搖猶豫的態度，必然陷暴動於敗亡等等。尤其重要的，是要破壞動搖我們階級之武裝力量。因此，本黨應當極快的徵調最大限度的力量，到新舊軍閥的軍隊中去工作，組織並發展我們的支部。這一任務，是現時非常緊迫刻不容緩的任務，本黨以前差不多完全沒有注意到。

民衆工農暴動的勝利，勢必引起帝國主義新舊軍閥及一切反動資產階級豪紳地主的殘酷的反攻，從經濟怠工，直到軍事行動。中國共產黨應當堅決的準備鎮壓一切反革命的企圖，實行猛烈的革命戰爭。必須準備沒收反革命派的一切財產企業工廠，採用極嚴厲的鎮壓政策，——實行革命的獨裁。

(五) 暴動之方式

中國共產黨應當組織工農暴動於革命的左派國民黨旗幟之下。這有以下的幾個理由：

一、國民黨是各種革命階級的政治聯盟之特殊的形式，這種形式是中國歷史上所集繁生長出來的。國民黨的領袖已經被資產階級軍閥的聯盟所利用，以爲反動政策之工具，不但背叛了國民黨綱主義中的一切革命的進步的成份，而且葬送了國民黨，使他要喪失政黨的資格。資產階級軍閥的反動，不能使國民黨形成資產階級的領導政黨，這種政黨必定要在與現時國民黨不同的社會政治基礎上方能發生。要恢復國民黨，便只能恢復革命的國民黨，或是簡直不能恢復。汪精衛唐生智的所謂黨權三民主義等等，完全是冒充國民黨的假招牌，以掩飾其反動的政變，——這次政變其實是國民黨亡黨的政變。

二、國民黨是一種民族解放運動之特別的旗幟，中國共產黨員加入了國民黨，而且一直形成了國民黨內左派的中心。本黨過去指導的機會主義，固然把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政策變成了無產階級對於小資產階級投降的政策。但是在下級

黨部之中，黨員羣衆的行動，足以糾正這一機會主義的方針。共產黨下級黨部羣衆的行動與宣傳，使中國國民在城市小資產階級的羣衆，以至一部份工農羣衆之中，已經很有革命的威信。中國共產黨現在不應當讓出這種旗幟，使一般叛徒篡竊國民黨的名號，而做軍閥及反動資產階級掌握裏的玩物。

三、中國共產黨在革命的國民黨旗幟之下組織暴動，還有一個目的，便是吸引小資產階級的革命份子。這些份子，本是左派國民黨的主要羣衆。資產階級軍閥反動的勝利，使小資產階級更加動搖分崩。一部份小資產階級被反革命派所吸引去了，他們的羣衆政治上是崩壞了，無所適從了，其中有一小部份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家，還留在革命的道路上。本黨現在和他們合作而組織秘密的革命的國民黨。但是革命鬥爭之不可避免的重新高漲，又要吸引大多數的小資產階級到工農的羣衆運動方面來，正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本黨應當做恢復左派革命的國民黨的工作。中國共產黨不但應當加入秘密的國民黨黨部，而且要保證自己的指導作用，同時共產黨應當極謹慎的避免過去指導之機會主義的錯誤，而保障本黨自己的完全的政治獨立，保持本黨批評小資產階級的同盟者之搖動猶豫之無限制自由（參看中央緊急會議告全黨同志書）。

尤其重要的：是使革命的國民黨民權主義化，凡是在革命的國民黨旗幟之下舉行暴動而勝利的地方，工農羣衆團體，應當用團體加入的方法，加入這種國民黨，使國民黨成爲羣衆團體聯合的黨，使反動份子不能假借國民黨黨部名義，來實際上阻滯革命的工作。革命的國民黨的這種結構，可以使將來革命發展到更高漲的階段時，政權形式將要進於工農兵代表蘇維埃——那時過渡更容易些，更沒有流弊些。

（六）組 織

工農兵代表蘇維埃，是一種革命的政權形式，即是保證工農民權獨裁制直接進於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獨裁制；這種形式之下，最容易完成從民權革命生長而成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而且是保證中國之非資本主義發展的唯一方式。本黨認爲照現在的形勢，資產階級民權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之間並沒有截然分爲兩段的界線，而且從民權革命生長而成社

會主義革命的前途，完全只要看無產階級的組織力量之程度如何而定，所以我們現在就應當在黨的機關報與勞動羣衆之中間開始宣傳蘇維埃的意義，以便到了必要的時期，立刻可以開始組織蘇維埃。

本黨現時不提出組織蘇維埃的口號，城市，鄉村，軍隊之中都是如此。只有到了組織革命的國民黨之計劃，完全失敗，同時，革命又確在高漲之中，那時本黨才應當實行建立蘇維埃。現時，本黨即組織革命的工農暴動於左派國民黨旗幟之下，自然還只限於宣傳蘇維埃的意義。然而這種宣傳現在就應當開始，而且要做得非常得當，非常廣泛。如果組織革命的國民黨的計劃能够成功（如果資產階級軍閥的反動還來不及完全消滅國民黨），那末，本黨就應當在革命超越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範圍時，使蘇維埃制度得以從新的革命政權之中生長出來，——這種新的革命政權，現在就要着手組織，依照最廣泛的各種革命階級選舉的最民主主義的代表制度。

(七) 政 權

爲指導各地暴動起見，應當在各地建立革命委員會，暴動成功之後，這些革命委員會之中加入左派國民黨人（但必須保持共產黨在革命委員會之中的指導權），革命委員會就變成臨時的革命政府之性質。全省範圍之內，應當稱爲某省臨時革命政府。鄉村中之暴動成功之後，革命委員會立刻應當組織農民協會而以一切政權交給他，農民協會祕密存在的地方，必須在準備暴動的時候就使農協會的指導者加入革命委員會。

城市之中的革命委員會或則某省的臨時革命政府在暴動勝利之後，就要着手組織新的政權，應用下列的形式：平民代表會議，由各工廠工人，各職業工會的手工業工人或店員，學生會學生，小商人團體的小商人，軍隊的兵士等以職業選舉團體選舉的方法（不以區域爲選舉原則）以人數爲標準，公選代表組織之。由選舉平民代表會議，選出某縣某市的革命執行委員會，城市之中的政權便完全交給他。全省的政權應當由各縣平民代表大會選出。各縣革命委員會及各省臨時革命政府，應當定出召集這種城市平民代表會議或全省平民代表大會的日期，這種日期依暴動之後的形勢如何而定，如果組織新政府尚須很大的政治上的準備，則召集代表會議的日期，可以略爲遷延。

資產階級及封建軍閥等類的階級，不應當叫他們參加革命的政治機關。

本黨現在提出下列口號——鄉村之中是「政權歸農民協會」，城市之中是「革命的民選的政權萬歲」！（民選革命政府）。

（八）軍 隊

除去徹底的反對軍閥地主資產階級之階級鬥爭以外，民權革命是決不能勝利的。這種革命戰爭，必須要創造新的革命軍隊。革命的經驗，已經證明雇傭軍隊決不是革命的靠得住的工具。軍閥如今很容易的利用雇傭軍隊來反對革命的羣衆運動，——這就是證據。因此創造新的革命軍隊，不要有雇傭的性質，而要開始於志願兵的徵調，漸進於義務的徵兵制建立工農的革命軍，這種軍隊之中要有極廣泛的政治工作及黨代表制度，強固的本黨兵士支部，要有靠得住的忠實於革命的軍官，——這是現實革命運動中最重要的一項任務之一。本這個目的，本黨應當努力的改組現時參加革命的雇傭軍隊。同時應當想種種方法武裝工農（如某市工軍，某縣農軍的地方性質的武裝，不用舊的糾察自衛的名稱），無論如何不能解散他們。從這些工農武裝，來造成新的革命軍隊之中心勢力。

（九）對帝國主義的策略

民衆暴動勝利的地方，如果可以遇見與資本主義列強直接的接觸（例如廣東以及其他有海口的地方），那麼，本黨應當在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有應付的策略，使與帝國主義的武裝衝突不至於過早的發動，本黨應當繼續不斷的增加反帝國主義的政治宣傳，有必要的時候，可以領導經濟的鬥爭（如抵制外貨等），同時如果與帝國主義的直接衝突可以根本犧牲新興的尚未鞏固的革命政權，——當這種工農階級民權獨裁制還只有很小的地盤的時候，——那末本黨應當暫時避免與帝國主義直接衝突（奪回租界，沒收外國工業使爲國有等等）。應當記着，——帝國主義在中國各種反動勢力的贊助之下（從張作霖一直到汪精衛），必定時時刻刻來挑釁，想藉口來屠殺，來鎮壓真正革命真正反帝國主義的平民政權

。本黨應當預先看見這種危險，在不利於新的革命政權之時機，不要接受帝國主義的挑戰，中國共產黨在國際革命的無產階級贊助之下，等到對於革命最有利的時機，然後要領導中國工農民衆去直接的與帝國主義鬥爭。

(十)

最近期間本黨對於農民運動，工會運動，以及組織問題上的任務，已經有八七緊急會議各個議決案，並且有中央緊急會議的告全國同志書，這裏不再複述。

(錄自「中央通訊」第二期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附錄三：黨的組織問題議決案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緊急會議通過)

- (一) 中央委員會緊急會議選舉中央委員會之臨時政治局，以正式委員九人，候補委員七人組織之。
- (二) 中央臨時政治局，應在六月內準備召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前，中央臨時政治局執行中央委員會之一切職權。

(三) 中央所在地最近數月內仍在武漢。同時須組織南方局於廣東，至少須有政治局委員或候補委員三人加入。

(四) 中央臨時政治局應當按期出版秘密的黨的機關報，而傳播之於全國。機關報之黨報委員會，由政治局委任之。政治局之下應設一特別的出版委員會，專掌傳播黨的機關報及中央一切宣傳品的責任。北方順直省委(或北方局)，南方局，以至上海省委之下，亦應設立出版機關及傳播秘密宣傳品傳單等工作。

(五) 中央臨時政治局，應當建立全國的祕密交通機關，與出版委員會的散布宣傳品的工作相聯絡，擔任傳達通告指令輸送宣傳品等等職務，並兼辦探聽反革命線索及其他各種消息各地環境的特務工作。各省亦應有此等機關之組織，務使本黨有一全國的交通網。

(六)現時主要之組織問題上的任務，就是造成堅固的能奮鬥的祕密機關，自上至下一切黨部都應如此。各級黨部委員會、省委、市委、縣委、區委都應當在最近期間改造成下列的方式：每一黨部委員會之中，分出三人至八人之常務委員會——為指導機關，由其上級黨部機關批准。此等常務委員會即應執行各該黨部委員會之一切職權。每一黨部都應嚴格的與其上級及下級黨部建立極祕密的聯繫。極嚴格的祕密規律，是祕密狀態中新的工作的基本條件，雖極小的破壞祕密的規律，都應予以極嚴厲的處分（一直到開除）。各級黨部都應利用一切公開的可能，以擴大黨的影響（如組織各式各種的學生團體，小商人團體，婦女團體，俱樂部等類之組織，利用尚未被封之工會等等，在這些組織中組織黨團，受黨的嚴密的指導，各種偽國民黨的下級黨部之下，也是如此）。但是即使在最公開的條件之下亦應有祕密組織及工作，這是現時環境中最主要的任務。

(七)祕密狀態之中，保存工會的組織亦是最重要的職任之一。一切工會中應當速建立起黨團來，人數不要超過五人至七人，須完全服從相當的黨的委員之政治上組織上的指導。工會機關的指導，應由各級黨部從速審查，換有經驗的工人（農民）同志擔任這種指導。

(八)嚴守黨的紀律尤其為祕密黨之必要條件。黨部機關之一切決議及決定，調遣等等，應當絕對的服從，一切黨員，不論其地位如何都應如此。凡破壞紀律者，都應從嚴懲辦（停止職務，開除黨籍等等）。

(九)一切支部應當立刻進行祕密工作，並即按照此種目的改造。每一支部都應當分成五人至八人的若干小組，每組有一組長（並應有候補者），以與支部幹事會聯絡（如支部之下尚有按生產部門的「分部」，則與「分部」幹事或書記聯絡。）各小組儘可能的每星期集會一次，進行一切黨的基本工作，經過這些小組進行各該企業中（工廠等）的工作。

(十)每一支部之中，須挑出最可靠的同志——負責同志；支部幹事與負責同志應有特別的聯絡——應按期召集負責同志開會，或全部的集會，或代表的集會。

(十一)每一區的黨部亦是如此，在小城市或村鎮，則可由全體黨部之中挑選負責同志，直接與市委或縣委聯絡，經

過這些負責同志，黨部委員會即易指導該地全體的黨部。

(十二)每一黨部委員會之下，現時須即組織審查委員會，（各省委就是監查委員會）以審查各該黨部之黨員有否不可靠的份子，這種審查不應帶有清黨的性質，而只是去掉對於黨部不可靠的份子，以及可疑的份子。我們黨應該在此過渡於秘密狀態之際，極力保存多量的黨員，要使每個黨員都不與黨部脫離關係。

(十三)現在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武漢黨部轉入秘密狀態的關鍵，因為此處有好幾千黨員而大半都是沒有經過秘密狀態的，中央應當幫助湖北省委進行這種改組的工作而直接的督促他。

(十四)自省委以下各級黨部委員會之成份，都應經過上級機關重新審查，使能更新而鞏固。應當注意提拔工人同志到黨部委員會負重大責任，而肅清其中曾經在最近幾月表現機會主義的份子。

(十五)現時秘密狀態之中，需要最大限度的集權。但是集權制度不應當變成消滅黨內的民權主義。最近黨所做的機會主義的錯誤，需要澈底的討論，提到羣衆之中加以審查，並根據之以審查各級黨部的指導機關。因此，不論如何嚴重的壓迫，必須在本次會議後，設法極慎密的進行黨內的討論，先由支部討論，然後在各省之區、縣、市、省開秘密會議，詳細討論黨的政策問題，而根據這種討論，改造各級黨部的機關。

(十六)黨對於青年團的關係，須有極嚴格的變更。須切實實現各級黨部與團互派代表的原則——團部代表有表決權，並引青年團的團員羣衆參加黨的政策問題之討論。

（錄自中共中央「中央通信」第二期一九二七年八月廿三日）

附錄四：兩湖暴動計劃決議案

一、目前兩湖的社會經濟政治情形，純是一個暴動的局面，本黨當前唯一重要責任，就是堅決的實行土地革命，領導兩湖的工農羣衆實行暴動，推翻武漢政府與唐生智的政權，建立真正的平民革命政權，如此才能保障革命猛烈的繼續進展。

二、兩湖的暴動尙未開始，在時間上已經是失敗，這是猶豫不決與不相信農民羣衆的力量結果，如此便要喪失革命。

三、土地革命必須依靠真正的羣衆力量，軍隊與土匪不過是農民革命的一種副力，坐待軍隊與土匪的行動，或許純全依靠軍隊的行動而忽略農民之本身之組織力量與行動，這也是機會主義的一種形式的表現。這樣領導暴動，暴動無疑義的要歸於失敗。這不是暴動，這是一種軍事的冒險，或者軍事投機。

四、兩湖的農民暴動必須開始於九月十號，因為兩湖的環境不同，兩湖應各有其中心區域，應各創成一種獨立的暴動局面以發展暴動，但總的政治目標口號與行動須一致。

五、湖南暴動可分爲三大區……如此全省範圍的暴動，應普遍的以中國革命委員會湖南分會的名義爲號召的中心，此革命委員會於暴動成功之後組織湖南省臨時革命政府。

六、湖南暴動應劃分成下列各區……

七、暴動組織在中國革命委員會湖南分會、湖北分會之下，軍事方面鄉村用農民革命軍，城市用工人革命軍名義，簡稱農軍，工軍，合稱工農革命軍，某農民暴動區域軍事的指導用某區農民革命軍總司令名義，工農的數量在暴動成功之後，須無限制的擴充成爲正式的革命軍隊，同時仍保存地方軍隊性質的工軍與農軍，執行各境當地警衛，以之爲革命的新警察的基礎。在暴動尙未發動之前，應將工人糾察隊改稱工人革命軍，農民自衛軍即應改稱農民革命軍。

八、對於土匪的政策應當以我們的口號去宣傳他們組織他們於農民協會之下，或革命委員會之下，使他們在暴動時成爲一部份重要的副的力量，在暴動成功之後予以改編。

對於反唐的雜色軍隊（許克祥除外），如能對於暴動取中立的態度，則可利用其中立以便迅速發展暴動，並須設法與其兵士接近宣傳他們，暴動成功後，對於此種部隊酌量予以解散或改編。但這決不是說要犧牲我們的根本主張以換取他們的中立。在暴動中對於有反暴動傾向的雜色軍隊和土匪雖然他們是反唐，也要立刻解決他們。

九、暴動爲實行澈底的土地革命，即沒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事實的結果是全部），殺盡土豪劣紳及一切反動派與沒

收其財產，實行鄉村一切政權歸農民協會，城市民選革命政府，消滅一切非農民非工人革命的武裝。

十、暴動之前須極端注意兵士中的宣傳，鼓動他們起來殺戮反革命的軍官；一有可能，便應組織革命兵士委員會；這種組織應是廣泛的羣衆的。暴動之中要吸引兵士參加。這種革命兵士的組織可以做改編新革命軍的成分。

十一、暴動的口號：暴動打倒武漢政府，暴動殺盡土豪劣紳反革命的大地主及一切反動派，暴動爲死難民衆復仇，暴動沒收地主的土地，暴動實行耕者有其田，暴動抗租抗稅抗糧抗捐，暴動恢復一切革命民衆團體，暴動實行一切政權歸農民協會，暴動實行民選革命政府，暴動打倒叛國叛黨的汪精衛，暴動打倒殘殺兩湖人民的新軍閥唐生智，暴動組織革命軍，農民革命才是真正的國民革命，平民和兵士的革命聯合萬歲，農民革命勝利萬歲，革命委員會萬歲！

十二、各區的暴動在未發動之先，在離城較遠一點的鄉村即應殺盡土豪劣紳反動的大地主，提高農民革命的熱情，舉行各區農民羣衆大會，多作羣衆的政治宣傳，（按照上列的口號加上實際的事實）如發傳單講演、壁報、告示等。在暴動方開始，首先即須徵集所有的力量攻打某鄉區的中心城市，屠殺政府的官吏，宣佈革命委員會政權，然後才能發展普遍的暴動。

十三、暴動方開始即須掘斷鐵路，破壞水陸交通，佔領破壞郵政機關，割斷所有的電線，造成敵人的絕端恐慌的狀態，然後才可便於暴動的發展。但因交通機關的破壞，同時影響於我們自己的聯絡，各暴動區域應當想出特別傳遞消息的方法，切不可因此而遲延等待某區的暴動，即令暴動發生後各方關係斷絕，亦應按照預定的未成功與已成功的地點猛烈的進攻，絕不可猶豫，猶豫便是破壞暴動的勝利。

十四、暴動勝利的地方，應無情的鎮壓肅清反革命，對於買辦及反動的資本家，如果他們經濟怠工或封閉工廠，則工會應當佔領工廠，以之交給革命政權管理。至於反革命的豪紳則應堅決的沒收其財產。但必須注意應用正式革命政權機關實行，這種沒收嚴禁私人的搶掠侵吞。

十五、長沙武漢兩湖省委，應有一特別的暴動計劃。

十六、各區的暴動內部的指揮爲各區的特別委員會，直接歸省委指揮。

(錄自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二日出版「中央通訊」第四期)。

附錄五：最近組織問題的重要任務議決案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

(一) 組織任務之重要

最近的革命鬥爭之中，組織問題更加佔了第一等重要的地位，中國共產黨組織之布爾塞維克化，以及無產階級和農民羣衆的組織之革命化，都是當前最迫切最重要的問題。工人階級的力量，全在於它的組織，全在於他有革命的階級的組織，尤其是對於工人階級的先鋒——共產黨。共產黨應當有布爾塞維克的組織。沒有正確的布爾塞維克式的組織，中國共產黨決不會成爲羣衆的力量，決不能盡他在工農革命裏的領袖及領導的歷史使命。最近勞動民衆革命運動所受的歷次失敗，就是我們本黨所受的歷次失敗很明顯的暴露出革命營壘組織上的弱點和缺點。這許多弱點和缺點，不僅是代表本黨在組織上不能領導廣大的工農羣衆奮鬥，而且黨員的本身在有些地方（如湖北）當反動勢力比較嚴重的時候，便公開的脫黨以至爲敵人當偵探，有些地方整個的黨的組織甚至根本瓦解。同時本黨自從放棄機會主義之後，雖然在極反動的政局之下屢次遭着失敗，但是工農羣衆對於本黨的信仰大增，尤其工人同志的積極，大增長起來，提拔工人同志負擔導職任的工作，雖然還很不充分，可是已經使黨日益健全起來，可見本黨組織的健全與發展，只有在反機會主義的政策及組織原則之下更加努力，更加切實執行新的方針，戰勝這些缺點和弱點，便是中國共產黨現時第一等主要的任務。

(二) 黨的組織之弱點

中國共產黨組織上的主要缺點：有很大的政治意義的——就是本黨領導幹部並非工人，甚至於非貧農而是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的代表。中國共產黨的形成一個政治派別，形成一個政黨，還在中國無產階級沒有自覺的成爲一個階級的時候

，還在工農階級運動初具雛形的時期。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潮中，資產階級曾佔着巨大的作用，尤其是小資產階級的智識界，這種情形影響到中國被壓迫民衆之階級自覺，及階級鬥爭發展的過程。在這一過去時期中站在民族解放運動的最主要的，最激進的革命的小資產階級份子，滲入了我們的黨。這種成份形成了中國共產黨的最初幹部。工人貧農羣衆的加入共產黨固然隨着革命的階級鬥爭的發展而日益衆多，但這已經是比較後一時期裏的現象，因此，中國共產黨的指導作用，竟留在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份子手中，當時這一部份革命的小資產階級份子，僅僅受着最初一時期革命高潮的衝動，並未經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鍛鍊，並不知道國際無產階級運動的經驗，並且是站在工人貧農的階級鬥爭之外的，他們不但沒有能改造自己成爲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反而將自己在政治上不堅定，不徹底，不堅決的態度，不善於組織的習性，以及其他種種非無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革命者所特有的習性，習氣，成見，幻想，……帶到中國共產黨裏來，這種組織成份，就是武漢反動以前本黨政策機會主義孟雪維克主義的策源地——這種機會主義一直影響到葉賀軍隊中黨的領導機關的行動。

最近許多正確的徹底革命的黨的決議案和方針，如土地問題，農民暴動的策略問題，勞動問題，國民黨問題（八七緊急會議及其後中央臨時政治局的決議）往往在各地並不執行，謬解而成機會主義的實際行動，這是因爲實行這些決議的份子，仍舊是那些小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代表的舊幹部。八七緊急會議就已經指出：黨的下層羣衆是行動的革命的，黨的指導幹部却是機會主義的，這種情形便是黨內有兩種不同的社會成份，因而有兩種不同的階級政策之反映，只有小部份黨的幹部，團結在黨的中央之下的，能够堅決的拋棄小資產階級式的觀點，拋棄機會主義的方法及猶豫動搖的政策，以及其他種種小資產階級革命者的特性；——必須全黨都經過如此的改造，才能鍛鍊出徹底的無產階級的革命黨——布爾塞維克的黨。

過去各省委在組織上更加犯了不集體化的毛病，各部處理各部的事務不是太專門化了，便是干預到黨的整個行動，如工農部不經過黨的組織系統而直接派人往各工會各縣担任黨的工作，軍事部因其離開組織部一貫的組織系統，致使各地黨部時有工黨，農黨，軍黨之稱，今後這種組織上的錯誤，中央必須負責糾正！務使這種各省黨的各部的分裂的生活

動完全打消，並建立黨的民主集權制，使一切工作都集體化於省委委員會及其常委中。

(三) 黨的改造之重任

因此而得的結論，自然便是：中國共產黨最重要的組織任務是——將工農份子的新幹部替換非無產階級的智識份子之幹部。當然這並不是說對一切非工農的份子完全不給工作，或完全開除出黨，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並不如此主張。這是要使黨的指導幹部之中無產階級及貧民的成份佔最大多數，支部書記，區委，縣委，市委，省委的成份，各級黨部的巡視指導員的成份，尤其是農民中黨的工作員的成份，必須大多數是工人同志或貧農同志。工會機關的，則須全部換成工人。這一改造工作，當然不是一下子可以做成功，但是必須越快越好，應當開始建立各級黨部的巡視指導制度，去切實執行這一改造工作，同時從最低支部起，提出工農份子，使擔負實際指導的工作，各省在第六次全黨代表大會以前，要開各省黨部代表大會，或者省委擴大會議，在這個過程中，澈底改造各級黨的指導機關。尤其重要的是：各地羣衆黨部的工作，譬如組織部，農民運動委員會，軍事部，要由最靠得住最堅決的工人同志擔任，在鄉村中呢——由貧農同志負擔。工會中的指導幹部，也要立刻換工人份子。總之，最主要的要使黨成爲鬥爭的組織，要使一切鬥爭都成爲黨的集體指導，以消滅個人的英雄式的領袖和指導之弊病。至於一般黨員的思想與行動，黨的組織的責任，便是要監督與訓練他們團結與溶化在八七緊急會議以來中央的政策指導之下，洗刷一切舊有的機會主義的遺毒。

(四) 黨的基本組織與民主主義化

黨的組織上的第二個弱點，便是許多大工廠大商店尤其是鄉村和軍隊之中，至今幾沒有黨的支部，鄉村之中，嚴格的說起來簡直沒有黨的組織，各地鄉村中，至多只有特派員或者極少的知識份子的黨部委員會，他們之下並無支部，甚至並無黨員，農民運動的經驗中，已經可以看出：沒有先進的貧民份子所團結而成的黨的組織，本黨便很難指導農民鬥爭，或者簡直沒有指導的可能，至於農民暴動便成了完全自然爆發的無政府主義的性質。最近各地農民暴動軍比較的抗

禦力很弱，農民暴動的持久性比較的少，大半就是因爲無產階級的政黨沒有能在農民之中實行「羣衆之組織者」的作用。而農民廣泛的羣衆組織，完全要靠黨在鄉村之中有擴大的支部組織，網羅全境，結合鄉村貧民及苦力中最堅決最革命的份子。再則在軍隊之中沒有支部（兵士黨員），也就是軍閥能够很容易的調動軍隊鎮壓屠殺工農暴動的重要原因之一。我黨對於拆散軍閥軍隊的工作，如果沒有在軍隊中的支部去團結革命的兵士和下級官長，那麼，簡直是不可能的。當然，主要的還有在大工廠大商店之中建立並鞏固黨的支部的工作。學校中的支部當然也要注意，總之，支部工作在黨的組織現狀之下，佔極重要的位置，過去因爲支部工作不好，以至本黨不能在羣衆中起擴大的作用，而黨員之散漫，黨的政策不能深入羣衆，甚至不能深入黨內羣衆，都由此而生。今後須特別注重支部工作，經過支部起羣衆的作用，至於支部的經常組織工作如按期開會等要嚴格的執行，這些都是樹立黨的基本組織的工作。再則全黨黨員應嚴格的執行交納黨費的義務，黨費以有收入者爲標準，各級黨部都要按月計算黨員的實數，要做到依黨費核算黨員的數目。現在很嚴重的秘密時期固然不能實現完完全全的黨內民主主義（黨部機關自下至上全屬選舉，重要問題由全黨黨員討論等等）。但是在這種嚴重條件之下，引進黨的下層羣衆，使他們參加黨的一切工作與政策的決定，仍舊是非常重要的，應當比以前更加百倍的努力去實行。並且要使儘可能的支部書記由黨員羣衆選舉的辦法，尤其是產業工人支部，此等區域更須進一步儘可能的實行區委由各支部選舉的辦法。

（五）工會的組織問題

組織廣大的無黨工人羣衆於革命的階級的工會之中的工作，也有非常之大的缺點。革命的工會現在只有很不健全的很薄弱的革命的機關，而沒有工會會員，只在幾個很少的工廠之中，有些工會的下層組織，如半公開或秘密的工廠委員會。至於一般而論，差不多完全沒有工會會員的羣衆。其實組織工人，尤其是無黨工人，却是工會的主要任務。因此中國共產黨在工會中工作的黨員，應該認清自己的主要任務便是吸收各個工人到工會裏去組織工人羣衆使各廠都有工會的組織，使工會成爲羣衆的組織，必須使極廣大的先進的工人，黨外的工人，各個的加入工會做會員，必需每月的統計工會

會員的實數，按時收工會的會費，（寧可訂到極少的會費）必須在各工會中實行發給會員證，必須在下級工會機關（工廠委員會）除共產黨員以外加入無黨的工人，絕對要避免黨代工會的形式，因而不發展工會會員的流弊，黨應當建立工會獨立的組織系統，使支部在工人羣衆中起核心的作用，吸引廣大的非黨的羣衆加入工會。

（六）農民的組織問題

鄉村之中黨的支部應當是很秘密的，除黨的支部以外，必須組織廣大的農民羣衆於農民協會農民委員會等組織之中，這些農民協會在革命的高潮時，勞動者奪得政權，就要變成農民代表會議（蘇維埃）。

（七）黨與青年團的關係

黨與青年團差不多完全不發生關係，這也是組織上非常大之缺點，必須在最近期間改正。黨與團的支部，區委，縣委或市委，省委……必須互相發生密切的關係，互派代表。黨部的各級委員會必須定期的聽團的工作報告，而給他們以指示。黨應當對於團給以經常的政治上物質上的幫助。

（八）黨與反動團體

從前黨曾經派遣黨員到我們階級仇敵的組織之中（如黃色工會、工賊工會、國民黨黨部等等）去做偵探的工作，但是經驗上所得的結果，大半是很壞的；因此，如今在一般的通例上決定拋棄這種政策，除非有非常之大的必要和意義，才可以偶爾使用這種方法，而且所派遣的黨員必須是確實可靠而忠實於共產主義的同志。

（九）黨的組織與紀律

嚴格的整飭紀律和建立黨的祕密組織，實在是黨的工作成效之最必須的條件之一，對於違背組織上政治上的紀律的

份子，必定要嚴厲的處分。秘密組織的規律，不容任何輕忽而破壞，秘密機關的地址，絕對只准在工作上必須知道的黨員知道。保存秘密文件的數量應當減到最少限度，絕對不容保存黨員的名單和地址單。通信上必須用密碼的方法。各級黨部的常務委員會，不得超過五人至七人。五人以上及兩個鐘頭以上的集會，非極需要不得舉行。凡是稍稍破壞黨的密組織紀律的，立刻應當停止他的工作，或者簡直開除黨籍。

(十) 發展黨員的數量問題

黨員的數量自從國民黨反動以後有極大的減少，從五萬餘黨員減至萬餘黨員，這雖然一方面證明過去吸收黨員與訓練黨員的方法錯誤，但欲使本黨新的策略深入羣衆，黨的組織重要責任之一，便是吸收新的工農兵士革命份子入黨，必須多吸收新的工農兵士革命份子擴大黨的力量，然後本黨才能擔負新的使命。

(錄自中共「中央通信」第十三期，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卅日)

附錄六：政治紀律決議案

——中國共產黨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

(一) 本黨第五次大會對於黨內政治紀律的整頓，非常重視。祇有最嚴密的政治紀律，才能够增厚無產階級政黨的鬥爭力量，這是每一個共產黨員所必備的最低條件。

(二) 自從今年七月事變公開宣言退出國民政府之後，決定拋棄以前遷就資產階級領袖的妥協政策，堅決的領導工農羣衆起來武裝暴動，「八七會議」更加詳細指出：以前本黨犯了機會主義錯誤，今後應當毫不猶豫的信賴羣衆的力量，澈底實現土地革命的政綱，并且決定於秋收時間於湘鄂贛粵四省領導農民舉行暴動，去進行土地革命的鬥爭。

(三) 這一政策的執行，不應有絲毫猶豫的餘地，但是在各省暴動過程中本黨的指導機關與負責同志做出許多違背策

略的嚴重錯誤：

一、八一事變中前委的錯誤。中央政治局決定南昌暴動是四省暴動的一部份，應以農民主力發展土地革命的鬥爭，絕不是希望單純軍事上的行動與勝利，但是前敵委員會的指導在政治上軍事上而做成了極大的錯誤的仍舊是繼續機會主義的舊政策。屬於政治上的錯誤，就是沒有明顯的土地革命及工農貧民政權的政綱，不堅決的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號，而徘徊於沒收二百畝五十畝土地之間，實際上祇實行了「耕者無其田」的政策。屬於策略上的就是軍行所到之處，對於豪紳資產階級沒有採取屠殺并摧毀其一切政治社會組織完全沒收其武裝的策略，及沿用軍閥「不擾民」的觀念，槍斃了乘機搶掠的貧民。再則沒有實行沒收豪紳財產以解決財政問題，却想用舊式軍閥經過豪紳籌款的辦法以剝削貧民和勞動民衆。屬於軍事上的就是拘泥於原在武漢預定的軍事保守政策，不走農民運動較有基礎的贛西直入廣東的路線，而祇願避免敵人攻擊，採取農民運動完全沒有起來的贛東荒涼道路。在瑞金會昌戰勝敵人之後，復不直往南下進攻梅縣，惟恐傷兵輜重運輸之困難而折回走上杭汀州繞道取潮州，使敵人從容佈置以致完全失敗！再則從暴動開始一直到潮汕失敗始終幻想與張發奎妥協，甚至寫信與張發奎聯絡，委任小軍閥的雜色軍隊，在南昌暴動以後，對於不穩定之蔡廷楷部隊不敢採取非常手段，以致中途叛變，使我們軍隊受很大的影響與打擊。這種指導上的錯誤徒使我們軍人同志在南昌、瑞金、會昌、湯坑、三河壩諸役很勇敢而決無後退的犧牲了三百多，士兵羣衆亦極其勇敢的蒙受了很大的損失，而結果仍不免於失敗。此種錯誤的根本原因乃在前委因襲着軍事投機的遺毒，不信任羣衆力量，沒有發動農民創造真正工農民衆政權的決心，完全是一次軟弱的軍事投機的嘗試，違背中央政策的行動。

二、南方局廣東省委對於農民暴動指導也做成了嚴重的錯誤，當南昌暴動軍隊向廣東進發的時候，廣東黨部應即鼓勵農民在土地革命政綱之下起來暴動，實行奪取政權，不容有絲毫的猶豫與等待。但是廣東省委的指導仍然是動搖不定，表示不信任羣衆能作暴動的主力，重要的錯誤就是：（一）政綱口號上拘泥規定五十畝以下不沒收，另提減租百分之三十的口號；（二）戰術上農軍祇取側面攻擊——僅僅作幫助葉賀率制敵人之計，而沒有號召農民羣

家自己起來奪取政權和土地，因而沒有猛烈搏擊的戰術；（三）根本上沒有發動農民羣衆，完全靠已組織好的農軍勢力行動——成爲純粹軍事行動，而不是農民羣衆的暴動，南方局反而祇注意介紹小軍閥的雜色部隊與前委，祇注重於軍事上的牽制；（四）地域上海南高雷雖起，而無關大局，西江方面簡直祇接洽有槍的零星部隊或土匪，沒有到羣衆中去號召，因此這地區始終沒有暴動，黃紹雄部隊遂得安然渡過。東江農運除普寧、五華、海陸豐外，都極其渙散無組織，黨更失其指導作用，以致葉賀軍隊到達潮屬後，農民暴動轉反停頓而不能擴大；（五）既沒有把廣東農民運動做主力，又根本沒有發動羣衆，致發生等待葉賀的心理，自然一般農民自己沒有深切知道自己起來奪取政權——這是政治宣傳之大錯誤。

三、湖南省委對於農民暴動的指導更定完全違背中央策略。中央屢次指出湖南暴動應以農民羣衆爲其主力，并且向省委書記彭公達同志當面警告其軍事投機的錯誤，要省委改正此錯誤，把暴動主力建築在農民羣衆上面，遵照中央兩湖暴動計劃切實準備。當時經過反復辯論，結果彭公達同志雖然勉強接受，但省委的指導仍然沒有改變舊的軍事機關的錯誤：（一）公然違背中央的指示，把暴動看做一種單純的軍事行動，祇與土匪和雜色軍隊接頭，不引導極大農民羣衆起來暴動，以致暴動開始除安源的工人很勇敢的參加鬥爭外，各地農民羣衆實在沒有一點行動；（二）在暴動區域以內完全沒有提出土地革命和政權的具體政綱，以至農民祇以爲是共產黨的搗亂，甚至省委懷疑農民是否需要土地，反對提出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的口號；（三）在工農軍所經區域以內沒有執行屠殺土豪劣紳的策略，以致農民視若客軍過境。因這些指導上的錯誤與懷疑的結果，湖南農民暴動變成了單純的軍事投機的失敗。

四、鄂北暴動，中央在八七會議後便指定特別委員會前往發動指導，孰意特委至鄂北對於農民羣衆反抗賦稅錢糧，反抗軍閥情緒不加重視作發動之指導，反轉輕視民衆力量，坐待張兆豐部隊之到來。及張軍被解決，又擬令張往聯絡樊鐘秀反對方振武，以圖軍事投機之嘗試，這都是根本上與中央的策略和託付的使命相反。鄂南暴動已經引起廣大農民羣衆的行動，湖北省委與鄂南行動委員會，決定會攻蒲圻城的戰略，但行委恐農民武裝少，戰鬥力量薄

弱，而臨時決定停止攻城，以致潰散，這也是充份表現不信賴羣衆力量臨陣退却的錯誤。

(四)除上述暴動區域黨部指導機關犯了嚴重的錯誤以外，王若飛同志未經過省委指導上海國民黨市黨部以內工作同志組織革命同志會，歡迎來滬投降蔣○○的汪精衛，亦屬組織上與政治上的極大錯誤，中央監察委員楊匏安同志在漢口時因爲怕環境險惡，不執行中央分配之工作，私自逃出漢口，顯然違反黨紀。

(五)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對上列執行錯誤政策之黨部執行機關及負責同志，決定下列的處罰：

一、譚平山同志自五次大會後擔任國民政府農政部長一直到南昌暴動前後的行動與主張，完全反對土地革命的政策。其行動更多離開黨而自由行動，最著者如當今年七月武漢國民黨及政府開始排共之際，曾秘密與鄧演達等聯絡，主張取消中國共產黨而另組第三黨，曾向智識份子同志中作反對中央另組織第三黨之宣傳，同時忽視黨的決議，不得中央許可私向汪精衛請假，在請假呈請書內復大罵農運之辣手；與汪精衛代表陳春圃談話，更大罵本黨中央及農運。最後中央政治局決定其赴莫，亦未遵命前去，及至九江南昌更充分發展其個人行動，在九江因爲他和賀龍談話之投機和賀可反張，便在負責同志會議中，鼓動不管中央不管黨而自幹的反黨空氣，至南昌仍繼續其第三黨的宣傳，在同志中在國民黨員中，其後在革命委員會中更多先做後通知或逕不通知前敵委員會的舉動，其於屠殺豪紳和沒收等政策，亦時妨礙行動，這些表示都是違背本黨組織的行動，應即開除黨籍。

二、張國燾同志受中央常委託赴南昌指導暴動，但國燾同志到九江南昌後不執行中央命令，反懷疑暴動主張甚至反對暴動。南昌事變以後的主張聯絡張發奎，并反對沒收一切土地的政綱，這些違抗中央政策和派其往前敵指導使命之結果，反給前敵同志以更壞更右的影響，前委亦因之更加搖動。國燾同志應開除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資格。

三、這次前委指導做出極大的錯誤，前委全體同志應予以警告。

四、徐光英同志在汕任公安局長時，取締工人擅自逮捕并殺乘機搶劫貧民三人，應處以留黨察看一年之處分。

五、南方局廣東省委指導農民暴動的錯誤，在於不了解土地問題策略的口號，不發動羣衆而只有軍事行動，應

全體予以警告。

六、湖南省委委員彭公達、毛澤東、易禮容、夏明翰，應撤消其現在省委委員資格，彭公達同志應開除其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資格，並留黨察看半年。毛澤東同志爲八七緊急會議後，中央派赴湖南改組省委執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員，事實上爲湖南省委的中心，湖南省委所作的錯誤，毛同志應負嚴重的責任，應予開除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

七、鄂北特別委員會，違反中央命令，應予全體警告。陸沉爲特委書記，其主張更多軍事投機心理，根本不做農民運動工作，應開除中央委員資格。

九、王若飛同志因指導黨團工作的錯誤應予警告。

十、楊匏安同志應開除中央監察委員資格。

註：原文無第「八」條。（錄自「中央通信」第十三期，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附錄七：陳獨秀的來信(一)

常委諸同志：

國民黨雖然不能長久統治鞏固，而眼前尚不致崩潰，因此，我們以羣衆力量掃蕩牠們奪取政權的時機尚未到。在實際行動上若取時機過早的政策，更是錯誤。因此，我以爲此時的工農運動，應偏重經濟的鬥爭，當然不迴避政治（更不是階級鬥爭與民族鬥爭對峙）以發展我們的實在力量。固然因經濟鬥爭而避免暴動，尤其在農運非暴動恐難發展。問題是在祇能以暴動爲不得已而用的方法，而不可以爲目的，此時尤不可存「以暴動取得政權」的幻想。前在漢口，我對湘鄂運動，也把這樣的意見告訴過亦農。若飛對於江蘇運動，偏重在奪取城市的政權（有些似毛潤之意見），他且幻想會佔得滬寧。我當時曾表示不贊成。略說了幾句，他似乎還不大以我的意見爲然。這如果是他自己的意見，望常委急需

第十一章 中共的盲動主義

糾正！如是常委的意見，我提議要切實討論估計，萬萬不可隨便做政治的暴動，尤其是上海。我見到於革命於黨有危險的，我不得不說，我不能顧忌你們說我是機會主義者。宜興無錫事件所表現的也是偏於政治方面，經濟的意味太少了，這樣的暴動，使羣衆只看做C與國（按：指共產黨與國民黨）的政權鬥爭，和國之北伐有甚麼不同（我們腦中的不同當然無用）？在各地的運動和暴動中，今後務要使經濟的意義着實加深，如此才能推動廣大的羣衆，如此才能使一般民衆了解C與國的顯明的不同。現在一般人都覺得連我也承認是C與國的衝突，而不是農民革命，因為在宣傳上在行動上都未能表現農民的經濟要求，與羣衆的騷動。我以為單是「耕者有其田」，這個口號還不够，因為太文雅了，不能使廣大的農民了解，而且農民的痛苦不單是土地問題。我提議用「四不」口號（不繳租，不完糧，不納稅，不還債），更簡單明瞭容易喚起廣大的農民羣衆，而且又可以通行全國。我們此時若不用最徹底適合於農民自身經濟利益的口號深入農民廣大的羣衆，而祇是幻想政治的暴動，暴動失敗了（當然的失敗），我們甚麼都得不到；并且還會因此使農民離開我們，使國民黨有組織黃色農民協會之可能。宜興無錫事件報上說是奉了唐生智的命令而做的，不知是反動的宣傳或是幼稚同志胡來，望注意。

獨秀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錄自中共「中央政治通訊」第十四期）

附錄八：中共中央致朱德信（一）

德兄并轉軍中全體同志：

自從三河壩與潮州的交通被敵人切斷後，黨的指導機關即與廿五師全體同志失了聯絡。潮州失守後，粵省委員二次派人追趕你們，及你們退武平轉入江西信豐時，江西省委又派人前往接洽，最後知道你們已越大庾嶺而入湖南，中央乃又命湖南省委派人員與你們接洽，但一切都是徒勞，始終未得趕着你們。現時你們的蹤跡，僅從報紙上的記載和輾轉傳來的

消息，似正駐紮桂東與桂陽一帶，惟仍未能證實。並且據江西省委報告，你們入湖南時，曾與范石生有一度之聯絡。此事如果屬實，在廣州暴動失敗後，能否不爲范石生所解決，很是疑問。因此中央特派李鳴珂同志經江西入湘專與你們接頭，除了中央一切重要的決議和關於軍事運動的新政策，以及最近各省工農武裝暴動的情形，和統治軍閥崩潰的趨勢，已令鳴珂同志口頭向你們詳細報告外，中央更有以下的話要說：

(一)葉賀軍隊在潮汕的失敗，一方面因由於軍事戰術佈置的不當（如入粵時不以主力攻梅屬而直下潮汕，主力既集潮汕，與東江敵人對峙，而又留廿五師在三河壩失其作用。）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革命政策的執行有許多未脫舊時機會主義和軍事投機的遺毒，以致入粵後，未能發動羣衆，使軍隊化爲工農的武裝力量，而造成土地革命在潮梅深入的局面。無廣大工農羣衆擁護的軍隊，便是倏倏戰勝黃紹雄、陳濟棠，結果也還是軍事孤立，不能使土地革命深入，甚至於客觀上還會阻止工農運動。因爲革命的軍隊，假使不能與工農打成一片，則仍是一個僱傭的武力，聽少數領袖的指揮，不能表示羣衆的意識。即是說，不能以工農羣衆的意識影響軍事行動。固然這種錯誤，當時前敵的軍隊不能負什麼責任，因爲前敵的指揮機關，在八一革命前，既未能得到中央完全的指導，而本身的指導又犯了很多錯誤，而廣東省委以及南方局，對於前敵的軍隊到潮汕時可號召的工農暴動，亦未能有充分的發動準備。不過軍中所有同志，應深切了解這種錯誤，務使這種錯誤，不再在我們同志所組織的任何軍隊中發生。

(二)軍事運動新政策的主要條件，是在黨的新政策下，以工農的武裝暴動，建立蘇維埃政權，由土地改革向社會革命的原則之上建立的。爲了在反動軍閥統治之下秘密的增長工農武裝的力量，我們必須在工廠裏農村中組織秘密工農軍，必須秘密的給工農羣衆和黨員以武裝的訓練，必須組織羣衆的紅色恐怖隊，反抗白色恐怖的壓迫，必須很技術的有計劃的佈置工農武裝暴動前的必需條件，必須在工農武裝秘密的組織中，避免個人的英雄的無組織的指導，要充滿政治的經濟的階級的鬥爭形勢；更必須的是對於敵人——統治軍閥——的武力，施以毫無姑息的破壞和分裂，在分裂和破壞的工作中，我們應一變從前鞏固所謂國民革命軍的態度改成做偵察、作間諜、鼓動兵變、破壞軍紀、勾引隊伍逃走、引誘兵士賣槍、煽動兵士反攻官長謀害官長、以至瓦解的種種工作，自然這種工作不是一個部隊裏所能做到的，但我們做軍

士運動的人，有了這種計劃，便不應絲毫放過，所以我們一面反對國民黨所屬的一切軍隊，一方面仍應想種種方法秘密的進去，對下級軍官、做兵士進行這種破壞和分裂的工作，假使我們所鼓動的兵士和勾引的兵士能夠成爲一種力量，我們當然立即組織在工農的武裝組織之內，進行鬥爭和暴動的工作；但是這種力量我們必須認清，如果專靠一部份的變兵、或已拿幾根槍的武裝隊伍，工農暴動不會發動起來的。縱使這種無廣大羣衆參加的武裝力量，殺了很多的豪紳官吏工賊，燒了地主的房子，分了資本家財主的財產，燒了借主的借契，充其量不過是梁山泊上英雄俠義的行爲，在羣衆的眼內看來是替他們打抱不平的。這樣，不但不能使土地革命深入，并且一旦統治階級的軍隊以全力攻來，到了不能抵抗的時候，好則上山，壞則崩潰，羣衆中是無法藏身的；自然更說不到擴大羣衆的參加，蔓延暴動的區域，以抵抗反動的勢力。所以我們分裂軍隊，來助成工農暴動，祇能當做工農武裝副力看，切忌變成流寇式隊伍，來阻止暴動。現時你們隊伍所處的境地和所負的使命，便應是這種工農暴動的副力。

(三)關於工農運動的範圍，你們或已知道。你們隊伍在暴動前後的責任，你們或已討論過。不過，我們慎重指出的，你們用這種副力參加暴動或發動暴動時，必須避免軍事投機的錯誤動作。大概軍中同志，在這個新舊政策交替的時候，最容易把武力包辦一切的觀念，移植到工農暴動上面來。譬如農民暴動開始，必須號召廣大的農民羣衆參加，然後才能使暴動中一切行動有意義而深切在農民心裏，但軍事同志則常易於初發動時便代替農民執行一切暴動動作，而忘了發動羣衆，或是撲攻一個城市，而忘了執行暴動中政治經濟的、社會的、土地革命的各項條件；殊不知羣衆的暴動和軍隊的對壘有迥然不同的廣狹意義，軍隊打仗是專門比賽技術，人的條件，是要在一定的技術範圍內比賽誰的勇敢；而羣衆暴動是要在廣大的熱狂的反抗的情緒中趁著統治階級動搖的社會、武裝了自己，推翻當地統治階級的權位，奪取政權。同時並會擴大這種反抗及於週圍的羣衆，以至於搖動敵人所僱傭的武裝羣衆。技術條件在這裏雖也成爲暴動條件之一，但他却不能比暴動羣衆，擴大羣衆，搖動敵人所奴役的羣衆更佔重要，認清了這一點，則我們以軍隊式的武力來參加暴動，便不會首末顛倒，否則我們不是因爲羣衆尚未起來，便代替羣衆單純發動暴動，即是不信仰羣衆的創造力量，藉口於幾件技術條件之未完備，便阻止暴動。前者是軍事投機，後者是機會主義。你們帶領隊伍在城市在鄉村，參加這一暴

動時，必須防止這些容易陷入的錯誤，時時注意羣衆的發動，羣衆的擴大，以至敵人所奴役的羣衆的勾引或煽動。

(四)你們的軍隊如已確實到達湖南的桂東桂陽地方，你們的工作對象，便應從這幾個縣分計劃起：據我們所知道的，在桂東的北邊茶陵、酃縣，以至江西蓮花，均有毛澤東同志所帶領的農軍駐紮。不知你們已和他聯絡否？各部分農軍從前也有不發動羣衆，專門代替羣衆從這縣打到那一縣，執行英雄式的暴動的錯誤。他們如果駐在這些地方，你們應確實聯絡，共同計劃一發動羣衆，以這些武力造成割據的暴動局面，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政權。在這現時的湖南敵人勢力空虛時，是一件刻不容緩的事。便是那部分農軍已經遠走無法聯絡，你們在桂東桂陽一帶應該單獨的做起來。當地如有我們的黨部，自然應該與他們計議發動羣衆，採取適當機會舉行暴動。假如沒有黨部，你們亦應由軍中挑選得力同志，派入鄉村做組織羣衆，鼓動羣衆的暴動預備工作，同時并派人與湖南省委作切實的黨的聯絡。

(五)暴動的局面，須看當地的環境，如便利在鄉村發動便應在鄉村中求深入和擴大，而不亟於攻城。如攻城確有把握而影響又大，羣衆或因此而擴大，則攻城亦所必需，便是守不住幾天，仍爲敵人攻下，亦只得去做。鄉村與城市的暴動，固然最好的是能匯合在一起，但決不要彼此等待，尤其是鄉村能發動時便發動，祇要注意羣衆深入和擴大，農暴總是可以鄉村支持而擴大的，我們以隊伍參加農暴，也須着眼於此點。

暴動的內容，自然應依照中央各號通告所指示的去，但口號必須依照工農暴動奪取政權的原則，制定各種切實的口號，以合乎當地的需要。

(六)萬一你們所去的地方，客觀條件不容許一個農暴實現，即所謂統治軍閥力量的強大，工農羣衆反抗情緒的微弱，黨的指導一無所有的時候，你們的隊伍便應向農運發達的區域移動，去發動羣衆，做成農暴的助力。這次同鳴珂同志同去的江西省委代表，便在這個條件之下，同你們磋商將軍隊移往江西農運發達區域，如萬安、蓮花、贛州一帶，去做農暴的助力；你們如認定湖南無發展農暴的希望，便可接受江西省委的提議。

(七)假使你們已經與范石生發生了組織的關係，你們便應很堅決根據上述的使命，從他的軍隊中分化起來，這就是說，不但將我們的軍隊抽回來，還將范石生的隊伍拉出一部份來。這一工作自然是很艱難而且很祕密的，但我們必須很

謹慎的努力去做，至少要將我們有的隊伍抽回來，指導機關應切實討論迅快執行。

(八)我們隊伍中或者已經發生一些動搖份子，不願意過這種無希望於升官發財的流浪生活，你們應堅決的淘汰這些份子，假使他們不但自己動搖，同時還鼓動別人，你們便應很堅決的執行軍紀斬斷惡根。士兵中如有厭倦軍隊生活而願歸家者，你們首應以土地革命後士兵家庭可分得土地耕種，工農革命軍隊待遇改良，生活平等的希望去鼓勵他們，更應時常引導他們與農民打成一片，引起他們參加農暴的興趣，以鞏固我們的軍隊。假如士兵有受敵人宣傳的影響，圖謀反叛或逃走者，便應立即予以監禁式的勸誡，並將解除的武裝，武裝熱心農暴的農軍。

(九)你們隊伍一切的給養，均應從豪紳官吏地主身上着想，千萬不要空想黨會來幫助；這不但事實不可能，而且原則所不許。舊廿四師在海陸豐參加農暴，不但自籌給養提高了兵士生活，并贊助農民分配了土地，分配了地主的財產給貧苦無業的農民，這一工作你們應首先注意。

(十)軍中黨的組織是一切組織的根源，你們必須依照從前的組織系統——團成立支部、下分小組，師成立委員會——管理支部生活，執行黨的政策，監督軍隊行動。

過去廿五師同志的許多行動，多有可批評處，尤其是三河壩退後，直到現在，許多同志的行動多應該拿到師委員會裏討論出一個大綱，交給全體同志公開討論，給一判斷，誰是誰非，報告中央核辦。沒有黨紀便沒有軍紀，黨員不能接受嚴格的軍紀，就無以處罰非黨員的羣衆，故你們對過去工作的審查千萬不要嬌虎一點。

一切黨的政策均須拿到支部會議或小組會議中討論，使每個黨員都能表示意見，有些并可向非黨的羣衆宣佈，使他們認識CP的真面目和這部份軍隊正當的出路——工農革命軍。師委會的組織以五人為合式，除指定朱德同志為書記外，餘四人可由全體選舉，但必須有兩個士兵同志被選。

(十一)你們這一部分隊伍的組織形式，廣東省革命委員會已任命為工農革命軍第一師。你們現在已到湖南，如果舉動佔據了一個地方，即可由當地革命委員會或蘇維埃政府任命為某某地工農革命軍第幾師。在這師中的一切訓練，除了軍事的正式操練外，必須有嚴格的政治訓練，在非同志和不得力的同志中，必須有黨代表的派遣，嚴厲的執行監督任

務。

(十二)你們過去一切的情形均須做一詳細的報告——給中央——給湖南省委，你們向中央要求祇有人材問題，中央可以供給，祇要你們有信來。你們應派人與湖南省委聯絡，對中央××同志的任務完畢，即須回來報告，萬一你們須要××在那邊工作，他可參加師委并任軍隊中一部份指揮工作。

一切一切都由××面達，此次又不詳寫了。最後中央對於你們這一師死難的同志，特致最誠懇的哀忱和永不能忘記的心意，同時並祝你們後死的同志努力。

中央十二月廿一日（一九二七年）

（錄自中共「中央政治通訊」第十六期）

附錄九：中共中央致朱德信（二）

德兄并轉全體同志：

廣東省委來信，有你們部隊已隨范石生到韶關的消息，如果屬實，則中央前信的指示，又有以下的變更：

(一)廣州的暴動，不曾嚴重的警告了范石生，但其對你們部隊的注意的防範，并且前信所說：「廣州暴動失敗後你們是否不為范石生所解決，尙是問題」。目前范石生恐將實際的回答這一問題。為避免被消滅的危險，你們祇有堅決的脫離范石生，聯絡北江的農軍，及廣州暴動後退往北江的隊伍，參加北江區域的農民暴動，擴大和深入北江的土地革命造成北江農暴的主要副力，造成海陸豐農暴割據東江的同樣的局面；這是你們隊伍存在和發展的唯一途徑。並且對於廣東省全省暴動的前途更有深切的關係，認清此點，你們必須迅速的執行。

(二)你們在脫離范石生時，必須擴大這個「叛變」的影響到他的軍中去，盡可能的帶去他的隊伍，拆散或消滅他的軍隊，即是保障和增厚我們的力量，這一良好的而又危險的時機，你們也須謹慎的利用。

(三)立即與廣東省委接洽，直接受廣東省委和北江特委（大約在韶關）的指導，完成你們對北江農暴應盡的責任。

其餘一切可參照前信斟酌實行。

(四)假如同志中有懷疑脫離以及拆散范軍政策的人，必須無顧忌的予以開除。萬一主持軍隊的同志，領導着隊伍反對這個決定，中央特命北江特委及××同志行使非常手段，領導服從黨命的同志消滅這一反抗。

(錄自中共「中央政治通訊」第十六期)

中央十二月廿七日(一九二七年)

增補一：評毛匪在「九大」的講話

（按：作者此文刊於「匪情月報」十三卷一期，一九七〇、二、二八）

毛共召開「九大」九個月後，我們才看到毛匪當時在「九大」的講話，現在把它刊載於本期歷史文件欄，以供研究大陸問題的參考。

毛匪這篇講話，實際就是「九大」的開幕詞，根據錄音整理，不過寥寥五百餘字，其內容顯然係以中共各次全國代表大會若干問題為中心。

所謂團結大會與勝利大會

毛匪在講話中，前後重複提到的就是要「開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大會以後，可以在全國取得更大的勝利！」這不過是共產黨人慣說的一句口頭禪，但也是毛匪當時的奢望和幻想。「九大」至今將及一年，還在進行「清理階級隊伍」和「鬪批改」，因而毛共內鬪繼續不已，被迫於去年七月、八月間，發出「七、二三」、「八、二八」命令，至十月間，又以反俄反修全面備戰為號召，以轉移內鬪目標並加強對大陸人民的壓榨和剝削，但都未見成效。同時「九大」之後，毛共中央以下的各級黨的組織，至今尚未建立；偽政權仍在軍管之下，無法改組，流為四不像的統治機構。另一方面，劉派的潛力與影響仍大，處處伺機反撲，民衆反毛反共的鬪爭，亦逐漸發展壯大，大陸偽政權仍處於混亂與動搖

之中，毛匪所謂「取得更大的勝利」，又成爲一次「偉大的空話」了。

「七大」、「八大」的錯誤問題

毛匪在講話中承認：「七大」選舉王明等人爲中委是錯了，是不好了，他們反毛，王明甚至跑到莫斯科反毛；「七大」「八大」選出劉少奇等人爲中委也是錯了；發生這些誤錯的原因，毛匪說是因爲不知道他們的政治歷史和不知道他們不好。其實，真相並非如此，一九三七年十月抗戰期間，王明由莫斯科飛返延安，傳達史大林指示，要中共幹部支持毛澤東爲黨的領袖，因而在歡迎王明的晚會上，毛澤東致詞時真是爲自己「喜從天降」，讚譽王明建立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位居首功；此後王明強調一切服從統一戰線，毛澤東立即在六中全會「論新階段」的報告中，發揚光大了王明路線。後來只是爲了建立毛匪個人獨裁，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和當共產國際解散之後，才把王明打倒了。至於劉少奇，那是毛匪一手提拔的「最親密的戰友」，從一九三六年起，毛匪就支持劉少奇爲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中共中央幹部部長，中共中央中原局書記，華中局書記，中央組織部長，乃至中共中央的副主席和毛匪的繼承人，稱讚劉少奇爲白區工作的模範，利用劉少奇打倒了王明的國際派和一切反毛的政敵，因而，「七大」期間，劉少奇主張把毛澤東思想列入黨章，作爲對毛匪的報恩，這一段毛、劉互相標榜，狼狽爲奸的經過，是有目共睹的事實；「文革」期間之所以整肅劉少奇，只是由於劉少奇不像以前那樣服從聽話，以自己的主張歪曲了毛匪的路線，動搖了毛匪的個人獨裁，而不是像毛匪所說不知道劉少奇不好和不知道他

的政治歷史。那有相處數十年，且爲自己的繼承人，還不知道他的不好的道理？這種說法，顯然是爲毛匪自己掩飾錯誤的遁詞和幌子，果真是不知道，那也只能說明毛匪已經是糊塗透頂了。

「一大」代表的人數問題

毛匪在「九大」說，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只有十二個代表」，而且把十二個代表的名單及其「犧牲」、叛變、死亡都說清楚了。可是三十餘年以前，卽一九三六年，當中共僞促陝北期間，毛匪對史諾口述自傳時却說：「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出席共產黨成立大會……另外還有一個湖南代表出席了這個有歷史性的第一次會議。其餘出席的有張國燾、包惠僧和周佛海，我們一共是十二人。」現在毛匪的講話，雖也列了「一大」十二個代表的名單，但單單把包惠僧有意漏掉了。如果把毛匪以前所說的包惠僧也包括進去，「一大」豈不是有十三個代表了嗎？毛匪何以要把包惠僧剔除呢？第一，可能是爲了符合以前他所說的只有十二個代表；第二，但也可能是棲梧老人（據說就是包惠僧）於一九五七年「新觀察」發表「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後的見聞」觸怒了毛匪，遭受毛匪的整肅，因而索性把他從代表名單中一筆勾消。

對「一大」代表的分歧說法

然則，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究竟是十二人還是十三人呢？答案是分歧的。由於毛匪對史諾說是

十二人，於是中共欽定的早期黨史書刊，以及偽政權建立後的匪黨書刊都說是十二人；可是米夫的「中國共產黨英勇奮鬥的十五年」，中共中央宣傳部所編「共產主義與共產黨」，陳潭秋的「一全大會的回顧」，周佛海的「逃出了赤都武漢」，棲梧老人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後的見聞」都說是十三人。張國燾的「我的回憶」，則以折衷辦法來解釋這一分歧，他說湖南代表何叔衡「不懂馬克斯主義，又無工作表現」，乃通知毛澤東，把何送回湖南去了，因而出席會議的代表就由十三人減至十二人。現在毛匪再次否定張國燾的說法，指明何叔衡是十二個出席「一大」會議的湖南代表。此外，去（一九六九）年五月六日，俄共莫斯科華語廣播：「歷史的偽造者在大顯身手」評論中說：毛匪在「一大」沒有發過言，「一大」之後的中共湖南省委書記也不是毛匪，而是「一大」參加者何叔衡。此一評論並引用一九三五年康生在「共黨國際」雜誌的文章作為例證，當時康生寫道：「中共『一大』以後，何叔衡同志回到了湖南，把培養革命幹部作為主要任務，為了這種目的，他在湖南組織了師範學校，並當了這所學校的校長，他選拔最革命的青年進這所學校，以革命的精神教育青年，同時何叔衡同志是中共湖南省的書記。」這樣一來，中共「一大」代表的人數及其出席者，還是沒有正確合理的答案。

「五大」與「六大」代表問題

關於中共「五大」代表人數，中共官方的記載為八十人，現在毛匪把它說成幾百人。「六大」代表人數也有幾種說法，中共官方的記載為八十四人，「中國共產黨之透視」說是中委及各省代表共一百七

十六人，張國燾則稱僅有卅餘人，另有列席旁聽的中共留學生十餘人。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三日，莫斯科華語廣播「共產黨人國際主義者的代表大會」說中共「九大」代表共有一百一十八名，現在又被毛匪說成爲幾十人了。

篡改史實的結果

總之，從毛匪有關中共黨的大會講話看來，毛匪自己前後說法不同，自相矛盾，因而中共官方的記載也前後分歧，難有正確答案；究其原因，大都由於毛匪及中共若干領導人，爲了個人崇拜或自己利害，往往隨心所欲，任意篡改史實，而中共的御用史家也只好依樣畫葫蘆一錯再錯了。

附錄：毛匪澤東在匪黨「九大」的講話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

同志們！

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現在開幕。

我希望，我們的大會，能够開得好，能够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

我們黨，從一九二一年成立，到今年已經有四十八年這麼長的時間了。第一次代表大會，只有十二個代表。現在在座的還有兩個，一個就是董老，再一個就是我。有好幾個代表犧牲了，山東的代表王燾美、鄧恩銘，湖北的代表陳潭秋，湖南的代表何叔衡，上海的代表李漢俊，都是犧牲了。叛變的，當了漢奸、反革命的，有陳公博、周佛海、張國燾、

劉仁靜四個，後頭這兩個還活着。還有一個叫李達，在早兩年去世了。那個時候，全國的黨員只有幾十個人，大多數是知識份子。後頭就發展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代表大會，每次到會的代表都很少，十幾個人，二十幾個人。第五次代表大會在武漢開，人數比較多一些，有幾百人。第六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開，幾十名代表，恩來同志、伯承同志參加了。第七次代表大會在延安開的，開了一個團結大會。那個時候，也是黨內分歧，因為有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錯誤，特別是王明路線。那個時候，有人建議不要選王明路線那些同志到中央，我們不贊成，說服他們選舉。結果呢？結果，就有幾個不好了，王明跑到國外反對我們，李立三也是不好的，張聞天、王稼祥犯了錯誤，就這麼幾個。其他一些，比如劉少奇呀，什麼彭真、薄一波這些人，我們不知道他們不好，他們的政治歷史我們不清楚，也選進來了。經過「八大」到現在，搞得比較清楚了。在政治路線上，組織路線上，思想方面，都搞得比較清楚。因此，我們希望這一次大會，能夠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在這個團結的基礎上，我們能不能取得勝利？就這個大會來說，能不能開成一個勝利的大會？大會以後，能不能在全國取得更大的勝利？我以為，可以的。可以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大會以後，可以在全國取得更大的勝利！

增補二：中共「一大」若干問題之研究

(按本文爲作者提交一九七三年七月在巴黎舉行之第二十九屆國際東方學者大會討論之論文)

中共「一大」的召開，是中共建黨的第一天，也是中共建黨的紀念日。自一九二一年到今天，中共的黨齡已達五十二歲，可是還弄不清它是那一天出生的（註一），好像是無父無母的私生子，被人隨便冠予生辰，說來也實在可笑。

雖然中共早已官定建黨紀念日爲七月一日，可是經過自由世界學者的研究，並以文件資料證明這是無稽之談（註二）；不過，「一大」召開的確期，到現在還沒有定論。

同樣，關於中共「一大」的若干問題，經過自由世界學者的研究與文件資料的參證，大體也得到了相近的結論，如一九二〇年四月，共產國際派威經斯基（Voitinsky）來華，於五月間在滬組織中共臨時中央（或稱發起小組）；一九二一年共產國際派馬林（Maring）、李克諾斯基（Nikolsky）於六月到滬，指導中共「一大」；「一大」是在上海貝勒路李漢俊家及嘉興南湖開會，前後共開五次會議而結束；「一大」討論內容及有無宣言等問題，有陳公博「共產運動在中國」論文及其附錄，即「一大」黨綱決議可作參證與解答；中央局委員的選舉，也有若干「一大」代表相近的回憶可作說明。其中到現在還沒有正確解答的，只是「一大」代表的人數，名單及其所代表地區的問題。這同樣是由於中共官

定「一大」代表爲十二人所引起，而其根源則來自一九三六年毛澤東向史諾口述自傳時的「欽定」。

解答中共建黨的確切日期，也就是中共「一大」召開的日期，最可信的資料，應是出席「一大」代表最早的文字紀錄。在此，首推出席「一大」的廣州代表陳公博的文章，他於一九二一年七月出席「一大」返抵廣州後，寫了一篇遊記，題爲「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載於中共中央理論機關刊物「新青年」九卷三號（註三）。如果說，「一大」兩年半之後，陳公博以留黨察看的中共黨員身份（註四），在哥倫比亞大學撰寫碩士論文「共產運動在中國」時，把他由廣州到達上海的日期——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日（註五）前後，當作「一大」開幕的日子而有錯誤；二十二年之後（一九四三年），所撰「我與共產黨」描述孔阿琴案時，「可能弄點手脚」，有不真不實之嫌（註六）；那麼，這篇遊記是「一大」剛結束後最早的記載，而且刊登於中共機關刊物之上，既不敢弄點手脚，亦不會忘記或弄錯，而是一篇信史了。

陳公博在遊記中說：他於一九二一年七月十四日由穗起程赴滬，在滬十天，住南京路大東旅社四十一號。遊滬期間之某夜，在李家曾被法國巡捕搜查與訊問，翌（七月卅一日）晨五時餘，大東旅社四十二號，發生女人孔阿琴情殺案，兇手爲男子瞿松林。因受此刺激，三十一夜遂趁車赴杭。

陳公博此一記述，與其於二十二年後，即一九四三年所撰「我與共產黨」中敘述中共「一大」第四天晚上，遭法租界巡捕搜查訊問及大東旅社女人孔阿琴情殺案大體相符（註七）。一九二一年八月六日上海英文「大陸週報」（The North China Herald）所記載的情殺案消息（註八），也證明陳公博的

「遊記」所述案件確實可靠。

其他出席「一大」代表包惠僧（棲梧老人）、陳潭秋、周佛海都指明「一大」會議由開幕至發生巡捕搜查會場止，連續開了四次會議，而且是在晚間開會（註九）。據此推算：孔阿琴案發生於七月卅一日清晨，中共「一大」被巡捕搜查的第四次會議，應為前一日，即七月三十日晚上，再回算三天，廿九日為第三次會議，廿八日為第二次會議，七月廿七日便是中共「一大」召開的第一天，也就是中共建黨的紀念日了（註一〇）。

至於「一大」代表的人數與代表地區，據棲梧老人（包惠僧）說：「這一次代表會議的代表是以地區為標準，而不是以黨員人數為標準，七個地區原規定每個地區兩個代表，如東京只有兩個黨員，也是邀請兩個代表，因為施存統那一年暑假沒有回國，所以只有一個代表出席。這七個地區是：湖南、湖北、上海、廣州、北京、濟南、東京，出席的代表有毛澤東、何叔衡、陳潭秋、董必武、李達、張國燾等十三人。加上馬林、李克諾斯基，到會的共有十五個人。」（註一一）

代表的名單及所代表的地區，董必武、陳潭秋及周佛海都指出共有十三名代表，分別代表七個地區：日本、周佛海；湖北：陳潭秋、董必武；湖南：何叔衡、毛澤東；北京：張國燾、劉仁靜；上海：李漢俊、李達；廣州：陳公博、包惠僧；山東：鄧恩銘、王盡美（周佛海忘記該二人的姓名）。（註一二）

一九三六年下半年，毛澤東在陝北保安向史諾（Edgar Snow）口述自傳時，曾說：「一九二一年

五月，我到上海出席共產黨成立大會……另外還有一個湖南代表出席了這個有歷史性的第一次會議。其餘出席的有張國燾、包惠僧和周佛海，我們一共是十二人。」（註一三）

可是，相隔三十三年之後，毛澤東於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在「九大」的講話，數出了十二個代表的名字，却單單漏掉了包惠僧（註一四）；如果把他對史諾所說有包惠僧代表其人加入，豈不是又有十三個代表了嗎？

另外，當張國燾尚未脫離中共，一九三七年三月還在延安的時候，就曾向「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編者陳然提供口述資料說：「一大」代表為十三人（註一五）。但當張國燾在香港撰寫「我的回憶」時，却牽強附會的寫道：「在大會之前，幾位主要代表還會商過代表的資格問題；結果認為何叔衡既不懂馬克思主義，又無工作表現，不應出席大會；並推我將這一決定通知毛澤東，他旋即以湖南某項工作緊急為理由，請何叔衡先行返湘處理。因此，後來出席大會的代表只有十二人。」（註一六）

毛澤東為了符合其以前「一大」代表十二人的說法，從代表名單中有意剔除了包惠僧，張國燾則為牽強附會遣走了何叔衡，其實兩者均與事實相左：

以何叔衡言，「一大」代表董必武、陳潭秋、周佛海、棲梧老人等的回憶錄，都一致指明何叔衡出席了「一大」，中共官方的記載更強調何之出席「一大」。何叔衡死後，王明（陳紹禹）、康生曾為文追悼說，何不僅出席了「一大」，且在「一大」之後被派為中共湖南區委書記（註一七）。何在工作上的表現，據中共官方的記載，他主持長沙師範學校，為中共做了許多工作，被毛澤東認為「最為堅定可

靠的革命同志」，是毛澤東的「最親密戰友」（註一八）。如謂何不懂馬克思主義，則山東代表鄧恩銘、王盡美（均為中學生），乃至其他代表，當時亦未見得有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且各地區代表經各地支部選派，斷不致到達上海開會時再行審查或予以否決。

以包惠僧而論，從毛澤東起，大部份「一大」代表回憶錄，都承認有包惠僧其人出席「一大」。現在大家研究的重心，是包惠僧究竟代表那個地區支部出席「一大」的問題。據棲梧老人（包惠僧）自己的報導，他於一九二〇年九月中旬在湖北參加中共（註一九），四個月後，約於一九二一年一月到上海被留在臨時中央工作（註二〇），直至「一大」召開約有六個月；若以工作時間長短作衡量標準，則包不可能代表湖北支部，如謂代表上海，尚有可能，但因每一地區規定僅派兩人，湖北、上海已有兩人出席，不可能增派一人。這裏值得重視的是：一九二一年五月間，臨時中央代理書記「李漢俊要他（按：指包惠僧）去廣州向陳獨秀報告上海情況，重新擬定工作辦法。」（註二一）既然陳獨秀無法回滬主持「一大」，「只派了兩名代表出席代表會議」（註二二），那麼，很可能當包惠僧到廣州報告上海情況時，陳獨秀先派包為廣州代表，七月再派陳公博為廣州代表，因此，包惠僧與陳公博在廣州未曾晤面，是不足為奇的。「一大」之後，一九二一年九月陳獨秀返滬遭捕，據周佛海說，「我們一面營救陳獨秀，一面派人四出『尋覓』代表（按：指尋覓代表出席第三國際在伊爾庫次克舉行之遠東弱小民族會議），包惠僧赴粵，劉仁靜赴北方……」（註二三）可見包惠僧與廣東有一定淵源。董必武、陳潭秋、周佛海指明包代表廣州，顯然是可以理解的。

綜前所述，本文結論是：

中共「一大」召開應是一九二一年七月廿七日，而非七月一日。

中共「一大」代表應是十三人，而非十二人。

註一：中共官定「一大」召開日期爲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李達、張國燾附會此說。（見李達「沿着革命的道路前進」「中國青年」第十三、十四期合刊，一九六一、七、五，見張國燾：「我的回憶」、《明報月刊》第六期，一九六六、六、一）。毛澤東於一九三六年對史諾說是五月，（見註一三），一九四六年又對佩恩（Rober Payne）說是六月三十日。見佩恩· Mao Tse-tung-Ruler of red China Chenry Schuman Inc, New York, 1950, 1st edition) P. 71。陳公博先說是孔阿琴案（七月卅一日）之前（見「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後來又說是七月廿日（見「共產運動在中國」）。陳潭秋說是七月底召開（見「中共「一大」的回憶」。其他出席「一大」人員之回憶，無確定日期之紀述。

註二：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章燕庭（Martin Wilbur），根據陳公博之「共產運動在中國」，對中共「一大」會期曾作最早的考證，認爲「一大」召開日期是在七月廿日至七月卅日之間。對官定的七月一日加以否定。

註三：見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新青年」九卷三號第三六三—三七四頁。當時「新青年」經常脫期出版，九卷三號實際出版時間應爲八月。因九卷四號，雖署明爲一九二一年八月一日出版，但所載陳獨秀覆蔡和森的信說：「我前幾天回到上海，才見到你的信。」但陳係九月返滬，可見九卷四號係九月出版的。

註四：陳公博在「寒風集」（甲二二三—二頁）「我與共產黨」一書中說，他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時，曾接譚植棠來信，謂陳受留黨察看的處分。

註五：陳公博：「共產運動在中國」，一九六〇年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出版。

註六：章燕庭教授對「共產運動在中國」的考證，係參考陳公博之「我與共產黨」（「寒風集」甲二二三頁）所

述孔阿琴案而作的。在韋教授未獲閱陳之「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前，對「一大」廿二年之後陳公博的回憶錄，難免有所懷疑，認為陳可能弄點手脚，把「一大」會場被抄與孔阿琴案連結在一起。

註七：孔阿琴案男兇手瞿松林。陳公博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遊記中有此記述，但經過廿二年後所寫之「我與共產黨」一書則稱男兇手姓名忘記了（見「寒風集」甲二二三頁），這是合理的。見「寒風集」，上海一九三六年版。

註八：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有該項資料。

註九：陳公博（「我與共產黨」）、包惠僧（「中共成立前後的見聞」）、陳潭秋（「中共一大的回憶」）、周佛海（「扶桑笈影溯當年」），都說開至第四次會議（晚上）發生巡捕查抄會場事件（周佛海在另一回憶錄「逃出了赤都武漢」又說是第六晚），只有張國燾一人說是分上、下午開會，會議開了八次（「我的回憶」），此說不可靠。

註一〇：七月廿七日「一大」開幕，與陳潭秋所說「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會議是在七月底召開的」大體相符，見陳潭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回憶」，「共產國際」（美國版）第十三卷，第十期第一三六二頁，一九三六年十月。

註一一：棲梧老人：「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後的見聞」，（北京「新視察」，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第十三期，第十八頁）。

註一二：董必武之回憶，見瓦勒斯：「紅塵」，斯丹佛大學，一九五二年——Nym Wales, *The Red Dus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P. 39)、陳潭秋之回憶見（註一〇）P. 1361。周佛海之回憶見「逃出了赤都武漢」，「共匪禍國史料彙編」第一冊第三二八頁，臺北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一九六四年版。

註一三：史諾：「西行漫記」紐約一九三八年版——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38) P. 141。

增補二：中共「一大」若干問題之研究

註一四：毛澤東在中共「九大」的講話（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匪情月報」第十三卷第一期第九一頁，一九七〇年二月，臺北國際關係研究所。

註一五：「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中國現代史研究委員會主編，新民主出版社印行，一九四七年七月香港初版。此書原為中共在延安時期「抗大」與「黨校」的教材，由張聞天、何幹之、陳伯達、成仿吾、陳然組成「中國現代史研究委員會」討論編纂者，並由陳然執筆編寫。據陳然告知筆者，該書有關中共「一大」、「二大」資料，大都取材於張國燾之口述。該書上冊（即已出版者，下冊為油印本，未出版）第一二八頁載稱：「一大」「到會代表十三人，代表黨員共五十人左右」。

註一六：張國燾「我的回憶」，香港「明報月刊」第六期，第六四頁。

註一七：見王明、康生所作的追悼文，刊「共產國際」（英文版）第十五期，第七五三頁，一九三五年八月五日及莫斯科華語廣播：「毛澤東捏造了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一九六八年一月廿九日播。

註一八：李銳：「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第一四九頁）。

註一九：棲梧老人：「二七回憶錄」，第二六頁，北京工人出版社，一九五七年。

註二〇：棲梧老人：「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後的見聞」，北京「新觀察」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第十三期，第十七頁。

註二一：同上。

註二二：同上。

註二三：周佛海：「逃出了赤都武漢」，「共匪禍國史料彙編」第一冊第三一九頁。

再論中共之建黨日期

一、官定日期——七月一日

一九三七年一月，中共中央由保安遷入延安後，積極加強幹部訓練，以開展其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抗日軍政大學、中央黨校、陝北公學等訓練機構的課程亦由中共中央負責人親自講授和編撰。其中「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包括中共黨史）一課，特組織中國現代史研究委員會，負責研究編寫與講授，以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爲主任委員，何幹之、陳伯達、成仿吾、陳然爲委員，並由陳然負責編撰。其中關於中共建黨早期資料，大都取材於曾經參加中共「一大」或「二大」之張國燾、董必武和毛澤東的敘述，最大的困難，便是當事人大都忘記了，尙能記憶的也是各人的說法不同，譬如毛澤東只能重述他在保安向史諾（Edgar Snow）所說的一些話，董必武也僅回憶他在「一大」參加過黨綱、宣言的起草工作。因此研究委員會的希望只好集中在張國燾身上，因他不僅出席了「二大」（毛、董都未參加「二大」），而且是「一大」的主席；可惜張國燾的記性更差，當陳然到他的住處清涼山石洞內訪談時，把「一大」最後一次會議移至浙江嘉興南湖舉行的「南湖」誤爲「東湖」（見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一二八頁），把「二大」開會的地點誤爲杭州西湖（這是二屆中央委員會開會的地點）。隨後，陳紹禹（救國言論集）、胡喬木（中共三十年）華崗（民族解放運動史）、胡華（新民主主義革命初稿）等都跟着「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錯把「二大」開會地點說成西湖。不過張國燾肯定「一大」出席代表爲十三人

，開會期間爲學校放暑假後之七月，至於七月那一天開會，他實在無法記憶了。（註一）

恰好在這時，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米夫所撰的小冊子「中國共產黨英勇奮鬥的十五年」（註二）也傳到了延安，這是紀念中共建黨十五週年的文章，張聞天爲此曾在中國現代史研究委員會提出了籌備建黨紀念的問題，交換意見的結果，七月是確定了，但無法確定日期，只好留後再行研究。（註三）

據邵維正引用的資料說明：直到一九四一年六月，中共中央始發出紀念中共誕生二十週年和抗日四週年的指示，即決定七月一日爲中共建黨紀念日（註四），此後，所有中共書刊都肯定中共「一大」係於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召開的。後來李達、張國燾的回憶錄也咬定「一大」係七月一日舉行，那是附會中共中央決定的違心之論。（註五）

二、陳公博論文——七月二十日

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除國際代表馬林、李克諾斯基二人、以上級指導者身份列席大會外，現在經各方考證均證明正式代表共爲十三人，其中五人：李漢俊、何叔衡、劉仁靜、王盡美、鄧恩銘沒有回憶錄（註六），八人都先後有回憶錄或訪問紀錄發表。其內容：李達說：「七月一日下午八時，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望志路樹德里三號的樓上正式開幕……」；（註七）張國燾說：「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下午三時，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了。我被推爲主席，首先宣佈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每日分上下午舉行兩次會議。」（註八）其餘當事人沒有直接肯定中共中央七一建黨的

決定。而且在決定之前毛澤東發表的回憶錄甚至說是在一九二一年五月召開「一大」的（註九），後來又向佩恩說「一大」是六月三十日舉行的（註十）。陳潭秋在莫斯科爲紀念中共建黨十五週年，寫了一篇「一大」的回憶說：會議是在七月底舉行的（註十一）。最足以否定七一建黨的文件，是陳公博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哥倫比亞大學撰寫的碩士論文，題爲「共產運動在中國」，文後還附錄「一大」黨綱、決議，「二大」黨章、決議和宣言。發現並予考證印行的是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主任韋慕庭（C. Martin Wilbur）教授，他在研究與印行該書時說：「一九二四年元月，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後二年半。陳公博氏，那位曾參加一九二一年七月間中國共產黨成立大會的參與者，寫成了一篇題爲『共產運動在中國』的論文。這論文也就是現存有關文獻中關於最早期中共史實的紀錄。三十多年，這一手抄本，一直放在哥倫比亞圖書館中，迄未爲人所注意。」直到一九六〇年九月，始予以刊印參考。

陳公博在論文中說：「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是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日在上海召開的。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日。」這雖然否定了七一建黨之說，但與陳氏一九四三年在「寒風集」中的說法七月三十日左右開會是互相矛盾的，因此韋慕庭教授的考證，認爲中共「一大」開幕日期，可能爲七月二十日或七月三十日，陳說的這兩個日期就接近第一次大會開會期間了。（註十二）

韋慕庭教授的考證，雖有道理，畢竟還沒有得出一個確期，也就是說還沒有有一個肯定的結論。

三、荷花生日——七月二十三日

香港鄧文光先生於一九六九年二月在「人物與思想」發表「中共建黨日期的研究」一文，文前似爲編者按語稱：「關於中共建黨之日期，向有兩說：大陸官訂的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和海外流行的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十日。作者認爲兩者均不可信，因而就其新發現之資料提出一新假說：七月二十三日。」這是就大會閉幕日期推算出來的。

「原來，在中共官訂的建黨三十五週年紀念日前夕，『新觀察』半月刊的記者曾經去到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最後一次會議的會址——南湖，訪問了當年在南湖工作的船工，因而得知大會的閉幕日期是『夏曆六月二十四日』，這篇專訪（註十三）有這樣一段話：

『年老的船工還告訴了我們一些關於當時南湖的情景。以前南湖在六、七月很熱鬧，特別在夏曆六月二十四日（相傳爲荷花的生日）遊人更多。當時來遊南湖的人主要是豪紳富賈，也有部分知識分子。他們來到南湖租一隻有客廳、宿床、裝有閘檣的「絲網船」，包上一桌酒菜，在湖上渡過一日。就在這樣熱鬧的遊湖季節中，黨代表們瞞過了特務們的耳目，在這裡秘密地完成了第一次黨代表大會的議程。湖上還有一個傳說，前去南湖接洽「絲網船」的人還是一位黨代表的親戚，是一個婦女（註十四），住在嘉興南門。』

「既然這條史料透露了『夏曆六月二十四日』就是大會的閉幕日期，那末我們便可以輕易地算出大會的開幕日期了。

「查對萬年曆，一九二一年『夏曆六月二十四日』即『陽曆七月二十八日』（註十五）。由此日回

算，大會的開幕日便應是『陽曆七月二十三日』，因為據各當事人的供證指出，大會由開幕日起至會場被警探圍搜止，共開四次會議，歷時四天；又據張國燾指證，會場由李漢俊家移至南湖，中間停會一天；同時各當事人一致指證，在南湖的會議是最後一次、亦即第五次會議，費時一天。依此回溯：

七月二十八日——第五次會議，大會閉幕日；

七月二十七日——停會；

七月二十六日——第四次會議，警探圍搜會場之日；

七月二十五日——第三次會議；

七月二十四日——第二次會議；

七月二十三日——第一次會議，大會開幕日。

「這個推論不但與『七月二十日』接近，同時與陳潭秋所說的『七月下半月』吻合。」（註十六）
鄧文光先生的研究，有幾點值得商榷：

第一，「新觀察」記者所訪問的「當年在南湖工作的船工並不是當年「一大」開會僱用遊艇中的船工，而是一般「年老的船工」，其所知只能是傳聞，而非親身的經歷。

第二，「荷花生日」、「遊人更多」，因而老船工猜測中共「一大」代表可能利用遊湖季節掩護會議。利用熱鬧的季節，那就不一定是在「荷花生日」那天，可能是在「生日」之前，或在「生日」之後。

第三，「一大」會議在貝勒路李漢俊家遭法租界巡捕搜查事件，係突發事件，事後各代表商定次日在南湖開完「一大」最後一次的會議，並未想到，以後也沒有一個代表提到過利用「荷花生日」的問題，顯然這一突發事件與節日並無關連，可能碰上節日，也可能是在節日前後。

第四，鄧文說：「因為據各當事人的供證指出，大會由開幕日起至會場被警探圍搜止，共開了四次會議，歷時四天；又據張國燾指證，會址由李漢俊家移至南湖，中間停會一天」；停會一天，只有張國燾一人供證，其他如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李達、周佛海以及南湖會址的安排人李達的妻子王會吾都說沒有停會，而在圍捕事件後第二天一早便移至南湖開會。

綜上所述，鄧文光先生的說法，不是考證，而是猜測，即使猜對了（荷花生日為「一大」第五次會議）同算結果，「一大」開幕之日應為七月二十四日，而非二十三日，因為「一大」第四次會議到第五次會議之間，據六位當事人說沒有停會。

四、孔阿琴情殺案——七月二十七日

筆者於一九七三年寫了一篇題為「中共『一大』若干問題之研究」論文（註十七），提交同年七月在巴黎舉行之第二十九屆國際東方學者會議討論，當時對這篇論文最感興趣的是蘇俄的學者，他們支持論文的觀點和結論，並聲言：下屆國際東方學者會如果在莫斯科舉行，類此論文資料，蘇俄可予充分提供參考云云。

這篇論文，筆者使用了出席中共「一大」代表的若干回憶資料，尤其是最早的回憶錄，作爲研究與考證的根據；那就是出席「一大」的廣州代表陳公博的文章。他於一九二一年七月出席「一大」返抵廣州後，寫了一篇遊記，題爲「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載於中共中央理論機關刊物「新青年」九卷三號（註十八）。這篇遊記是「一大」剛結束後最早的記載，而且刊登在中共機關刊物之上，既不敢弄點手脚，亦不會忘記或弄錯，而是一篇信史了。

陳公博在遊記中說：他於一九二一年七月十四日由穗起程赴滬，在滬十天，住南京路大東旅社四十一號。遊滬期間之某夜，在李家曾被法國巡捕搜查與訊問，翌（七月卅一日）晨五時餘，大東旅社四十二號，發生女人孔阿琴情殺案，兇手爲男子瞿松林。因受此刺激，三十一日夜遂趁車赴杭。

陳公博此一記述，與其於二十二年後，即一九四三年所撰「我與共產黨」中敘述中共「一大」第四天晚上，遭法租界巡捕搜查訊問及大東旅社女人孔阿琴情殺案大體相符（註十九）。一九二一年八月六日上海英文「大陸週報」(The North China Herald)所刊載的情殺案消息（註二十），也證明陳公博的「遊記」所述案件確實可靠。

其他出席「一大」代表董必武、包惠僧、陳潭秋、周佛海都指明「一大」會議由開幕至發生巡捕搜查會場止，連續開了四次會議，而且是在晚間開會（註廿一）。據此回算：孔阿琴案發生於七月三十一日清晨，中共「一大」被巡捕搜查的第四次會議，應爲前一日，即七月三十日晚上，再回算三天：二十九日爲第三次會議，二十八日爲第二次會議，七月二十七日便是中共「一大」召開的第一天，也就是中

共建黨的紀念日，至於三十一日在南湖遊艇上的會議，那是最後一天的第五次會議了。（註廿二）因此，這篇論文的結論是：中共「一大」召開應是一九二一年七月廿七日，而非七月一日。中共「一大」代表應是十三人，而非十二人。

五、俄文資料——七月二十三日

大陸出版的「中國社會科學」雜誌一九八〇年第一期，邵維正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日期和出席人數的考證」文章，其中「一大」出席代表人數與自由世界學者的研究大體相符，同為十三人，在此不予論述；關於「一大」開會日期，被定為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一節，是為該文的新論點。不過這一考證，雖然在開幕日方面同為七月二十三日與鄧文光的猜測一樣，但資料來源不同，鄧文係根據「荷花生日」的猜測，鄧文是根據一篇沒有作者姓名、沒有寫作時間、地點、用途的俄文短文而來（見附錄）。

此一短文，題為「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下註：「此件是中共「一大」後向共產國際的報告。作者不明。本文譯自俄文本」。邵維正引用此一短文時稱：「從內容和文字上分析，此文是「一大」閉幕後不久寫的，似出自當事人的手筆。」

此一文件，不像如註釋所說為中共中央會後向共產國際的報告。因為在文件中，第一，沒有與會代表的姓名；第二，會議「主席張同志」，不說張國燾，「領導人是……陳同志」，不說陳獨秀；第三，

最後說「選舉了三個同志組成書記處，又選出了組織部和宣傳委員會」，可是無姓無名。如果中共中央正式向共產國際報告，不會連當選人的姓名也不向上級報備的。

此文原係俄文（似非由中文翻譯成俄文的），從內容看，也不像中國人寫的報告，譬如第一，對「一大」會議，說是「在一個同志家召開的」，如果是中國人寫的，起碼會說在李家或李漢俊家召開的，或者說在法租界貝勒路召開的；第二，會址被法國巡捕搜查後，會議移至嘉興南湖繼續開完最後一次大會，原文僅說「只好到附近的一個不大的小城市去」。原作者連「嘉興」、「南湖」都說不上來（南湖遊艇上開會，時過境遷，更無保密可言），足見原作者未參加南湖會議。第三，文中說：「在中國，『官』這個詞……」好像作者是外國人。

然則是那個外國人呢？筆者以為到會的十三個代表及國際代表馬林等（馬林曾用英文向共產國際作報告，把中共成立與日共、韓共問題一起報告的）二人中，只有赤色職工國際代表李克諾斯基能够用俄文寫報告（按：馬林、李克諾斯基、陳公博、李漢俊均未參加南湖的最後一次會議）。此說如果成立，那麼，邵維正所說，此文「似出自當事人的手筆」一點並沒有錯，不過這個當事人不是會議代表，而是俄國毛子。

問題在於此文有許多存疑之處，譬如說：

- 第一，文中說：到會代表十二人。其實是十三人，何以作者會像毛澤東一樣有意減少一人呢？
- 第二，文中說：「各地代表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全部到達上海，於是代表大會開幕了。」代表當天

才到齊，當天就正式開大會，這種可能是不大的。因為大會的許多問題，在陳獨秀、李大釗兩位要角都不能出席情況下，更需要會前的協商，如代表住地之安排，會場地址的選擇，黨綱、決議、宣言起草的分工，議事日程的擬訂，會議主席與紀錄的推選，會議安全的佈置等等，都不是代表一到就解決了的。

第三，文件說：「根據希夫廖特同志（按：即馬林）的建議決定選出一個起草綱領和工作計畫的委員會，給予委員會兩天時間起草計畫和綱領，在這個期間沒有開會。」也就是邵維正所說的「休會兩天前兩天會議是預備會或籌備會。而且曾寫回憶錄或訪問紀錄的八個代表，從來沒有一個說過休會兩天。中共「一大」開會不過一週左右，時間緊湊，中間休會兩天，是一件大事，任何代表都不會忽略或忘記，何以沒有一個代表提及此事？足見文件所說之可靠性，令人懷疑。

第四，「一大」開會經過，包惠僧曾說：「會期原定四天至五天，每天開會是在下午八點鐘。第一天的會各地代表及馬林和李克諾斯基都出席了，主席是張國燾。第一項議程就是馬林的報告……接着李克諾斯基報告……第二、三兩天的會，馬林和李克諾斯基沒有出席，各地代表的工作報告都很簡短。因為黨在誕生初期，工作還不多。這兩天的時間集中討論兩個問題：第一是『黨綱』，第二是『勞動運動計畫』。」（註廿三）俄文資料所說休會兩天，可能是大會的第二第三兩天，也是集中討論「黨綱」和「勞動運動計畫」的時候。因為兩位國際代表「沒有出席」，就可能被誤為休會或「沒有開會」。事實上每天晚上開會，白天可以起草黨綱和計畫，提付晚上討論，無需休會兩天來草擬文件。

第五，既然「各地代表的工作報告很簡短」，那麼，俄文資料所說：會議主席說明大會意義，擬定議事日程以及聽取各地方小組的報告，「這一共佔用了兩天的時間」，可能又是不實之詞。

總之，輕信一件沒有寫作時間地點用途與作者姓名的俄文資料，並從而得出結論是欠妥的。

六、結論——且看新資料解答

在中共「一大」召開日期的若干考證中，有一件案件的發生時間地點與經過，業被證明是確實的，那就是陳公博在最早的遊記「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及「一大」廿二年以後「我與共產黨」中所說的大東旅社孔阿琴情殺案。這一案件發生於一九二一年七月卅一日，過去筆者研究本案時所能得到的資料，僅有哈佛大學燕京社寄來的「大陸週報」複印本，該報證明陳公博所說的孔案發生的時地與經過都是正確的。現在邵維正的考證更提供了新的證據說：「一九二一年八月一日上海『新聞報』，刊登了『大東旅社內發生謀斃案』的消息，八月二日又報導『大東旅館中命案續聞』。上海『申報』一九二一年八月一日第十四版，也刊載了『大東旅社內發現謀命案，被害者爲一衣服麗都之少婦』的新聞，內容與『新聞報』相似。這兩家報紙的新聞都是說的孔阿琴的被殺案件，時間是七月卅一日。」（註廿四）因此，陳公博的記述是完全可信的。

由此亦可說明陳公博所述孔阿琴案的前一晚，即法國巡捕搜查「一大」會場的那一晚，就是七月卅日晚上。又據董必武、陳潭秋、李達、包惠僧、周佛海以及南湖會議安排者王會吾等六人的回憶，上海

最後一次會議被巡捕搜查中斷後，第二天即乘火車赴南湖開會，中間沒有停會（只有張國燾一人說中間停會一天，不可信），因此，上海最後一次會議是七月三十日，南湖會議是七月卅一日，那是中共「一大」最後一次的閉幕會議了。

至此，問題的關鍵就在於有何資料足以證明七月卅日的會議，究竟是「一大」在上海舉行的第幾次會議？邵維正採用俄文資料所說的那是第六次會議；依此回算：廿九日是第五次會議，廿八日是第四次會議廿七日是第三次會議，廿六日和廿五日休會，廿四日是第二次會議，廿三日便是建黨開幕日了。

奇怪的是：指證在上海舉行的最後一次會議為第六次會議的，除俄文資料外，僅有周佛海的半個人，周佛海在「我逃出了赤都武漢」一文中說過：「誰知道了第六晚，爲上海法租界包探偵知，正在開會討論的時候，忽然來了一形迹可疑的人，闖入屋內，一望而去，我們知道不妙，隨即散會……」（註廿六）。可是在「扶桑爰影溯當年」的另一回憶中，周佛海又說……會議是「在貝勒路李漢俊家，每晚開會。」「開到第四晚時」，發生了巡捕圍搜會場事件。（註廿七）

指證「一大」會議在上海開到第四晚發生巡捕圍搜會場事件的代表，除周佛海半個人外，還有如下各人：

陳公博：「短短會期四、五日，……但一連四日都在李漢俊的貝勒路家內開會。」當第四晚會議時，發生了警探搜查事件（註廿八）。

包惠僧：「會議開會的時間，是在各學校放了暑假以後，……會議原定四天至五天，每天開會是在

下午八點鐘。」會議開至「第四天……開會後不到半個鐘點，……就來了幾個包打聽和武裝巡捕，搜查了一番。」（註廿九）

陳潭秋：會議開了四天，第四天的會議是在晚上八點鐘開始，正當會議進行中，就發生了警探圍搜會場事件。（註三十）

董必武：「董老還講到兩個情況：一是在第一次代表大會第五天——也是最後一天，爲了避免敵探警察的搜捕，不得不遷到浙江嘉興南湖的小船上舉行……」。這是間接承認代表大會第四天發生圍搜會場事件，才有第五天移至南湖的最後一次會議。（註卅一）

以上共有五人（嚴格說應是四人半）供證「一大」第四次會議晚上發生警探圍搜會場事件，寫有回憶錄的八個人，除毛澤東、張國燾、李達三人外，竟有五人不約而同的如此指證，照常理言，應該是比較可信的。邵維正何以不作此想？何以偏信一紙俄文資料？是否又是「父子黨」時期，「崇俄媚外」的餘毒使然？！

因此，在今天還沒有更多的資料，足以駁倒「一大」第四次會議發生警探圍搜會場事件之前，筆者仍然相信七月廿七日是「一大」開幕的一天，也就是中共建黨的日期。

筆者以「且看新資料解答」作爲結論，也作爲願望，深盼有一天能發現更新的資料，藉以解答研究的困難和矛盾。

一九八二年七月寫於木柵

註 釋

- 註一：陳然先生提供的資料。
- 註二：米夫：「中國共產黨英勇奮鬥的十五年」，一九三六年莫斯科印行。
- 註三：同註一。
- 註四：邵維正：「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日期和出席人數的考證」，「中國社會科學」一九八〇年第一期，北京出版。
- 註五：李達、張國燾的回憶錄均在中共中央決定七一為建黨紀念日之後發表，李為一九六一年七月，張為一九六六年六月。
- 註六：據邵維正說：劉仁靜有過訪問錄，似未公開發行。
- 註七：李達：「沿着革命的道路前進」，「中國青年」第十三、十四期合刊，一九六一、七、五。
- 註八：張國燾：「我的回憶」，「明報月刊」第六期，一九六六、六、一。
- 註九：史諾：「毛澤東自傳」，一九三六年下半年於陝北保安。
- 註十：見佩恩 (Rober Payne)：Mao Tse-tung-Ruler of Red China (Cherry Schuman Inc., New York, 1950, 1st edition) P. 71.
- 註十一：陳潭秋：「一大大會的回憶」，莫斯科「共產國際」一九三六年第十四期，英文版一九三六年十月號。
- 註十二：韋慕庭的考證，譯載臺北「匪情月報」第十一卷第五期。
- 註十三：周守謹、石在：「『七一』前夕訪南湖」，「新觀察」第十三期，一九五六、七、一。
- 註十四：此人就是李達的妻子王會吾。
- 註十五：鄭鶴聲編：「近世中西史日對照表」，國立編譯館編訂，台灣商務印書館發行，一九六二、一月臺北初版。
- 註十六：鄧文光：「中共建黨日期的研究」，「人物與思想」第三十三期，香港，一九六九、二、十五。

註十七：此一論文現列入「中共史論」（中文本）第一冊（第三版）增補二。

註十八：見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新青年」九卷三號。當時「新青年」經常脫期出版，九卷三號實際出版時間爲八月。因九卷四號，雖署名爲一九二一年八月一日出版，但所載陳獨秀覆蔡和森的信：「我前幾天回到上海，才見到你的信。」查陳係九月返滬，足見九卷四號係九月出版的。

註十九：孔阿琴案兇手爲瞿松林。陳公博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甲浦」遊記中有此記述，但經過廿二年後陳所撰之「我與共產黨」一書則稱兇手姓名忘記了，這是合理的。見「寒風集」，上海一九三六年版。

註二十：美國哈佛大學燕京社圖書館藏有該項資料，筆者所用係該館寄來之複印本。

註廿一：董必武（談中共一大）、陳公博（我與共產黨）、包惠僧（中共成立前後的見聞）、陳潭秋（中共一大的回憶）、周佛海（扶桑笈影溯當年）都說開至第四晚會議（晚上）發生巡捕查抄會場事件（周佛海在另一回憶錄「逃出了赤都武漢」又說是第六晚），只有張國燾一人說是分上、下午開會，會議開了八次（我的回憶），此說不可靠。

註廿二：七月廿七日「一大」開幕，與陳潭秋所說「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會議是在七月底召開的」大體相符。見陳潭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回憶」，「共產國際」（美國版）第十三卷，第十期，一九三六年十月。

註廿三：棲梧老人（按：卽包惠僧）：「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後的見聞」，北京「新觀察」一九五七年第十三期，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出版。

註廿四：同註四。

註廿五：同註四。

註廿六：「陳公博、周佛海回憶錄合編」，香港春秋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四月初版。

註廿七：同註廿六。

註廿八：陳公博：「我與共產黨」，同註廿六。

註廿九：同註廿三。

註三十：同註十一。

註卅一：董必武：「董必武談中共一大」，北京「中國青年報」，一九五六年九月五日。

附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註一）

中國的共產主義組織是從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該組織一共只有五個人。領導人是很受歡迎的「新青年」的主編陳同志。這個組織逐漸擴大了自己的活動範圍，現在共有六個小組，有五十三個黨員。代表大會預定六月二十日召開，但是來自北京、漢口、廣州、長沙、濟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全部到達上海，於是代表大會開幕了。參加大會的有十二名代表，他們來自七個地方，包括上海在內，兩個地方各有一名代表，五個地方各有兩名代表。

主席張同志在第一次會議上說明了這次代表大會的意義，大會必須制定綱領（俄文為憲法——譯者註）和實際工作計畫。擬定了議事日程，聽取了關於各個地方小組的活動及其總的情況的報告。這一共佔用了兩天的時間。這些報告裏都提到了以下三點：黨員很缺少，必須增加黨員，組織工人的方法和進行宣傳工作的方法。我們在這裏非常高興地說，希夫廖特同志和尼柯爾斯基同志出席了第一次代表大會，並給我們做了寶貴的指示。希夫廖特同志在其發言中談到了他在爪哇的活動，並向我們建議，要特別注意建立工人的組織。

註一：此件是中共「一大」後向共產國際的報告。作者不明。本文譯自俄文本。

尼柯爾斯基同志把成立遠東局的情況告訴了我們，並向我們述說了他對俄國的印象。在這個報告以後，根據尼柯爾斯基同志的建議，我們決定打電報給伊爾庫茨克，告訴他們代表大會的進程。根據希夫廖特同志的建議，決定選出一個起草綱領和工作計畫的委員會，給予委員會兩天時間起草計畫和綱領，在這個期間沒有開會。

代表大會第三、四、五次會議專門研究了綱領，有些問題經過長時間爭論以後，做出了最後決定，只有引起熱烈爭論的一點除外。這一點就是黨員能否得到執行委員會許可做官和做國會議員。對這個問題有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我們的黨員做官沒有任何危險，並且建議挑選黨員加入國會，以使他們在黨的領導下進行工作。另一方面不同意上面的意見。在第三次會議上，代表們沒有得出任何結論，在第四次會議上，辯論更加激烈了。一方堅持認為，採納國會制會把我們的黨變成黃色的黨，他們以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例子證明，人們加入國會就會逐漸放棄自己的原則，成為資產階級的一部分，變成叛徒，把國會制認為是鬭爭和工作的唯一方式。爲了不同資產階級採取任何共同行動，爲了集中我們的力量進攻，我們不應當參加國會，而應當在國會外進行鬭爭。而且，利用國會也不可能使我們的情況有任何好轉，加入國會，就會使人民有可能認為，利用國會，也只有利用國會，才能使我們的情況好轉，才能爲發展社會革命事業服務。另一方堅持主張，我們必須把公開的和秘密的工作結合起來。如果我們不相信在二十四小時內可以把國家消滅掉，不相信總罷工會被資本家鎮壓下去，那麼政治活動就是必要的。起

義的機會不會常有，它很少到來，可是我們在平時要做準備。我們應該改善工人的狀況，擴大他們的眼界，引導他們參加革命鬭爭和爭取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的鬭爭。因為公開宣傳我們的理論，是取得成就的絕對必要條件。而利用同其他被壓迫黨派在國會中的共同行動，也可以部分地取得成就。但是，我們要向人民指出：希望在舊制度的範圍內建設新社會是無益的，即使試作一下也是無益的。工人階級必須自己解放自己，因為不能強迫他們進行革命。否則，他們會對國會抱有幻想，採取和平的方式，而不採用澈底的手段。

這個問題最後還是沒有得出結論，只好留到下次代表大會來解決。至於談到我們是否應該做官的問題，這個問題有意識地迴避了，但是，我們一致認為不應當作部長、省長，一般的不應當任重要行政職務。在中國「官」這個詞普遍應用在所有這些職務上。但是，我們允許我們的同志做類似廠長這樣的官。

代表大會第六次會議是在深夜裏在一個同志家召開的。會議剛開始，有一個偵探闖到了屋裏，他道歉說走錯了，可是終究不允許我們繼續開會了。這個偵探的到來，並沒有給黨帶來損失，盡管在他來過以後，很快地警察就突然進行了搜查。在這以後，我們提高了警惕，爲了使代表大會繼續開會，只好到附近的一個不大的小城市去。在那裏，我們研究了委員會起草的實際工作計畫。在我們對其他黨派的態度問題上，產生了短時間的爭論。有人說，我們認為不論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無產階級應該永遠和其他黨派進行鬭爭。同其他黨派共同行動，並不違背我們黨的原則，我們還應當竭盡全力與一切分子合作，

反對共同的敵人，而我國的軍閥就是社會上一切其他階級的敵人。另一些人主張，在行動上要與其他黨派合作反對共同的敵人，同時，我們不能失掉原則，在我們的報紙上要批評他們。即使我們自己不能立即奪取政權，至少可以加強自己，以便進一步採取行動，因為我們的力量由於這方面的成就一定會加強，代替現在的統治階級的那個統治階級或許不敢像封建老爺那樣壓迫人。這樣，我們就可以集中自己的革命力量，擴大自己的革命活動。這樣，即使無產階級現在不能取得政權，我們也要聯合其他階級壓迫共同的敵人，加強自己，使我們能夠進一步進行鬭爭，推翻那個獲得了政權的階級。由此可見，我們聯合其他階級，只是爲了進行破壞性的鬭爭。但是，會議對第一種意見，即實際工作計畫起草委員會的建議，作了決定。

因爲黨員少，關於組織農民和軍隊的問題成了懸案，決定集中我們的精力組織工廠工人。爲了把好的可靠的同志吸收到自己這方面來。決定接受黨員要特別謹慎，嚴加選擇。鑒於我們的黨到現在爲止幾乎完全是由於知識分子組成的，所以代表大會決定要特別注意組織工人，以共產主義精神教育他們。委託黨中央局起草了黨章。選舉了三個同志組成書記處，又選出了組織部和宣傳委員會，代表大會高呼下面的口號而宣告閉幕：「共產黨萬歲、第三國際萬歲、共產主義、人類的解放者萬歲。」（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供稿）（錄自黨史資料叢刊一九八〇年第一輯上海人民出版社）

國立政治大學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中文叢書系列第60冊

中共史論 第一冊

著者：郭華

發行者：張京育

出版者：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臺北市木柵區萬壽路六四號

九三九九四九二一（六線）

郵政劃撥：〇〇〇三四三六一二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印刷者：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中和市中正路八〇〇號

二二三一三二七一九

初版：中華民國五十八年九月

增訂版：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六月

三版：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六月

四版：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十月

四版二刷：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六月

平裝本：全套四冊 實售新台幣八〇〇元
（郵資另加）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